

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 二十道 陰影下的 自由

區家麟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區家麟**，史丹福大學奈特新聞學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哲學博士，現任該院專業顧問，兼任香港電台烽煙節目主持，擁有超過 25 年香港傳媒行業經驗。著有《潮池》、《他他巴》、《傘聚》（獲 2015 年香港書獎），曾任無綫電視新聞及資訊部公共事務科高級監製、時事節目《新聞透視》主持，所監製及採訪之新聞紀錄片曾獲皮博迪大獎、中大新聞獎等獎項。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邊城思想者系列

#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

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區家麟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 邊城思想者系列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區家麟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7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770-3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 BORDERTOWN THINKER SERIES

*Twenty Shades of Freedom:*

*Media Censorship Routines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By Au Ka-lun All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770-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 . . 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s,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alized.”

—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李立峯序 xiii

劉進圖序 xv

# 1 序篇

下一站天國 3

請讓我慢慢說 4

審查時分 5

借來的時間 9

六年 13

# 2 破篇： 新聞運作六種迷思

2.1 審查的迷思—— 內心一條蟲、斗室有大象 19

2.2 專業的光環—— 一襲華麗外衣 26

2.3 中立的神壇—— 客觀持平萬能 key 33

2.4 慣性的暗湧—— 折服於平淡的日常 55

2.5 機構的皇牌—— 老闆才擁有新聞自由 65

2.6 制度的枷鎖—— 我們會飛，但已不懂拍翼 69

# 3 立 篇： 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 3.1 進退 · 行止（規範系統） 87
  - 3.1.1 | 假平衡 · 偽中立 87
    - 第一道陰影：不對稱平衡 95
    - 第二道陰影：強力平衡 99
  - 3.1.2 | 迷信高官權威 102
    - 第三道陰影：唯權是尚 103
    - 第四道陰影：官話必真 115
  - 3.1.3 | 積極客觀 · 被動客觀 119
    - 第五道陰影：後天下之憂而憂 120
    - 第六道陰影：積極不對焦 123
  - 3.1.4 | 飄移境界 · 雙重標準 126
    - 第七道陰影：龍門飄移 127
    - 第八道陰影：重劃禁區 132
  - 3.1.5 | 集大成之「洗頭艇事件」 136
  - 3.1.6 | 搖尾狗還是看門狗 140
- 3.2 規律 · 日常（文化認知系統） 143
  - 3.2.1 | 車衣生涯 · 極度分工 144
    - 第九道陰影：生產線常規化 145
    - 第十道陰影：血汗工場削自主 147

- 3.2.2 | 形式指揮腦袋 152  
    | 第十一道陰影：取悅大眾·擁抱平庸 153  
    | 第十二道陰影：追逐利潤·迷失本業 155

- 3.2.3 | 作為與不作為 160

### 3.3 操控·賞罰（管控系統） 163

- 3.3.1 | 操控資源分配 164  
    | 第十三道陰影：陰乾設框限 164  
    | 第十四道陰影：陰乾滅士氣 169

- 3.3.2 | 舞弄人事升遷 172  
    | 第十五道陰影：幼嫩培育 174  
    | 第十六道陰影：邊緣化羞辱 178  
    | 第十七道陰影：同聲同氣新秩序 181

- 3.3.3 | 妙用行政權力 183  
    | 第十八道陰影：調兵遣將·滅於萌芽 183  
    | 第十九道陰影：前提預設·先發制人 185  
    | 第二十道陰影：橫刀干預·後發先至 189

- 3.3.4 | 陰影重重·明暗之間 191

- 3.3.5 | 拈花微笑·不著痕跡 193

## 4 案例篇： 結構性審查實錄

- 4.1 佔領運動——報道與不報道的斷崖上 199
  - 4.1.1 | 消失了的人，不存在的事 199
  - 4.1.2 | 暴力、混亂、內訌 203
  - 4.1.3 | 辭彙之語言藝術 205
  - 4.1.4 | 七警事件：傳說中的百分百中立 208
  
- 4.2 中國採訪——大海航行靠舵手 216
  - 4.2.1 | 資源調配：承傳經驗 vs 自斷經脈 218
  - 4.2.2 | 制約措施：破浪乘風 vs 一葉孤舟 224

## 5 逆流篇： 激流中的點滴浪花

- 5.1 遊戲規則之遊戲規則 237
  - 5.1.1 | 管理文化·誰主浮沉 237
  - 5.1.2 | 文化資本·鴻溝隔閡 242
  - 5.1.3 | 背景依賴·各有前因 245

- 5.2 逆流的勇氣·抗衡的可能 252
  - 5.2.1 | 衝突點：專業價值之張力 253
  - 5.2.2 | 板塊碰撞處：專業 vs 市場 255
  - 5.2.3 | 板塊碰撞處：專業 vs 企業 257
  - 5.2.4 | 板塊碰撞處：專業 vs 國家 260

## 6 結語篇： 審查新境界

- 6.1 再思自我審查——你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沒有 269
  - 6.1.1 | 自我審查難認定 269
  - 6.1.2 | 就在陽光空氣中 273
- 6.2 再思客觀——不追求中立，追求真實 280
- 6.3 最後，還有七個自問自答 285

跋 295

參考文獻 297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李立峯序

2002年，香港的新聞自由程度，在無國界記者的排名榜上是全球第18位。2017年，香港的排名跌至第73位。

香港的新聞自由困境，根源在於政治經濟結構。不過，大老闆是誰，不能解釋所有媒體現象。吳光正是全國政協，何柱國是全國政協，李澤楷是北京市政協，但有線新聞、《星島日報》和Now新聞還是有分別的。雨傘運動參與者極不信任TVB，但拍下七警動武的正是TVB。不管電視台高層後來如何處理該新聞，影像是先被拍下來和播放了，後來更成為呈堂證供。

媒體的表現充滿內在矛盾。很多市民和記者都認為主流媒體有自我審查，但要充分了解這些「審查」如何發生，殊不容易，因為新聞機構有其複雜性、新聞理念有其模糊性、新聞工作者有能动性、新聞事件有偶然性。結果，「審查」這東西難以捉摸，甚至不易定義，自然也難以分析。

不過，本書把這個千絲萬縷的題目闡釋得有條不紊，而且充滿洞見。區家麟在〈序篇〉中說，帶著二十年工作經驗回歸校園，使他「體會『理論與經驗結合』的實在」。同樣地，這本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書，也展現了理論和經驗結合的威力。

這不只是一本分析新聞媒體（自我）審查的書。我相信，這本書對我們了解香港社會也有很大幫助。社會制度和機構的運作如何

在有意或無意間蠶食自由和專業自主，大概不單是新聞界要面對的問題。這是一本所有關心香港社會轉變的人都應該閱讀的書。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 劉進圖序

新聞自我審查往往難以發現，所以無從防止。當新聞主管收到施壓的電話，轉過頭便剪裁新聞內容，外人根本難以得知。然而，這種初階自我審查還是有痕跡的，新聞機構內的員工是知道的。更可怕的是，當自我審查的意識深入各級主管的腦海，迴避敏感預防壓力成為機構的文化，自我審查就無跡可尋，連電話也沒有，一切就像自然而然地發生。

面對幾近無跡可尋的新聞自我審查現象，我們需要曾經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又脫離了這環境的新聞人，借助學術研究的調查和批判能力，深入剖析隱蔽式自我審查運作背後的程式密碼，區家麟的《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為我們提供了解開密碼的鑰匙。

區家麟和我都是在風起雲湧的1989年加入香港新聞界，他做電視，我做報紙，偶然在採訪場合相遇，彼此敬重。四分一個世紀過去，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結緣，我兼職教傳播法，他做博士論文專研新聞審查，又教新聞實戰心得，偶爾談起新聞行業日走下坡，內外交困，不免百感交集。我們都在問，可以為下一代人做甚麼？

要抗衡新聞自我審查的洪流，除了要有辨識的能力，手握破解審查運作程式密碼的鑰匙，還要在每個重要的新聞戰線，如電台、

電視台、報紙、網站，都有最少一個機構，是敢於按正常新聞邏輯運作的，能夠為每天的新聞產出提供「基準」，折射出周邊同類新聞機構自殘的陰影。

香港過去不缺這樣的「基準」，如今卻岌岌可危。一群已經上了岸的新聞老兵再度下海，發起一個稱為「眾新聞」的小型網站，承諾純按公眾利益和新聞專業準則運作，就是想在新媒體領域樹立一個「基準」。但願香港有更多新新舊舊的基準。

劉進圖

《明報》前總編輯  
明報教育出版營運總裁  
「眾新聞」發起人

# 1 序 篇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下一站天國

無數個下午與黃昏，我凝望餐桌對面的新聞人，聽他娓娓道來那些鮮為人知的新聞運作悲喜劇；晃眼間，兩小時、三小時過去。

我們選的地方都很寧靜，偶爾傳來刀叉匙碟清脆碰撞聲，刺不破對話的無奈、化不開鬱悶眼神，卻看透了隱密審查新境界。

他終於離職了，訪談中，他突然抬起頭說：「對不起，我捍衛不到。」然後，沉默良久。

堅強而看似豁達的她，最後說：「我不服氣。」斗大淚珠流到了唇邊。

他的語調，深沉如大海，平淡如日常，說了一個笑話：「有些主管，體力上好辛苦，因為天天要搬龍門。」說完，他沒半絲笑意，神情一貫肅穆。

鏡頭一轉，眼前又是另一張臉龐。他們每一位，都是香港電子媒體的新聞工作者，由記者，到採訪主任，到主管級人物，總共69人。漫長的訪問，一對一的沉思，我想起日本電影《下一站·天國》的場景，靜默小屋中，每個人在輪迴轉世間，走向天堂地獄時，有數天光景，整理自己的回憶。

為他們整理回憶的人，也有很多一言難盡的往事。

有人不願回望，有人不肯忘記；有人背叛了自己，懵然不知；有人處之泰然，彷彿千帆過盡，已無力哀傷。

一位老記者說，也許他已妥協到一個地步，自己也不知道在自我審查：「不如你告訴我，我有甚麼做錯了，自己卻不知道。」

一位年輕記者說：「我不覺得自己是記者；我寫的，不是我學的新聞。」

訪談中，也有些笑聲。有位記者回想起，有一天，偶然間同事發現她在大學唸書時精采的採訪大作，她記起同事滿臉疑惑：「她問我，為何現時不拍這些故事？」

她哈哈大笑，響亮地說：「我好傷心啊，哈哈。」

有很多話要說，請讓我慢慢說。

## 請讓我慢慢說

路，不由自己選擇。

那是上世紀的事了。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人文館，梁偉賢老師的辦公室內。

他說，我首選的香港電台電視部實習名額已滿，TVB新聞部還有餘額，你去TVB實習吧！

TVB？拋頭露面？那時候，大學三年級暑期實習，選擇TVB的同學很少。我猶豫了一會，其實沒有其他選擇，也不太肯定自己喜歡做甚麼，就「是是但但」吧。

那一年，是1989年，實習期6月開始，正式踏入新聞採訪室工作觀察，是6月3日。

那一天，採訪室內，目睹坦克圍城、槍聲震耳、血跡斑斑；世界在崩潰，歷史在冷笑，新聞部在沸騰；那些電視新聞裏熟悉的臉孔，伏案疾書，奔走於剪接室，陷於瘋狂；稍為安靜的時刻，那些權威的記者盯著最新衛星影像，有人呆滯無語，有人淚流滿臉。

如果當年有「廢青」的稱號，我大概都是一個廢青。大學時，只想環遊世界，沒有「生涯規劃」，也沒有認真想過，路，如何走下去。

1989年6月3日，從那一刻起，我知道，沒有回頭路。

大學老師一個看似輕描淡寫的分配指令，我留在TVB新聞部，二十年。

從來不覺得自己有甚麼過人之處，總算遊歷過大半個地球，才發覺自己讀書不夠，要填補很多黑洞與空白；工作上，拿過好些新聞獎，都是團隊努力，都是時勢使然。當過時事節目主持，有舊同時曾經說，很懷念我當主持的年代，因為這位主持長相平庸、聲線平淡，毫無星味，成功令觀眾忘記了主持的存在，把焦點集中於他們的大作上，這確實是一大成就。

低著頭，走了好一段路。後來有一天，有點累，停步下來，回望四周，原來已經走得很遠。

## 審查時分

記者生涯，有很多經歷畢生難忘，足夠講一世：神戶地震塌樓的驚慄、科索沃戰場狙擊手的子彈、眾多無權無勢者的嚎號、每位平凡百姓向你敞開心扉的眼神、觸碰不為人知隱密真相的神聖一刻……

還有一種，無以名之，姑且叫審查時分，絕少對人講。

因為，每次軟弱都加添一分罪疚；每次妥協都直面自己的底線；每次不作為，都會質疑自身能力與勇氣。

第一次遇上「審查」，小事一樁，但記得很清楚。

當記者一兩年後，九十年代初，無大事的一天，我被分配重寫一則台灣新聞，乃當時李登輝總統談兩岸關係的演講。電視片段由台灣來，很完整，我只是重寫、略為縮短、配上粵語旁白而已。李登輝於演講中談大陸，原話用到「共匪」二字，少年的我太天真，

原文照剪輯；後來編輯走過來，硬生生要把李登輝說「共匪」那幾句刪去。「共匪」一詞，是當時國民黨政治語言的現實；況且，兩字不是記者說的，是李登輝的原話，那句更是重點；但編輯一鎚定音，身為小薯，無力爭辯。

那是我第一次，隱隱然觸碰那條無形界線。這叫審查嗎？當時沒有細想，但一直記在心頭。

又一次，也是九七回歸之前，理應百無禁忌，我在剪輯一個有歷史元素的專題故事，當中略提到「六四」，畫面找來了軍隊鎮壓場面，加插了兩三秒民眾呼喊「自由」的原聲。上級很緊張，全條片都沒問題，獨是那兩三秒「自由」要刪去，說是「無關主題」。我很疑惑，電視的專題故事，現場聲音很重要，平常題材，車聲人聲、風聲笛聲、開門關門聲，常常無關主題，我們也不放過；獨是呼喊自由那短短兩三秒聲音，金睛火眼，不容過關。

那時，我沒有爭辯。也許年少無知，也許不夠勇氣；也許明知改變不了，無謂起爭端；也許是說服了自己，以為妥協能換取日後更大的自主空間。

香港傳媒行家聚首，離不開的話題，正是種種奇特的新聞判斷、惹人疑竇的趨吉避凶行為。

有時會問自己，為何那些疑似審查時分，旁觀者看來，應該覺得無關痛癢，大家一直銘記？

原因很簡單，這是踏入醜惡世界的起步點，這是學校老師沒有告訴你的新聞暗角。審查時分，新聞原則面對殘酷現實，奮起反抗還是妥協自闔？夾縫中等待突破機會，你可能助紂為虐；轟轟烈烈瀟灑走一回，你可能粉身碎骨。隱密的操作，摻雜屈辱、權謀，直指人性弱點。



平淡的指令，暗藏殺機；久而久之，習慣了自我設限，訓練自己馴服。所謂審查，若隱若現，往往無形無跡，總有理由解釋；但當事人不可能不察，因為每個疑似審查時分，都伴隨內心交戰，日後矛盾愈來愈尖銳，憤怒鬱結糾纏；忘不了，放不下。

扭曲的世代中，審查時分，各行各業都存在，每種專業都面對，無人倖免。

以下，是在香港新聞行業，綜合各方耳聞目睹、道聽塗說的故事，只屬冰山一角，出現於不同年代、不同機構，可以說是疑似審查行為，也可以說是高超的操控伎倆，大家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 「強力部門」送上認罪訪問，竟然由聽命的突發組負責「採訪」，政治組不知情，不得經手。
- 富豪與高官貪污案，有報館高層下令，只可刊登高官相片，不能刊登富豪相片。
- 傳媒母公司集團開業績記者會，母公司公關擬定問題，要求屬下媒體記者照本宣科發問，採主乖乖從命。
- 一談CEPA、自由行，編輯必加「中央送大禮」字眼。自由貿易，香港一早奉行；做生意互惠互利，為何是「送大禮」？
- 記者報道或有偏頗，偏向建制派的，編輯們隻眼開隻眼閉；偏向民主派的，編輯會大興問罪之師。
- 敢言專欄作家的專欄被停了，編輯說「改版」，後來發現，原來是改一個人的版。

- 為了一個六四周年專輯，有主管打破慣例，跨越七級，直接「關心」記者。
- 一些政治立場傾向泛民的學者，一律不能訪問；一些政治立場傾向建制的學者、北京的法律專家等，則無任歡迎。
- 每逢內地有超大型活動，如奧運會、亞運會、人大政協開會，主管明言，減少報道敏感新聞，原因是人家「擺喜酒」。
- 有主管謂：不需要派「醒目」的記者駐北京。
- 記者想報道內地天災人禍、環境污染、民族問題，「無錢無資源」，不能採訪；報道「神舟太空船升空」、「一帶一路」、領導人外訪，忽然有錢有資源，篇幅愈長愈好。

種種新聞判斷，離奇古怪，最終，總是令有權有勢者獲得不成比例的話語權。這些行為，叫「審查」或「自我審查」嗎？如何理解此等未必有審查之名、卻有審查之實的行為？

有位傳播學師祖曾在一個新聞獎頒獎典禮上說：「香港業界的新聞獎，應考慮增設『最高境界馬屁獎』，候選人不缺。」大家都笑了，笑得有點悲悽。

今時今日，拍馬屁需要高超技巧，監控要神不知鬼不覺；一切隱藏於運作流程中，裝扮得客觀中立兼權威，一切「依法依規」，顯得理所當然。無為而無不為，境界之高，超凡脫俗。

當天遇過的「審查時分」，銘記於心，不敢或忘。不過，相對於今天同業們面對的日常，我當年的其他遭遇，只屬九牛一毛，不提也罷。

## 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有關香港宿命，此句歷久不衰，翻查出處，1968年，長駐東亞與香港的澳洲籍記者 Richard Hughes 曾以此為書名，書寫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不過，「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不是他原創，Hughes 在書中特別鳴謝，此句出自韓素音 1959 年於《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 發表的一篇文章：

擠於強敵狗咬狗骨的爭鬥中，只有寸土的香港竟能與之共存，原因令人困惑費解，但香港取得輝煌成就，就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sup>1</sup>

不過韓素音提到，此句也非她原創，乃源自一位旅居香港、叫 Tom Wu 的上海商人。

香港從來都在夾縫中，當年逃難到香港的上海資本家，亂離中，洞察香港特質，感觸一句，流傳久遠，成為香江名句。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獲「一國兩制」保證與「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借來的時間」，延長至 2047 年。

回歸前不久之 1995 年夏，《財富》雜誌封面以〈香港之死〉為題，<sup>2</sup> 預言九七回歸後香港大倒退，作者叫大家不要裝模作樣，沒有「明天會更好」；香港的命途，兩個字：It's over，「完蛋」。

<sup>1</sup> 英文原文：“Squeezed between giant antagonists crunching huge bones of contention, Hong Kong has achieved within its own narrow territories a co-existence which is baffling, infuriating, incomprehensible, and works splendidly—on borrowed time in a borrowed place.”

<sup>2</sup> 文章見：<https://goo.gl/pwr14H>。

當時，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一笑置之。回歸以後，每逢周年紀念，香港的主旋律傳媒不忘重溫〈香港之死〉，借機揶揄一番，謂英殖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香港回歸祖國形勢大好，一國兩制充分落實云云。回歸十年時，《財富》更發文，承認「我們錯了」。<sup>3</sup>

韶光荏苒，轉眼回歸二十年，當天〈香港之死〉一文，預言逐漸成真。

搞清楚所謂「香港之死」，文章開宗明義，不是說經濟上完蛋，香港繼續是億萬富豪的樂園，一個「能賺很多錢的地方」。但隨著香港「變成北京的殖民地」、「變成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以裙帶關係與貪腐方式管治」而「不再重視法治」，香港將變成「一潭死水」。

「英語將會凋零」、「倚賴廣東話與普通話」；北京的權力核心「將控制全部政府部門」、「立法會議員換上服從的人」、「選擇肯合作的法官」、「委任行政長官」，這些官員將會受到「數以百計由中共派到香港的黨官嚴密監督與指導」、「大阿哥馴服傳媒，逼令自我審查」。

還有其他預言，粗略看來，有七、八成應驗，相比廟街的相士先生或任何一屆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承諾要做的事，命中率都要高。

〈香港之死〉一文最錯的地方，是預計所有劇變在九七回歸一刻就出現。

回歸初年的中國政府，重視國際承諾，「韜光養晦」四字外交真言，常掛在口邊；中央積極示範「兩制」，中聯辦等駐港機構，在香港政事上幾乎隱形；畢竟，香港回歸事小，以香港為楷模向台灣示

---

<sup>3</sup> 文章見：<https://goo.gl/girwFJ>。

範一國兩制才是千秋大業；九十年代末，也是中國經濟改革攻堅期，國企改造需要大量外來的人才資金與技術，香港的「窗口」、「橋樑」地位穩固，仍是會生金蛋的鵝。

經濟奇跡下的中國，這幾年摸索了一條「經濟騰飛，政治鐵腕」的新道路。對香港，則強調「一國」之威權，貶「兩制」之自治。內地學者朱學勤形容，中國的改革開放，簡單而言，就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Leninism) 轉變成「市場列寧主義」(Market-Leninism)，即是說，馬克思的平等均富烏托邦，變成了市場經濟，但「列寧主義」從來無變。「列寧主義」概括而言，就是堅決由黨管政府、黨管軍隊、黨管媒體；<sup>4</sup> 中國擁有全球最高的網絡防火牆，是全球網絡自由度最低的國家。<sup>5</sup>

借來的香港，其特質從來如是：孫中山南來學醫，選擇香港鼓吹革命是因為香港享有更大自由；<sup>6</sup>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文人南遷香港，看不起香港如「野孩子」、受西方價值「奴化」，「地小人笨」；那為何要來呢，是因為小島的「自由空氣」「討人喜歡」。<sup>7</sup>

1949年江山易主，上海資本家急急轉移資產與機械，大江大海之間，只有香港一隅能成為避風港；數以百萬計難民，為逃避政治運動狂潮，翻山涉水，越過深圳河，來到獅子山下借來的地方，圖安身之所、覓自由之地。資本流動與資訊自由，造就香港成為金

---

<sup>4</sup> 朱學勤，2008。

<sup>5</sup> 2016年「自由之家」評中國為全世界網絡自由得分最低國家，網址：<https://goo.gl/zeK0i2>。

<sup>6</sup> 見孫中山之回憶錄《孫文學說》，1927：96。

<sup>7</sup> 楊彥歧，〈香港半年〉，1941；載於盧璋鑾所編之《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1983：207-211。

融中心；貨物流動的自由，造就香港成為航運樞紐；言論表達自由，令香港成為「抗議之都」、成為外國傳媒窺探神州的大本營，六四燭光之海，近三十載以後仍在維園點亮。

經濟自由、資訊自由，從來都是香港特質，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逐漸成為基本的核心價值。望向北方，是財雄勢大、精於管控傳媒的威權主義強國；回望香港，經濟上獨特地位漸降，管控的無形之手近在咫尺，喪鐘喚醒了香港「自由之魂」。<sup>8</sup>

威權管治與自由之魂，猶如兩塊碰撞的地殼板塊。地質研究，看岩層板塊碰撞之處；歷史詭譎轉折，也是看新舊秩序板塊撞擊之時。

回歸初年的平靜，已成過去。回歸二十年，板塊碰擊進入活躍期，真正的回歸到臨。

回歸二十年來，曾經承諾的民主政制遙遙無期，每年的回歸紀念日也是抗議日；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反而隨時日消滅，低處未算低，人心未回歸，更似乎愈走愈遠。

我們考察地質，要遊走灘岸，尋覓頑石上微細的褶皺與紋理，細看沙礫晶體，觀察裂紋走向，從而推論斷層活動的故事。我們考察傳媒，也是觀察板塊碰擊交疊處，價值扭曲變形，原則遭擠壓破壞，看地獄之火竄升，荒唐異象燎原。

香港新聞媒體，處於板塊碰撞的斷層夾縫中，身處摩擦激盪前沿。研究新聞審查，不光是一個行業的事，也是我們處身時代的斷崖中，每個人似曾相識的掙扎故事。

---

<sup>8</sup> 方志恆等，2015。

## 六年

神劇《天與地》經典一幕，電台主管暴躁拍門，指罵下屬，阻止直播，節目主持不顧一切狂呼：「無錯！現在大家聽到的砰砰聲，就是強權與制度下的代表！在建制下的當權者，他們最恐懼的，就是他們管治的人不聽話……」

不對不對，不夠真實。

今時今日，強權的聲音，不會氣急敗壞，都很悅耳動聽，甚至笑容溫婉、和顏悅色。直接而激烈的對抗，幾乎不存在。

本書源自本人的博士研究論文，從新的「結構性審查」角度，看新聞審查新境界。書與論文的分別，主要在縮減了理論框架篇幅，減少學術詞彙，談到重要概念時增加例子，多說故事，務求簡明易讀。

工作了一段長時間，重回校園讀書，最大的優勢，是體會「理論與經驗結合」的實在；那些看似抽象的理論框架，結合實際經驗觀之，不再離地，原來皆言之有物，能夠解開工作期間積累的種種疑竇。

我算是比較幸運，因為決定讀博士課程前，已確定要研究「審查新境界」。我不是為了讀博士而去找研究來做，而是為了研究「新聞審查」而唸博士。一唸六年。

另一個幸運之處，我毋須像其他同學一樣，因為助學金、住宿、生活費等問題，而要盡快畢業。我預留時間，給自己慢慢來，寫一篇文，用上幾年時間，似乎很奢侈。

感謝指導老師們——蘇鑰機教授、李立峯教授及陳韜文教授多年來指導，建議各種方向，開啟了一道又一道知識大門。最後階

段寫論文，教授們一直忠告，需要非常專注，放下雜務，而且要極有紀律，每天若能逼自己寫兩頁紙，連續半年，就完事了。

最後寫作階段，我用了一整年。

這一年，把心一橫，五時多就起床，等待黎明，寂然的城市，泛黃燈光下衝刺一輪，還只是早上七時多，頓覺一天平白多賺了兩小時。

早起而不損健康，還要精神奕奕，當然要早睡。反正晚上的時間甚多煩擾，時間不好用，腦袋亦難集中，索性每晚十時多入睡，就能每天保持六、七小時睡眠。要令習慣持續可行，需要更大決心：減少晚間應酬，不追劇，關電視，關電話，當然還有家人配合。

時間挪移轉換，晚上的瑣碎時間，換成難得寧靜的晨曦光影，盡用腦袋睡眠修復後最靈巧的時刻；不單賺得了時間，還找到自己的節奏，開啟小宇宙，終於，大功告成。

本書主要分五個篇章，〈破篇〉首先打破迷思，摘下「專業」、「客觀」、「中立」等光環，指出運作慣性、機構權力等常為人忽略的操控渠道。〈立篇〉闡述研究主要發現：新聞審查的二十道陰影，二十種潛藏於機構運作中的「結構性審查行徑」。〈案例篇〉用「佔領運動」及「中國採訪」作案例，詳述如何具體運用「結構性審查行徑」分析新聞運作。〈逆流篇〉講述機構權力架構中，誰主浮沉，體制中人如激流中的點滴浪花，有沒有抗衡的可能。〈結語篇〉再釋「自我審查」、「結構性審查」、「客觀」、「中立」之義。

研究範圍雖然只及香港廣播媒體，但「結構性審查」概念，能套用於其他媒體，甚至其他專業。



你可視本書歸納的種種「結構性審查行徑」，為傳媒自闢路線圖、審查利器一覽表、暗渡陳倉新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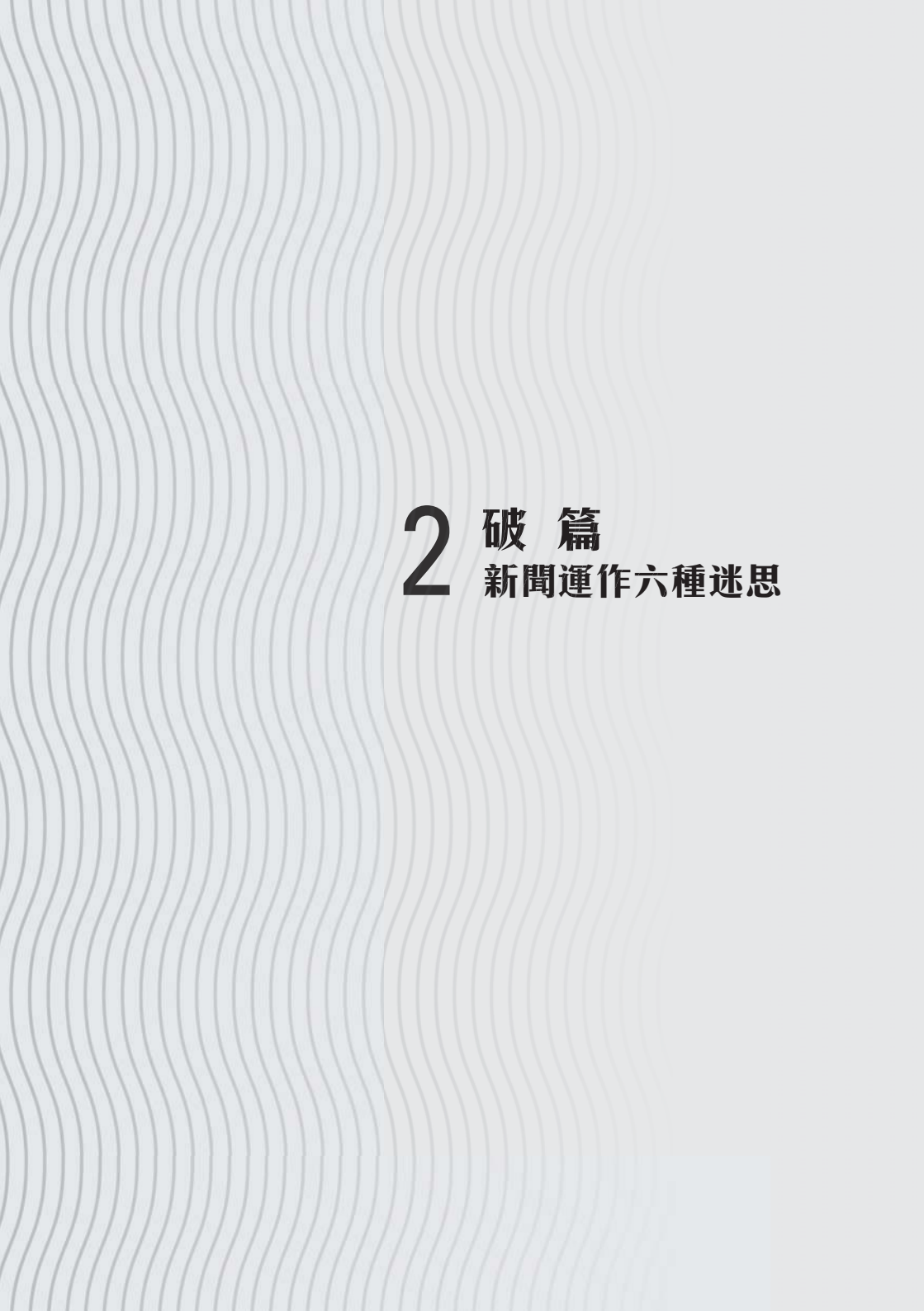
你可視本書為一本故事書，一個又一個於洪流中奮力掙扎向上游的故事，一個又一個理想磨滅的故事，一個又一個明明會飛、卻已不懂拍翼的故事。

一個大言不慚的卑微希望——盼這本書，能為香港新聞行業的掙扎，留一點註腳。

這是本人迄今所出版最重要的一本書。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2 破 篇

## 新聞運作六種迷思

除了球賽比分、賽馬結果與股票價位，  
世上沒有甚麼真正客觀中立的新聞。

—Hunter Thompson

日光之下，又豈有新事。所謂「審查新境界」，也許不新，境界一直存在；不為人所察，只因為我們視很多金科玉律為理所當然，無視規律背後，可能有操控黑手。

〈破篇〉先行，旨在撥開迷霧，破除迷思；微細的審查方式，無色無味，一如陽光空氣，就在日常運作制度中。〈破篇〉指出，既往之「自我審查」概念，難以證實審查行為，「結構性審查」概念能更清楚指出審查之隱秘運作，潛藏於「專業」的光環、「中立客觀」的高地、天經地義的工作規律與至高無上的機構權力中。

## 2.1 審查的迷思——內心一條蟲、斗室有大象

1994年，亞洲電視新聞部發生「六君子」事件，六位中高層新聞部人員集體辭職，抗議管理層抽起西班牙電視台拍攝的六四鎮壓紀錄片，當中有香港從未播放過的天安門廣場清場片段。電視台高層干預新聞部，內部分歧激化，爭論公諸於世，審查行為轟動過渡期中的香港，是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經典案例。<sup>1</sup>

傳播學者李立峯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自此之後，類似「六君子事件」新聞管理層與下屬直接衝突、導致集體辭職的事件無再發生，是否代表有更微妙的遊戲規則？

從新聞從業員訪問中，聽到兩句非常平淡的話，但很有代表性。

上司從來不會叫你不做甚麼，但會令你無時間做你想做的事。

香港傳媒，沒有所謂「操控式審查」(regulative censorship)，不像內地的成熟監控系統：媒體有審讀員，中宣部有白紙黑字言論禁區，互聯網有網絡警察，網民言論有「小秘書」實時監控，網絡直播也要事前審查批准。香港還算擁有自由，但是新聞從業員往往覺得沒有自主，這種「有自由無自主」的現象，亟待解釋。<sup>2</sup>

另一句平淡的話，來自一位記者的慨嘆：

---

<sup>1</sup> 事件之詳細記述，見《一人又一故事》中，李玉蓮寫〈所謂六君子事件〉。

<sup>2</sup> 見李立峯：〈在全球比較研究中看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明報》，2016年10月20日。

還沒有做過甚麼，就已經甚麼都不能做了。

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工時長、工資低，新人常自嘲，無止境加班令時薪比法定最低工資還要低；然而，明知山有虎，不少人還擁有驚人的考試成績，有醫科、法律不選，闖進新聞行業。這位記者慨嘆，未能轟轟烈烈大幹一場，未經歷過甚麼真正激烈的碰撞，還未實踐記者最根本的抱負，卻發現，四周有很多無形的枷鎖，有意義的東西，難以堅持去做。

有一種力量，滲透於日常運作的空氣中；有一種羈絆，你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有一種自由，就在眼前，但你無法享用。

西諺有云：“elephant in the room”，房間裏的大象。斗室中，明明有一頭大象，但大家視而不見，或視作理所當然，或詐作不知。

## 「自我審查」難深究

思想的壓抑、言論之審查，從來不是新鮮事。蘇格拉底叫人反思現狀，最後被賜毒酒；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了百了；伽利略的日心說，被教廷視為妖言邪說；就算是歐威爾諷刺強權的經典《動物農莊》，二戰時在美國出版，也受到諸多阻撓，原因是小說嘲諷蘇聯，而蘇聯是美國戰時盟友。<sup>3</sup>

往日，「審查」泛指權貴以直接及制度化手段干預。二十世紀初《社會科學百科》舊版本，形容「審查」為「權貴所制訂之政策，旨在限制公眾有關思想、意見、概念及情感之表達，以防止貶損其管

---

<sup>3</sup> Ingle, 2015:152.

治權威及保障其認可之社會及道德秩序」。<sup>4</sup>

時代轉變了，我們擁抱多元，高舉自由旗幟，相信真理愈辯愈明；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寫在人權宣言，載於大小憲法，記於中小學教科書。管你是不羈放縱真的愛自由，還是心底裏虔誠地相信「中國人是要管的」，言論自由，已經成為普世價值。

在香港，言論自由是公認的核心價值，《基本法》第27條明文保障新聞與言論出版自由，國家機器受制約，不易公然張牙舞爪。廿多年來，香港傳媒界與學界多用「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概念，研究傳媒趨吉避凶、靠攏權貴之大勢。

傳播學者李金銓定義「自我審查」為：「新聞從業員或其機構，甚至整個傳媒行業，透過忽略、淡化、扭曲、改變側重點、挑選詞彙等一系列編採行為，旨在於現存權力架構中趨利避禍。」<sup>5</sup>

杜耀明形容自我審查為「新聞從業員或機構劃圈自限，把有發表價值的新聞報道或言論，按下不表」，及「基於新聞以外的考慮而放棄按照新聞判斷去作編採決定」。<sup>6</sup>法律學者張善喻於其研究香港傳媒的專著中如此形容自我審查：「迴避懲罰、試圖得到好處，既是策略性的協調博弈，最終更是政治轉型期中的生死之戰。」<sup>7</sup>

總結學者定義，「自我審查」之行為，意味著三種必要元素：

---

<sup>4</sup> Ingram, 2000:2.

<sup>5</sup> C.-C. Lee, 1998:57，原文為英語：“a set of editorial actions ranging from omission, dilution, distortion, and change of emphasis to a choice of rhetorical devices by journalists,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the entire media community in anticipation of currying reward and avoiding punishments from the power structure”，由本書作者譯作中文。

<sup>6</sup> 見2007年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之《香港言論自由年報》。

<sup>7</sup> Cheung, 2003:5.

- 一，這種自我設限的作為或不作為，是**刻意的**；
- 二，具有**趨吉避凶之目的**；
- 三，結果導致**不專業**的新聞判斷。

香港新聞從業員，大體上皆認同「自我審查」確實存在，而且問題嚴重；<sup>8</sup> 然而，要深究「自我審查」不容易——三大元素之一，「刻意」難證實；二，「目的」很多時並不明顯；三，新聞判斷如何才叫專業，準則多變，也沒有明確界線。

要判別某個編採行為是否刻意自我設限，當然困難。常言道：「你又不是他肚裏條蟲！」寫與不寫、報與不報、作為與不作為，旁觀者又如何肯定他是刻意或無意？只要自我審查者不肯「悔罪」，或自欺欺人，知悉內情者緘默，旁人幾近無法證實其意圖，遑論找出「刻意不作為」的證據。

學者李立峯曾於2007年一篇文章指出，香港新聞界歷來的「自我審查」指控，找不出一次是傳媒管理層承認的。<sup>9</sup> 香港記者協會收過很多自我審查的投訴與質疑，但由於「缺乏得悉內幕的證言，很多指控無可避免地難下結論，成為不解謎團」。<sup>10</sup>

本研究訪談的69位新聞工作者，大部分皆同意，其工作的新聞機構有自我審查案例或現象；大部分被指自我審查的行為，上司自有其解釋論據，肯承認自我審查的非常罕有。

---

<sup>8</sup> 香港記者協會2017年之新聞自由指數調查可見，新聞從業員認為「香港傳媒自我審查情況」普遍，得分為3.1（0-10，得分愈高代表愈不普遍），認為「香港傳媒老闆或管理層向員工施壓而影響編採自由的情況」普遍，得分為3.2，兩者為十個新聞自由指標中得分最低。調查摘要及報告見 <https://goo.gl/Ebvkr>。

<sup>9</sup> Lee F. L. F., 2007:438.

<sup>10</sup> 見2007年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之《香港言論自由年報》。



其中一宗，乃一位新記者顧慮公司的潛規則，於佔領運動期間，採訪堵塞道路對經濟影響時，忽然推翻本來想用的角度，並坦白告訴採訪主任自己的憂慮。反而是中層採訪主任不以為然，採訪主任憶述事件：

曾試過有兼職記者，找經濟師談「佔中」的經濟，打電話報料時，明明說沒甚麼影響，最後定稿卻沒有這幾句。我後來問他為何如此？記者說，自己思前想後，又聽到其他同事說，好像不能講這些，於是「自動波」刪了。

肯招認的，是「無名小卒」；大部分富經驗的新聞工作者，皆認為自己專業地遊走於各種潛規則之間，這是生存技巧，甚少承認「自我審查」。

再者，自我審查的行為不一定有明確趨利避禍之「目標」。種種看風轉舵行為，可能早已內化、嵌入平日的運作規律，變作「工序」、「常識」，一切理所當然，自動過濾了不可能的內容，新聞從業員甚至不察覺自己在審查自己。一位資深記者如此形容：

自我審查已入骨髓，很微妙……不是直接手段，甚至不是間接手段，一種瀰漫著的文化，例如，所有都是從上而下，沒有人在老闆框架外，有更多想法。

「自我審查」概念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包括為了「獻媚」或「避免麻煩」而作出不專業的新聞判斷。例如一些傳媒，非常重視中國基

建科研發展的硬道理，每逢高鐵通車、神舟號太空漫遊、一帶一路新聞，就算沒有新角度，皆以不成比例的巨大篇幅與人手資源，隆重其事，擠壓掉其他新聞的篇幅。旁觀者或許覺得，這種新聞判斷莫名其妙，很大程度跟隨國家主旋律起舞，但主事編輯總能解釋，這些新聞既有趣味亦很重要，新聞價值無與倫比，判斷非常專業。

某個編採決定，是自我審查還是「錯判」，難以分辨。例如，某人真心相信「一加一等如三」或「愛國等同要愛黨」，而作出了不可思議兼明顯不專業的判斷；若判斷出自真誠的信念，你只能說他蠢，但很難稱得上是自我審查。

法律學者張善喻認為，自我審查「難以定義及證實，複雜而不易研究」。<sup>11</sup> 多次審視傳媒自我審查現象的香港記者協會則指出：「新聞故事的偏頗或遺漏，可能出於自我審查或合理的編採判斷，也可能出於公允報道或避免誹謗指控，要確立為自我審查甚為困難。」<sup>12</sup>

然而，各種新聞怪現象，無日無之，充斥於運作細節，既難用「自我審查」之角度審視，我們應從何入手？要明白發生甚麼事，我們首先要換一種眼光，看「審查」這回事。

## 審查的新衣

往日，「審查」乃系統性的直接干預與操控，但今天的審查者，絕少會大搖大擺「掛著臂章」；<sup>13</sup> 正如「六君子」的高調辭職反抗事件，

---

<sup>11</sup> Cheung, 2003:25.

<sup>12</sup> 見香港記者協會2005年《香港言論自由年報》。

<sup>13</sup> Jansen, 1988:15.

不再在香港出現，乃因為種種控制行徑，已隱身於組織架構中，不外露、不明顯，可以稱之為「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sup>14</sup>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指，現時的「審查」，不再用法律規章直接控制，而是透過社會組織的結構性控制，管控「表達的渠道與表達的形式」(access to expression and form of expression) 去管控表達的內容。<sup>15</sup> 具體而言，掌權者可以用機構組織內的獎懲制度與人事任免，確保「信得過」之人控制資訊發放的渠道；也可透過制訂節目形式，來規限資訊的可能範圍；亦可利用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規律」(doxa)、不會被質疑的常識，前設了一系列不須問不可說的事情。

無形之手潛藏於組織架構，滲入每個個體的思維，影響日常運作的細節，限制了表達的可能，人們「逃不出已知的形式與認可的規範」。<sup>16</sup> 相對往日「操控式審查」(regulative censorship) 之直接施壓甚至野蠻粗暴手段，「結構性審查」較隱密而恆常，讓人不知不覺間視作理所當然。結構性審查乃「現代社會更深刻有力的操控，因為它促成了大致上無意識的自我審查」。<sup>17</sup> 布迪厄形容「審查從未如此完美、如此隱蔽」，處身其中的個人，「甚至不用去審查自己，接收與表達的形式已全然內化，這種審查，一勞永逸」。<sup>18</sup>

---

<sup>14</sup> Müller, 2004; Jansen, 1988.

<sup>15</sup> Bourdieu, 1991:139.

<sup>16</sup> Bourdieu, 1991:140.

<sup>17</sup> Rosenfeld, 2001:127.

<sup>18</sup> Bourdieu, 1991:139.

## 2.2 專業的光環——一襲華麗外衣

「專業」二字，總予人崇高、清新的感覺，如自有永有的光環。

新聞判斷被質疑，電視台發聲明說，支持「新聞部主管的專業」。<sup>19</sup> 選舉時，候選人常吹捧自己專業，是律師、醫生、會計師、測量師、治療師、大學名字也叫不出的博士，貼上「專業」之名，仿若正義化身，俠骨仁心，不偏不倚，比那些政黨政客政棍不知高了多少倍。

警察也自稱「專業」，不偏不倚保護社會安寧，但所謂社會安寧卻是權貴定義的和諧；記者自稱中立持平，但往往高官談話必錄，航天員出巡全程追蹤，以「客觀」與「反映事實」為名，附和權貴，以「專業」之名包裝，冠冕堂皇。

今時今日，快餐店請店員請店長，也強調是「專業」；家傭公司賣廣告，也強調提供「專業化」優質服務。專業殺手也叫專業，「專業」二字，很爛很廉價。

「嘩，你好專業！」如果有人這樣讚美你，請不要高興得太早。「專業」，也許代表你做事認真、勤快、可靠、有專門知識；潛台詞往往是慨嘆：能緊守規矩，程序無懈可擊；懂鑽空子，「無手尾跟」；以專業之名，政治正確，乾淨利落。嘩，專業。

「專業」之所以予人信心，因為專門行業一般有嚴格評核、有專業守則、有崇高理想，站於道德高地；而且專業知識往往是你所無，有求於他們，自然敬仰尊崇。

---

<sup>19</sup> 2014年，TVB新聞部播出「七警」片段爭議，大批新聞部員工聯署，不同意主管判斷，TVB發聲明支持「新聞部主管的專業」，詳見本書第210頁。

## 專業控制職業

在《馴服的心》(*Disciplined Minds*)一書中，物理學家Jeff Schmidt拆解「專業」之虛妄與假象。Schmidt認為，專業人士在自身的工作領域中，非常保守因循。保守，源於專業之嚴格訓練，實際上是社會教化與馴服的過程。各種專業考試與行為規範，要求既具體亦嚴謹，浸淫時間長，付出的精力體力也多；那些敢於挑戰權威、不滿眼前現狀的人，未必想入行，在挑選與訓練過程中早已被篩去七七八八。專業界別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不斷劃地為牢，強化行業權威，以專業自主為名，鞏固自身地位。

總體而言，Schmidt認為專業人士是社會上一股保守力量，傾向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附庸。當然，一種專業養百種人，各種專業之工作性質亦大不同；Schmidt之斷言，未有充足研究實證；但是，「專業」光環耀眼眩目，我們不能忽略，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是一套價值系統，用以判辨行為對錯；換個角度看，專業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用作操控行為。

專業主義是「霸權式信仰系統」、「社會制約機制」，<sup>20</sup> 是「控制的軟件」(software of control)、「操控專業人士的製造方式」(controlling the production of producers)，也是一套「獎懲邏輯」(disciplinary logic)。<sup>21</sup> 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裏，所謂「專業守則」，是促進同化的過程，也是一種操控的機制。

---

<sup>20</sup> Evetts, 2003:395.

<sup>21</sup> 分別見Townley, 1989，於Fournier, 1999:281；Larson, 1977:49-52；及Fournier, 1999:281。

試試從管理者的角度看，現代社會的工作模式，較彈性亦分散，員工散布不同時空，自主性相對高，上司監管下屬工作甚困難。動用「專業規範」，有共同語言與道德守則，可以遙距發功，比較傳統官僚式的近距離兼冒犯之監控方式，「專業話語」能針對全方位的職業行為，<sup>22</sup> 而且出師有名，專業人士甚至會引以為傲。

身為「專業人士」，不單止擁有一套專門知識，而且要遵從業內行事規範；壓迫性的操控不再需要，控制的模式「既內化而主動，非外加及反射式的」，<sup>23</sup> 即是不須外力，大家心甘情願，發自內心最真情的擁護。

這就是現代化社會中「專業」之妙用，不需白紙黑字事事規限你，因為「專業」規則早已內化、全盤接受；「專業」還叫你無私奉獻，於是醫生連續當值48小時是「專業」，會計師通宵達旦工作是「專業」，有怨言就是「不專業」。一個法國現代音樂的研究發現，一旦自我界定為一個專業藝術家，這些專業人士就會覺得超時工作變得理所當然。專業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不只促成「自我約束」，更令人「自我剝削」。<sup>24</sup>

「專業」二字不簡單：「專業不只是職業，專業是控制職業的手段。」<sup>25</sup> 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早於半個世紀前已提出，專業培養出「精於狹隘，更目光如豆」的人。<sup>26</sup>

---

<sup>22</sup> Fournier, 1999:281.

<sup>23</sup> Evetts, 2003:405.

<sup>24</sup> Evetts, 2003:555.

<sup>25</sup> Johnson, 1972:45.

<sup>26</sup> Mills, 1956:112.

## 極端分工壞腦袋

從社會學祖師韋伯形容的「鐵牢籠」(iron cage)開始，伴隨資本主義工業化與科層體系的崛起，「工具理性」崇尚分工合作，提高效率。現代人生於「鐵牢籠」中，習慣了這種生產模式，不能想像其他可能性，而所謂專業人士，亦深陷其中，分工之細，每個人只關顧眼前極狹窄的視野，無視大局，忘記初衷，甚至把專業技巧視為成就，把手段當作目標。<sup>27</sup>

現代化管理之下，Schmidt指出專業人士的「極端分工」現象，例如現在的物理學家或生化學家做實驗、極端細微，專業研究者仔細分工，叫各司其職，提高效率；醫療體系下的各種專業、會計師核數，同樣是不斷重複嚴格的運作規律。這些專業人士，專注細節，埋首於狹隘的角落，甚至不知旁人在做甚麼。

劇烈競爭下，香港很多新聞工作者每天皆陷於苦戰，與時間競賽，自嘲有如製衣廠生產線的「車衣女工」，分工仔細無疑較有效率。現實運作，一宗新聞，三個記者分別採訪三個人，資料搜集與寫稿，分別由辦公室另外兩人來做，每個人只須做新聞故事一小部分，再由其他人合成製品，如車衣女工縫縫補補完事。結果，有記者可以上班整整一個月，從沒試過一人包辦採訪至寫稿全過程。

車衣一樣的工廠生產線，有其「強項」：一是「量」有保證，二是有效率，三是產品一式一樣夠穩妥；對「工人」而言，他們只是新聞生產機器裏的螺絲釘，分工細碎，一切安排好，每人只負責刻板而重複的動作，「自主性」無形中消失。

---

<sup>27</sup> Hendel, 2003:12.

專業分工，成為專業人士「智力碎片化」(intellectual fragmentation) 與「社會割裂」(social divisiveness) 的源頭；社會學家這樣形容專業人士之狹隘：「高分低能」(trained incapacity)、「職業性思覺失調」(occupational psychosis) 或「專業化殘缺」(professional deformation)。<sup>28</sup>

結果，前線專業工作碎片化，埋首於瑣碎技藝，強化了中高層人員統籌與支配權力，有權勢者更能掌握大局，其權勢更會透過日常運作規律反饋加強；「小薯仔」被分配做刻板工作，容易令新人成長慢、眼界窄，每天只望著衣車上的鈕扣，無力說不，亦難以抗拒命令，陷於「鐵牢籠」中，任由掌控全局的機構管理者予取予求。專業人士以為自主，其實不少人早已失去自主；他們行屍走肉，成為工具，但感覺良好，因為頭戴「專業」光環。

## 一襲高尚華麗的外衣

回到新聞行業，記者與醫生、律師、會計師等專業大不同，沒有發牌制度，沒有認證制度，行業內亦談不上有一套專門的核心知識。我們也許對「好記者」有要求：例如觸覺敏銳、判斷準確、博學多聞、熟悉時事、表達能力佳、分析能力強、即時反應快等等，但這些皆不算專門知識；特別在互聯網世代，任何人都能開設平台，公民記者也是記者。重視自由的新聞記者行業，更會擔憂「發牌制度」背後的業外操控，從根本上影響專業自主。中國內地的記者要接受統一培訓與考核，才獲發新記者證；這種「專業」，想不想要？

---

<sup>28</sup> 見Freidson, 2001:112之總結。



香港的新聞行業，未必是嚴格定義的傳統「專業」，但從學院培訓至自我形象，皆有自成體系的專業價值觀，從業員亦重視專業操守。無論將新聞工作叫做「專業」或「半專業」，把「新聞專業」理解成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控制職業的手段，卻一樣通行，對管理層的作為有莫大啟發。

傳播學者早有發現，「專業」正是上司規範記者工作的上佳方式。每天例行採訪工序中，「鐵腳馬眼神仙肚」的記者一般在外奔走、亦無定時，長期在上司視線範圍外，如何規範記者行事？「新聞專業主義」正是妙著，行事標準與報道規範，大家視之為美德，甚至是教條，而且跨機構全行通用，新聞管理層省下工夫，毋須自設規條；記者轉工頻繁，人來人往，亦不須重新學習，皆大歡喜。<sup>29</sup> 專業主義令「酌情權可預測」(makes the use of discretion predictable)，<sup>30</sup> 記者只能在特定範圍內行使自由。

再強調一次，專業規範當然有價值、有需要；行事自律有原則，堅持發掘真相，公正持平，乃公信力之源；好些戒條，新聞工作者視作神聖不可侵犯，合情合理。然而，凡事一體兩面，「專業」同時成為制約之工具，於今猶烈，甚至成為審查之藉口、惡鬥之場域，卻不可不察。

首先，流水作業式的新聞極端分工，正步向瘋狂；電視台24小時新聞、網絡的即時新聞即時評論大趨勢，令新聞生產線繼續加速。新聞行業之專業責任，要「提供新聞資訊」，新聞價值又以「適

---

<sup>29</sup> Soloski, 1989.

<sup>30</sup> Larson, 1977:68.

時」、「走在最前線」為重；在「專業」驅使下，從業員理所當然地配合生產線節奏，工序愈加細碎而刻板。

而所謂專業理念，雖然很多人奉為圭臬，但落實到運作層面，意義卻曖昧模糊。尤其是新聞專業中「客觀」、「中立」、「持平」、「公正」等無人反對甚至要誓死捍衛的價值，標準含糊，甚至於特定處境中，互相衝突。

這潭價值觀的渾水，提供了各種詮釋的灰色地帶。傳媒主管想審查，為了面子與權威，往往要出師有名，顯得有理有節；<sup>31</sup>「新聞專業」成為媒體主管控制新聞流程中，既有效而省力的工具；<sup>32</sup>遭質疑自我審查時，媒體往往以「正確專業判斷」<sup>33</sup>或「負責任報道」<sup>34</sup>為由拒絕承認；外界亦難以一針見血指出其審查行為，正是源於「專業」的可塑性。

還記得，已故體育新聞主播伍晃榮曾形容電視新聞的光環：「唔知就嚇死，知就笑死。」專業的崇高理想，只是一層表皮；一襲高尚華麗的外衣，騙倒很多單純的人，至於外衣上的蚤子，無人深究。

---

<sup>31</sup> Ma, 2007:968.

<sup>32</sup> Soloski, 1989:208.

<sup>33</sup> Lee & Chan, 2009:128.

<sup>34</sup> 香港記者協會，2007:19。

## 2.3 中立的神壇——客觀持平萬能 key

有這樣一個故事。

兩位製作地圖的專家在談論，地圖比例要多大，才可以充分描繪真實世界？

一位製圖者說，地圖上六吋代表一哩，不夠仔細；六碼代表一哩，也不夠；我們製了一幅全國地圖，比例是一比一！同實物一樣大！

「那麼，這地圖你常用嗎？」另一人問。

「從來沒打開過。農民們投訴說地圖會覆蓋整個國家，遮住陽光，我們現在用整個國家當地圖，我告訴你，一樣好用。」

故事乃《愛麗絲夢遊仙境》作者 Lewis Carroll 所作，<sup>35</sup> 一世紀多前的荒誕故事告訴我們，縱使你擁有一張事無大小都一切如實紀錄、與實物原大、非常準確的地圖，但它不能摺疊、不能攜帶，自我推翻了地圖的本來作用。

地圖上的訊息，必然經過選擇，才能一覽而略知全局；記者的報道，過濾資訊是工作本質，因為無止境的訊息令人吃不消。記者發掘真相，反映現實，但過程必涉選擇，有所取捨，不可能絕對客觀絕對全面；但一如製作地圖，記者報道，不能誤導，不能引人入歧路，不能隱沒清晰地標，是最底線的原則。

常聞批評者輕言新聞媒體「不客觀不中立不全面」，或是傳媒自詡「百分百客觀中立」，「中立客觀」似是新聞準則之教條，神聖不

---

<sup>35</sup> 故事見 Kieran, 1997:21。

可侵犯。本研究中，一位資深記者認為，中立客觀持平，乃上級控制的手段：

講中立客觀持平，都是萬能 key，實際操作是扯後腿。

「客觀中立」，仿若神壇上的教條祖訓，背後有多層次多面向，需要細心拆解，重新認識，才能明白這些專業話語，如何搖身一變，成為有效的操控工具。

## 客觀新聞之起源

「中立客觀」儼然是傳媒光環，大眾也覺得天經地義。學者考究歷史起源，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前，美國報業無中立概念，文章夾敘夾議，黨派立場鮮明。自電報於十九世紀中葉發明，國際通訊社出現，由於要供稿予不同立場之報章，遂要「中立客觀」，免得失客戶。<sup>36</sup>

「客觀」慢慢變成傳媒的道德高地，很大程度乃從避免麻煩、怕得罪人、方便拉生意而起。路透社於1921年一份通告闡明何謂「客觀」態度，要求通訊員「應如法官一樣為陪審員總結案情」，駐外記者的報道「不含個人感情，沒有政策傾向，無喜好亦無厭憎，我們是事實與事件不偏不倚的記錄者」。學者認為，採納這些編採方針，是為了防止涉事者或政府部門因感到冒犯而找麻煩。<sup>37</sup>

---

<sup>36</sup> Schudson, 1978.

<sup>37</sup> Hampton, 2008:479.

傳播學者Schudson認為，美國公眾與傳媒於1960年代，才開始把「客觀」奉為新聞業之圭臬，希望與當時流行之「煽色腥」新聞(sensationalism)劃清界線。<sup>38</sup>然而，何謂「客觀」，專業準則所指為何？包羅萬象，各自解讀。

「客觀」相對「主觀」，亦受科學探索之實證主義影響，要摒棄個人主觀臆想，強調觀測、搜集證據、追尋真實。「客觀新聞」之理想，相信「意見可自由，事實卻是神聖的」，<sup>39</sup>相信新聞報道中，「事實與意見要分開」，要「堅持事實」，不受外界干擾而「讓事實說話」；<sup>40</sup>記者採訪時，要公正平衡，政治上要不偏不倚，感情上要疏離。<sup>41</sup>學者McQuail總結六項「客觀」元素：平衡報道、準確傳真、觀點全面、事實與評論分開、不偏私、記者盡量抽離。<sup>42</sup>

新聞從業員自己又如何看呢？一個涵蓋18個國家地區的跨地域研究發現，全世界記者都認同，記者應該抽離、不參與、提供資料與監督政府；提供資訊時要準確、可靠、不偏不倚，這些價值廣泛受認同。<sup>43</sup>

總的而言，新聞從業員自視為尋真者和監督者，並須以抽離、不偏私、自主的方式達成任務。<sup>44</sup>然而，說時容易，真相難覓時，應如何報道？價值與題材之選擇總有主觀成份，如何可抽離？所謂

---

<sup>38</sup> Schudson, 1978:9.

<sup>39</sup> 《衛報》編輯C. P. Scott 1921年之名言，見<https://goo.gl/9hBnm0>。

<sup>40</sup> Muñoz-Torres, 2012:571.

<sup>41</sup> Maras, 2013:8.

<sup>42</sup> McQuail, 1992:184.

<sup>43</sup> Hanitzsch et al., 2011:273.

<sup>44</sup> Chan, Lee & Lee, 1996; Gans, 1979; So, 2011; Soloski, 1997; Weaver & Wilhoit, 1996.

公正持平不偏私，又有何準則？大是大非時，又如何中立？說到底，又由誰來決定「大是大非」，真相與謊言，在電光火石之新聞製作流程中，如何分得清？

於實際操作層面，「客觀中立」準則多樣，如何判辨，有時含糊，有時隨意。Schudson 總結了針對「客觀」的三種批評：

一，所謂「客觀」，乃基於一系列自證為真而大有問題的假設；二，好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新聞價值與寫作模式，本身就有偏頗；三，新聞採訪的手法，往往強化官方立場，鞏固其權力。<sup>45</sup> 接下來要說明：客觀是一個迷思，客觀是一種「策略性儀式」，客觀也可以是權力之偽裝。

## 客觀大迷思

前頁的「地圖故事」說明了，描述現實世界，難免帶有選擇性；新聞亦一樣，例如每到歲末，傳媒總會製作《大事回顧》專題。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幾個月前的事，重新包裝，已是我們的回憶；數十年後回看，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一年過來，回望當天，領導人「重要講話」不一定重要，窩心小事也可能是時代記憶；一年的新聞，資訊量如茫茫大海，如何選材方能切合「大事」之名，對編輯是一大考驗。

人們常說：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讓事實說話），記者直接鋪陳事實就可以了！這種說法自欺欺人，實在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歷史學家 Edward Carr 提醒我們要留意的，是「誰」讓「甚麼」

---

<sup>45</sup> Schudson, 1978:184.

事實說話：「往日所謂讓事實說話，當然不真確。事實只會於歷史學家指出來後才能說話，事實能否登上前台，甚麼次序，其前文後理，都由執筆人決定。」<sup>46</sup>

記者一如歷史學家，面對浩如煙海的新聞材料，眾說紛紜的解讀，扮演把關人角色，決定甚麼事實要放到歷史舞台上。事實的擺放次序，主角出場之時間長短，正反意見之長度，面紅耳熱的強度，舞台背景設計與燈光效果，或者沒有設計沒有效果，都能令「事實」有不同造型，變化萬千。

美國報人Hunter Thompson說過，除了球賽比分、賽馬結果與股票價位，世上沒有甚麼真正客觀中立的新聞。<sup>47</sup>一宗新聞，報與不報、寫長還是寫短、跟進追查或不查，都涉及判斷。「六四」，你用「屠城」、「鎮壓」、「風波」或「事件」？「旺角騷亂」還是「暴亂」？如何取捨，一落筆就有態度。

社會學家Tuchman以「新聞網」(news net)概念，描繪新聞行業的特質；世事紛繁，記者不可能一網打盡，記者撒網之處，就決定了記者能捉到甚麼魚。歷史學家Carr亦有相似比喻：所謂事實，猶如汪洋裏的魚群，你捕捉到甚麼魚，有時看運氣，但主要視乎你往海的哪方航行，用甚麼捕魚工具。最終，原來取決於漁夫想捉甚麼魚。

客觀之為虛妄，因任何表達皆須在各種事實中去蕪存菁，必涉主觀選擇。人們說，攝影是「減法的藝術」，萬象紛陳，只定格一時一框，這就是選擇；相機的觀景器，是攝影家察看世界的窗口；記

---

<sup>46</sup> Carr, 1961.

<sup>47</sup> H. S. Thompson, 1973；載於Maras, 2013:70。

者的筆，就是大眾觀察時事的耳目。而且，「任何說話皆出自觀察者」(Anything said is said by an observer)，<sup>48</sup> 而每位觀察者皆有其立場，每位攝影師有其獨特擺放鏡頭的位置，皆具主觀成分。

大千世界，每天發生的事如恆河沙數，新事物不斷湧現，每件事情，有如浪濤翻波的大江大海裏偶然冒出頭來的小水滴，它們在浪花之中擠擁著，還來不及被人發現，又回歸大海。<sup>49</sup> 這些小水滴，絕大部分不為人所知，不為人所談，默默無聞；硬是某些小水滴，經過傳媒選擇與包裝，升格為新聞，捧到大家面前，告訴你：這是新聞，是每天你要知的事。

資訊之海裏，記者的工作，就是每天在浪花裏淘新聞。傳播學者 Molotch 及 Lester 有很簡潔的形容：每時每刻，有無數事件 (occurrences) 在發生，但這些事情絕大部分無人理會。例如，此刻有一個你在讀書，是一宗「事件」；牛頭角有一位順嫂打仔是一宗「事件」；行政長官逛街買了烏冬麵是一宗「事件」；李旺陽陷獄廿多年，也是「事件」。某些事件，會轉化成大眾能觀察到的新聞事件 (news events)；有些事件，只是一剎那的浪花，瞬即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無人知曉。由「事件」轉化成「新聞」，箇中輕重取捨，傳媒擔當其中一個重要角色。

現實世界，每天發生無數事件，若把所有事實通通鋪陳，不加整理與判斷，只會雜亂無章，故只有極少數「事件」會成為「新聞」，<sup>50</sup>

---

<sup>48</sup> 出自智利生物學家，見 Heinz von Foerster 所寫之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網址：<http://goo.gl/RON7IR>，亦見於 Poerksen, 2008:299。

<sup>49</sup> 歷史學家貢布里希 (Ernst Gombrich) 《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之結語，以大海浪花比喻歷史。

<sup>50</sup> Molotch & Lester, 1997:194.



一切都是刪減的過程，而每個選擇皆有價值判斷。為何某些一瞬即逝的浪花，會變成新聞？這是一個選擇的過程，甚麼事件要做大？甚麼事件視而不見，當中難免主觀。學者們形容，所謂「知識中立」的說法是「假象」，所謂「客觀新聞」之概念「滑不留手」，「本質上曖昧」，甚至是「新聞行業中最大的混淆」。<sup>51</sup>

後現代主義者與建構論者認為，現實是建構出來的。傳媒透過看似被動的選擇行為，賦予事件新聞意義，並加上誘導性詮釋。<sup>52</sup>新聞不是反映現實之鏡子，而是選擇性的描述；<sup>53</sup>以抽離方式保持客觀，「概念上不可能，操作上亦不可行」；<sup>54</sup>一個「客觀記者」的心智，不可能如同一塊空白電視屏幕，被動地接收訊息。<sup>55</sup>相反，新聞判斷需要活躍的心，判斷這是新聞還是舊聞，分辨這是正常還是異常，涉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亦涉個人態度與偏見；<sup>56</sup>而任何種類的傳播，本質上皆具價值判斷，不完整兼扭曲現實。<sup>57</sup>換個角度看，所謂現實，是傳播之訊息所建構出來的結果。<sup>58</sup>

新聞行業不再被視為反映真實的鏡子，建構論者要探究的是，傳媒究竟反映著哪一部分的事實？有何前設、價值與規律，主宰著持鏡人的判斷？這問題才有意思。

---

<sup>51</sup> 形容分別來自 Muñoz-Torres, 2012:573；Durham, 1998:118；Tumber & Prentoulis 2003:215–216，載於 Maras, 2003:7；Kovach & Rosenstiel, 2014:101。

<sup>52</sup> Poerksen, 2008:297.

<sup>53</sup> Schudson, 2003:33.

<sup>54</sup> Muñoz-Torres, 2012:575.

<sup>55</sup> Ward, 1998:122.

<sup>56</sup> Gans, 1979:197.

<sup>57</sup> Dennis & Merrill, 1984:106.

<sup>58</sup> Poerksen, 2008:298, 301.

那麼，當「客觀」的光環打破了，散落一地的，難道只剩下「主觀」、「任意」？這裏，引述社會學家Tuchman的話：「說新聞報道是故事，恰如其分，沒有貶低新聞，也不是指控它虛構；而是請大家警覺，新聞有如其他公眾文件，都是建構出來，能自圓其說的真實（a constructed reality possessing its own internal validity）。」<sup>59</sup> 傳播學者Fisherman說，新聞故事沒有反映現實，如果它能反映甚麼，「乃是反映了從業員在機構中生產新聞時的作為」；<sup>60</sup> 即是說，只反映了新聞媒體日常運作中，在各種限制與條件下的做法而已。

## 客觀是策略性儀式

這是一個古老、有效、全球通行的騙局。<sup>61</sup>

大街一角，莊家拿出紙皮箱與三張紙牌，其中一張是紅心A，他把紙牌反轉，移形換影，調來調去，然後大聲叫陣：「來來來，猜中紅心A，賞你一百元！」

慢慢地，人群聚集，駐足八卦，但人人都知是騙局，只肯圍觀。莊家施展渾身解數，打開紅心A示眾，再以龜速移動紙牌：「今次太容易了吧，來來來，猜中，一百元！」並且立即掏出一百大元，放在紙箱上。

圍觀人群中，大部分無動於衷，唯獨一位大叔開始心動，莊家看在眼裏：「這位大叔，大優惠，第一局，輸了不收錢！」大叔心

---

<sup>59</sup> Tuchman, 1976:97.

<sup>60</sup> Fisherman, 1997:210.

<sup>61</sup> 騙徒故事出自 Jeff Schmidt, *Disciplined Minds*。

想，我只玩一局，而且肯定紅心A的位置，贏了拿錢就走，你奈我何？「好，我來！」

莊家叫大叔先拿出一百元：「賭桌規矩，我不殺你本，你也要先拿出本錢。」大叔猶豫，有兩個特別熱心的圍觀者插嘴：「掏出來吧，只是一百元！」

大叔從錢包拿出一百元說：「我要自己拿著錢。」怎料莊家一手把錢搶走，放在紙箱上：「你開牌。」大叔滿有信心，翻開紙牌……

「噢！」圍觀者驚呼。

大叔當然猜錯，莊家瞬即把本錢沒收。接下來，當然是大叔在糾纏，怒罵「說過輸了不收錢」，莊家則大義凜然說「願賭服輸」！互相推撞、髒話橫飛之際，兩位多事八卦旁觀者皺著眉頭，對大叔說：「但你真的輸了。」

就這句話，大叔突然平靜，嘆了口氣，無力再辯。

「你輸了」這句話，出自莊家口中，毫無說服力；但同樣一句，出自貌似中立客觀、打扮得無立場無利益衝突的旁觀者口中，卻特別有份量有權威。

多少罪惡，假「中立」之名而行。細心留意，兩位在關鍵時刻說「掏錢出來吧」、「噢」、「你輸了」的「中立」旁觀者，當然是莊家的同黨了。

故事只是故事，旨在說明「中立」、「抽離」之妙用。

所謂「中立」，在香港，從來都是一個「萬能key」。看看歷任立法會主席，只須主持會議，不須表態，不用投票；堂前高座上，說聲開會休會，顯得中立脫俗，又威武又超然。尤其是往日議會爭拗

未算尖銳時，立法會主席無為，往往榮登議員民望之首，就因為他甚麼都不用做，避開爭議，市民就有好感。

「中立」之曼妙，莘莘學子早已了然於胸。中學通識科考問政黨政治，考生害怕站錯邊、政治不正確，紛紛「扮中立」；為免失分，不惜違背良心。雖然教評局謂，通識考試中，無論考生有立場或中立，只要有理據、論述清晰即可。不過，現實中，大家早已學懂趨吉避凶，扮作無立場，事事各打五十大板，平平庸庸，萬無一失。

「中立」是公務員的神主牌，公務員政治中立、警員政治中立，其實是甚麼意思？

公務員事務局解釋，政治中立「最基本原則」就是：「不論在任的行政長官和政治任命官員的政治主張為何，公務員皆應完全忠誠地協助他們制訂政策、執行決定……」。<sup>62</sup>

《公務員守則》寫道：「不論本身的政治信念為何，公務員必須對在任行政長官及政府完全忠誠……」<sup>63</sup>「對行政長官忠誠」，翻譯一下就是：無論誰是老闆，都要服從。

也許是從大英帝國殖民管治開始，當年港英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舉旗「中立」；及至回歸時分，港英自詡留下有效率的公務員隊伍，「政治中立」是天大美德。

文官政治中立的傳統移植自英國，鐵的衙門，流水的官，有一群中流砥柱保障政府運作，古今中外皆如是。問題是，民主政體的領導人與內閣，是人民選出來的，當權者代表人民；香港的特首與高官，代表不了多少人。「政治中立」移植到此，意義有微妙改變；

---

<sup>62</sup> 見2007年11月28日立法會動議辯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發言。

<sup>63</sup> 見《公務員守則》第3.7段。

選舉制度不公平，政府缺乏認受性，「政治中立」變成助紂為虐的擋箭牌；「中立」幌子下，公務員受納稅人供養，卻要服從不能代表市民的上級，還自詡中立而得到掌聲。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曾接見香港傳媒高層代表團，特別提到希望香港傳媒「以客觀、公正、持平、理性的聲音，引導香港社會抓住國家改革發展新機遇……」。<sup>64</sup>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一個大專校園新聞獎中，兩次告誡學生，「未來繼續以中立持平和客觀的態度報道新聞，為香港作出貢獻」。<sup>65</sup> 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無綫新聞部總監一封內部電郵被公開，指「政治無分對錯，但新聞必須要客觀中立」，並敦促下屬平心靜氣地反問自己：「報道時是否做到百分百客觀中立？」<sup>66</sup>

傳媒要「客觀中立」之說，由公眾、記者、傳媒老闆、官員至國家領導人都掛在口邊，尤如真理，仿若共識。

社會學家Tuchman於她經典的採訪室考察研究中提出，「客觀」是一種「策略性儀式」(strategic ritual)，乃傳媒機構自我保護的方式，實際上是免責條款。每天繁雜多變的新聞運作中，新聞人員恆常面對截稿限期、上級責難、誹謗風險，同時要快速核實資訊真偽；無奈受資源與時間所限，記者編輯無可能查核每一絲細節，為了管理風險，逐漸形成「平衡報道」的習慣。<sup>67</sup>

於是，遇爭議時，意見必須「有正有反」，記者習慣向相關人士

---

<sup>64</sup> 見《文匯網》，網址：<https://goo.gl/LxkF37>。

<sup>65</sup> 發言全文見政府新聞處，網址：<http://goo.gl/DrnPxH>。

<sup>66</sup> 見《852郵報》，2014年10月2日，〈無綫袁志偉疑提醒下屬佔中報道「不公正」〉，網址：<http://goo.gl/qPRTVd>，文中電郵經核實為真。

<sup>67</sup> Tuchman, 1978:84.

「問反應」，客觀效果就是把查證的責任，推到被訪者身上。Tuchman 發現，記者常把「A說了X」這句子，當作「事實」，縱使「X」為假或未知真偽，「A說X」這句卻無疑是真；記者接著找B，去平衡A的意見，於是就齊備了「兩方面意見」，收工！明智地運用引號，新聞從業員在看似抽離與不偏不倚之間，建構「事實」。<sup>68</sup> 有時，就算A說錯了，記者的引述卻沒有錯！記者遂能以這樣「客觀化」(objectification) 的表達方式，避開偏頗主觀的指控，卻不自覺地卸下求真的天職。

Tuchman 形容，傳媒自詡客觀中立這種慣性，有如中世紀農民掛一圈大蒜在頸上，作用是「驅邪」，一方面意圖避開爭議，減少批評，又借勢建立崇高超然的形象。<sup>69</sup> 傳播學者 Glasser 認為，「客觀」受尊崇，乃因穩妥，穩妥是因為標準劃一；記者遂專注新聞應如何表達，留意其形式是否妥當。結果，「客觀」之規範，要求記者為他們報道的方式負責，而非為報道之內容負責。<sup>70</sup> 只要形式妥當，內容反而變得次要；形式能夠持續，因為「編輯與社長們不想下屬犯錯而危害其機構與其事業。」<sup>71</sup>

固守於程序上的客觀 (procedural objectivity)，記者容易失卻求真動力；<sup>72</sup> 說故事技巧，變作「技術性寫作」。<sup>73</sup> 記者搬字過紙，把事件化作簡單語言與既定方程式；當中，「平衡報道」成為卓越之標的。

---

<sup>68</sup> Tuchman, 1972:660.

<sup>69</sup> Tuchman, 1972:665.

<sup>70</sup> Glasser, 1992:180.

<sup>71</sup> Schudson 1978:184.

<sup>72</sup> Tuchman, 1972:662 及 Iggers, 1998:92。

<sup>73</sup> Glasser, 1992:181 及 Maras, 2013:63。

「程序客觀」的習慣使然，好些互相排斥的觀點，卻呈現得有如同樣有道理。<sup>74</sup> 正反意見的鋪陳，容易令人錯以為意見二分而且只有兩種意見；如此鋪排，貌似公允，嚴守中立，實際上貶損了真實。<sup>75</sup> 記者的責任，本應在過濾雜音，分辨哪些意見是無根據的胡言，哪些意見是經得起考驗而毋庸置疑。<sup>76</sup>

當事情眾說紛紜，或涉及道德與價值判斷，提供多元意見作平衡報道，乃記者天職。但若然黑白分明、是非清晰，涉及真偽之辨、擺事實時，還中甚麼立？

在香港的政治泥漿，所謂「政治中立」，往往是叫人收聲的「去政治化」愚民話語。不加思索的平衡報道，實際上是「假平衡」、「各打五十大板之暴虐」(a tyranny of evenhandedness)，導致「無意義、缺層次、扭曲與無止境的誤解」、<sup>77</sup>「並非通往真理之路，而是往相反方向竄逃」。<sup>78</sup>

平衡報道往往空洞無物，英國廣播公司(BBC)前執行總監 Huw Wheldon 曾說過，在堅守平衡與持平之時，BBC 亦要探求真實，「不能只鋪陳正反意見，無論如何困難，也要靈巧地搞清楚事實……在一些節目中，平衡報道不代表不能諷刺批評，或不能展露熱情與信念」。<sup>79</sup>

美國 2016 年總統選舉期間，傳媒知悉特朗普信口開河之個

---

<sup>74</sup> Glasser, 1992:178 及 Muñoz-Torres, 2012:570。

<sup>75</sup> Maras, 2013:64.

<sup>76</sup> Muñoz-Torres, 2012:576.

<sup>77</sup> Overholser, 2006:10.

<sup>78</sup> Rosen, 1993:49–50.

<sup>79</sup> 見引述於 Green & Karolides, 2005:42.

性，為免流言與謊話廣為傳播，多家傳媒機構於電視辯論直播時，備大量人手，史無前例地即時核實 (live fact-check)，可見傳媒亦深明，若要「平衡」地讓正反意見播出，可能與「求真」相悖。

無奈，「搞清楚所有事實」，在實際運作中淪為奢侈想像。主動探求真相，抽絲剝繭，弄清楚各種意見的含金量，費力費時間。新聞業界缺錢缺人，時間緊逼，記者遂以「客觀」、「平衡」作擋箭牌，名正言順不細心查證，不探究真相，不須成為某範疇的專家，也能繼續工作，<sup>80</sup> 而且較「廉價」，具成本效益。

傳播學者 Rosen 認為，記者推崇「抽離」，已上綱上線到一個「割裂狂熱」(separation fever) 的地步：新聞與評論割裂，事實與價值割裂，專業身份與個人身份割裂，這種堅強的抽離意志，造成盲目，結果「記者的心智與靈魂都割裂了」。<sup>81</sup>

## 客觀也是營商策略

客觀中立作為「策略性儀式」，另一妙用，在其商業潛力。

看看香港演藝界人士的遭遇就明白，例如演員杜汶澤，歌手黃耀明、何韻詩等，他們曾旗幟鮮明支持2014年的佔領運動。有態度、有立場、敢言、不中立，就要付出代價；結果，由於受娛樂公司與內地網民抵制，他們在內地的演藝事業告終，有時甚至會令投資者蒙受損失。

---

<sup>80</sup> Maras, 2013:33.

<sup>81</sup> Rosen, 1994，載於 Merritt, 1999:373-374。



香港的主流電視台，在「一台獨大」環境下，基本賺錢策略，就是爭取最多觀眾，求取最大利潤。電視台絞盡腦汁構思新猷時，既不能惹人抗拒，又想中層基層男女老幼通吃，盡攬「大眾」，高收視最重要。故一般劇集少有談政治，少談同性戀或認真反映社會問題；縱使有，都幾乎不在黃金時間播放。試想想一家人，只要有一位覺得厭煩、覺得悶、反感，就會轉台或關電視，觀眾就流失了。

廣告商最愛穩定觀眾群，不要敏感項目增風險，令潛在顧客轉台，或題材太沉重而失去購買欲。最穩妥的，包括旅遊玩樂、警匪鬥法、情愛纏綿、輕鬆小品、食食食食死你等節目，最能營造放鬆的消費氛圍。就算是新聞資訊，廣告商都愛贊助天氣、當年今日、報時、財經、滬港通等環節，因為政治安全系數高。

2014年《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管理層張裘昌解畫，編輯方針要「中立」，謂「企得太左太右都會鬧……怎會不走失讀者？無讀者怎做生意呀？」<sup>82</sup>

學者Porwancher指，「客觀」是一層掩護色，令新聞傳媒於偽裝之下，追求利潤、促銷、拉廣告，又能減少法律訴訟的風險。<sup>83</sup>「客觀中立」這種策略性儀式，有助傳媒趨利避禍，減少開支，控制工作流程，加上大眾慣性視作圖騰，傳媒可高舉「客觀」的金漆招牌，逃避求真的責任，卻能顯得冠冕堂皇。

---

<sup>82</sup> 見〈明報管理層昨與編輯部主管對話摘錄〉，《明報》，2014年1月10日，網址：<https://goo.gl/7iWJc6>。

<sup>83</sup> Porwancher, 2011:186.

## 客觀成為權力的偽裝

看看近年泰國、土耳其與世界各地的政變，革命分子想奪權，不去搶佔博物館，不會扣留小說家，<sup>84</sup> 他們第一時間就是出兵佔領電視台。

香港的殖民地時代，廣播機構全設於廣播道「五台山」，這小山丘的道路設計如一個袋，出入只有一條路，旁有軍營駐守，緊握廣播重地之咽喉。

新聞媒體塑造意識形態、影響輿情，關鍵時刻更是直接的官民溝通渠道。訊息背後，誰在主導，如何操控？「媒體並非反映真實的世界，乃是權貴操控他人感受的手段。」<sup>85</sup>

傳媒的監察角色，一向被視為民主體制中重要的制衡力量，但是，新聞從業員卻習慣倚賴官方訊息與建制組織提供新聞材料，領導人講話必然「重要」、領導人出訪必然「歷史性」、領導人視察民情總是皇恩浩蕩，值得大書特書。政治傳播學者 Entman 以層層瀑布為喻，談權貴引導輿論之先天優勢。<sup>86</sup>

這種梯級瀑布，行山澗時總會遇上，有何特徵？就是上游可能只是涓涓細流，但層層水潭，匯集溪澗點滴，一級一級地加碼，到下游洶湧澎湃，勢不可擋。

政府高層，身處輿論制高點，猶如佔領水瀑上游，發布簡單訊息，就能同時啟動建制精英的敏銳觸角，聞歌起舞，主動附和；主流傳媒則慣性兼惰性地認為政府消息必然重要，必屬精品。政府與

---

<sup>84</sup> de Botton, 2014.

<sup>85</sup> Molotch & Lester, 1997.

<sup>86</sup> Entman, 2003.

附和者發聲後，經傳媒加碼，再散播至其他建制精英與普通民眾耳目，他們的意見回饋，再經傳媒一層層放大，變得水浪隆隆，喧聲震天。

Entman 稱之為「階梯激活」(cascading activation)，政府官員與建制精英處於高位，訊息向下流容易，平民百姓要扭轉局勢，把訊息向上傳，則甚為艱難，大概要一個龐大抽水站，才能引起注意。

而「客觀」之大原則，卻為權貴有機可乘。傳播學者 Glasser 指，「客觀報道」原則，有「三違背」：第一，偏向維護現狀，背棄傳媒「第四權」監督之責；二，背棄獨立思考；三，背棄道德與責任。<sup>87</sup>

Glasser 認為「客觀」之說往往令記者以「冷漠旁觀者」(disinterested spectator) 自居，不追查到底，不倡導議題。一如水瀑之喻，權貴的聲音，本來已是水聲隆隆，若記者被動接受，公共政策之辯論，往往由權貴聲音所操弄。<sup>88</sup> 這種平衡與不偏不倚的要求，在電子傳媒新聞領域，更是載於法定業務守則中，令上層之意識形態，更有效鞏固。<sup>89</sup>

權貴之審查行為，獲「幻象泡影式客觀」(phantom objectivity) 加持淨化，令批評者難以置喙；<sup>90</sup> 客觀有如「雙面刃」，有時可協助基層記者抵抗壓力，同時亦是自我審查的面具；<sup>91</sup> 客觀也是「權力的偽裝」，暗地強化既存之政治現實，避免詰問特權階層之既有秩序。<sup>92</sup>

---

<sup>87</sup> Glasser, 1992:180.

<sup>88</sup> Bennett, 1982:306.

<sup>89</sup> Glasser, 1992:176.

<sup>90</sup> Jansen, 1988:24.

<sup>91</sup> Lee, 2007a:435.

<sup>92</sup> Schudson, 1978:159–160.

Glaser更形容，客觀之教條侵蝕了報業的根基，記者變得「非道德」(amoral)，即事事旁觀，對錯不分；「客觀」更剝奪了記者的創造力和想像力，<sup>93</sup>令他們走向沉淪，充當「去知性」(deintellectualized)及「技工化」(technicalized)的角色。<sup>94</sup>

事實上，所謂「客觀」之規範，卻又不是鐵板一塊，充滿例外。傳播學者Schudson注意到，駐外記者往往能較自由地表達個人判斷；體育記者往往不須固守中立客觀，例如體育賽事中，他們可以公然偏向主隊一方。由此可見，所謂中立客觀，界線模糊，充滿操弄空間。在香港，媒介的「中立報道」最大受益者正是中國政府。<sup>95</sup>

Glaser等學者的論述，代表著對「客觀」準則最具批判性的一方觀察。以上討論可見，「中立客觀」是一個滑不留手、含糊不清、矛盾重重的概念。客觀準則的演譯，與新聞行業監察政府的重責相違背；平衡報道，會導致失真；中立之取態，不一定崇高；中立是一種立場，是需要解釋的立場。

CNN記者Christiane Amanpour採訪波斯尼亞戰事的感言，<sup>96</sup>值得深思：

所謂客觀，是要公平地聆聽各方處境，但不代表要平等處理……在受害者與施暴者之間，若我們選擇道德中立，我們距離淪為萬惡的幫兇，只餘一步之遙。

---

<sup>93</sup> Glaser, 1992:181.

<sup>94</sup> Carey, 1969, 於Munson & Warren, 1997:137。

<sup>95</sup> Lee, 2007a:451-452.

<sup>96</sup> Christiane Amanpour對客觀的看法，可見於此視頻：<https://goo.gl/GcOnDJ>。

## 積極客觀與被動客觀

「客觀」所受的批判，龐雜而多面向，根據 Lichtenberg 之總結，大致可分為三類：「有些人認為，新聞不客觀；有些認為，新聞不可能客觀；也有些人認為，新聞不應客觀。」<sup>97</sup> 具體的批評乃：一，客觀報道在日常運作中遭曲解變型；二，「客觀」本來在知識論層面就不存在；三，「客觀報道」不可取，甚至毒害新聞理想。

歸根究柢，混淆出於論者對何謂客觀，本來就有不同看法。傳播學者 Maras 把「客觀」分成兩種面向，分別為「被動客觀」(passive objectivity) 與「積極客觀」(active objectivity)，新聞機構與記者，於不同時空不同新聞內容之下，遊走於積極客觀與被動客觀兩端之間。循此路向，有助釐清「客觀」之紛囂。

「被動客觀」的一端，較強調中立、抽離，無個人感情；<sup>98</sup> 記者自居被動角色，不論斷、不參與爭論，投放較少資源於調查報道。<sup>99</sup> 這些傾向「被動—中立」的新聞從業員，較強調自己作為「鏡子、大眾平台、消息發報者」等角色。<sup>100</sup>

「積極客觀」的一端，則重視批判質疑，拷問前設、追查事實、尋索未知，他們會主動去詮釋、調查。<sup>101</sup> 美國報人 Harold Evans 也作過類似比喻，新聞運作可分為兩派，一是「平面派」(horizontal school)，一是「垂直派」(vertical school)。「平面派」做法，把新聞流

<sup>97</sup> Lichtenberg, 2000:239，粗體為原作者所用。

<sup>98</sup> Maras, 2013:122.

<sup>99</sup> Hackett & Zhao, 2005[1998]:35, 46.

<sup>100</sup> Donsbach & Patterson, 2004:266.

<sup>101</sup> Donsbach & Patterson, 2004:265–266.

程視作一條生產線，記者拾起手邊物件，加工拼湊，流水作業，過程被動；「垂直派」則深挖真相，挑戰難度，打通上下，主動進取。<sup>102</sup>

「客觀」源起自實證主義，強調追求真相，<sup>103</sup>擺脫中世紀的蒙昧迷信，凡事講求證據，崇尚科學方法，反覆推敲查驗。客觀新聞與科學所講之客觀同出一轍，皆強調一切資訊，應盡可能準確地描繪事實。<sup>104</sup>積極客觀與被動客觀之別在於：當大家發現「真相難覓」之時，如何是好？

被動客觀的態度，就是從「尋真」的目標中，退而求其次；既然認定了是非對錯難定，真相朦朧不可知，那麼「平衡報道」與「不偏不倚」就取代了「尋真」，成為新聞編採日常運作準則。<sup>105</sup>

不過，縱使真相不可得，又或沒有絕對客觀事實時，記者仍能從紛亂的說法中理出頭緒。歷史學家Edward Carr解說甚麼是「歷史事實」，就是「一團爭議性事實中的核心詮釋」(a hard core of interpretation surrounded by a pulp of disputable facts)。事實儘管有爭議，但總有眾人公認兼推論對確的「核心詮釋」，真相也許難以觸碰，但我們可以嘗試走近真相。「尋真」也許難做到，卻可視為目標；<sup>106</sup>記者以「誠實」、「持平」、「準確」、「完整」作目標，是有可能達到的。<sup>107</sup>

---

<sup>102</sup> 載於 Maras, 2013:122。

<sup>103</sup> Schudson, 1978:7.

<sup>104</sup> Ryan, 2001:1.

<sup>105</sup> Muñoz-Torres, 2012:575.

<sup>106</sup> Gans, 1979:315.

<sup>107</sup> Kessler & McDonald, 1989:28-29.

記者與歷史學家一樣，同樣在浩如煙海的事實中，憑著良知與專業技能，判辨真偽；在世事紛紜之際，去蕪存菁，還事實本來面目。新聞捕捉得好，就是一個歷史紀錄，凝住一個時代的面貌。

故此，無論記者站於「被動客觀」或「積極客觀」的一端，都需要一顆主動的心去分辨、判斷、選擇，才能接近真相，觸碰「核心詮釋」。所以，當大家都認同「客觀」之義後，問題已不在「客觀」本身，而是如何實現，甚至是：為何根本從無打算實現。<sup>108</sup>

問題可以出於新聞從業員個人身上，追尋真相，說得動聽，卻談何容易；很多記者口才好，擅於表達說故事，卻未必擅長理解數字、調查真相，只要大家都接受「客觀是迷思」的說法，工作就變得容易了，可以明正言順堆砌各方意見，然後以「客觀」為由，把正反意見鋪陳就完事。<sup>109</sup>

問題亦出於新聞生產線的慣性流程，無止境的死線壓力下，記者為求在截稿前完工，遂把最方便快捷得到的資訊組合起來，並視之為常態，「被動客觀」的做法融於運作慣性中，意味著整套運作，更容易被高速生產線牽著鼻子走。

問題亦出於外部影響，權貴與政府資源豐厚，有能力不斷製造新聞原材料，新聞界被動接收官方消息，把「官方版本」(official-fact)視作「自證為真的事實」(self-validated fact)已成為新聞運作常態，<sup>110</sup>也把新聞原則推向「被動客觀」一端。

---

<sup>108</sup> Ryan, 2001:16-17.

<sup>109</sup> Ryan, 2001:16-17.

<sup>110</sup> Hallin, 1986:25.

新聞「中立」、「不偏不倚」，說來動聽，高尚超然，似乎人人都要同意。聽過不少記者說，「客觀中立難聽過粗口」。不偏不倚，報道新聞時當然重要，問題是很多傳媒高層深明心戰妙法，擅長以「客觀」掩飾偏頗，以「中立」迴避話題。

新聞報道「被動客觀」，只因有時真相一時難求，惟有稍退一步；但久而久之，因惰性而捨難取易，因慣性而順流而下，最後慣性與惰性成為結構一部分，「被動客觀」漸變成行事標準，進一步成為上層操控新聞運作的有力手段。

當中，新聞運作之慣性，力量龐大而少為人察。



## 2.4 慣性的暗湧——折服於平淡的日常

要向大學外的朋友解釋何謂“dem beat”，甚為困難。在網上找一條片，自己看吧。看畢，通常仍不明白：他們在做甚麼？為何這樣做？

大學流行的“dem beat”文化，即是各學生組織之新內閣，為了宣傳新閣叫人投票，同學穿著一式一樣的球衣，走遍校園日以繼夜以繼日以甚為奇特的肢體動作兼口號與歌曲宣傳。想吃一頓安靜的午飯，一隊穿著整齊制服的同學，突然操進食堂，敲鑼打鼓，雙腿大力鋤地，高叫口號，他們叫甚麼倒聽不到，因為飯堂狹窄，聲浪迴旋，喧鬧得有點瘋狂，他們叫得落力，雙腿出盡力氣又跳又蹬，震動整座大樓。

宣傳新內閣，為何用這種方式？為何延續三數星期？還要不斷變口號變姿勢？雖然團隊精神很重要，衝勁也很難得，但為甚麼要這樣做？據說是「傳統」，同學無人說得清源起，有人不喜歡做卻又跟從大隊全程投入，做完又覺得爽，似乎又有點意義。

日常生活細節，我們不可能事事盤算，計劃周詳，每一步反覆思量。例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刷牙、洗臉、上網、開收音機，都是機械式動作，如果我們每天早上睜開雙眼，都要想想下一分鐘做甚麼，落床時要左腳先落地還是右腳先落地，人很快會瘋狂。

任何機構運作亦如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規律，能保證基本運作；規律運作日久，慢慢成為教條，人們行禮如儀，容易忘記規律的本義，視習慣為天經地義，不質疑，無條件服從。

近年愛上「網邊」與「泳網」玩意，就是疾走岩岸邊那些「無路之路」——沿海邊石灘岩壁攀爬前行，叫「網邊」；當前路被峭壁巨石

攔阻，勉強爬石太危險，就索性跳進海裏，泅泳游過峭壁高崖，順路探探天涯海角的隱秘洞穴，叫「泳網」。

大海泅泳，巨浪洶湧，浪花飛揚，固然刺激；但有時風平浪靜，卻發現奮力泅泳，始終不能游前半步，原來水有暗流，身處其中，無聲無息，不察不覺，身不由己。

這種巨大力量，暗湧潛行，容易被忽視。

## 車衣女工與麵包工場

時下香港記者，有「車衣女工」之說；數十年前美國社會學家 Tuchman 早以「焗麵包」比喻新聞製作過程，新聞是「每天都要新鮮製造的消費產品」(a depletable consumer product that must be made fresh daily)。<sup>111</sup>

無論當天有大新聞、小新聞、無新聞，每天都要開鋪「出貨」，車衣工人好，焗麵包師傅也好，都要有新新聞出街。新聞淡靜之時，就是記者們最頭痛的日子，尤其是電視新聞，因為無論當日新聞多寡，新聞節目長度都幾乎一樣。

每逢星期六日，電台電視總會找來政治人物做專訪，例如是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專訪後記者們還要截住找她再簡短談幾句。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談甚麼呢？2016年底一段新聞片段中，<sup>112</sup> 范太談人大釋法(但已講了一個月，了無新意)，不評論曾俊華是否參選(一個人不評論一件事，這是甚麼新聞?)，又說估計

---

<sup>111</sup> Tuchman, 1978.

<sup>112</sup> 以2016年11月27日一宗新聞為例。

梁振英應會參選（這估計難道很有見地？最後估錯了）。時事評論節目，找政界有頭有面人物清談，可以理解，但如此閒話家常，卻由各大媒體轉發，成為星期天由朝到晚播出的新聞材料。

「新聞價值」是相對的，當沒有新聞、又要填塞節目時間，甚麼垃圾事件都變成新聞，這是最簡單、最表面的解釋；再進一步，傳媒的辦事規律，也關乎傳媒的組織架構、其理念及意識形態。

類似「范徐麗泰說了話」這類新聞有一特徵，屬「事前可預計」（prescheduled）。以一家工廠而言，尤如一塊等待放進焗爐的麵團，或一堆元件齊備的衣料，只待車衣女工妙手剪裁，縫好即完事。屬於手到拿來、萬無一失的材料。在紛亂的新聞採訪環境中，像一大碗香噴噴的白飯，就算無主菜，吃了能填滿肚子，很重要。

對資源緊絀的媒體而言，「范徐麗泰」或其他「林鄭葉劉張黃何」之話，有眾多好處：

一，供應源源不絕，不愁原材料缺乏而導致麵包做不出來。

二，他們有官職、有頭有面，無論說甚麼話，都似乎有意義，記者容易說得通。

三，人手及資源調配完全在預計之內，而且必定有貨交，填塞新聞時間有保證。

四，零政治風險，可以大量篇幅，大書特書。

要求高的記者與新聞機構，重視調查報道，監察政府、深入分析、揭露社會不公義，這些新聞「原材料」難找，需要時間精力，走得太前怕出事，擔心政治不正確，投入太多資源又怕維持不到正常運作，應付不了平日「出街」壓力。這些都是高難度動作，除了大量人力物力，更須挑戰權威的膽量，要精密分析的智慧與經驗。當三者皆缺，就是深深擁抱「范徐麗泰」的時候。

不過，Tuchman的麵包店比喻，已略嫌過時。往日報紙每朝出報，猶如麵包店每朝有新鮮麵包出爐；但今天記者面對網絡即時新聞、電視24小時新聞，活在當下，每一刻都要有新鮮事。一位資深電視新聞從業員如是說：

以前一天三節新聞，現在48個。<sup>113</sup>

新聞講求時效性，為了先人一步，報道爭分奪秒，以示擊倒競爭對手，媒體的分工流程愈來愈細緻繁複，記者大部分心力都耗費於緊逼的規律中。一位電視記者形容他們處理一宗簡單新聞時的慣常做法：

例如，梁振英行政會議前有話說，大家如何趕新聞？可能他說話時，已選好了soundbite，一個版本有字幕，一個版本無字幕……例如海關的瑣碎記者會，收到採訪通知後，已寫三十秒稿，記者會開始之前拍攝場地鏡頭，官員剛發言，還未講完，已播出一個bite，若有一個較好的，改bite，接著要寫一個完整故事，要fine tune，又改一次……一個如此簡單的故事，都有五六個版本，這只是一宗新聞，剪接完還要check片，工作量真的很大。

機構運作中，日常之「規律」(routine)無處不在，它主宰著工

---

<sup>113</sup> 指新聞台24小時運作，每半小時一節新聞，一天共48次。

作流程；個體陷於其中，大家不常察覺其存在，視之為理所當然，不加詰問，行禮如儀。

規律之存在，對機構運作有重大意義；所謂行禮如儀，「儀」當然有大用。在複雜混亂的環境中，能集中員工注意力；大家視某種規律為天經地義後，容易建立默契，減少不確定性，促進協調，提高效率。<sup>114</sup> 特別是新聞製作流程，社會上每天皆有突發事故，這邊有地震，那邊有名人死去，又或是原先約好的訪問取消了，記者每天面對重重的不確定性，更需要一套規律化生產流程，才能「測不可測」(predictability of unpredictability)；「如果新聞是不可預計的，那麼其製作就要變得可預計」。<sup>115</sup>

人們愛秩序、愛規律，因為能減少伴隨不確定而來的焦慮感。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Douglass North 指，我們把事情視作理所當然，能減輕複雜與不確定；<sup>116</sup> 控制焦慮乃「人類行為中最常見的動機根源」；緊貼規律，能保障自我的基本安全感。<sup>117</sup>

不過，慣性地服從規律，卻會造成「隨意的迷信」(arbitrary superstitions)，大部分組織中人，可能從來無思量過某些安排、規矩或法則，是否合理正當。獲大家認同的行事邏輯，不一定理性，部分規律之源起，可能來自於偶然的成功。看似權威和合理的既定行事模式，行禮如儀之「儀」，往往只是一種迷信，卻反過來定義了目標與規則。<sup>118</sup>

---

<sup>114</sup> DiMaggio & Powell, 1991:19.

<sup>115</sup> Golding & Elliott, 1979:97.

<sup>116</sup> North, 1990:22.

<sup>117</sup> DiMaggio & Powell, 1991:23.

<sup>118</sup> Powell, 1991:192.

例如，新聞要有時效性，從業員相信要爭分奪秒，快人一步，把訊息第一時間送到觀眾眼前。但好些不太重要的新聞，是否需要勞師動眾，投入心力，目標只是比競爭對手快幾分鐘、甚至快幾十秒播出？

又例如官員講話就是新聞，無論意見是新是舊，必預留篇幅。政府閉門「放料」，有時只為試探民意，隨時不認帳，記者習慣上卻不捨得不用，願意押上公信力，也引用匿名的「政府消息人士說……」，甚至會覺得光榮。傳播學者 Schudson 形容，記者的消息線眼 (sources)，乃新聞媒體和權力之間的「暗黑秘密」；<sup>119</sup> 政府源源不絕地餵飼新聞原材料，記者則視政府消息為廉價而可靠的「資訊噴泉」(fountains of information)。<sup>120</sup> 記者慣常把官員說話當作事實，<sup>121</sup> 官方消息不須再進一步核實而「自證為真」(self-validating facts)；<sup>122</sup> 自動把官員當作「最權威的知者」(most authorized knowers)，這就是新聞採訪的「最省力法則」。<sup>123</sup>

另一類慣性，關乎「新聞價值」。如何才成為「新聞」，一般行業內公認「有價值」的新聞，都有時效性、貼身、重要、有矛盾或有趣味。Schudson 認為，記者習慣選擇能觀察得到及不含糊的新聞故事，意味著新聞形式容易傾向「事件主導」(event-orientation)，例如是今天有甚麼大活動、今天誰說了話等，而非「議題主導」(issue-orientation)，即關乎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由於權貴階層有資源製

---

<sup>119</sup> Schudson, 2003:134.

<sup>120</sup> Fishman, 1980:108.

<sup>121</sup> Shoemaker & Reese, 2014:109.

<sup>122</sup> Tuchman, 1978:95.

<sup>123</sup> Schudson, 2003:134.

造「偽事件」(pseudo-events)，如各種慶祝、盛事、公關宣傳、記者會等，曝光機會多；社會運動的訴求與改革者的倡議等長期問題，不易凝聚於單一事件，這些議題於是常遭新聞規律忽略。

## 直播極速新規律

大災難、大地震了，香港電子傳媒記者第一時間上機，趕赴災場。幾乎每個人都有過類似經驗：剛下飛機，還未離開機場，就要做直播，最少來一個「電話現場報道」，報道甚麼呢？國際機場又不是災區，甚麼都見不到，甚麼也未採訪，都要「第一時間」報道。

結果，報道只能拉雜而談，講講機場航班有無受影響，所謂現場報道，大部分內容皆「出口轉內銷」；記者匆忙趕到，所述之「最新情況」，很多是同事們在香港新聞部綜合外國媒體最新資訊，集齊資料，傳給災場的記者覆述一遍，「快人一步」的「現場感」，都是營造出來的假象。

一個有關「空降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的研究發現，香港記者2011年採訪東日本大地震，嚴重受制於「現場報道」之規律。為了一天幾次直播，他們帶著沉重器材，要留在寬頻訊號順暢的城市，意味著根本不能走到重災區，做有意義的採訪，「尋找好地方做直播，有如採訪新聞一樣重要」。<sup>124</sup> 決定是否做直播，往往非取決於其新聞價值，而是因為技術先進了，有「新玩具」。<sup>125</sup>

傳媒學者McLuhan半世紀前的名句：「媒介就是訊息」(the

---

<sup>124</sup> Wang et al., 2012:497.

<sup>125</sup> Rosenberg & Feldman, 2008:15.

medium is the message) 提醒大家，媒介的形式主宰內容，媒介本身「能塑造與控制人際間聯繫與行動的形式」。<sup>126</sup>

曾幾何時，人們相信「需要是發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因為有需要，人們發明新事物。學者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詳述眾多人類技術發展史的例子，指出「發明才是需要之母」，<sup>127</sup> 即是說：技術驅動需要。推特(Twitter)的創辦人之一Biz Stone曾說：我們以前不知道我們需要這種社交媒體，直至我們擁有。<sup>128</sup> 是的，在社交媒體與智能電話出現前，應該無人想過，吃飯要讓手機先吃。

社交媒體興起，新技術導致溝通模式大變革，眾多小眾頻道、政治脫口騷和網台出現，自成群落。社交媒體的傳訊方式，令意見兩極化、激進化、情緒化、速度化。學者認為，這種「無間斷新聞」營造虛假的充權感，人們容易滿足於資訊的速度，安於不完整及誤導的內容，眾多選擇下，受眾細碎化。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令受眾選擇自己愛聽的說話；<sup>129</sup> 社交媒體上，一聲呼喊，總有和應，氣味相投，鑽進小圈子，活在回音谷的世界，欣賞自己的回聲。

傳統媒體亦不能倖免，往日有云「內容是王」，今天「速度是王」。傳統媒體亦要比拼即時新聞上網速度，快人一步上載，贏在起跑線，賺得點擊率，造成了匆忙報道的羊群心態。製作周期縮

---

<sup>126</sup> McLuhan, 2002[1964]: 18-19.

<sup>127</sup> Diamond, 1998:242.

<sup>128</sup> 引自Sundar, 2010:3。

<sup>129</sup> Rosenberg & Feldman, 2008:10.



短，即時新聞、現場直播成為主菜；每幾分鐘就是交稿限期，腎上腺素高企。<sup>130</sup> 統計所見，美國的有線電視新聞，約六成時段都無預先寫稿，屬「即興」的脫口騷或現場訪問直播。<sup>131</sup> 問題於是出現了：新聞瞬息萬變，記者又要爭分奪秒、即時播出，又要電光火石中分清真假，很多時是不可能的任務。

技術促成的新運作規律，逼使新聞專業進一步妥協退讓：

- 減少核實資訊：「速度是王」的心態，加上直播潮流泛濫，運作上難以過濾及核實不確訊息；<sup>132</sup> 網絡媒體習慣「先發放，後改正，再補充」的做法，容易損耗公信力。
- 減少調查報道：「24小時新聞」冒起，新聞生產線無止境運作，令從業員耗損心力，無暇反思判斷；<sup>133</sup> 新聞時段以倍數增加，記者卻沒增聘多少，自然難以抽出時間人手做有意義的偵查報道，結果令新聞平面化、單一化。
- 新平台舊人手：新技術促成新平台，傳統新聞媒體擴充，舊平台繼續運作，人手資源增加卻有限，自然犧牲專業質素。<sup>134</sup>
- 依賴官方信息：為了填塞無限的新聞時段與空間，記者慣常把官方信息手到拿來，少加質疑，令有權勢者更有機可乘，容易主宰資訊之供應與流通。<sup>135</sup>

<sup>130</sup> Kovach & Rosenstiel, 2010:38.

<sup>131</sup> Kovach & Rosenstiel, 2010:40.

<sup>132</sup> Kovach & Rosenstiel, 2010:38.

<sup>133</sup> Mark Thompson, 2005.

<sup>134</sup> Kovach & Rosenstiel, 2010:39; Maras, 2013:177.

<sup>135</sup> Kovach & Rosenstiel, 2010:42.

聽聞多時的「資訊革命」，近年終於見真章。通訊革新急行，傳統媒體招架不住，收入下降，新聞專業價值承受各方面衝擊；新生態令網絡眾聲喧嘩，受眾細碎，意見兩極，真假不分；但同時給每個弱小的個體充權，人人有發聲機會。跨媒體的表達方式締造新可能，知識的鴻溝迅速移除，傳統媒體的壟斷遭打破。傳播學者 Maras 認為，技術對新聞行業而言，是「毒藥也是解藥」(poison and cure)。

世情複雜多變，訊息量如海嘯，本來新聞從業員應肩負去蕪存菁、選取重點、詮釋要旨的角色；但業界被各種規律牽著鼻子走，隨暗湧漂流，容易把世界描繪得雜亂無章、分崩細碎。正如英倫學者 Alain de Botton 所言，若媒介令大部分受眾，不能把握要旨，無力留心關注，大眾感到混淆、沉悶，繼而覺得政治煩厭，<sup>136</sup> 暗合權貴階層之利益。

看似無色無味的規律與儀式，可以強化，可以攔下；身處暗湧之中，你可以隨水漂浮、放棄掙扎，也可以配備充足、逆流奮進。

我們可以問，這些規律儀式，誰來控制？誰來加固？是否真的理所當然？當社會鄙視資訊審查，透過規律儀式來操控，無聲無息，更加高明。

---

<sup>136</sup> de Botton, 2014:32.

## 2.5 機構的皇牌——老闆才擁有新聞自由

新聞媒體，自詡有遠大使命，但媒體也是一個機構，多數是商業機構。

香港新聞界有一個自嘲小笑話，常道「編輯自主」，不要高興得太早，現實是「總編輯自主」，一個人的自主；而總編輯之上，還有他要聽命的機構老闆。學者 Altschull 說過：「笛手吹奏的曲子，由付錢的人決定」(The tune the piper plays is composed by those who pay the piper)。<sup>137</sup> 列寧早於 1919 年說過：「新聞自由乃富人收買報紙的自由、富人用自己的財富操控與偽造民意的自由。」<sup>138</sup>

新聞自由的興廢存亡，端在傳媒擁有者一念之間，美國記者 Liebling 的名句則諷刺：「誰擁有新聞自由？就是擁有報紙的人」(Freedom of the press is guaranteed to those who own one)。<sup>139</sup> 傳媒學者 Schudson 說，傳媒大老闆經營媒體，不是為了賺錢 (make money)，是為了發聲 (make statement)；<sup>140</sup> 他們的錢已經賺夠了，沾手傳媒不是為了建造賺錢機器，是要建立輿論陣地。

香港新聞行業前輩劉銳紹曾經擔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他記得 1989 年「六四」之後，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接見了一批香港傳媒高層人士，江澤民有一句經典說話，大意是，他最欣賞資本主義的一點，就是「誰人出錢誰就是老闆，誰是老闆就聽誰的話」。<sup>141</sup>

<sup>137</sup> Altschull, 1984:256.

<sup>138</sup> 載於 Jansen, 2015:141。

<sup>139</sup> Liebling, 1981.

<sup>140</sup> Schudson, 2003:120.

<sup>141</sup> 劉銳紹文章〈《明報》的明天〉，網址：<https://goo.gl/nwFAAZ>。

江澤民這句話清晰、簡潔，一語道破資本主義商業機構的本質：老闆有莫大權力，老闆說了算。

## 科層組織洪荒之力

新聞從業員也許有滿腔理想、有偉大使命，但現實就是，機構老闆與其代理人，有權獎勵你有權懲罰你，有權升你職有權叫你坐冷板凳，有權請人或炒人，有權選拔負責請人或炒人的人。社會學奠基者韋伯形容，科層組織是一個巨型的人類機器，既有效率、又能摧毀人性，潛藏於生活的每個環節。現代社會中，科層組織利用專家，建立規範，各司其職，紀律分明，無處不在。<sup>142</sup>

機構老闆與其代理人，有權分配與指派工作。Tuchman 研究大學制度時發現，人們面對緊逼壓力要完成任務，很少人會願意再承擔多些工作。新聞行業爭分奪秒，變化萬千，記者奔波勞碌於不同場合，本來已經很忙，難以抽空關注個別有價值的議題，<sup>143</sup> 管理層再利用人事及工作調配，主導記者之工作模式，能否專注某事件之調查，記者身不由己，最終都是由管理層決定。

機構老闆與其代理人，有權制訂預算與分配資源。主管說句「善用資源」或「資源緊絀」，記者採訪計劃即時人仰馬翻。當中最受影響的採訪，是要投放大量人力物力與時間、卻分分鐘白走幾趟的調查報道。例如在中國採訪一些敏感題材，既要走遍大江南北，也要長時間跟進，又要冒「政治不正確」風險，佔用資源卻無保證一定有收穫，調查報道遂成為資源短缺的犧牲品。相反，送上門的

---

<sup>142</sup> Handel, 2003:6-7.

<sup>143</sup> Gans, 1979:185.

政府資訊，既快捷又方便又省力又廉價，人手資源短缺時，手到拿來最合用。

老闆看似沒有直接干預新聞運作，但通過分配資源與人事調配，自能「有效地劃定前線記者操作上所享有的自由」。<sup>144</sup>記者無法做深入報道，有違新聞志業，也只能徒嘆奈何；畢竟老闆真金白銀投資，賺多少錢才叫足夠？盈利前景是否真的不樂觀？傳媒良心值幾錢一斤？身為機構中的小小僱員，亦難以置喙。

「善用資源」是一個美妙的說辭。當新聞主管封殺敏感話題，為了趨吉避凶，不想冒犯權貴，又不能直言自我審查，更不敢同記者辯論「新聞價值」，因為恐怕會輸；這時候，抬出「資源問題」，下屬不知公司財政，往往難以抗辯，只能退讓。而所謂「善用資源提高效率」，也屬虛無縹緲的說法；「沒有甚麼必然的功能性指標去斷定何謂效率」，「效率」的標準，往往由掌權者定義。<sup>145</sup>

機構老闆與其代理人，有權主導節目形式。例如亞洲電視於2015年倒閉前一段時間，新投資者準備救亡時，開宗明義訂出節目路向，要「少談政治，多弘揚真善美和報道好人好事，以及多製作對社會和國家有益有建設性的節目」。<sup>146</sup>無綫電視2016年新24小時頻道「J5」啟播，主打財經投資；近年新聞台冒起眾多新環節，如天氣、歷史、醫療、周末好去處等軟性節目，當中最受歡迎的節目是《世界零距離》，三位記者走到偏遠角落，如格陵蘭、福克蘭、蒙

---

<sup>144</sup> Lee, 2007a:436.

<sup>145</sup> Friedson, 2001:45.

<sup>146</sup> 見《立場新聞》報道，〈葉家寶：「司總」要求亞視少談政治 多製作對社會國家有益節目〉，2015年9月11日，網址：<https://goo.gl/kQPi8r>。這位新投資者後來因收取其他財團欲收購亞洲電視所付的1,500萬「誠意金」後不還錢，於2017年3月被法庭頒令破產。見<https://goo.gl/jPqW8X>。

古、瓦魯阿圖等地，介紹當地風土人情與社會議題。

節目路向與形式，反映了管理層的偏好，也主宰人手與資源配置。總括而言，科層架構中，在上位者有超然的管控能力：

- 有權設定前提 (setting premises)：高層管理者能訂立規範與標準，塑造與引導下屬之行為。<sup>147</sup>
- 有權於關鍵時刻插手 (critical intervention)：高層管理者能於關鍵時刻，推翻既定程序，製訂新的守則，重設分工架構。
- 有權分配資源：資源之限制，能直接排除某些行徑，減少可行的選擇；<sup>148</sup> 資源多寡，也是操控之術，能令人歡喜令人憂，定計劃之生死。2017年3月，有線電視母公司九倉宣布不再額外注資連年虧蝕的有線業務，備受好評的有線新聞，財政頓時陷入困境。
- 有權招聘與分配工作：高層管理者操控員工招聘，會傾向選擇想法接近的人，亦主導接班者的培訓，晉升與自己世界觀相似的下屬。<sup>149</sup>

機構制度，有科層架構作為執行機器，個體難以抗衡。組織論者Scott形容，個體要對抗組織的規則系統，並不容易，情緒往往波動複雜，一方面是恐懼、困惑、罪疚；另一方面，卻感到解脫、正義、含冤得雪。<sup>150</sup>

---

<sup>147</sup> DiMaggio & Powell, 1991:80.

<sup>148</sup> DiMaggio & Powell, 1991:10.

<sup>149</sup> Powell, 1991:191；及DiMaggio & Powell, 1991:72。

<sup>150</sup> Scott, 2008:54.

## 2.6 制度的枷鎖——我們會飛，但已不懂拍翼

廣州白天鵝賓館，五星級酒店大堂正中，數年前有一個礙眼的巨型不鏽鋼鳥籠，毫無美感，似是風水陣。牢籠裏，養了數十隻彩色小鸚鵡，我在大堂閒坐等人時目睹，一隻小鳥逃脫了。

當小鳥掙脫牢籠，牠會做甚麼？牠可會歡天喜地，頭也不回，珍惜機會，拍翼遠飛？

這頭小鸚鵡，站在籠外，看來有點不知所措；籠內同伴繼續齊聲啾啾唱歌，籠外小鳥卻甚為焦躁，牠沒有遠走高飛，反而不停回頭張望，挨在鐵枝旁，想鑽進牢籠裏。

這些小鳥，一生都活在籠內，囚籠裏豐衣足食，環境熟悉，又有親戚朋友；易地而處，如果你是小鸚鵡，籠內的規律，可能已經變成生活的唯一可能；外面的世界也許精采，自由的天空卻充滿未知。

有人擔心小鳥安危，請服務員留意，服務員愛理不理地說：不用擔心，小鳥會找到洞口鑽回去的。

監獄電影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譯《月黑高飛》，講述長期囚禁罪犯的故事，有一句經典對白，一位坐牢30年的囚犯，Morgan Freeman 飾演的瑞德，談到監獄的牆：

這些牆很可笑，開始時你恨它，慢慢你習慣它，時間長了，你開始倚賴它。

瑞德在電影對白中，形容這個過程，用上了「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 的字眼。當人被高牆圍繞，如鳥囚籠中，久而久之，習

以為常，磨滅意志，想像不到其他可能，高牆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在龐大的權力系統中，人如螻蟻，一如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所言：

平凡人陷於日常生活的環境限制中，他們只是機器的小部件，難以想像龐大的社會架構。他們每天執行看似合理的行動，卻無從想像，最終會達成甚麼效果。<sup>151</sup>

Bourdieu說，在看不見的制度架構之下，個體只是代罪羔羊，「要找出傀儡後的線」。<sup>152</sup>

## 無形的囚籠

〈破篇〉至此，闡述了「自我審查」概念之局限；「專業」光環，同時可以是操控的緊箍咒；「客觀中立」規範，詮釋彈性多變，是時候從神壇拿下；各種機構運作的規律與慣性，如潛行暗湧，力量常遭忽略；機構本身的科層組織，亦方便有權位者予取予求。

以上是本書提出以「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 概念了解香港新聞審查之大背景。此研究路向，更重視探討專業規範、運作慣性與機構行政規章，如何自成系統，嵌入組織架構，如韋伯所言的「鐵牢籠」，以工具理性之名，衍生隱密的審查行徑，框限與操控新聞發表之可能與形式。

---

<sup>151</sup> Mills, 2000[1959]:168，原文：“Caught in the limited milieu of their everyday lives, ordinary men often cannot reason about the great social structures—rational and irrational—of which their milieux are subordinate parts. Accordingly, they often carry out series of apparently rational actions without any idea of the ends they serve . . .”

<sup>152</sup> Bourdieu, 2005:42.



「結構性審查」有別於「自我審查」概念，主要在四方面：

- 「結構性審查」不僅針對懷疑審查之案例，更強調其結構性現象；
- 「結構性審查」不亟亟於追問疑似審查行為之意圖，而重視行為對內容之影響；
- 「結構性審查」透過操控表達渠道與表達形式去影響內容，不一定要直接操控內容；
- 「結構性審查」是否存在，並非單純「有」或「無」，而是程度問題。

本研究之「結構性審查」概念，聚焦於機構日常運作層面，追尋疑似審查行為的一絲一縷，如何鑲嵌於組織結構中，影響內容。由於這種對「審查」之再定義涉及寬廣層面，學者 Müller 警告，不要誤把結構性審查等同機構中的所有社會化控制 (social control)，每個機構都有其控制訊息的規範，有些資訊會被排除，不一定全歸類為審查。Müller 舉出四種可能被人當作「審查」之情況，可作為一個思想實驗，更具體地分析哪些情景才算「審查」。

- 例一，在威權國家生活的作家，因著作得不到官方審核批准，不能出版；
- 例二，學者的著作被學術期刊拒絕刊登；
- 例三，出版社偏好為有名氣的作家出書，拒絕名不經傳的作家；
- 例四，父母要求孩子靜下來。

例一與例四爭議不大：例一有「第三方強力干預」，阻止公眾知情，屬明確的審查行徑；例四則只涉家庭私事，無關公眾領域，故不屬審查。但第二及第三例，則須詳細討論。

Müller認為，學術期刊的把關人，屬同儕審核，非外界之第三者，故應視為專家之自我規管 (self-regulation)，不屬審查。例三的出版社，Müller認為它選擇有名氣的作家出於財政考慮，而且被拒出版的作家可以找其他渠道發表，故出版社政策並無減聲效果，亦不屬審查。<sup>153</sup>

不過，Müller作判斷時，明顯有一些前提。學術論文一例，已假設了負責評審的同儕乃真正自主，其專業判斷不受外界影響，這點於西方學術界，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但於威權主義國度，不能假設為真，權貴軟硬兼施，滲入生活每個層面，任何專業皆不能自動免疫。

例三之出版社例子，我們亦不能忽略一重要因素，挑選作者與經典作品的原則，由誰所訂？有何根據？說到底，審查是一種「規則鑲連現象」(rule-embedded phenomenon)，<sup>154</sup>有明規則有潛規則。Müller假定了出版社以商業角度或其他未明言的理由，制訂出版政策；但是政策實行時有彈性，詮釋時流動多變，常有例外。誰有權執行與修改政策？誰有權豁免遵行規則？也許在上位者與權貴眉來眼去，違背了公司之商業利益？縱使被拒絕刊發的文稿仍能找到其他出版機會，遭排拒的資訊接觸讀者的機會無疑少了，故所謂「審查」不一定用「有」或「無」來衡量，而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例如，香

---

<sup>153</sup> Müller, 2004:11-12.

<sup>154</sup> Jansen, 1988:8.

港的中資書店，各大門市遍及市區購物熱點，市場份額大，若中資書店不賣某本敏感書籍，接觸讀者之機會大大減少，這種排拒有實際效果。

故第二與第三例子，不能斬釘截鐵論斷那不是審查，須仔細察看主事者究竟有沒有真的自主，而其享有自主的多寡，還有很多影響因素，包括「結構性審查」概念中，專業話語的詮釋、運作慣性的規律、組織行事規則的管控；機構科層組織之外，也受更上層的社會與政經力量所左右。

但Müller所言，研究「結構性審查」確實須警惕，「審查意味了話語之操控與規範，反之卻不然，並非所有操控與規範皆屬審查」。<sup>155</sup>

本書之「結構性審查」定義，建基於李金銓對自我審查的定義，<sup>156</sup> 修改如下：

結構性審查為一套支配編採方針的制度規律，建構各種規範、守則，及其詮釋與執行，從而促成一套編採方針，以不作為、忽略、無視、淡化、扭曲、轉移焦點，以至透過話語之選擇，把新聞內容導向有利於建制。

此定義把焦點轉移至自我審查之結構性根源，不再強調「趨利避禍」之意圖，聚焦於新聞運作之規律、守則與執行方式，如何透過掌控機構運作，塑造有利於建制的新聞內容。

總括而言，「結構性審查」不能上綱上線：訊息傳播受制於各種規則與禁忌，但並非所有規則與禁忌皆等同審查；資訊之挑選與過

---

<sup>155</sup> Müller, 2004:12.

<sup>156</sup> 見本書第21頁。

濾不能避免，有選取，必有訊息遭排除，但不是所有排除皆屬審查；科層組織施加各種影響，但不是所有由上而下之影響都是審查。

這些模糊的界線，正是「結構性審查」的威力，鑲嵌於制度架構中的既定程序、規範系統與運作慣性，本來就同時有「充權與控制」的作用，<sup>157</sup>主宰著機構日常運作，顯得自然而然。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Douglass North 指出，人們日常行為有九成不須認真思考，因為「要面對各種繁瑣與未知，對應方式早已規律化，而且應對的方式有限」。<sup>158</sup>

這些規律，皆隱藏於機構日常運作中。本研究以「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 之「制度邏輯模型」(institutional logics model) 作分析框架，詳細文獻回顧見原著論文，<sup>159</sup>由於篇幅關係，於本書從略，僅述關鍵要點。

## 制度，就是遊戲規則

制度論中之所謂「制度」(institution) 在英文字義中，除了「制度」，亦可解作規則、習俗，或是機構、團體、官僚架構，含義廣闊，常見混淆。<sup>160</sup>

被認為屬於 institution 的東西，可包括婚姻制度、合約制度、勞工制度、保險業、正規組織、軍隊、總統制、公司、學術科目

---

<sup>157</sup> Jepperson, 1991:146; Scott, 2008:50.

<sup>158</sup> North, 1986:25.

<sup>159</sup> 原著論文：*Institutional Logics as Constitutive Censorship: The Case in Hong Kong Broadcast News Media*。

<sup>160</sup> Jepperson, 1991:143.

等；縱使差異大，制度論中所言之「制度」有共通點，乃「生產系統」(production systems)、「賦能結構」(enabling structures)或「社會程式」(social programs)；這些比喻皆指向「重複的活動序列背後的一套穩定設計」。<sup>161</sup> 這些系統、結構或程式，引導複製與生產過程，這些「制度」建構各種規則系統，既充權也同時框限可能性，大多數人視為金科玉律。

「制度」很籠統，它透過甚麼渠道設定遊戲規則、引導生產模式？這個生產系統，Scott歸類有「三條支柱」(three pillars of institution)，<sup>162</sup> 一為管控系統(regulative system)，即機構擁有者與其代理人所掌控的權力系統，包括資源分配、人事任免、制訂規則等；二為規範系統(normative system)，主要為行業守則，在新聞行業中，即指中立、客觀、持平、求真等專業守則；三為文化認知系統(cultural-cognitive system)，即那些被視作天經地義、絕少人質疑的日常運作規律。

除了獨立的公民記者，新聞工作難以脫離於組織架構之外。「結構性審查」之概念，正是從這三條支柱出發，深入剖析傳媒機構內的新聞生產結構，如何炮製出傾向建制的新聞內容。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所著之暢銷書《快思慢想》，把人的思維方式分為兩個「系統」：「系統一」以直覺、情感作快速判斷，這是省時省力的決策捷徑；「系統二」則擅長懷疑、理性分析，但這個系統耗費心力，很懶。康納曼說，人的心智不論學識教育，都有這兩個系統，但人們大部分時間只會啟動「系統

---


<sup>161</sup> Jepperson, 1991:144.

<sup>162</sup> Scott, 2008:48.

一」，對眼前所見不加細想，看不見自己的看不見；康納曼以簡寫“WYSIATI”（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原則來代表「系統一」的特徵，意思就是「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

接受眼前規律與運作，不深究背後的隱密操控，既是人的直觀本質，也促成「溫水煮蛙」之過程。太直接粗暴的管控，猶如把蛙放進熱水，青蛙察覺危機，立即跳躍掙扎；改以溫水浸泡，慢慢升溫，青蛙茫然不察，甚至悠然自得地享受；溫水煮蛙之伎，最希望你安於現狀，一點一滴慢慢習慣，到你發現問題，已是跳不出沸水之時。

香港的新聞自由，看似一座百花齊放的巍峨大山，這些年來，有人在暗黑處鑽洞；有人享受溫水的舒泰，自劃牢籠，為高牆添磚；現在，水土流失、草木凋零。本研究希望深究因由，拆解在機構層面的隱密運作。



# 3 立 篇

## 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偽中立」、「假平衡」、「搬龍門」、「血汗工場」、  
「車衣女工」、「陰乾」、「換血」……

——深度訪談中最常聽到的形容

今時今日的新聞審查，沒有人戴著臂章，不會明刀明槍，所謂「陰影」無實質形體，明暗不定；無審查之名，卻有影響心理與操控結果之實效。



一個人的力量，影響不到公司決策，我只是體制裏的零件，能改變的不多。  
—Y.C.G.<sup>1</sup>

本章闡述香港廣播新聞媒體之二十種「**結構性審查行徑**」(Constitutive Censorship Practices, CCPs)，呈現新聞運作中各種無形框限與禁忌，故亦稱為「陰影」。二十種「結構性審查行徑」，分置於組織架構內之規範、文化認知及管控系統中。新聞專業話語，成為規範控制爭逐之場域；行業面對極端細碎的分工流程，容易墮進缺乏反思的僵化規律中；管控系統中的資源及人事配置等行政權力，均能把新聞內容推向被動與規律化的一端，最終有利建制一方。

研究亦發現，機構內愈是階級分明、高低層人員間之文化資本鴻溝愈大，則主管愈能支配運作標準與規則。當今之世，專業自主不能公然侵犯，操弄人事任免、資源分配、慣性規律及中立客觀等文字遊戲，成為柔性支配之伎。

表1分類列出本研究發現之二十種「結構性審查行徑」，亦可視之為二十種審查陰影。這些「結構性審查行徑」，不一定存在於所有機構或每項決策之中；系統結構俱在，但不須每時每刻啟動，力度亦有強弱之分，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結構性審查」並非純粹一個可預計結果的壓迫工具，而是「權力爭逐中既有作用力、也有反作用力的不穩定過程」。<sup>2</sup>

---

<sup>1</sup> Y.C.G. 是一位有超過十年行業經驗的採訪主任。

<sup>2</sup> Müller, 2004:25.

本研究以香港廣播媒介作切入點，研究「結構性審查」的概念及現象，研究成果亦可用以審視其他機構、甚至其他專業的狀況。部分被訪者明確表示，他們所披露的親身經歷及細節，只有極少人知曉；故本書處理方法如下：

一，本書所有被訪者皆匿名處理，引述的名字簡稱均屬代號，一方面由於本研究並非針對個別從業員或機構，毋須具名；另一方面，「審查」這回事在傳媒行業中屬敏感話題，絕大部分被訪者仍然在傳媒機構中工作，為保護受訪者，身份不便透露。

二，部分資料，不完全披露細節，只談梗概或整體現象。

三，部分細節，於無關宏旨處（如當事人性別、職級、工作機構等），可能略有修改，以避免被訪者身份遭認出。

四，同一被訪者於不同事件中，可能有不同的名字代號，避免身份暴露。

五，部分被訪者所提供的資料及觀察，會融入內文，不直接引用被訪者的說話。

六，訪談中所涉之傳媒機構行為，部分假如是行業中較普遍的問題，不會具體列出機構名稱。

訪談內容均有錄音紀錄，一些爭議性事件，會從多方核實，包括不同崗位的被訪者證言，及從新聞內容分析中查證。以上安排，目的只有一個：既能存真，同時不為受訪者帶來麻煩。在此，再次感謝受訪者的信任。

表 1 二十種結構性審查行徑 (Constitutive Censorship Practices) 分類一覽

管控系統 Regulative System	文化認知系統 Cultural-Cognitive System	規範系統 Normative System
資源分配 Resource Allocation	極度分工 Extreme Specialization	平衡報道 Balance Reporting
陰乾設框限 Tacit Desiccation— Devitalization	生產線常規化 Sweatshop Routinization	不對稱平衡 Asymmetric Balancing
陰乾滅士氣 Tacit Desiccation— Demoralization	血汗工場削自主 Sweatshop Power Realignment	強力平衡 Intensified Balancing
人事操控 Personnel Manipulation	形式指揮腦袋 Genre-driven Regularity	迷信權威 Power Prominence
幼嫩培育 Novice Conformity	取悅大眾·擁抱平庸 Mass-oriented Banality	唯權是尚 Authority Supremacy
邊緣化羞辱 Humiliating Marginalization	追逐利潤·迷失本業 Profit-oriented Info-news	官話必真 Official-fact as Fact
同聲同氣新秩序 Synchronized Co-orientation		被動客觀 Passive Objectivity
制約措施 Prohibitive Measures		後天下之憂而憂 Coordinated Absence
調兵遣將·滅於萌芽 Precautious Deployment		積極不對焦 Enhanced Non-Agenda Setting
前提預設·先發制人 Pre-emptive Premise		飄移境界 Drifting Norms
橫刀干預·後發先至 Critical Intervention		龍門飄移 Shifting Goalpost: Double Standard
		重劃禁區 Shifting Boundary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

## 電子媒體作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香港的電子媒體，當中以電視新聞為主要審視對象，固然與作者於電子新聞媒介二十多年的經驗息息相關。多年與同業交流、所察所思所想，令本人深刻體會，組織架構中隱藏著鮮為人談論之「結構性審查」新貌，不只出現於一兩家媒體，也不限於傳媒行業，於其他專業之中，亦愈來愈突出，亟待研究。

選擇電子傳媒之另一理由為其重要性，尤其是電視媒介。

試設想一下，你新居入伙，全屋裝修，此刻你看著大廳，構思家居擺設，第一件事想甚麼？「電視機往哪裏放？」相信是大部分香港人首要考慮。

電視機方位，決定了沙發與其他家居擺設位置；我們慣性思維中的家庭生活，就是不自覺地圍著電視團團轉。網絡與社交媒體興起，動搖傳統媒介地位。在美國，報紙喪鐘早響，但電視不死，換個角度看，電視也是「社交媒體」——它是家居裏的社交媒體，仍然是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家庭，慣性打開電視，不是為了看些甚麼好節目，只是為了一家人圍坐，一齊做一件事，打發時間。電視機，仍然是我們家庭生活空間的中心。

電視入屋，影響力大。Bourdieu 於《論電視》說，電視媒介享有一種跡近壟斷的地位，它把訊息灌進人們腦袋；然而，時間是稀有資源，當電視「佔用寶貴時間說些平庸的事，其實就是掩飾了值得討論的問題」、「公民得不到有意義資訊去行使他們的民主權利」。<sup>3</sup>

---

<sup>3</sup> Bourdieu, 1998.

香港情況比全世界其他城市更甚，因為我們家庭空間小，客廳也是飯廳，甚至客廳飯廳與睡房融為一體，電視之威力難以逃避。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民調顯示，91.3%受訪香港市民表示，電視與電台媒體是他們取得社會政治資訊的途徑<sup>4</sup>（被訪者可選擇最多兩個媒體，總計為173.9%），59%受訪者選擇了TVB。<sup>5</sup>

相對報章，電視新聞之性質更受運作規律影響，例如電視新聞操作更像工廠生產線，因為「需要小心協調複雜技術，需要專門崗位、排序及其他規律化的步驟，方能令其順暢播出」。<sup>6</sup>在專業規範的層面，香港電子傳媒受到更具體法規所限制，持牌廣播機構受《通用業務守則》<sup>7</sup>規管，香港電台亦有《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皆具體列明了新聞節目資訊要「不偏不倚、持平、準確」，這些專業術語的詮釋，成為新聞方針激烈爭逐之戰場。故選取電子媒介作為研究對象，更能體現遊戲規則中，規範系統與文化認知系統中的掙扎與衝突。

---

<sup>4</sup> 見蘇鑰機，〈傳統新聞媒體仍然主場〉，《明報》，2015年8月13日。

<sup>5</sup> TVB是香港市民最普遍取得社會政治資訊的途徑，遠高於電子媒體第二位之有線電視(8.8%)及香港電台(8.8%)，亦遠高於佔印刷媒體第一、二位之《蘋果日報》(20.8%)及《東方日報》(12.7%)。

<sup>6</sup> Shoemaker & Reese, 2014:87.

<sup>7</sup> 通訊管理局之《通用業務守則》，見<http://goo.gl/2VsSYU>。

本研究聚焦新聞運作中之「結構性審查行徑」，〈立篇〉三節，查核、確認各種結構性審查行徑，輔以事例、證言及數據，闡述其普遍性，說明一些系統性偏頗、雙重標準、自相矛盾之情況。機構層面的制度之上，尚有市場、企業、國家、專業等宏觀影響，這些力量如何反映於運作細節？體系中人扮演何種角色？誰最有力量運籌帷幄，掌控遊戲規則，強化或改造各種結構性審查行徑？（見〈逆流篇〉，第237頁）結構性審查下，中低層記者有何喘息空間？有無抗拒可能？如何策略性應對？（見〈逆流篇〉，第252頁）

「結構性審查」概念，關乎機構中記者與編輯的關係，只能透過直接訪談，相互印證，一窺堂奧。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與內容分析方法，共訪談了69位香港電子傳媒的新聞從業員，職級由記者、攝影師、採訪主任至管理層。選取樣本盡量涵蓋不同職級，以了解新聞機構整體運作，取得多重意見與觀察；被訪者亦包括一些矚目、疑似審查案例的參與者，互相印證一些細微操控的來龍去脈。訪問於2014年9月至2016年5月進行，受訪者簡歷詳見表2。

訪談主要話題包括他們每天工作流程、機構的管控、專業守則與工作規程，如何促進或框限了專業自主。他們也被問到是否遇過疑似的審查或自我審查個案。訪談一般歷時兩小時。<sup>8</sup>

---

<sup>8</sup> 訪談之問題框架，請參閱論文原著之附錄。

表 2 受訪者簡歷

新聞工作年資	1-5年		6-10年		11-20年		超過20年	
受訪者數目	14		21		19		15	
工作機構 <sup>9</sup>	TVB 無綫	i-Cable 有線	RTHK 港台	Now TV	CRHK 商台	ATV 亞視	多個 <sup>10</sup>	
受訪者數目	37	12	10	5	4	1	11	
職級	主管級		採訪主任 <sup>11</sup>		首席記者		高級記者	
受訪者數目	4		19		17		16	
							記者	
受訪者數目							13	

內容分析方面，本研究主要選取2014年佔領運動前後共三個月，TVB及有線新聞每一天之主要新聞時段，作定量及定質分析。<sup>12</sup>分析方向包括審視哪些新聞主角有話語權，有關政改與佔領運動正反論述的長度、排序、出現的次數、重視的程度等，輔以文本分析，看報道如何選取新聞角度、如何選擇關鍵用字、如何微妙地選用詞彙、專業準則如何化作實際指引、哪種行為被合理化或邊緣化、「平衡報道」如何操作、如何透過排序去影響觀感、有甚麼被排除而消失於新聞中等等。

<sup>9</sup> 部分被訪者受訪時已離職。

<sup>10</sup> 受訪者工作機構以訪問時任職或最近任職的電子媒體為準，共69人，其中11人於三年內曾轉職，並於其中最少兩個機構工作，能比較不同機構運作，表中分類為曾於「多個」新聞機構工作。

<sup>11</sup> 「採訪主任」級別包括職級為策劃、監製等不被視為主管級別的中層管理階層。

<sup>12</sup> TVB為翡翠台六點半新聞，有線電視則選擇其每天晚上七時半的新聞作分析。定量分析只取樣自2014年8月1日至10月27日，每天主要新聞第一節約十分鐘內容中，有關政制爭論與佔領運動的新聞作分析。詳細分類及編碼方法，請參閱論文原著。

另一定量內容分析，則比較港台之《星期五主場》系列與TVB之《講清講楚》所邀請的嘉賓種類，判定哪些新聞主角得享更多曝光機會。所有內容分析結果，皆會與深度訪談的資料交叉比對，互相補足，加深認識。

除了各種結構性審查事例，本研究亦針對兩宗重要案例，作整全性分析，分別是2014年因政制改革討論而觸發的「佔領運動」，又稱「雨傘運動」，以及電子媒體有關中國採訪之部署。（見〈案例篇〉，第216頁）



### 3.1 進退·行止(規範系統)

我記得以前做很多 one-sided 的故事，窮人慘況等，重視「有無古仔」、「有無代表性」，為何一定要 balance？

—W.M.T.<sup>13</sup>

所謂規範系統，即組織運作中，個體判別對錯的共同價值、行事準則、專業守則、相關法規等。在新聞專業中，最廣泛引用的行事守則，離不開「客觀」、「中立」、「持平」、「平衡」的講法。

訪談中，常聽到三種形容：「偽中立」、「假平衡」、「搬龍門」。

前文〈破篇〉已闡述，專業守則如客觀中立，當然有其意義，卻往往因為詮釋模糊多變，容易成為隱密而順理成章的操控手段。「搬龍門」則指雙重標準，例如足球賽中，球證是否應判罰十二碼，常有爭議，執法有鬆有緊，有時難言對錯；假如球證對其中一隊鬆，對另一隊緊，高舉「中立」但準則界線常變的話，雙重標準明顯，自然惹人疑竇，球迷亦會看得激動。

#### 3.1.1 假平衡·偽中立

講中立客觀持平，都是萬能 key，實際操作是扯後腿。

—Y.B.M.<sup>14</sup>

---

<sup>13</sup> W.M.T.是一位有廿多年經驗的新聞從業員。

<sup>14</sup> Y.B.M.是一位資深記者。

所謂持平或平衡，並非絕對計量，香港持牌廣播機構受〈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規管，當中列明節目討論受公眾關注議題時，必須「恰當地持平」，即是以「公正不偏的態度處理」，「盡量反映所有主要而又關乎宏旨的觀點，以便求取平衡」，「不應隱瞞事實而有所偏倚，或輕重倒置而誤導觀眾」；同時列明了「恰當地持平」並非指「每一方的意見要佔用相等的節目或節目環節時間，或每一方的意見長短相等」，亦不須「對每個富爭議的問題保持絕對中立」。<sup>15</sup>

「公正不偏」但不須「絕對中立」，「求取平衡」又不須「相等時間」，守則具彈性，亦有廣闊的詮釋空間。

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TVB新聞部主管曾發出內部電郵，敦促下屬自省能否保持「百分百客觀及中立」。廣播媒體常強調之「平衡」、「中立」，如何體現於報道當中？本研究以訪談為主，但首先輔以量化分析，得其宏觀概略，比較佔領運動前後，無綫新聞（TVB）與有線新聞（i-Cable）兩家主要香港電視媒體，報道極具爭議的政制改革與佔領運動時，哪一方面的聲音較多較受重視？是否「平衡」？如何「平衡」？政改爭議與佔領運動期間，香港社會陷入尖銳爭議，民意兩極化，傳媒取態受關注，是一個觀察「平衡報道」以至結構性審查運作的絕佳機會。

選擇TVB與有線新聞作分析對象，乃因TVB於香港免費電視市場佔有八至九成收視率，是市民獲取政治經濟資訊之主要來源。TVB近年被部分網民笑謔為「CCTVB」，譏笑其政治取態如內地之

---

<sup>15</sup> 守則由廣播發牌及規管機構「通訊事務管理局」制訂，有關「恰當地持平」之定義，詳見守則第31-32頁。

中央電視台 (CCTV)。有線新聞則較為進取，較重視深入調查報道及中國採訪，自2013年起，取代TVB成為「電視欣賞指數」中得分最高的香港電視新聞。<sup>16</sup> 有線新聞所屬之有線寬頻公司由於長年虧蝕，母公司九龍倉集團於2017年3月宣布不再注資，後引入新股東「永升」繼續營運。

量化分析的樣本，來自TVB翡翠台及有線新聞台自2014年8月1日至10月27日主要新聞時段第一節中，有關政制改革及佔領運動的所有新聞，合計612則，共2,262個新聞人物 (news actors) 人次，<sup>17</sup>「新聞人物」指在新聞片段中發表意見、組織行動的人物、政黨、團體及政府部門。此部分主要量化分析出現在新聞中的人物及組織之政治背景和意見立場，具體查看誰得到更多機會及更長篇幅發表意見，<sup>18</sup>所謂「平衡」的狀態與幅度究竟為何。由於篇幅所限，詳細分析請參閱論文原著，本書只摘其中要點。

影響深遠的「佔領中環」運動，結果演變成長達79天的對峙衝突。兩電視台新聞中出現過的新聞人物中，他們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對佔領運動？

<sup>16</sup> 「電視欣賞指數」由香港電台主辦，自1998年起，委託港大民意研究中心進行，調查市民對各個節目的「欣賞」程度，而非計算收視。

<sup>17</sup> 樣本包括三個階段，8月1日至31日，為人大常委公布「一鎗定音」之「831決議」前一個月，社會爭辯政制改革方案；9月1日至27日，為佔領運動醞釀時期；9月28日至10月27日，為大規模佔領運動之首一個月。期間，每天TVB翡翠台六點半新聞及有線新聞台七點半新聞時段中，第一節新聞所有提及政制改革、佔領運動之事件及討論，均作內容分析。當中TVB佔290則，有線新聞佔322則。

<sup>18</sup> 有關內容分析主要概念之定義及編碼方案，請參閱論文原著之附錄。量化內容分析由兩位研究人員編碼，主要變量的編碼員間信度Krippendorff's  $\alpha$  為0.87-0.96。

樣本中有77%新聞人物，即1,733人次表達過對佔領運動的態度。表3列出持正、反或中立意見的新聞人物人數。「正面」意思，乃新聞人物參與、支持運動，或道出運動積極可取的一面等；「反面」意思，乃新聞人物勸人不要參與、反對佔領，或道出其壞影響等；「中立/混合」即表示好壞參半或同時表達正反意見。<sup>19</sup> 結果可見，TVB新聞中，對佔領運動呈負面意見的較多；有線新聞中，對佔領運動表達正面態度的新聞人物較多。

但要特別指出，這數字只是純粹計算出現過的新聞人物數目，未計這些新聞人物所獲的篇幅，及是否編排於頭條位置等因素。即是說，高官的兩分鐘談話與路邊小人物的十秒意見，同樣算一次。

新聞人物出現的次數，只是其中一個參考；新聞人物曝光的長度與他們在新聞中獲編配的位置，更能反映他們受重視的程度。表4按佔領運動三個階段，列出對運動持正反意見的新聞人物，他們出現的次數、所獲報道之總長度<sup>20</sup>及新聞編排之「顯著指數」(prominence index)。<sup>21</sup>「顯著指數」以該新聞片段的總長度為基礎，

<sup>19</sup> 具體定義，請參閱論文原著之附錄。

<sup>20</sup> 「總長度」指新聞故事中，新聞人物的意見及行動在稿件的導言、旁白與原聲引述 (soundbites) 被引述長度之總和。

<sup>21</sup> 新聞編排中，重點新聞故事較長，並會於節目開首時以預告 (teaser) 方式簡述，會編排於頭條、二條等較顯著位置，並以記者旁白包裝 (packaged story) 加上原聲引述等。「顯著指數」在總長度之上，再按相關新聞故事是否置於新聞預告中，是否編排於頭條或二條位置，及是否由記者旁白包裝加權處理。「顯著指數」能說明編輯對該新聞人物言行的重視程度。「顯著指數」計算方法是「總長度」×「顯著因子」；「顯著因子」為三項指標之積，分別為加權頭條因子(頭條新聞為1.4，二條新聞為1.2，其他為1.0)、加權預告因子(若新聞人物所在之新聞故事出現於新聞開段的預告中，因子為1.2，否則為1.0)，及加權故事因子(若新聞故事由記者旁述，因子為1.2，若由主播簡短讀出，因子為1.0)。顯著指數的最高值，約為故事總長度的兩倍(2.016)。

表 3 比較兩台新聞人物對佔領運動之立場

	新聞人物對佔領運動之立場			
	負面	中立/混合	正面	總計
TVB 新聞	392	137	338	867
	45.2%	15.8%	39.0%	100%
有線新聞	333	147	386	866
	38.5%	17.0%	44.6%	100%

表 4 兩台於佔領運動三階段中，按新聞人物取態之報道數據

		新聞人物對佔領運動之態度			
		TVB 新聞		有線新聞	
		負面	正面	負面	正面
第一階段 2014年8月 政制發展辯論	新聞人物數目	34	21	61	26
	平均顯著指數	75.6	45.2	62.9	31.1
	平均總長度(秒)	48.7	31.5	38.2	23.9
第二階段 2014年9月 佔領運動商討	新聞人物數目	49	95	43	130
	平均顯著指數	51.1*	31.2*	76.6**	32.3**
	平均總長度(秒)	33.2**	21.1**	53.1**	21.5**
第三階段 2014年10月 佔領運動首月	新聞人物數目	309	222	229	230
	平均顯著指數	42.5	36.4	51.9**	32.8**
	平均總長度(秒)	27.9	24.0	35.1**	23.6**
總計	新聞人物數目	392	338	333	386
	平均顯著指數	46.4**	35.5**	57.1**	32.5**
	平均總長度(秒)	30.4**	23.6**	38.0**	22.9**

\*  $p < 0.05$ , \*\*  $p < 0.01$

再以是否頭條二條等因素加權，能說明編輯對該新聞人物言行的重視程度。

量化分析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的觀察：

**新聞人物多寡比例，不同階段各異：**於第一階段，即全國人大就政制改革的「831」決議前，社會焦點集中於建制派及與會人士的取態，連帶令「反佔領」的新聞人物亦佔多數。第二階段，即831決議後，大局已定，球在泛民主派的場上，社會關注泛民主派如何回應，焦點遂轉向爭議多時的「佔領運動」會否及如何開展，故第二階段中，兩電視台出現的新聞人物，對佔領運動持正面意見者佔多數。佔領運動爆發後之第三階段，社會激烈分化對立，有線新聞中出現的新聞人物數目，正反陣營相若；TVB新聞中，對佔領運動持負面態度者數目較多。

**持反佔領意見的新聞人物，曝光時間較長，編排較顯著：**兩電視台於每一個階段，就算是支持佔領者數目較多的第二階段，對佔領運動持負面態度的新聞人物，平均曝光長度及平均顯著度，均遠高於支持佔領運動的人。反對佔領的聲音顯著，原因是政府高官及主要政治人物較獲新聞編輯重視。

**比起TVB，有線新聞中對佔領運動持負面意見的新聞人物，獲更長篇幅、更顯著編排：**整體而言，有線新聞中的新聞人物，對佔領運動持正面態度者較負面數目為多，但若計算篇幅及顯著度，負面聲音較獲重視，遠超正面聲音，差距亦較TVB為大。有線新聞中，反對佔領者篇幅較長，其原因乃有線新聞有不少建制派人士的獨家訪問，一般篇幅較長。

進一步分析，把近三個月兩台所有研究樣本中，對佔領運動持正面及負面意見之報道長度分別加總（見表5），兩台負面及正面聲

表 5 兩台於佔領運動中新聞人物態度之總長度

	新聞人物對佔領運動之態度			總計 (秒)
	負面 (秒)	中立/混合 (秒)	正面 (秒)	
TVB 新聞	11,912	3,102	7,990	23,004
	51.8%	13.5%	34.7%	100.0%
有線新聞	12,654	3,732	8,855	25,241
	50.1%	14.8%	35.1%	100.0%

音的比例相距不大，負面、正面與中立意見的比例，總體而言，兩台均大約為 50:35:15。

所謂平衡報道，並無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比例」，公眾關注議題，更往往不是非正即反之黑白二分。如佔領運動中，社會對立清晰，分化為「黃絲帶」與「藍絲帶」，<sup>22</sup> 涇渭分明，也難言平衡報道要五五比、六四比，還是七三比才算恰當。不少受訪新聞從業員認為，政府中人與建制派手握權力，決策影響力大，是新聞製造者 (news makers)，給予較多篇幅合情合理，況且記者可以提問、質疑，督促政治人物問責，給予長篇幅不一定代表偏向某方。

Hallin 研究美國電視台報道美國總統大選，<sup>23</sup> 發現給予候選人之原聲引述長度，二十年來一路遞減，代表著記者透過刪剪、選擇、重設語境脈絡 (re-contextualization) 的詮釋程度愈來愈高。我們可以理解為，佔領運動報道的量化分析中，持負面意見的新聞人物，於

<sup>22</sup> 佔領運動中，支持運動的人與反對者強力動員，分別以「黃絲帶」、「藍絲帶」，及黃色與藍色為記，亦有「黃絲」與「藍絲」之稱。

<sup>23</sup> Hallin, 1992.

兩台新聞的篇幅均較長，代表報道較忠於原話、較少刪節，對其論述較有利。

學者李立峯指出，「引述」之舉，可視為一種策略，新聞從業員有意無意間，能加插主觀詮釋。<sup>24</sup> 單純了解何種聲音獲較大篇幅並不全面，Fairclough 指，話語之鋪陳，往往涉及微妙的排序。<sup>25</sup> 故量化分析能窺探正反意見之顯著或多寡，亦需質化分析及深度訪談，以了解意見鋪陳之前文後理及編輯決策的來由。

從質化分析及訪談可察，某些新聞人物言論誇張、上綱上線，有記者表示會刻意拉長「捧殺」，讓其完整的論述播出，加強惹人反感的效果；一些較長篇報道，被訪者往往遭到質疑及處於辯解的位置上，長報道未必等同有說服力；佔領運動及其主催者也往往得到較長報道篇幅，但佔領行為於報道的字裏行間，常與社會秩序混亂拉上關係（詳見後段篇章）。

故篇幅之長短與顯著性，反映大環境與硬數字；深度訪談呈現內部運作與編輯決策，揭示規範系統在結構性審查之角色，兩者相輔相成。除了「平衡報道」的數據，亦要了解各種日常運作層面的「策略性平衡」，如何令含混的「平衡報道」天條，有可能成為傾向建制的報道手法。

---

<sup>24</sup> Lee, 2012:585.

<sup>25</sup> Fairclough, 1995:81.



## 第一道陰影：不對稱平衡 (asymmetric balancing)

2006年，香港電台《鏗鏘集》播出〈同志戀人〉，當時的廣播事務管理局向香港電台發出強烈勸喻，指節目不持平、一面倒，有鼓吹同性戀婚姻之嫌。節目報道三位同性戀者渴望同性婚姻的心情，並無反同性戀者意見，其中一位被訪者曹文傑申請司法覆核。夏正民法官推翻廣管局決定，判詞指，紀錄片描繪被訪者的處境與盼望，並無宣傳同性婚姻；若守則中所謂「恰當地持平」要理解為任何議題皆須加入「正反意見」，根本不切實際。夏正民法官在判辭中說：「如果香港電台節目報道禽流感或犯賣兒童問題，難道也要提供正反意見？」<sup>26</sup>

很多新聞從業員皆同意，所謂持平，並非硬性羅列各種意見：

持平，不是無角度，不是交通警，要擺出觀點；觀點非計量，計質，要有份量，要提供平台讓觀點有機會爭辯。  
—H.W.J.<sup>27</sup>

然而，一些特定情況下，平衡報道是新聞從業員公認的合理做法，例如於強調對等的談判中應列舉雙方意見、遭指控者必須獲機會回應等。<sup>28</sup>「不對稱平衡」乃結構性審查行徑的一種，指平衡報道只屬裝飾性，雖然容納雙方意見，但長度及顯著性不對稱，其中一

<sup>26</sup> 見〈曹文傑 v 廣播事務管理局〉判辭，第71段。

<sup>27</sup> H.W.J.是一位新聞主管。

<sup>28</sup> 見《香港記者協會專業守則》第四條。

方意見特別顯得薄弱、抽象、失焦甚至答非所問。佔領運動中兩宗事例，可見端倪。

佔領運動第十天，情況膠著，政府官員與學生領袖商討對話談判之安排，10月8日的準備會議後，雙方見記者匯報時隔空互轟，官員指摘學生兩點，包括「學生背棄議程的共識」及「會議期間呼籲人集會，騎劫會議」。TVB新聞及有線新聞當晚均以頭條報道會談僵局，處理手法相似，但有兩處重大差異。

TVB新聞給予官員之篇幅較學生代表長（分別為90秒和56秒），有線新聞雙方篇幅差距較少（分別為75秒及73秒）；兩台新聞都給予官員兩句原聲引述，而學生代表之回應，有線新聞有兩句，TVB新聞只有一句。TVB新聞末段，官員指控學生「騎劫」會議的說話，措辭相對強硬，卻未加學生代表回應，有「一鎚定音」之效；相反，有線新聞引述了學生反擊，指政府意在分化等。

另一宗事例發生於2014年8月。全國人大831決議前，行政長官梁振英點名批評「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TVB新聞及有線新聞的處理手法比較見表6。指名道姓的嚴厲批評，一般新聞處理手法，都會找來當事人回應，以示公允平衡；當天兩台都有戴耀廷回應，但TVB新聞的處理方法，雖有平衡之姿態，卻顯得不對稱（請參考表6）。

具體分類，不對稱平衡有三種方式，首兩種從數值上能觀察：

**長度不對稱：**從雙邊談判與梁振英批評戴耀廷兩案例可見，TVB給予官員的篇幅較長，差距亦較有線新聞大，他們所獲之原聲引述亦較長，代表著官員的意見，能夠較完整及忠實地呈現。

**顯著度不對稱：**兩台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點名指摘戴耀廷，均把行政長官的談話原聲放於新聞開首之「預告」(teaser)上，戴

表 6 「不對稱平衡」事例：行政長官梁振英點名指摘戴耀廷

		TVB新聞		有線新聞	
		指控	辯解	指控	辯解
2014年 8月26日 行政長官 梁振英 點名指摘 戴耀廷	新聞總長度	136秒	45秒	133秒	79秒
	預告片排序	第二	不在預告片	第二	不在預告片
	新聞排序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原聲引述	2	1	2	2
	內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基本法無列明所謂普選國際標準</li> <li>• 以三個例子解釋香港是一個特例</li> <li>• 戴之主張有反效果</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只有真普選才能解決特區政府管治危機</li> <li>• 佔中發起人不會參加政府之政改簡介會</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戴之主張有反效果</li> <li>• 基本法無列明所謂普選國際標準</li> <li>• 以一個例子解釋香港是一個特例</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指梁振英誤導，回應國際標準之說</li> <li>• 建制派有組織地攻擊佔中行動</li> <li>• 只有真普選才能解決特區政府管治危機</li> </ul>

耀廷的回應則沒有。在TVB新聞，戴的回應並非記者包裝故事 (packaged story)，篇幅較短之餘，處理上亦較為簡單。

第三種不對稱平衡，則屬內容上之不對稱。如TVB報道梁振英批評戴耀廷之言論，洋洋灑灑，長逾兩分鐘；梁振英的論據頗為抽象，先講《基本法》是否列明普選會跟從國際標準，再以三個例子說明香港是特例，無先例可循，最後指佔領運動將有反效果。篇幅長，令梁振英的論據看似更具體，指控有理；相反，戴耀廷並未享有對應待遇。在TVB新聞中，梁振英有多方面指控，但TVB只在導言引述戴耀廷說對方本末倒置，無處理問題的根本，然後只有14秒原聲引述：「香港社會若沒有一個真正普選制度，我們的管治危

機無法化解……」所引述之意見相對泛泛而談，並無具體回應梁振英的批評。

雖然戴耀廷在TVB新聞中共有45秒篇幅，但當中一半內容，根本並非回應指控，而是引述戴耀廷談「佔中運動」發起人會否參加政府舉辦的政改諮詢會，與爭論點無直接關係。故戴耀廷之回應既短亦弱，而且離題（有線新聞同樣有戴耀廷回應，相對較長，而且回應了多項指控）；這種不對稱平衡，可名為「內容不對稱」。

**內容不對稱：**縱使內容有正反意見，被指控者有機會回應，但被引述的論據強弱懸殊，或以空泛表述回應尖銳指控，或遭多項批評而只獲回應一點，被引述之內容甚至無關宏旨，離題萬丈。

在深度訪談中，一位電視台記者觀察到，日常新聞都出現「不對稱平衡」手法；他發現，公民黨梁家傑的意見，處理得甚為奇怪。<sup>29</sup>

很多時候，梁家傑最好的 soundbite 不能播出，不知為何採主會換一個不太有力量，不太中 point 的 soundbite，我不知操作如何，但這是常見現象，就是一聽較 convincing 的 soundbite，有時候消失了，換了一個，聽完以後……哦……不外如是 的說法。

—S.M.L.

如此選材，以「平衡報道」之專業術語為名，儘管正反意見都有，持平卻只是外殼。

---

<sup>29</sup> 梁家傑曾任12年立法會直選議員，經常發表意見批評政府，2016年不再競逐連任。

## 第二道陰影：強力平衡 (intensified balancing)

「不對稱平衡」於需要平衡時，只作裝飾性平衡；結構性審查行徑之二「強力平衡」，則是不需要平衡時強作平衡，過分強調平衡而引致扭曲。

「強力平衡」常見於記者選擇被訪者意見時。例如，香港有兩個主要教師公會，一為泛民主派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二為屬建制派的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教協之會員人數及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得票，均遠多於教聯，<sup>30</sup> 但有記者透露，遇上爭議性的教育議題，訪問教協時，上級會以平衡之名，要求同時訪問教聯。這位記者認為做法無理，因為教協代表性遠較教聯為高，刻意輕視教協聲音，反而不平衡。至於立法會會議，也習慣引述意見時，一個建制派、一個泛民主派。

新記者會「學壞師」，聽立法會，找 (soundbite) 一個左一個右，就完成工作，停。但是能否代表會議過程……例如拉布，意見一比一會 unfair，無如實反映發生何事，平衡過了火。  
—Z.C.M.<sup>31</sup>

佔領運動期間，「黃絲」與「藍絲」的報道比例，也常見爭議。一位資深記者採訪「黃絲」一方的造勢大會，期間大約20人「藍絲」組織

<sup>30</sup> 於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界別選舉，教協代表長期以大比數勝出。2016年選舉，教協取得約七成選票，教聯約三成。據公開資料，教協會員人數約九萬，教聯為三萬，見2015年12月22日《大公報》。

<sup>31</sup> Z.C.M.是一家電視台的資深記者。

「贈慶」，他認為可用簡短旁白交代藍絲到場抗議，但採主要求「有 soundbite」：

這不是平衡報道，proportion 不應該如此，加上他們是刻意踩場搏取曝光。 —C.P.P.

黃絲與藍絲的報道比例，如何才算「平衡」？傳媒工作者之間一路有爭議。質疑者認為，很多「藍絲」組織皆屬新冒起而參與人數不多，與「黃絲」比較，人數明顯懸殊，但所獲之篇幅不成比例，觀眾看報道內容，未必感受到這種比例的懸殊。一位採訪主任認同「平衡報道」是一種姿態，也常用「假平衡」字眼，但他認為，「藍絲帶」有其代表性。

我不認同有些記者講，「愛字堆」<sup>32</sup>不應該播出，你撫心自問，親戚朋友間，有幾多藍絲？ —A.L.J.<sup>33</sup>

A.L.J. 認同，有時「平衡」乃為了「安全」，減少投訴。

為了安全，就全部都播出，平衡啦。所謂安全，是指社會觀感，不想冒犯任何觀眾。 —A.L.J.

---

<sup>32</sup> 「愛字堆」指佔領運動前冒起、以愛國愛港為名、活躍於街頭活動的建制組織。

<sup>33</sup> A.L.J. 是一位採訪主任。

另一位年輕記者認為，過分強調平衡報道，妨礙記者工作：

A講了B講了C講了，就是最安全，讓觀眾判斷，但記者應突出重點，有自己觀察……否則人家說甚麼，我們就哦哦哦，記者變成錄音機。 —K.L.F.

深度訪談眾多被訪者中，不少資深新聞從業員皆認同，專業規範被用作新聞運作的控制方式：

借中立持平之名，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若你不認同，就說你偏頗，就說你違反公司的新聞守則。……誰在違反守則，誰在玩弄把尺，誰在搬龍門？  
—H.L.X.

需要平衡時可佯作平衡，不須平衡時強作平衡，「平衡報道」是一個滑不留手的概念，管理層以「平衡」之名控制內容，記者亦可用「平衡」作論據保住採訪所得（見第253頁），觀眾則視「平衡」為專業標準。然而，何時啟動「平衡」？具體如何達到？何時不須「平衡」？如何不量化計算，又「恰當地持平」？準則多變，亦隨境而遷。偽裝對稱，實則有偏有倚；強力平衡，可以模糊真相。誰主「平衡」之詮釋，成為新聞機構內部的角力場。

### 3.1.2 迷信高官權威

官員永遠是最神聖的。

—C.J.G.<sup>34</sup>

一族之長、一國之君，由古至今，都要面對相同的管治問題：你如何建立權威，令子民拜服，塑造管治合法性？無論你有豐功偉績，或主張無為而治，政治宣傳的第一件事，首先要令庶民知道領導者的存在。

古時候，小國寡民，統治者的故事，或親眼目睹，或口耳相傳，庶民總會知道。但當英雄人物南征北討，帝國建立，廣土眾民，帝王與平民之間，相隔大江大山，不可望不可即，統治者如何在其子民腦海中建立權威形象？有甚麼東西，古時運輸通訊不發達時，廣闊疆土幾乎每一處臣民的日常生活中都能接觸到，而且都有君主的威武形象？

大英博物館館長 Neil MacGregor 在《記錄世界歷史的百件物品》中告訴大家—— the message is on the money，訊息就在錢幣上，人手一串，刻有領導人威武頭像，都是不著跡政治宣傳。錢幣「入屋」、「落袋」，無所不在；不知不覺間，臣民視帝王管治為理所當然，承傳的根源、權威之形象，由此建立。

現代生活，還有甚麼東西的影響力直入每家每戶，當權者能源源不絕又似乎漫不經意地灌輸其意識形態，令平民足不出戶都能接收？無疑，正是電視媒介。

---

<sup>34</sup> C.L.G. 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



日頭猛做，晚上回家，是人最放鬆、戒備最少的時候。「公仔箱」直入大廳，陪你吃飯，甚至在床邊伴你入睡，潛移默化，影響力巨大。新聞媒介雖云有監督政府之責，但日常運作中，政府及權貴聲音往往天經地義地享有優勢，成為政治宣傳一部分。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如此形容：

我們這一行很勢利，那個人是nobody（我們就不理），若他說話會影響政策制訂，就算是鼻屎一樣小的東西，我們都會分析一下，會壓碎它、掰開它、翻來翻去；一般人說得天花龍鳳，都無人理會，傳媒就是如此。

—C.B.K.

### 第三道陰影：唯權是尚 (authority supremacy)

結構性審查行徑之「唯權是尚」，指官員屢獲例外處理，新聞媒體前設了他們地位重要，不詰問其權力，不須嚴守平衡報道。

**唯權是尚——超然地位：**一些機構雖然重視「平衡報道」，但遇上官員講話，「平衡」卻往往不適用。官員言行被理所當然置於超然地位，毋須平衡；若要平衡，也以一種「中立」姿態出現。很多記者指出，立法會會議報道中的「平衡」異象。

立法會的bite，泛民要平衡建制，再加官員講話，比例是2:1。

—K.T.M.<sup>35</sup>

<sup>35</sup> K.T.M.是一位主力採訪立法會的記者。

香港政治中，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可視為執政聯盟一部分，特別於政制改革爭議中，與政府立場非常相似。報道議會討論、選取意見時，泛民議員聲音要與建制議員聲音平衡，再加政府態度，如此「平衡」，實際上建制對泛民意見，比例長期是2:1，有利建制。

這種「地位超然」的優待，亦見於轉載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中。2016年1月，「書局五友」失蹤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廣泛關注，其中一名香港失蹤書商桂民海，懷疑於泰國被擄走，後來被安排於官方中央電視台新聞報道中亮相「悔罪」。有電視台轉載了中央台報道，並找到了泛民議員及大律師梁家傑評論最新發展，但其意見延遲了數小時才能播出。

……作為常理，中央台已偏向一邊，梁家傑能 balance 到中央台的講法，但不是，原來，現在中立的線，中央台的話是中立的，如果加一個梁家傑，就偏了去反建制的一邊。要一個建制的人出來講，梁家傑才可以播出。

—S.M.L.

**唯權是尚——節目設計：**節目之形式設計，客觀效果亦能放大權貴之聲音。2012年，TVB新聞部啟動一對一訪談節目《講清講楚》。<sup>36</sup> 節目首13集的嘉賓，全部都是建制人物，包括行政長官、七位政策局局長或秘書長、兩位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主席等。有記者形容，節目開始時有如「高官巡禮」，司局級官員「排隊做嘉賓」；直到第21集，才首次見到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任嘉賓。

---

<sup>36</sup> 《講清講楚》逢星期六日，於24小時新聞台播放。

知悉情況的記者謂，相信嘉賓選擇以高官為主，並非出於逢迎或審查，高官本身一來具新聞價值，亦可達到宣傳目的；權貴中人被訪者，能吸引其他媒介到現場採訪，讓嘉賓站在充滿TVB徽號的背景前接受簡短訪問，能收宣傳之效，打響名堂。

2012年底，香港電台亦設計了類似新訪談節目《星期五主場》，意念據報由政府委任之廣播處長提出，香港電台製作人員工會曾關注，憂慮背後有政治操作，目的在仿效《講清講楚》，變成喉舌節目。<sup>37</sup>

究竟兩節目邀請的是甚麼嘉賓？內容分析結果可見，<sup>38</sup>政府官員佔頗大比例（見表7）。TVB《講清講楚》中，決策局長、行政會議及智囊、署長級官員等（表7之第1、2、3項）佔受訪者總數34.6%，香港電台之《星期五/六主場》則佔28.5%；再加上其他建制聲音，包括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政府法定組織及諮詢組織成員、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代表等（第4、6、7、9項），<sup>39</sup>《講清講楚》的建制聲音比例為68.2%，《星期五/六主場》則為44.9%。

香港電台之建制人物較TVB少，知悉情況的港台員工表示，他們希望採訪更多建制中人，只是行政長官及其他官員拒絕訪問邀請。表7的分項可見，TVB與香港電台邀請嘉賓大方向之分野，不在主要官員多寡，而是《講清講楚》訪問更多署長級公務員、立法會議員及法定組織成員（第3、4、5、9項）。《講清講楚》定期每周

<sup>37</sup> 見2012年11月9日《蘋果日報》及《星島日報》的報道。

<sup>38</sup> 內容分析審視了TVB《講清講楚》從啟播至2015年底之所有節目，共364集；香港電台《星期五主場》及《星期六主場》分多個季度播出，每季10或13集不等，每星期一集，至2015年底共49集。

<sup>39</sup> 港區全國人大之選舉由建制派主導，政協委員則由內地政府委任，特區政府內的法定組織及諮詢委員會大部分由政府委任，這些人物於此分類方法中皆被歸類為「建制」一部分。

兩集，遠較《星期五/六主場》頻密，需要大量嘉賓「填充」節目時間，故一些非決策級、只負責執行的較「低級」官員及法定組織成員，常在訪問名單之列。立法會議員則充當「大後備」的角色，由於容易邀約，他們亦樂於接受專訪，當重量級嘉賓最後關頭婉拒採訪時，多由立法會議員補上。

另一主要分別：香港電台的訪談節目，有較多文化界被訪者，49集中佔5位，TVB《講清講楚》364集中，則一個都沒有。香港電台邀約的商界被訪者包括《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及因「香港電視」牌照問題與政府公開爭辯的王維基，部分人選相對「另類」，批判政府態度較鮮明。

《講清講楚》節目年中無休，有很多被訪者重複出現。表8羅列節目中出現最多頭十位嘉賓，十居其九屬「建制」一方。

出席最多者為三位局長。三年多的節目中，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接受專訪12次，時任發展局局長接受訪問10次。了解情況的J.C.B.解釋，這些官員非特別受優待，他們的政策範疇，如土地、房屋等議題，確實爭議激烈，需要決策官員解畫：

寧願質疑官員……我們寧願質疑一樣會落實的東西，你為何質疑泛民？坐在直播室，你質疑他，真的浪費氣力，人家這麼有理想，有東西要倡議，又未有 power，你質疑他？  
— J.C.B.

TVB所重視之「平衡」元素，見於受訪立法會議員分布，建制派和泛民主派數目相若（見表7）。《講清講楚》節目嘉賓中，議會的建制聲音也獲重視，但不一定有其他陣營意見。例如爭議良久的「擴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事件，機場管理局及民航處要員先後五次於

表 7 比較 TVB 及香港電台訪談節目之受訪嘉賓身份

受訪嘉賓身份	TVB 《講清講楚》 次數	香港電台 《星期五/六主場》 次數
1. 特區政府核心官員	70 (19.2%)	6 (12.2%)
2. 行政會議成員及智囊	35 (9.6%)	8 (16.3%)
3. 特區政府部門處長/官員	21 (5.8%)	0 (0%)
4. 立法會議員(建制)	37 (10.2%)	2 (4.1%)
5. 立法會議員(泛民)	39 (10.7%)	1 (2.1%)
6. 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9 (2.5%)	2 (4.1%)
7. 其他政治人物(建制)	4 (1.1%)	0 (0%)
8. 其他政治人物(泛民)	12 (3.3%)	3 (6.1%)
9. 法定/諮詢組織成員	72 (19.8%)	4 (8.2%)
10. 專業人士/專業組織	7 (1.9%)	2 (4.1%)
11. 關注團體/志願組織/學生組織	16 (4.4%)	4 (8.2%)
12. 學者/專家	16 (4.4%)	3 (6.1%)
13. 工商、財金界領袖	20 (5.5%)	6 (12.2%)
14. 宗教領袖	2 (0.5%)	2 (4.1%)
15. 名人、演藝文化界人士	0 (0.0%)	5 (10.2%)
16. 其他(前官員等)	4 (1.1%)	1 (2.1%)
總計	364 (100%)	49 (100%)

表 8 TVB《講清講楚》最頻密獲邀嘉賓

獲邀次數	名字	時任職銜
12	張炳良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10	陳茂波	發展局局長
9	高永文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8	劉慧卿	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
7	陳家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6	黃錦星	環境局局長
6	葉劉淑儀	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
6	胡紅玉	行政會議成員、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
5	曾鈺成	立法會主席、民建聯創會主席
5	劉兆佳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講清講楚》中亮相，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的環保團體出現過一次。於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冒起及活躍於佔領運動的學民思潮黃之鋒，直至2015年底，從無在《講清講楚》亮相。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期間，時任教育局局長及政府委任之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共於節目亮相三次，當時領導運動、15歲的黃之鋒，無機會於《講清講楚》中講清講楚。一位資深記者總括選擇嘉賓的標準：

為何要給你30分鐘平台？用甚麼來衡量？用錢同權。  
—M.F.P.

當然，有權有錢者獲得寶貴的說話機會，不一定能主導節目，不一定能締造良好形象，也不一定能暢所欲言盡訴心中情。畢竟訪談節目是溝通辯論的時機，記者會質疑、反問。受訪者能否主導節目，也視乎主持人風格與節目編排。參與過兩個節目的新聞工作者均強調，記者在節目中會質詢，邀請官員受訪，不應視為給予他們優待，面對公眾是官員的責任：

他們有需要答問題，不是說我們給他們機會說話，有權就有責。  
—T.S.K.

論主持人風格，香港電台《星期五/六主場》較進取，常插話，不讓嘉賓「遊花園」浪費時間，多次引起被訪者投訴，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曾批評主持人「不專業及不禮貌」。<sup>40</sup>為準備對質，《星期五/六主場》特別聘請一位資深政治記者作兼職顧問，協助提供

---

<sup>40</sup> 見2013年12月4日《文匯報》，網址見：<http://goo.gl/oPJ1jd>。

背景資料及草擬具體問題。主持人每集平均有一星期時間搜集資料，構思專訪流程，主持人多數不須兼顧其他節目。

相對而言，TVB《講清講楚》主持風格較溫和，一般會先讓嘉賓陳述基本觀點，才開始反問質詢；據製作人員所講，他們從未收過投訴。熟悉內情的受訪者認為，並非每位官員都容易質疑，尤其是政策制訂初期，官員在諮詢聽意見，難以找尋切入點質問；又或面對一些中高層、只負責執行的官員，往往只限討論技術細節，難言以「盤問」的姿態質疑政策本身。TVB於資源上甚為吃緊，負責的主持多數只有一天半天時間準備訪問，幾位主持會互相討論，但無特別人手支援，他們亦須同時兼顧日常採訪工作。

一位主持過訪問節目的記者說，問好問題，需要很多心思：

有少少似 debate，要做準備，知他如何回答，預算 follow up 問題，要知他的套路，要有 background，有些官員滑不留手……全部用自己時間準備，無 researcher，全部人日間有其他工作，多數訪問前一晚深夜搜集資料。

—K.B.H.

另一位經驗豐富的「脫口騷」製作人認為，這類型「一對一」專訪，有難以逾越的先天困難：

沒甚麼記者可以做到質詢，有困難；有時（一對一訪談）不是一個訪問，大家都「夾好晒」。大家都顧及形象，很難對質。這種清談式專訪，本身好平和狀態。這是潛規則……這場合是先天性的和稀泥。

—F.K.F.

這類型清談節目，可以有不同形式，例如一位主持配搭多位立場相異的嘉賓，讓各方對壘、互相質詢，自能減少一方主導。就算是一對一專訪，若有觀眾直播來電，有時官員會被殺個措手不及，因為要立刻撥電話想直接與官員對話的市民，多是滿肚子疑問，或有話想說，很多時能平衡官員意見。一位製作人透露，常有新聞官要求高官出席節目只能“solo”，即「一個人講晒」，及不邀請其他意見相左的嘉賓，亦要求「不聽電話」，避免失控尷尬。

祖宗家訓，一定要聽（聽眾電話），少少都要聽。新聞官有時會問，可否不聽聽眾電話，聽眾是神經刀。  
—R.M.F.

「聽眾電話」代表部分民意，又能增添「貼地」的討論角度，而且官員常稱「問責」，要「聽市民意見」，聽聽受眾電話訴心聲，理所當然乃高官職責之一。不過，TVB的《講清講楚》及港台之《星期五/六主場》節目，由於節目時間短，加上錄播及各種技術問題，兩者皆沒有觀眾來電的環節。

高官權貴，權錢在握，也代表影響力巨大，常受記者青睞，曝光機會較多；但報道最終是否有利建制，還視誰被安排當主持、電視台的支援、有多少時間準備、節目形式、有沒有觀眾來電等因素，不能以受訪權貴數目一概而論；這些左右節目面貌的關鍵元素，都掌握於節目形式設計者手上。

**唯權是尚——新聞採訪與選材：**建制一方於新聞中享有優越地位，亦可從佔領運動的激烈爭辯中一窺端倪。本研究之內容分析，亦數算了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TVB新聞及有線新聞之報道，建



表 9 以新聞人物政治聯繫比較兩台新聞總長度與顯著度指數  
(只計算最少有一個原聲引述之新聞人物)

新聞機構		政治聯繫	
		建制	泛民
TVB	新聞人物數目	218	189
	平均顯著度指數***	71.6	40.4
	平均總長度(秒)***	45.3	26.7
有線	新聞人物數目	229	219
	平均顯著度指數***	71.5	31.8
	平均總長度(秒)***	47.7	22.2

\*\*\*  $p < 0.001$

制派與泛民新聞人物言論受重視的程度。<sup>41</sup>總括而言，兩台新聞中，建制派的聲音在新聞長度與編排顯著性兩方面，皆遠高於泛民主派，差距於統計上達顯著程度。表9列出在新聞中有最少有一個原聲引述、即可理解為較受重視的新聞人物，其曝光總長度與顯著度。縱使建制與泛民新聞人物數目相差不遠，但建制派新聞人物所獲之曝光長度，比泛民新聞人物多約一倍。

那麼，具體哪些新聞人物最獲重視？表10及表11分別列出兩台在佔領運動三個月樣本中篇幅最長的政治人物新聞故事，幾乎全部屬於建制一方：香港及北京的領導人。<sup>42</sup>

<sup>41</sup> 於此分析中，非政治人物如市民、商戶等被訪者，不納入分析。「建制」指特區政府各級官員智囊、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建制政黨中人、反佔中人士及各相關組織；「泛民」指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泛民主派政黨中人，籌劃或參與佔中人士及各相關組織。

<sup>42</sup> 警察與示威者的衝突報道篇幅亦很長，但由於缺乏主要新聞人物，不包括在表10、表11的分析中。

表 10 TVB 新聞中獲十大最長篇幅的新聞人物

排序	新聞人物	日期	原聲引述數目	總長度(秒)
1	董建華，前行政長官及政協副主席	9月3日	5	238
		內容：董建華呼籲香港人接受人大政改方案，「讓五百萬人投票」選特首 備註：董建華2005年辭職後首次記者會		
2	董建華，前行政長官及政協副主席	10月24日	5	217
		內容：董建華呼籲學生撤離佔領區 備註：此為董建華兩個月內第二次記者會		
3	梁振英，特區行政長官	10月12日	3 + 3	160 + 130
		內容：梁振英批評佔領運動，亦談及政改 備註：佔領運動爆發後，梁振英首次獨家專訪，分拆為兩宗新聞，共長約六分鐘		
4	習近平，國家主席	9月22日	2	147
		內容：習近平見工商界訪京團，提出中央對港政策「三個堅定不移」		
5	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9月1日	2	141
		內容：李飛於香港簡介會解釋人大決議案		
6	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8月22日	2	137
		內容：李飛於深圳一研討會中解釋選委會的重要性及批評佔中運動		
7	梁振英，特區行政長官	9月30日	2	137
		內容：梁振英呼籲佔中發起人停止佔領，並批評行動阻礙緊急救援服務		
8	梁振英，特區行政長官	8月26日	2	133
		內容：梁振英說基本法並無列明所謂普選的國際標準		
9	馬英九，中華民國總統	10月10日	2	128
		內容：馬英九於台北雙十節活動中，表示支持香港民主運動 備註：內文有近一半時間引述馬英九談香港民主，30多秒談中國大陸民主		
10	梁振英，特區行政長官	10月4日	1	125
		內容：梁振英發表緊急電視講話，呼籲佔領者撤離 備註：當中有101秒長的原聲引錄，涵蓋講話主要內容		

表 11 有線新聞中獲十大最長篇幅的新聞人物

排序	新聞人物	日期	原聲引述數目	總長度(秒)
1	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	8月21日 內容：李飛與立法會議員在深圳會面後，重申 中央政府對政改的原則	3	187
2	范徐麗泰，人大常委	9月8日 內容：獨家訪問談政改	5	182
3	董建華，前行政長官及 政協副主席	9月3日 內容：董建華呼籲香港人接受人大政改方案， 「讓五百萬人投票」選特首 備註：董建華2005年辭職後首次記者會	4	182
4	匿名消息人士	8月13日 內容：消息稱，中央已決定政改方案，不可能 讓步	0	177
5	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	9月1日 內容：李飛於香港簡介會解釋人大決議案 備註：有線新聞將簡介會分拆成三宗新聞，此 為其一，三宗新聞共有李飛九個原聲引 述	5	173
6	梁振英，特區行政長官	10月12日 內容：梁振英批評佔領運動，亦談及政改 備註：有線新聞引錄TVB之獨家訪問	0	167
7	梁振英，特區行政長官	9月30日 內容：梁振英呼籲佔中發起人停止佔領，並批 評行動阻礙緊急救援服務	3	163
8	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	8月21日 內容：李飛於深圳會見港區人大代表，談政改	3	162
9	劉迺強，基本法諮詢委 員會成員	8月23日 內容：劉迺強表示，佔領運動最壞情況是「一國 一制」	4	156
10	習近平，國家主席	9月22日 內容：習近平見工商界訪京團，提出中央對港 政策「三個堅定不移」	3	154

雖然TVB六點半新聞總時段一般較有線新聞短，但整體兩個最長的新聞故事，皆出現於TVB，而且屬同一人：前行政長官、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他兩次談話，分別獲得超過三分鐘報道及五個原聲引述，獲重視程度非比尋常。董建華於9月召開記者會，呼籲香港社會接受中央的政改方案，是他2005年辭職後首次記者會，有其新聞價值；但佔領運動期間第二次記者會，並無大新意，亦不入有線新聞十大最長的新聞中。

行政長官梁振英所獲之篇幅，在TVB新聞中亦顯著，十大最長新聞有四宗是梁振英講話；佔領運動開始不久，梁振英選擇TVB做獨家專訪，TVB的專訪報道總長接近六分鐘。一位資深記者於平日採訪中亦察覺，梁振英深受重視：

每星期二，CY開行政會議前談話，我們必定詳盡報道，非常重視。  
—C.J.G.

相對而言，中央政府官員的聲音更獲有線新聞重視，十宗最長新聞中，包括三次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的講話，一次引述消息謂中央不可能讓步，一次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談中央對港政策。

以上數據可見新聞選材的過程中，有權勢者受重視的具體程度。於政治紛擾的關鍵時刻，掌權者一舉一動能左右大局，既重要亦逼切，無疑具新聞價值；至於是否長得不成比例，難有公認準則。當掌權者主導新聞成為常態，新聞工作者如何面對這種慣性的態度，值得深究。

## 第四道陰影：官話必真 (official-fact as fact)

對權威有一個前設：他們不講大話。 —C.J.G.

官方資源充裕，亦手握權力，取態影響深遠，自然而然成為「新聞製造者」，主導傳媒設定議題，傳媒若照單全收，容易成為傳聲筒；但記者一筆在手，小小動作，也能扭轉乾坤，既不失客觀，亦能指出關鍵要點。

2014年8月中，醞釀中的「佔領中環」運動如箭在弦，建制派夥同民間組織抗衡，組織「反佔中大聯盟」，舉辦簽名運動「反佔中」；行政長官亦參與，並召喚傳媒拍攝，謂「以個人名義」簽名支持。當時，官員是否以官方身份支持「反佔中」活動，成為社會關注點，TVB新聞及有線新聞當晚都以顯著篇幅，報道梁振英參加簽名，新聞長度相若（TVB新聞113秒，有線新聞114秒），<sup>43</sup>但有線新聞在旁白中指出梁「由特首辦主任陪同，事前經新聞處通知傳媒，梁振英依然說是個人名義簽名」，以事實陳述的方式，指出梁振英自相矛盾之處；TVB六點半新聞則無提及這一點。

結構性審查行徑之「官話必真」，<sup>44</sup>視官方訊息為事實，官員之作為與言論，傳媒理所當然地視為真，不加質疑。無論從業員真心信服或是不加思考，「官話必真」的思維，令傳媒陷入官方設定的議

<sup>43</sup> 見2014年8月15日，TVB六點半新聞第三宗新聞，及同日有線新聞七點半時段第二宗新聞。

<sup>44</sup> “Official fact”一語，出自Hallin, 1986:25。

題與框架，進而把現狀合理化，維繫既有的權力關係。

記者的使命，號稱監察政府，但實際日常運作，政府作為新聞製造者，有三大優勢：

**穩定供應：**每天每夜，無論有沒有天災人禍、溫情故事、政治爭議，新聞的版面與時間都需要填滿，政府擁大量人力物力，能定期製造新聞事件，傳媒大可飯來張口，照單全收。

**完全免費：**做新聞，內容是王。不少傳媒人手緊絀，資源又少，政府消息手到拿來，多快好省。

**權威錯覺：**政府掌握數據資料與政策話語權，有其權威，但政府消息常常成為記者核實消息的最後一關，政府有回覆，就算是「平衡」，或當作事實，可以完稿收工；有時礙於播出壓力、時間緊迫，傳媒對政府資訊不加質疑，成為慣性。

尤有甚者，部分編輯方針信任官方消息達至照單全收的程度。2016年10月立法會宣誓風波，行政長官梁振英與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及禁制令，阻止青年新政兩位年輕議員再次宣誓，被指破壞三權分立；當晚最少兩家電視台引述匿名政府消息人士回應，訊息相若：「政府消息人士回應有關破壞三權分立的說法，指立法會的開會及休會日期都是由行政長官訂定。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是整個特區的首長，律政司是行政長官的法律部門。」<sup>45</sup>

此處不論三權分立之爭，「律政司是行政長官的法律部門」一語，若非有語病，就是語焉不詳，甚或是事實錯誤。堂堂一司，怎

---

<sup>45</sup> 此段新聞於TVB網站被下架，Now新聞可找到，網址見：<https://goo.gl/lxNSWt>。

可能變成一位長官的部門？但記者不問情由，未有澄清意義，就把隱於幕後的「政府消息」複述播出。有時，消息人士真的「爆料」，記者核實後確認可信、有新聞價值，決定引用，屬正常新聞操作；但好些消息人士往往只講自己意見，或想試探，或想引導輿論，又躲在暗角不負責任。傳媒本來就不應成為權貴的傳聲筒，更何況是無名無姓的匿名意見。

另一高官公關新招數是網誌，以博客形式發文，屬單向溝通，既免除了記者追問，又能避免講多錯多；博客形式容許較軟性方式表達，增添人味；選擇於星期日刊發，更能抓緊新聞淡靜的日子，搶佔篇幅，大收宣傳之效。

當中一突出案例，發生於2014年8月初，佔領運動醞釀中，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星期日發表網誌，指外圍因素加上本地政局不穩，會影響金融市場，「可能引發一場完美的金融經濟風暴，為國際大鱷提供機會，後果不堪設想」。<sup>46</sup>曾俊華的意見成為TVB新聞當晚頭條，也是有線新聞的第一宗政治新聞。<sup>47</sup>TVB新聞引述網誌所言，長約兩分鐘，並有另一跟進報道。事後證明，曾俊華的「預言」並無發生，「完美風暴」不見蹤影；高官一段表達憂慮的文字，已具備自足新聞價值，大篇幅主導了當天「政局不穩可能引發完美金融風暴」的議題。

另一「官話必真」行徑，是跟從官方版本之敘事框架(frame)。典型例子：2016年農曆大年初一之夜，激進本土派與警察於旺角街

---

<sup>46</sup> 見財政司司長網誌：<https://goo.gl/nf4NgD>。

<sup>47</sup> 有線新聞當晚頭條為香港發現一宗疑似伊波拉病毒個案。

頭爆發衝突，<sup>48</sup> 行政長官初二早上譴責「暴徒」，並稱之為「暴亂」。TVB新聞曾於凌晨時分提及「暴亂」字眼，但於翌日早上至下午，一直使用「騷亂」；網站紀錄所見，新聞用字從下午5時34分開始改用「暴亂」，<sup>49</sup>「暴亂」字眼以後一段時間一直沿用。TVB新聞乃唯一廣播機構使用「暴亂」字眼，甚至最少一次用到「暴動」字眼，<sup>50</sup>其他廣播機構主要用「騷亂」。<sup>51</sup>「暴亂」之語意，予人嚴重暴力的印象，「暴動」本身亦是刑事罪行的名稱。一位TVB記者質疑為何要使用政府之敘事框架。

如果有人說那是一場「戰役」、一場「戰爭」，我們是否又跟？  
—H.C.M.

事後通訊事務管理局收到超過300宗針對TVB報道的投訴。通訊局裁決「投訴理據不足」，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用上「暴亂」言詞令報道違反新聞須準確及恰當地持平的規定，其中一個原因是警務處處長也用過「暴亂」字眼。<sup>52</sup>由此可見，「官話必真」不只是一些傳媒的慣性規律，更是得到官方認可的「護身符」。

<sup>48</sup> 旺角騷亂為近30年來香港最嚴重的街頭衝突，示威者曾擲磚及燒車，有警察向天開槍，事件中拘捕近80人。其中一名發起人梁天琦，在數月後的立法會補選中，得票15%。梁天琦後被起訴「暴動罪」。

<sup>49</sup> 稿件原文於2016年2月14日從tvb.com下載。

<sup>50</sup> 見通訊事務管理局調查報告：<https://goo.gl/fuTIPI>。

<sup>51</sup> 端傳媒，〈暴亂？衝突？香港媒體怎樣稱呼「旺角衝突」？〉，見網址：<https://goo.gl/Ke1IXI>。

<sup>52</sup> 見通訊事務管理局調查報告：<https://goo.gl/fuTIPI>。



「暴亂」與「騷亂」之用字選擇，有時牽涉主觀判斷，但有些「定性」卻涉事實問題。

近年的南海主權爭議中，中國在細小的島礁上填海造地，興建機場港口，引起鄰近國家關注；「島」、「礁」及「暗礁」之稱謂，涉及領土及專屬經濟區範圍，乃外交爭議之一。有電視台新聞部員工收到具體指示，當引述中國官方講法時，要引用官方的形容詞句，即新增建設為現有「島礁」上的「建築工程」，不用西方通訊社慣用的「人工島」；有記者不認同，因為從各方片段可見，人工島造地面積巨大，幾近無中生有，如此嚴格跟從官方用法，已經到一個地步，無視那確是人工島礁的事實。

不加質疑、視官話為真的行徑，將權威的言行合理化；傳媒協助議題設定，跟隨官方敘事框架，自然有利建制一方。

### 3.1.3 積極客觀 · 被動客觀

2014年9月底一個夜晚，新聞紀錄片記者B.L.H.一直忘不了，當時佔領運動爆發不久，金鐘、旺角及銅鑼灣鬧市，危機一觸即發，時代的斷崖上，記者行家奔走記錄，留住重要時刻；但是，那沸騰的夜，B.L.H.發現自己流連街上，無事可做，沒有工作。

有一天放工，在街邊走，我突然發現：每個記者都好忙，但我竟然無事做，我是甚麼記者？

—B.L.H.

## 第五道陰影：後天下之憂而憂 (coordinated absence)

相對「積極客觀」重視尋真、主動出擊，「被動客觀」強調記者應中立、抽離。結構性審查行徑「後天下之憂而憂」，建基於「被動客觀」之姿態，走得更遠，於重要新聞之時，採取按兵不動的策略，不主動、不爭先，結果令公眾關注度降低，減少令權貴尷尬的機會。

除了製作每日新聞，廣播電視機構按發牌條件，亦要定期製作半小時新聞紀錄片，B.L.H. 及其他專題記者察覺，在多次大規模社會運動中，記者理應一馬當先，適時提供分析與深度報道，但管理層卻一反常態，既被動又不積極協調，一些專輯在社會運動結束後才播出。2014年佔領運動的新聞專輯，也是記者堅持才能獲准製作。

老闆問：時間緊逼，做不做得得到？……我們堅持一定要做，否則佔中期間播甚麼？不能長期無佔中故事。其他大事時，要即日製作出街，老闆會說：「你們不是做新聞嗎？」題材要 current，以前不會擔心「唔夠料」，問夠不夠料只是藉口。

—M.J.S.

類似之大規模社會運動「趕故」，一般無難度；首先聲畫豐富，矛盾點多，衝突發展中，全城關注，亦具歷史意義；於製作及資源層面而言，「趕故」製作周期短，相對成本效益更高，故管理層的勉強態度令他們甚覺疑惑。管理層偶或提出因攝影隊分配、播出安排或準備時間不足等技術原因，不急於製作，但資深專題記者 P.E.J. 認為不合理：

從來大事都是第一時間跟進，值得做就做……（外出採訪）飛過幾次，無完整構思就出發。 — P.E.J.

P.E.J.及其他專題記者認為，「於重大事件中缺席」乃管理層之計算，源於對記者不信任，管理層不想在激烈爭議性事件中，因編輯方針與記者陷入爭拗，遂把可能之衝突消滅於萌芽階段，索性不碰，轉為於事過境遷後才「回顧」，後天下之憂而憂。P.E.J.認為自己要負一定責任：

自動篩去一些題材，有些題材可以爭取，但完全想像到以後的衝突。不會主動提出政治古仔，感到有些缺失，有些事應該做無做到，大家都覺得麻煩，不提出，大家會舒服一點，保持著一種虛偽的中立。 — P.E.J.

「後天下之憂而憂」同樣出現於每天新聞製作，一位入職只有兩年的記者，察覺其新聞機構選取新聞的特徵：

那些謠言、醜聞，好像沒發生過，直至有人回應。 — Y.K.D.

多位受訪者於深度訪談中都指出，他們所服務的機構，不會轉載報章揭發的政治人物醜聞，直至主角有回應，原因為「只是捕風捉影的無根據指控」。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認為，指控嚴重，當然需要小心核實，問各方意見；但管理層於幾宗影響權貴的矚目大醜

聞無動於衷，甚至不指派記者留意及跟進：

老闆認為報紙刊出的新聞，不一定要跟進，一個人講，無證據，指示說，有人出來回應才播出，但全日從無主動跟進任何東西……不盡力追尋真相，不盡量追，等待發展，等官方回應才做，被動式跟進。

—C.J.G.

傳媒管理層是否「刻意被動」去規避風險，很難證實。2011年5月，籌劃中的香港數碼廣播電台，股東間有爭拗，一段董事會會議錄音「絕密流出」，可讓大家窺探傳媒高層面對政治壓力時趨吉避凶可用之手法。當時股東之一鄭經翰試圖說服其他股東，邀請名嘴李慧玲加盟，有股東擔心李慧玲「惹火」，鄭謂「今日個個都講艾未未，你唔講唔得，咁講完咪算囉」。<sup>53</sup>

遇上敏感新聞，怎麼辦？這段錄音道出了很多傳媒擔心得罪權貴又要維持公信力的策略：人有我有，但不須積極跟進。

潛規則之一，正是「後天下之憂而憂」。很多敏感話題，傳媒為顧全公信力，不能詐作不見，怎麼辦？其他傳媒都在談論時，不能不講，但不爭先，卻爭後，其他傳媒已報道一輪，已當「爛頭卒」，政治風險降低才開始報道。跟進報道也毋須深入持久地講，「講完咪算」，篇幅短小，人有我有即可；遇公眾質疑時，還可振振有辭說「我們一直有跟進」。

正是抱著這種心態，新聞界監察政府、提出質疑的天職，越來

---

<sup>53</sup> 錄音見網址：<https://goo.gl/4nT9rL>。

越被動，大家「你眼望我眼」，不走第一步，新聞工作的積極性，一點一滴自戕自闕。

### 第六道陰影：積極不對焦 (enhanced non-agenda setting)

傳播學一個老掉牙、但有意思的理論——議題設定 (agenda setting)，起源於大眾傳播媒介上世紀中葉興盛後的一個迷思：大眾傳媒影響力似乎很大，但很多研究又發現，傳媒要影響一個人的看法或行為，並不如預想中直接。於是，就出現了議題設定理論中的名句：傳媒最大影響力「不在改變別人想法，在告訴你應該想些甚麼」。<sup>54</sup>換言之：不易改變你的態度，但可以設定看來「重要」的議題，影響受眾的思考範圍。

結構性審查行徑第六招「**積極不對焦**」，以極端的中立持平之名，去焦點、去情感，不鼓勵調查報道，迴避設定議題。手法包括：平鋪直敘，不選取新聞角度；若議題未在社會上發酵，不主動引發討論；嚴防調查報道出錯，結果令有心的記者氣餒。

不將某一部分放大，不深入細節，避免令人覺得偏幫某一方或有立場，但這是選擇性的。 —T.W.K.<sup>55</sup>

為何不可以帶起討論？新聞應該 inform and inspire，傳媒有責任令公眾關注，不重視這作用。 —Y.L.N.<sup>56</sup>

<sup>54</sup> Cohen, 1963.

<sup>55</sup> T.W.K. 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

<sup>56</sup> Y.L.N. 是一位有數年經驗的記者。

在積極客觀與被動客觀兩種詮釋之間，新聞採訪面貌南轅北轍。A.C.B.曾於兩家機構工作，有深刻體會：

TVB教我一定要客觀，無形容詞；要抽離，無「我」字，列出事實，不重批評，不重視包裝公仔……要please最多人，要最多人明白，要normal……Cable是反轉，重批評，抽出尖銳位，鏗鏘，短句，到point……要有surprise，要abnormal，think out of the box。

—A.C.B.

有記者指出，把「中立」詮釋為「不設定議題」，實則也是一種議題設定，令新聞訊息缺乏焦點、顯得細碎而混淆。

若無觀點，無added value，我覺得是刻意，把焦點模糊化，最高明的維穩；無重點，（觀眾）好像看了很多東西，但看完，沒有接收甚麼，記者好像甚麼都沒有講過。

—Y.Y.M.

平鋪直敘、不著色、不突出重點的要求，亦出現在後期製作中的畫面與音樂運用。一位十多年經驗的從業員，被多次要求「客觀」處理。

兩三年最大變化，畫面顏色不用加強，少音樂，no enhancement，他們覺得不客觀，但這些都是雞毛蒜皮的東西，音樂及效果只是錦上添花，旁白如何寫，soundbite用多少，如何剪接，旁白如何接soundbite，才更是主觀。

—R.T.U.

記者的調查報道，貫徹第四權角色，監督政府、揭露社會問題，本應受尊崇受鼓勵；但既要「積極不對焦」，有目標有態度的調查報道，自然相對不獲重視，有時更以核實為由，嚴加防範。

幾位記者均提到2012年一宗調查報道被徹底刪去的事件，記者得到內部文件，知悉一個親建制組織使用公款之帳目有問題，經眾編輯採主確認，事實證據俱備；準備播出當天，報道突然被殺掉，記者一番心血白費，採訪部流傳的管理層解釋謂「選舉臨近，不知道泄密動機」。多位記者指，事件影響深遠，記者不敢放手做調查報道，亦清晰看到管理層心態：

(管理層)好害怕引起話題討論，害怕得罪人。人家做，你跟，就無事，但千祈不要無事生事。

—T.B.A.

另一宗事例，記者搶先得到獨家材料，但編輯管理層擔心出錯，核實過程漫長，最後苦主開記者會公諸於世，獨家新聞變成人人有我有，事件令有心做調查報道的記者意興闌珊。

無癮，下次不做了，懶得爭論，爭論要花精神時間心力。

—Y.B.M.

Y.B.M.及其他記者認為，調查報道固然要小心求證，但總有風險，難以保證百分百滴水不漏。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認為，這種極端的嚴謹有明顯效果：

我不相信他們是客觀，這是他們講的，或表面做法，他們學懂何時祭出一套客觀新聞的講法……同意是（刻意被動），不挖掘真相……深入的報道沒有了。  
—T.W.K.

調查報道減少，甚至絕跡，監察權貴力度減弱，不須歌功頌德，也自然有利建制一方。

### 3.1.4 飄移境界·雙重標準

Bias 去窮人一方老闆說你 bias，談到政府就要體諒他難處。  
—Y.C.L.<sup>57</sup>

所謂平衡，就是罵建制派小心一點，罵民主派可以隨便一點。  
—P.E.J.

那些採主，不知他們身不由己還是如何，他們只會做過籠，偏向某一邊，老闆不會出聲。做過籠是不會罵的，做另一邊反建制的，做過籠就會出聲。  
—S.M.L.

正反意見比例，怎樣才算平衡？「被動客觀」與「積極客觀」之間，線如何劃才算合理？眾說紛紜，難以斬釘截鐵定對錯。若判斷標準遊移常變，對人不對事，則更容易看清其報道傾向。

---

<sup>57</sup> Y.C.L. 是一位入行數年的專題記者。



## 第七道陰影：龍門飄移 (shifting goalpost: double standard)

第七種結構性審查行徑「龍門飄移」，意指執行規則時雙重標準、前後不一。

好些傳媒都有明確規定，記者不能引述政治人物「呼籲」公眾參加遊行或其他活動，原因乃記者應秉持中立，避免予人偏幫某組織或協助宣傳的印象；但這規矩往往不適用於政府、甚至建制派組織的「呼籲」。2014年9月初，學民思潮籌劃組織中學生罷課，抗議人大的政改框架，屬建制派組織之「爭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召開記者會，宣布設立熱線電話「救救孩子」，呼籲公眾舉報準備參與罷課的學生、老師及學校。TVB新聞及有線新聞皆於旁白中用了「呼籲」字眼，畫面上皆出現記者會場內清晰展示的電話號碼，TVB更製作圖像再次展示電話號碼，旁白亦有「呼籲」字眼。學生組織批評設立熱線電話是「白色恐怖」，舉報行動不久就取消。值得一提的是，兩台當天皆找來學界組織回應，有線新聞訪問的學聯代表，指舉報行動是「製造白色恐怖」及「文革式批鬥」，但TVB當天六點半新聞引述學民思潮發言人，只談他們的罷課籌備及如何向家長解釋，而非直接回應反佔中大聯盟的指控，屬「內容不對稱」的裝飾性平衡。

學者訪問人選，亦是爭議點。TVB記者皆知道，有數位政治學者，由於早年曾參與泛民活動，被新聞管理層認為屬泛民一員；若真的要訪問，不能用學者稱謂，亦可能要找其他人來平衡意見。有多位記者指出矛盾之處：很多親建制的北京學者皆以「學者」身份接受訪問，卻無問題。

你找學者當然想聽他的意見，你要無立場的學者，好奇怪。

—M.Z.T.

一方面要求新聞中立、抽離，記者不應有強烈意見，但一些記者卻清楚記得他們做街頭訪問時的遭遇。街訪 (vox-pop)，行內粵語稱「扑街咪」，目的在尋找及聆聽街頭民意，理應隨意揀選被訪者，並事前不知其立場。但有記者指，有時他們做街訪前，已接指示須找到某種管理層認同的立場。

試過扑街咪，老闆想要某些 soundbite，問了超過十個人，都無他們想要的東西。後來才學會質疑，根本無人這樣想！

—H.S.M.<sup>58</sup>

雖然一些傳媒常常強調中立及不偏不倚，甚至在內部會議中表明不「做大」某些新聞，但總有一些花時間花資源的自家故事，一些主動出擊採訪的特寫或獨家新聞，綜合觀之，能窺探其新聞取向及重視之角度。表12及表13分別列出有線電視及TVB新聞，於內容分析日子中主要新聞時段出現過的特寫或獨家故事。這些新聞故事屬於「主動出擊」，包括獨家訪問，涉調查、核實、分析元素和競爭對手所無的故事。

表12可見，有線新聞之特寫及獨家故事較多元化，容納多方聲音，有清晰切入點；自8月開始，分別有專題及分析，探討複雜

---

<sup>58</sup> H.S.M.是一位有超過十年經驗的記者，他憶述數年前的一次遭遇。

的政改方案，報道建制中人的忠告、泛民應對之策略、如何化解佔領僵局等以訪問為主的特寫（第2、6、7、8、10及12項）。當中，8月17日反佔中大遊行的報道，掀起波瀾，影響力持久。

當天，「爭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動大遊行，反對「佔領中環」運動，建制派動員各界社團參與。有線記者根據社交媒體流傳聘人遊行的訊息，混進一個青年團體中，並拍攝到參加者獲主辦團體派發港幣250元。<sup>59</sup>當天不少媒體也拍攝到其他社團派錢情況，但以有線新聞故事最完整。事後，反佔中大聯盟召集人譴責有線新聞「移花接木」，但後來改口稱讚報道可信。其後兩天，有線新聞繼續追蹤涉事團體要求回應，「派錢遊行」事件主導了遊行的議題，亦成為當時熱話。相反，TVB只簡短提及一些疑似派錢情況，無確切證據；有參與當天採訪的TVB記者說，他們想不到網絡上流傳的派錢訊息竟然為真，要補救時已經太遲。

一次主動出擊的嘗試，配合齊備的畫面證據及事實鋪陳，令「派錢遊行」之舉無可辯駁，為有線新聞贏得可觀的公信力。不過於佔領運動期間，有線新聞的特寫或獨家故事大幅減少，記者們解釋，是由於衝突延綿不絕，記者筋疲力竭，再無餘力構思自家故事。

TVB新聞強調「中立」，但亦有其「主動出擊」的故事。表13可見，TVB新聞的特寫或獨家故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把訪問節目《講清講楚》訪問重新包裝的新聞故事（第1、2、3、5、9、11項），六位嘉賓中，四人屬建制派，一為溫和民主派，一為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第二類是特寫故事，描述正常生活如何被佔領行動打

<sup>59</sup> 見有線新聞，網址：<http://goo.gl/GRH8Hp>。

表 12 有線新聞之特寫或獨家新聞（2014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27 日）

項目	日期	新聞故事	備註
1	8 月 11-15 日	《前途解密三十後》系列	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三十周年，連續五集之系列回顧報道
2	8 月 11、12、14 日	政制改革分析系列報道	訪問不同陣營政治人物，分析政改之可能發展
3	8 月 13 日	消息人士談中央政府之政改立場	獨家消息，並有新資訊
4	8 月 17-19 日	揭發反估中遊行「派錢」醜聞	研究期內重要之獨家新聞
5	8 月 31 日	記者分析人大 831 決議之字眼	採訪部之自行分析
6	9 月 2 日	訪問法律學者	主要訪問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楊艾文教授，以法律觀點談政改，共有四個原聲引述
7	9 月 4 日	談泛民立法會議員「總辭」之可能性	被訪者來自泛民陣營
8	9 月 8 日	獨家訪問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新聞長三分鐘，共有五個范徐麗泰原聲引述
9	9 月 11 日	消息人士談政改第二輪諮詢	
10	10 月 8 日	獨家訪問退休主教陳日君	跟進陳日君於網誌批評學生，並呼籲他們撤離街道
11	10 月 10 日	跟進梁振英 UGL 事件，涉任內收酬金無申報	追查各方涉事者，指出未解謎團
12	10 月 27 日	訪問政府與學生談判之「中間人」陳祖為	陳祖為呼籲學生撤離街道，共有三個原聲引述

表 13 TVB 新聞之特寫或獨家新聞（2014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27 日）

項目	日期	新聞故事	備註
1	8 月 10 日	專訪羅致光，一位溫和民主派	重新包裝《講清講楚》專訪
2	8 月 23 日	專訪羅范椒芬，行政會議成員及人大代表	重新包裝《講清講楚》專訪
3	8 月 30 日	專訪何柱國，星島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重新包裝《講清講楚》專訪
4	9 月 15 日	人大 831 決議民意調查	獨家委託嶺南大學進行之民意調查
5	9 月 20 日	專訪黃友嘉，全國人大代表	重新包裝《講清講楚》專訪
6	9 月 30 日	專訪珠寶店，談佔領運動如何影響生意	
7	10 月 7 日	有示威者利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休息及開會	記者親自到辦公室查證消息，並訪問葉劉淑儀等議員，談此舉可能違反立法會規則
8	10 月 7 日	第一天復課之交通擠塞情況	記者追蹤一位學童上學過程，體驗堵路之影響
9	10 月 12 日	獨家專訪行政長官梁振英	重新包裝《講清講楚》專訪，此乃梁振英於佔領運動爆發後第一次專訪，TVB 共寫成兩宗新聞，長約六分鐘
10	10 月 14 日	訪問汽車及酒店業，談生意如何受佔領運動影響	
11	10 月 25 日	專訪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重新包裝《講清講楚》專訪

亂(第6、7、8、10項)。10月7日,TVB連續兩宗新聞都有自家查證的元素,一宗是追蹤佔領者利用立法會議員辦公室開會及休息是否符合規矩,另一則跟隨學生上學,實地觀測馬路遭佔據後,學童如何受阻;其他特寫故事,包括珠寶店及車行生意受影響等。「正常生活如何受阻」是TVB新聞主動關注的議題。

### **第八道陰影：重劃禁區 (shifting boundary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

史無前例地延續79天的佔領運動中,示威者佔領三條市中心主要幹道,繁囂大道變成營地、藝術廊,出現自修室、圖書館、廢物回收中心、花圃、神壇、教堂;各種抗爭標語、塗鴉、漫畫、圖片、海報布滿佔領區,出現「連儂牆」、巴士民主牆,各種雕塑、裝置藝術冒起。不過,佔領區內的人與事,香港主流媒體著墨不多,只有簡單街訪,更重視圍重兵捕捉對峙衝突場面。一位有線新聞前線記者解釋,雖然佔領區內平和的時間佔大多數,但記者一般不敢離開可能發生衝突的地點,去拍攝特寫故事。

影「own故」不容易,因為驚拍不到(衝突場面),有時就算無事發生,都不敢走開……你不知會發生甚麼事,隨時亂。

—C.H.P.

受訪的TVB記者都從內部溝通中,得悉管理層的態度:由於佔領行為屬「非法」,故不應「美化」,結果佔領區內平和的一面、各種人與事,甚少報道;若有報道,都是阻路、內訌、佔領者於街

燈電箱偷電等事件。大部分受訪的TVB記者不認同這個「不能美化」的理由，認為是雙重標準。若然「非法」就不能報道的話，佔領區內各種打鬥與衝突也不應報道，平日的搶劫案貪污案也不應報道：

我覺得不一定美化，可以不美化地報道，根據事實去講。

—M.Z.T.

撿垃圾(回收)，也說不能播出，因為你美化那班人。有人打邊爐，打麻雀，我們報道是否美化？……事實已經發生，不報道等同滅聲，社會在十字路口上，我們說要記錄歷史，你記錄了甚麼？

—Y.B.M.

第八種結構性審查行徑「**重劃禁區**」：重新定義反對派的行為，視之為「越軌」，而名正言順地譴責及不予報道。

此概念源自傳媒學者Hallin之「認可爭議圈」(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 論述。試想像有三個同心圓，最內一圈為「共識圈」(sphere of consensus)，這圈內的東西屬社會核心共識，甚少爭論，如香港的法治、自由；內地的市場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等。共識圈內的價值，傳媒視為理所當然，報道不會刻意中立平衡，甚至成為倡導者、歌頌者。

共識圈外的一圈，就是「認可爭議」一圈，代表在傳媒常見的社會議題，例如政策辯論、經濟發展的方向、貧富懸殊的憂慮、政制改革步伐等，傳媒報道各方意態，表現得客觀持平。

最外圍一圈是「越軌之圈」(sphere of deviance)，此圈之人事，

被視為離經叛道；傳媒取態若非置之不理，就是脫去平衡客觀的外衣，口誅筆伐。在內地與香港的主流傳媒中，「越軌」的政治議題，有藏獨、台獨、疆獨、港獨、法輪功、太子黨利益、軍隊國家化等，都屬不可越雷池的「紅線」。傳媒大多不主動調查、不搶先報道、不聚焦分析；偶爾會讀到一些「越軌議題」，多屬人有我有，事後跟進。

三圈之界線，時有進退游移，成為傳媒、大眾情緒與權貴主導之主流價值互為塑造的角力前線。例如港獨主催者嘗試把港獨議題從「越軌之圈」推向「認可爭議」的範疇；一些建制論述，則圖謀把自由法治等本應毋須爭論的核心價值，推向認可爭議之圈。政府常把「發展」、「和諧」、「愛國」等概念推向共識之圈，避開原則性爭論，例如大型國際活動（奧運、亞運、世博會等）舉行時，部分內地及香港主流傳媒會自覺進入「和諧模式」，主辦國際盛事被視為國家榮譽、民族復興，「應否舉辦」不在討論之列，甚至盛事期間的負面新聞亦減少報道，在共識圈中營造喜慶氣氛。

何謂共識、何謂越軌，界線的爭奪，在自由與威權交疊之香港，衝突至烈。套用「認可爭議圈」概念看佔領運動的角力，主張佔領一方以「公民抗命」為由，把佔路行為列入認可爭議；另一方則認為佔領屬非法行為，處於「越軌之圈」，若要報道亦只能譴責。

因「非法」之名，即使「佔領運動」掀動香港神經，但「佔中三子」，即佔領中環運動三位發起人，運動前後從未被邀請於TVB《講清講楚》節目中亮相；直至佔領結束後一年，發起人之一陳健民首次在節目中出現，檢討運動一年得失。領導運動的學生組織，於醞釀階段從未獲邀出席《講清講楚》，直至10月底，學聯秘書長才首次亮相，TVB中人指出當中的雙重標準：



如果把尺是一致的，應繼續不請周永康上來，一直都不能請周永康，但突然又可以了，為何如此？因為當時佔領運動的氣勢開始跌。 —P.X.K.<sup>60</sup>

各廣播機構中，只有香港電台的電台新聞，於佔領運動期間，持續製作定期環節《佔領故事》，每天播出佔領區內各種人物特寫，包括佔領者、警察、抗爭歌曲創作人、受影響商戶等。<sup>61</sup>一位參與其中的資深從業員認為，記者有責任記錄這場香港歷史上罕見的大型社會運動。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我們不去記，有誰去記？

—C.K.M.

把抗爭的人與事，掃進「越軌之圈」禁區，直接減少報道；剩下能描述的，只有抗爭者之暴力與混亂，並理所當然地以大篇幅譴責，新聞內容自然偏向建制一方。以「非法」之名劃定禁區，更直接妨礙記者記錄事實，難以履行尋真的天職。

---

<sup>60</sup> 當時佔領運動陷於僵局，佔領者對如何抗爭下去意見紛紜，亦無清晰方向。周永康在訪談節目中的表現，普遍被認為欠缺說服力。

<sup>61</sup> 系列中部分故事獲2015年人權新聞獎，包括有關抗爭歌曲、警民關係、內地百人因支持佔中被捕等故事。當屆人權新聞獎，香港電台是唯一以佔領運動報道獲獎的廣播機構。

### 3.1.5 集大成之「洗頭艇事件」

2016年初的「洗頭艇事件」，集規範系統中各結構性審查行徑於一身，可見「平衡」不一定公允，「抽離」有可能遠離事實。

「洗頭艇」乃香港早年一種嫖妓方式，有小艇以「洗頭」為名，載人到南海外島尋歡。2016年1月，銅鑼灣書店五人被發現相繼失蹤，懷疑遭內地執法人員於香港及境外擄走，內地官辦的《環球時報》社評聲稱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都有規避法律的做法，引起香港及國際媒體關注跨境執法、人身安全，以至一國兩制實施等問題。銅鑼灣書店主業為出版及發行內地視為「禁書」的政治「秘聞」，並於內地寄出銷售，後來幾位被捕香港人相繼於中央電視台或其他媒體悔過認罪。

事件之初，諱莫如深，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李波失蹤後，沒有出境紀錄，其妻曾報警隨後又銷案，李波透過家書表示「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內地。事件未明朗前，建制派人士一直淡化事件，身兼全國人大代表的時任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聲稱收到朋友短訊，更詳細宣讀，謂李波是「坐洗頭艇」回內地宿娼。

當晚TVB六點半新聞頭條報道吳亮星言論，新聞預告率先直接引述13秒，頭條故事中再有44秒原聲引述，記者旁白以「中立」方式客觀化其言論，即純引述而不加任何判斷或觀察。該頭條報道也沒有記述吳亮星最後的話——這些都是揣測之一，不宜過早下結論。TVB新聞當晚較後時段迅速修改原報道，但通訊事務管理局收到約8,000宗投訴。以下透過比較TVB六點半新聞及有線七點半新聞的處理方式，輔以深入訪談了解事件，幾種結構性審查行徑皆出現其中。

**唯權是尚及官話必真：**「洗頭艇」傳聞當日早已在網絡散播，指控並無任何佐證，李波夫婦後來亦反駁澄清，兩台新聞處理大不同（見表14）。儘管只是傳聞，但出於吳亮星之口，TVB重點預告、頭條處理、大篇幅、長引述、記者旁白無質疑，吳亮星於預告及報道中之原聲引述共計57秒，講述李某「五名『書局友』先後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被公安當場拘捕，並被拍下片段」及「李某之太太已收到有關照片，於是向警方急急銷案」等。相反，有線新聞只把吳亮星的言論當作會議其中一幕，吳之原聲引述只有11秒，並略去了其後很快證實為假的訊息。

**被動客觀之積極不對焦：**兩台處理最大分野在記者旁白，有線新聞在報道旁述中指出疑點，謂吳亮星「一方面說太多不確定傳聞，不應討論事件，但另一方面，隨即在委員會，公開聲稱來自商界朋友的訊息，還讀出表明自己無法證實的傳聞」。短短幾句，過濾出三個疑點：吳亮星前後不一、記者旁白以「聲稱」暗指言論未必可信，及吳亦知道這只是傳聞。TVB則以「吳亮星說」的方式，把報道「客觀化」，不判斷亦不理會洗頭艇之說的真偽，但「吳亮星談洗頭艇」此事則無錯，記者旁白「中立」抽離，無主動指出疑點。

**強力而又不對稱平衡：**TVB新聞處理，「平衡」做足，但在此案例中，言論明明有疑點，「平衡處理」反而把議題拉到「認可爭議圈」中，加深言論值得關注的錯覺。TVB的平衡方式用了三人，強力而重視，分別為一位泛民議員、一位建制議員及一位保安局官員，當中官員及建制派議員回應模稜兩可、難辨吳亮星言論真假；總體而言，雖然表面平衡但內容不對稱，難以抗衡吳亮星繪影繪聲的長篇引述，亦未能協助觀眾探知言論之真偽。

**飄移境界搬龍門：**幾位知悉事件的TVB記者認為，事件只是時間緊逼之下的疏忽，播出後很快已修改。但他們也認同，假如換上是反對派議員說出如此指控嚴重、又毫無佐證的傳聞，相信不可能逃過編輯及主管的法眼，而享有如此大篇幅重視的報道。

「洗頭艇事件」的報道手法，揭示了以「中立持平」之名、消極不對焦而又機械式地平衡，可誤導亦災難性。「中立平衡」，未必能帶人接近事實；引述「準確」，可帶來錯覺；迴避判斷，令事件真相更模糊；作為把關人，記者沒有積極地判辨真偽。本事例亦反映出，個別結構性審查行徑，不一定導致一面倒傾向建制的新聞內容，但若眾多結構性審查行徑同時出現疊加，可以推斷，結構性審查程度愈高。

負責規管廣播機構之通訊事務管理局，事後收到逾8,000宗針對TVB報道的投訴，但裁定「投訴理據不足」，原因是「有關該立法會議員的言論的事實報道可讓觀眾得悉有關議員的言論，從而可就有關言論得出自己的意見」及「有關新聞節目亦已報道反對該位立法會議員的言論的意見」，故此無違反「報道準確，恰當地持平」的準則。<sup>62</sup>

通訊局的裁決，一定程度上認可了以「客觀化」方式報道可避免違規，即是「引述某人的話」，縱使某人所說的話不可信，仍然是「事實報道」；裁決指「有加入反對意見」，就沒有違反「恰當持平」，判斷時沒有理會反對意見的比重及是否對稱。由此可見，「不對稱平衡」的行徑，縱使是徒具形式的平衡手法，也符合法定守則，不會違規。

---

<sup>62</sup> 通訊局裁決，見：<https://goo.gl/6F1Sr9>。

表 14 比較兩台之「洗頭艇事件」報道（2016 年 1 月 5 日主要新聞）

報道	TVB 新聞	有線新聞
新聞故事長度	140 秒	127 秒
新聞片頭預告	新聞預告中第一宗新聞，有 13 秒吳之原聲引述，謂書商因坐洗頭艇召妓被捕	吳之言論，沒有放於片頭預告，亦不在主播導言中
相關新聞排序	第一	第二
吳亮星言論之導語	記者旁白談吳亮星：「……收到朋友短訊，說有五個失蹤人士的消息。」	記者旁白談吳亮星：「一方面說太多不確定傳聞，不應討論事件，但另一方面，隨即在委員會公開聲稱來自商界朋友的訊息，還讀出表明自己無法證實的傳聞。」
吳亮星原聲引述之長度及內容	44 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五名「書局友」先後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被公安當場拘捕，並被拍下片段</li> <li>· 李某之太太已收到有關照片，於是向警方急急銷案</li> <li>· 保安局要求警方繼續調查，以防有人製造白色恐怖</li> </ul>	11 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五名「書局友」先後坐「洗頭艇」偷渡回內地宿娼嫖妓，被公安當場拘捕，並被拍下片段</li> </ul>
同一新聞片段中其他人之意見撮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立法會議員（泛民）何秀蘭：人格謀殺</li> <li>· 立法會議員（建制）姚思榮：要調查清楚才下結論</li> <li>· 保安局高級高員：不評論任何資料</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立法會議員（泛民）陳家洛：人格謀殺、無恥、歪曲的指控</li> <li>· 立法會議員（泛民）陳志全：我們不是猜測，是指出疑點</li> <li>· 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建制）談事件中警方角色（無關「洗頭艇」）</li> <li>· 立法會議員（泛民）李卓人談立法會程序（無關「洗頭艇」）</li> </ul>

### 3.1.6 搖尾狗還是看門狗

本章節闡述了規範系統裏四類共八種結構性審查行徑：專業話語中的平衡報道，變種為「不對稱平衡」與「強力平衡」；新聞編採方式慣把權貴當權威，衍生「唯權是尚」與「官話必真」的行徑；於被動客觀到積極客觀的光譜中，過於強調中立抽離會導致「後天下之憂而憂」及「積極不對焦」；最後是準則運用出現雙重標準，「龍門飄移」及「重劃禁區」令報道內容傾向建制一方。

必須重申，這些結構性審查行徑，潛藏於日常運作規範中，不一定長年無間斷影響每一個編採判斷；規範如何詮釋，主管、採主與記者之間常見角力，結構性審查行徑是否啟動、強度多大，皆隨境遷，亦視乎新聞機構的背景。

規範系統中的結構性審查行徑，可再細分為兩種面向：平衡報道與重視權威的行徑，可視為「背景暗湧」，即是長期存在，一向如是推動力，在不同機構均較常見。中立持平、平衡報道的價值取向，新聞從業員普遍認同；權貴影響力大，也是新聞製造者，記者大篇幅報道，也合情合理。深度訪談中，一位採訪主任說，他們一直重視人手調配方式，目的在抵禦這些暗湧的力量。

News makers 主導，一向如是，留資源給記者做 own story，留意自己條 beat，很重視這些，不會等運到，不會等記者會。  
—F.K.F.

積極客觀與被動客觀之間的取捨，及是否「雙重標準」，屬另一種面向的「策略選擇」。本章節的內容分析可見，佔領運動中，

TVB新聞與有線新聞同樣給予較大篇幅報道官方與建制人士的意見，實際上有線電視的建制聲音比例，較TVB還高；訪談節目中嘉賓之選擇，TVB與香港電台同樣以權貴為主，為何相對有線新聞與香港電台，TVB新聞予人較保守的面貌？主要分野在TVB採取較被動的策略性選擇，重視權威本來已是環境中難以迴避的暗湧，加上被動地接受官方言論、抽離地鋪陳、不加詰問、不聚焦疑點，客觀效果於是放大了本來就具備優勢的建制聲音，令新聞焦點模糊。

有線新聞於佔領運動的報道中，即使給予建制聲音較多、較顯著的篇幅，但策略性選擇較主動積極，對官方訊息有質疑、有查證、有分析。反佔中遊行派錢的調查報道可見，雖然這類型的報道相對整體新聞量比例極小，但於關鍵時刻設定議題，道出真相，揭露黑暗，穩固了公信力。一位有線的資深新聞工作者說，要做到這點，須積極策劃、查問到底，又要小心翼翼，往往心力交瘁。

調查報道，要搞清楚他是對是錯，fair，不能雙重標準……要有一個說法能夠公開 defend，同樣事情發生在另一陣營，你是否同樣處理。 —V.J.E.

訪談節目亦同理，每個媒體都希望邀約大人物訪談，但嘉賓權貴能否主導節目內容，卻視乎主持人是被動聆聽還是積極質疑，也視乎節目形式的設計、主持編導有否足夠支援。總的而言，權貴在前，仍有遊刃空間，能否把握，或是輕輕放過，端在被動客觀與積極客觀光譜中的取態。

圖 1 規範系統中結構性審查行徑主要概念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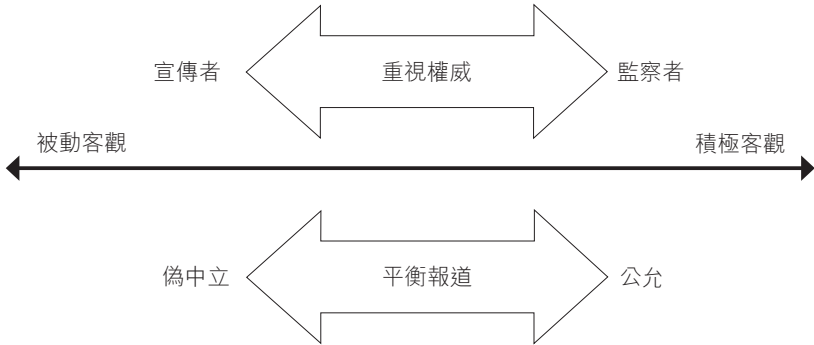


圖 1 總括各種結構性審查行徑之互為關係與效果，「重視權威」與「平衡報道」是長期存在於不同媒體的「背景暗湧」，如何影響新聞內容，視乎個別新聞處理中，編採人員在被动客觀與積極客觀之間的「策略選擇」。「雙重標準」亦是策略選擇之一，規範標準任意啟動搬龍門，能進一步加強結構性審查的效果。

「平衡報道」配合「積極客觀」的取態，意味既有不同意見也主動求真，去蕪存菁，對焦重點，報道持平而恰如其分，謂之「公允」。強調「平衡」卻取態「被動」，「平衡報道」成為門面裝飾；機械式的平衡既無視真象，甚至表面平衡、實則卻不對稱，是為「偽中立」。

「重視權威」亦是背景暗湧，但若選擇以「積極客觀」態度面對，既承認其影響力值得報道，同時重視查證、求真、核實、分析，確立了新聞從業員作為看門狗 (watchdog) 的監察者角色。反之，既確認權威是權威，同時採納被動抽離姿態報道官方消息，結果則加強「唯權是尚」與「官話必真」的暗湧，發揮至極端時，傳媒便成為搖尾狗一樣的宣傳者。



### 3.2 規律·日常（文化認知系統）

新聞變成流水作業，搬字過紙式新聞，無時間消化，直播一個接一個，找人去回應……本來可以想多一點，但變了打稿機器……不加入手編制，一樣有自我審查的效果。  
—L.C.W.

一位資深記者難忘他所目睹的一個歷史時刻，也許平淡無奇，卻是翻天覆地的改變的開始。2000年左右，友台工程人員拿出秘密武器——安裝了新軟件的手提電腦，在新聞現場就地上網，傳送最新影像，電視新聞從此不一樣。

往日於外地採訪，傳送新聞片段要用衛星，衛星傳送設施的「上天點」，一個城市只有三兩處電視台提供，而且費用昂貴。電視記者眾多集體回憶，乃交通擠塞焦慮中「趕衛星」，狼狽地奔赴限定時刻的衛星傳送點，把最新片段傳回香港。傳送時間一天只有兩三次，代表著那年那天只須每日發兩三條稿。

如今，24小時新聞無間斷播出，互聯網傳送直播儀器輕便，新聞流程如超級跑車加速，掀動一切運作。文化認知系統 (cultural-cognitive system) 中的結構性審查行徑，鑲嵌於組織架構中規律化的工作流程內，主導內容表達的可能與形式，從而塑造新聞內容。

深度訪談中顯示，重視直播、要求速度、時間趕急等愈來愈壓逼性的新聞規律，很多從業員視為理所當然；縱使累人，但一些新入行記者會視之為寶貴經驗及有趣挑戰。大部分人都察覺到，迷戀速度並不健康；有些中高層主管有意識地抗衡，有些則慨嘆大勢難擋，無可奈何。

### 3.2.1 車衣生涯·極度分工

新聞採訪室如「血汗工場」，日常工作如「車衣女工」，這些比喻在廣播新聞記者圈子中經常聽到。不少記者深感追求速度與數量，極端細緻的分工，令工作機械化與碎片化，窒礙有意義的採訪，但又認同，這是24小時新聞所需：

車衣女工有其需要，因現時新聞運作，要一路 update，不像以前，一個新聞古仔由朝到晚播出，現時運作較複雜，又要多角度，團隊合作重要；戰線長，時間短，很多事同步做，如 live、follow up，一定要分工做。

—C.J.G.

為求速度與效率，新聞流程在各廣播機構中，逐漸演化成不同程度的「極度分工」現象。昔日記者「自己的稿自己寫」，通常採訪、寫稿、監督剪輯，一手包辦。如今記者被分配到血汗工廠生產線的不同崗位，有人只負責在外採訪錄音，有人在採訪部收發片段與協調，有人專職寫稿，把不同材料縫補剪貼，分工細碎。

這種慣性規律如山澗激流，處身洪流中不作為，自然會順流而下，或在湍流中迷失，波濤洶湧間失控，遠離目的地。<sup>63</sup> 抵抗洪流需要決心與努力，若要逆流而上，更需周詳策劃與特殊技能。通訊科技主宰新聞流程與表達方式，如何影響內容，還看各機構如何應對大潮中的急流暗湧。我們可以留意：新聞機構有無應對，如何應

---

<sup>63</sup> 激流比喻，部分靈感得自 Entman (2003) 之瀑布比喻。

對？採取的措施是強化了機械式規律，還是意在抵擋規律的衝擊？極端分工能導致「規律化的被動」(doxic passivity)；無視急流，任由衝擊，是「不作為的作為」(action of non-action)。客觀效果，能促成僵化的思維、無方向的運作，製作出對權勢一方有利的新聞內容。本章節從深度訪談，了解新聞機構的具體運作。

### 第九道陰影：生產線常規化 (sweatshop routinization)

結構性審查行徑之九「生產線常規化」，指工作流程固化，有如工廠生產線，重視產量、效率與樣式一致，加上繁重工作，削弱生產者的活力與主動性。現代工場生產線設計強調效率，重視穩定出品，每個工人只負責細小工序，不求生產者有自己心思，樣式不同的產品更被視為次貨。深度訪談中，主要廣播機構中的從業員都認同，「車衣女工」式的規律化工序是常態。

一上班，工作無停，沒甚麼 build up 古仔，一提出，不會給你很多時間做，不會去調查甚麼，說了想做就要播出，不能等，太奢侈。 — J.K.T.<sup>64</sup>

一些廣播機構重視量化產出，要求24小時新聞各時段盡量少重複，予觀眾不斷更新的觀感；大部分記者都認為，額外的工作卻沒有增加相應比例的人手，緊絀資源還會調配去做一些「友台」認為無價值的新聞：

<sup>64</sup> J.K.T.是一位入行數年的前線記者。

有主管說：因為有24小時新聞，就好像資源回收箱，做了的古仔不會浪費的，一定有機會播出；結果不揀擇，我們現在做很多新聞都「台獨」，好核突。<sup>65</sup>

—J.K.T.

對量的追求，更擴展至「自家故事」（行內術語一般稱為 enterprise story 或 own story）。擺脫日常，自家精心炮製的新聞故事，理應質素較高，具備一些調查報道元素，但這類型故事一樣量化，有時重量不重質：

舊題材舊角度，採主叫你做「系列」，一講就叫你做四隻啦，要滿足數量，把事情都顛倒了，是為了開四隻古仔而開。

—J.K.T.

以量為先的工序設計不斷強化，促成了名副其實的血汗工場，工時長，生產者勞累不堪。記者們形容，每天上班如一場戰鬥，與競爭對手鬥法，不停緊逼攔截，實際上是體力勞動，身體健康損耗率高。不少記者認為，採訪室內仍有自由，有空間讓人構思自己喜歡的題材，或大家一起討論，但往往心力交瘁，又缺時間，只能順大潮而行，規律化地處理新聞。

---

<sup>65</sup> 「台獨」為香港記者行內術語，指一些新聞事件並無價值，其他電台電視台都不關心，只有一台「獨家」採訪，故戲稱「台獨」。「核突」是粵語俚語，「噁心難看」的意思。

人手影響，無時間精力查證新聞角度，不是沒有討論空間，但做做吓，磨掉了棱角。 —A.L.J.<sup>66</sup>

批判性減了，連反思的時間都無，官方訊息都用單方面。 —L.C.W.<sup>67</sup>

### 第十道陰影：血汗工場削自主 (sweatshop power realignment)

細碎分工亦促成新聞採訪部的權力轉移。結構性審查第十種「血汗工場削自主」指極端分工改變權力架構，一方面記者工作零碎，成長緩慢；生產線一樣的工作模式，有利中高層新聞管理者掌握大局操控流程，削弱前線記者自主。前線記者常發現，他們在工作流程中未必需要寫稿，甚至自己做的訪問，引述哪一句也不由他們決定。

在前線扑咪，控制不到(公司)發生甚麼事，可能有bite好激昂，好有感情，他們會用一個普通的。 —Y.K.Z.<sup>68</sup>

記者只負責新聞產品一小部分，過程中見樹不見林，只知狹窄

---

<sup>66</sup> A.L.J.是一位採訪主任。

<sup>67</sup> L.C.W.是一位前線記者。

<sup>68</sup> Y.K.Z.是一位前線記者。

層面的運作，無機會窺見全局，亦不需參與決策。

老闆有甚麼不想做，根本毋須對你講「不能做」，大家都太忙，無記者有餘力去做花絮或發掘角度，某程度上，新聞角度是主管去構思……記者不知大局，旁邊同事做甚麼都不知，有時處身不同時空。就算一齊做同一隻古仔，通常一主一輔，互相之間無溝通。

—T.Q.M.<sup>69</sup>

通訊技術發達，反過來削弱了記者的自主權。現時差不多所有重要記者會，沒有直播都有即時訊號，新聞編採中高層，安坐辦公室，完全看得清聽得清一問一答。有年輕記者謂，連直播現場畫面，採主都會「追魂急電」給攝影師或記者，調校方位，控制拍攝角度，即時叫記者補充問題。

自主性低了，直播扑咪時，採主可以打電話（給你），叫你即時問甚麼，追問甚麼問題，有時覺得自己似 mic-stand，連訪問內容都不需要報告新聞部，因為入面全部聽到。

—C.H.P.

極端分工的規律，降低前線記者主動性，採訪部的權力動態出現微妙轉變：低層人員工作細碎化，造就了高層人員更主導，於工作流程中享有話事權。

---

<sup>69</sup> T.Q.M. 是一位資深記者。

一位曾做過電台與電視的記者說，電台新聞只涉聲音處理，運作遠較電視新聞簡單，有八九成新聞，都由一個記者包辦，但電視新聞涉及較複雜的人手調配，又要協調畫面運用、工程人員支援：

（一宗電視新聞）可以有四五個人做，例如垃圾徵費的政策古仔，找學者、（政府）briefing、街訪、志願組織……同一隻古仔，幾個記者做，採主可以操控。

—H.S.M.

採訪部中，只有採訪主任與主管才知悉一天的新聞大局，擔任「交通指揮」角色。一位採訪主任說，24小時新聞背後的運作繁瑣混亂，採訪主任團隊「指揮交通」很關鍵，他們決定新聞角度、主導採訪優先次序、分配記者工作、調配攝影隊、安排分工任務，保證溝通無誤。前線工作細碎，客觀效果令採訪主任及主管權力更大，從細節到大局，一一於掌握之中。記者接受任務指派，奔波勞碌，縱使有自己想做好故事好角度，也不易打破規律。

猶有甚者，數碼技術與高速網絡令更多新聞資訊頻道湧現，電視台添加新的生產線，卻沒有相應增加人手資源，記者疲於奔命，更無力抗衡洪流的衝擊。

資源少，員工士氣不高，怨氣大，向心力低，負面情緒累積，影響生產力及創意，然後覺得，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又不是打一世工，那就安全第一，只做分內事。

—D.A.V.<sup>70</sup>

<sup>70</sup> D.A.V.是一位資深記者。

血汗工序加強了以量為先及追求速度的新聞運作慣性，高轉速的運作消耗心力，容易減低記者發掘新聞的動力。不過，血汗工序令採訪主任及主管角色吃重，主導運作，也不一定是壞事，還看主導者操控決策與編配人事大權時，是否有心抗衡大潮，做好新聞。一如在激流中航行的船長，他可以讓船艇漫無目的、隨水漂流，也可嘗試排除萬難、逆流而上。

D.A.V.認為，通訊科技引發競爭對手之間的速度戰與直播戰，大勢難擋，優質新聞難做。不過，一些較進取的採訪主任及主管則明言，他們知悉「血汗工序」容易磨滅意志，採訪主任K.F.K.形容，自己主要從事「管理資源」，決定甚麼不做（“kill”古仔）：

主要工作是 kill 東西，不被 routine 綁死，給其他同事空間做到新聞，甩得起。留意有甚麼可以不做。  
—K.F.K.

如何「不被規律綁死」？K.F.K.舉例，他們只會撥出小部分人手「餵 cast」（填滿新聞時段），減少無價值的現場直播，24小時新聞不頻密更新，記者毋須事無大小都要先做簡報。有些雞肋式的新聞事件，果斷地決定不做，就算「甩」了（即其他電視台有報道而自己沒有），主管也不會追究；省下時間資源，讓記者自己發掘新聞，追蹤線索，製作自家故事及專題。主管亦鼓勵記者自己從頭到尾完成一條稿，不仔細分工；雖然效率較低，有時播出時機不及對手快，亦在所不計。

一位有線新聞的資深從業員則強調，日常新聞運作容易被規律



帶著走，常會被「說話大聲」及新聞製造者所主導，「打破規律」很重要，需要艱苦地策劃。

如果把持不定，容易被 logistics 控制思維，要深入籌劃，花好多時間，工序容易主導你思維；要全副精神，構思幾小時，如何令古仔「出街」。角度要著力花心思。  
—V.J.E.

有線新聞亦實行「當值記者」制度，希望訓練年輕記者了解新聞運作的大局。一般新記者一天到晚在外跑新聞，拍攝訪問後傳送片段回採訪部，就由其他人接手，工作零碎，成長緩慢。資深記者都明白問題所在：

24小時新聞嚴重影響記者成長，愈來愈少機會在壓力下完成一條稿。外面只負責問問題，另一個只負責挑選 soundbite，碎片化工作，不知道寫一隻古仔的過程與如何配合，久而久之進步慢，自主能力不如以前高。  
—Z.L.P.<sup>71</sup>

「當值記者」一職，由年輕記者輪換；「當值記者」毋須外出工作，需要早上8時回到採訪部，讀報了解當天大事，於早上9:30例行編採會議中，匯報主要新聞及建議有何事件值得跟進。當值記者日間會協助聯絡，統籌新聞片段的接收與運用、邀約訪問、綜合材料寫稿等。新記者在資深前輩督導下，了解決策準則與運作大局，

---

<sup>71</sup> Z.L.P.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

親歷新聞策劃、採訪、選擇與製作之全過程。一位做過「當值記者」的年輕從業員如是說：

開心事，學習了很多，整個新聞怎麼做，角度如何，如何包裝古仔……「當值記者」更，朝八晚七，長時間，不受記者歡迎；的確矛盾，有得著，但辛苦。  
—D.H.Q.

傳播技術急速猛進，加強了很多看似天經地義的新聞運作規律：追求速度，隨時直播，元素要多要豐富。洪流裏想站穩腳步，已經不容易；若想逆流而上，探索無人地帶，更需膽大心細，謹慎部署。相反，若放棄抵禦，自然喪失自主，順流而下，遠離原先目的地。

處身澎湃激流中不作為，也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安於現狀者，習慣隨水漂流，逆來順受，對珍貴的價值丟失於無情規律卻無動於衷，儘管坐擁權位，有一個支點，卻不嘗試改變。這種不作為之作為，客觀效果是強化極端分工規律，造就更被動的採訪模式。

### 3.2.2 形式指揮腦袋

「媒介就是訊息。」<sup>72</sup>新聞節目的種類形式 (genre) 能主宰內容，此之謂「形式指揮腦袋」。影響範疇可分兩個層面：一，節目形式影響人手資源編配，嚴肅重要之工作可能受忽略；二，節目形式本身傾向非政治化、去爭議的範疇。節目形式與方針既定，化作製作機

---

<sup>72</sup> Marshall McLuhan 之名言。

器的規律；其理據亦顯得天經地義：為觀眾服務，同時賺取收入支持公司運作。

### 第十一道陰影：取悅大眾·擁抱平庸 (mass-oriented banality)

第十一項結構性審查行徑「取悅大眾·擁抱平庸」並非指大眾平庸，而是以大眾口味為由，製作平庸節目，令嚴肅新聞工作之人力物力被分散。免費電視觀眾群較闊，情況更明顯。於深度訪談中，記者常引述採訪主任最重視的元素：「多元化」與「民生故事」。

做民生、物價、旅遊，他們最愛。採主說這些才最多人關心，觀眾不喜歡吵吵鬧鬧的東西。—N.L.H.<sup>73</sup>

其實有空間深入一點長一點，高層想關心不同議題的人都找到想看的東西，內容要多元化。—Y.Y.M.

一位曾於TVB及有線新聞工作的資深從業員，比較兩台側重點之別：

有線新聞會特別重視核心價值，公義、言論自由、法治，會落力在這些議題上；TVB不會圍繞核心價值，因為要多元化，政治不是全部。—C.Y.X.<sup>74</sup>

<sup>73</sup> N.L.H. 是一位前線記者。

<sup>74</sup> C.Y.X. 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

照顧大眾口味不一定要平庸，但香港電視行內一直流傳「牛頭角順嫂」的說法，指寫稿要化繁為簡，「牛頭角順嫂」也要聽得明白。「順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TVB一齣處境劇中的草根師奶角色；自此以後，「順嫂」成為無知平民的代名詞。不少新聞機構主管編輯仍以「牛頭角順嫂」提醒記者寫稿要簡明，本來不扮高深、清晰表達屬溝通要旨；但一些中高層新聞工作者，有時會詮釋為避開複雜抽象的事情，浮光掠影、簡簡單單就可以，迎合「順嫂」口味。一位有超過十年經驗的記者不同意：

整天在說牛頭角順嫂，我們要提升順嫂的水平，而非被她拉低水平！  
—H.S.M.

「順嫂標準」不只是寫作心法，更成為一種內容類型。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記得某年財政預算案公布後的新聞選材，一隊採訪隊被派到長洲拍攝一棵櫻花樹，選材令他深感奇怪：預算案有眾多新聞故事不跟進，卻花費大半天人力物力，往長洲拍一棵凋謝了的櫻花樹。

做瑣碎事太多，做完又少播出，久而久之，好氣餒。  
—C.Y.X.

一些資深新聞工作者認為，就算新聞專題片，題材也愈趨軟性，有如《都市閒情》和《東張西望》。<sup>75</sup>

---

<sup>75</sup> 《都市閒情》為TVB午間時段針對家庭主婦的節目，《東張西望》為混合娛樂與八卦時事的資訊節目。

既然故題不要引起任何社會矛盾不安，只好談談情  
說說愛。 —V.S.M.

有記者則察覺一種很微妙而重要的轉變：

老闆常常不談「新聞」，講「資訊」，說「我們要提供  
資訊給觀眾」，我很不安。 —N.L.H.

## 第十二道陰影：追逐利潤·迷失本業 (profit-oriented info-news)

「新聞」與「資訊」對一般觀眾而言，差別不大；但觸覺敏銳的記者眼中，卻認為這是一場靜默的革命——革了「新聞」的命。

結構性審查行徑第十二項「**追逐利潤·迷失本業**」，指節目形式轉向「資訊」，內容無時間性、缺批判性、以實用價值為先，較少社會議題，遠離記者尋真與監督政府之「新聞」天職。從法規而言，〈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只規定，「凡報道本地或國際新聞的真正新聞節目，不得接受贊助」，<sup>76</sup>即是說「資訊節目」不受限制，即使是同一採訪部同一團隊製作的節目，冠以「資訊」名稱，就能接受冠名贊助，賺取真金白銀。

數碼廣播啟動後，能容納更多新頻道，「資訊節目」成為電視台  
的「大金牛」。2014年，TVB三條新數碼頻道，即24小時新聞類

---

<sup>76</sup> 見通訊事務管理局〈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頁33。網址：  
<https://goo.gl/5KaQg7>。

道、J2及高清翡翠台，<sup>77</sup>廣告收益有超過30%強勁增長，遠超其他頻道只有1%之增長。<sup>78</sup>TVB稱，新增頻道「為廣告預算較細的客戶提供更實際及合適的電視廣告平台，有助我們吸引更多新的電視廣告消費，及提升了我們在總體廣告市場的佔有率」。<sup>79</sup>

全香港的主要商業電視台都有一條以財經股市資訊為主的頻道，提供即時股匯報價、投資指南、大市評論等資訊。2016年初，TVB把原來的「翡翠高清台」改造成「J5」頻道，以「財富與知識」作賣點，由新聞及資訊部門主力製作。

電視台節目之種類及編排，一方面「提供服務」，更要製造觀眾群，從而吸引廣告商贊助賣廣告，保證財源滾滾來，對電視台生死攸關。兒童節目時段，製造了一群兒童觀眾，吸引玩具廣告商付錢賣廣告；財經節目時段，凝聚一群有餘錢的投資者觀眾。為何每間電視台都有財經頻道或長時間的財經節目？財經平台吸引資產豐裕的投資及投機者，投資顧問、樓盤銷售及奢侈品銷售商自然願意付錢給電視台，購買觀眾群的「眼球」。再者，財經節目成本低，只需財經評論員上陣，加上交易所提供的股價即時資料，數位主播清談一番，就可充斥大段廣播時間，地產代理公司贊助樓盤節目，證券公司贊助投資節目，本小利大。

財經節目賺錢的門路，除了平常廣告時段，還包括製作大量新節目與「小品節目」(mini-program)，讓市場推廣部門找冠名贊助，

---

<sup>77</sup> 「高清翡翠台」於2016年2月重整為「J5」頻道，以財經資訊及娛樂節目為主。

<sup>78</sup> 見TVB 2014年年報，頁7，網址見：<https://goo.gl/EhvE56>。

<sup>79</sup> 見TVB 2015年年報，頁7，網址見：<https://goo.gl/3wn5m6>。

各種名目包括操盤群英、樓盤內望、股價、匯價、財經小字典、技術分析、智富錦囊、「滬港通」特輯等。「小品節目」雖然短，但需要大量行政工作，一位經驗豐富的財經記者Q.S.B.說，只剩一半時間真正做採訪。

每一個節目都說要找 sponsor，滬港通來了，有人說「一定好多贊助，今次發達了」。做那麼多東西，一是為了賺錢，二是想開新頻道，要有節目。

—Q.S.B.

近年多家電視台新聞部都積極製作「小品節目」，令24小時新聞台節目「多元化」外，亦可用冠名贊助方式賣錢，其中以TVB數量最多。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昨天的新聞片段就成為電視台的寶庫，短篇專題包括一系列重新包裝舊新聞的節目如《新聞檔案》、《國際新聞檔案》、《2016難忘記》、《話說當年》；軟性專題有《廿四節氣》、《探古尋源》、《周末闖蕩》等，亦增添大量天氣節目時段；實用攻略式的短篇如《家居·築則》、《睇新聞·學英文》、《職場制勝》等；時政類有《時事通識》、《時事多面睇》及訪問節目《講清講楚》、《世界觀》等。除時政類外，大部分「小品節目」皆偏向大眾化、生活化、非政治化，即實用又有趣味的小知識。

當中，以《世界零距離》近年最受關注，主持記者走遍世界偏遠角落，發掘有趣的人事風物，足跡遍及福克蘭群島、古巴、格陵蘭、不丹等，既談趣事，亦有嚴肅資訊。節目叫好亦叫座，《世界零距離》平均有近150萬觀眾，收視率23%（即全香港四歲以上人口

有23%觀看)，<sup>80</sup>乃新聞及資訊部罕見的高收視節目，遠超同時段其他節目。《世界零距離》於2015年電視節目欣賞指數、全港164個電視節目中，排名第一。<sup>81</sup>

《世界零距離》在業內引起不少迴響，有資深記者認為新聞部不應「鬥獵奇通俗」，把新聞娛樂化，內容淺薄亦有偏見，所謂認識世界只是「裝飾」；<sup>82</sup>深度訪談中，亦有資深從業員質疑，是否因為帶著記者的光環去做趣聞，才有如此大的迴響。《世界零距離》有體育用品公司贊助，至2017年已製作第三輯；採訪部抽調三位記者及主播負責，由籌劃、採訪、剪輯到重新包裝，每輯需時大半年。大部分於深度訪談中的TVB記者都欣賞節目製作認真，短時間穿梭多國又找到有趣題材並不容易，而且節目以生動輕鬆的形式介紹風土人情，也探討氣候暖化、貧富懸殊等嚴肅議題。

一位曾於TVB工作的資深記者認為，《講清講楚》及《時事多面睇》<sup>83</sup>都是很好的嘗試，問題來自軟性節目多，淘空人手資源。

有時我們形容是不務正業，本業、新聞無做好……  
主播做《周六搜記》、《探古尋源》，她花攝影隊去做，一做兩三小時……做這些軟性古仔，要犧牲認真古仔……資源分配不平衡。 —B.N.E.

不少記者投訴，節目數量密集，人手短缺，心力與體力難以支持。

<sup>80</sup> 見《明報》，2015年10月20日，〈方東昇人氣強勁《世界零距離II》收視逼近《張保仔》〉。

<sup>81</sup> 「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由香港電台主辦，委託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調查。

<sup>82</sup> 見張翠容〈請下車看〉，《香港經濟日報》，2015年10月16日，網址：<https://goo.gl/Cju3MN>。

<sup>83</sup> 這兩個節目為近年新增欄目中較緊貼時事的節目。



試過一個月輪四更上班，(上班時間是)05、09、14、23，他以為可以善用人手，好像賺了，但約訪問很難約，特寫古仔放假也要做，很累……生活顛倒，生活只剩一份工。  
—Y.L.N.<sup>84</sup>

辛苦到一個地步，我在這一年來，好期待周末放假，可以休息，不用理會公司事。這麼多年來，我未試過會期待，星期五了，快休假，正呀！你可想而知。  
—K.L.H.<sup>85</sup>

眾多「小品環節」傾向軟性、少批判力，一方面迎合大眾口味，亦能照顧廣告商愛好的「非政治化」氛圍；如果天天播出政治爭拗，人人坐困愁城，商討嚴肅大事，自然無心消費享樂，廣告投資猶如倒落大海。「小品環節」當道，形式指揮腦袋，改變資源分配優先次序；新的生產線設立後，前設了新規律，記者時間精力投放於軟性環節生產線，難免影響正常新聞的質素，放輕了監督調查的力度。

Bourdieu 在《論電視》中，批評電視與電視新聞為了取悅大多數人，埋首製作看似有吸引力、卻無關痛癢的東西。事實上，提供天氣、股價、文化歷史等資訊，也屬傳媒天職；電視台在商言商，賺錢至上，有時更是生死攸關；例如有線新聞所屬之有線寬頻，2016年虧蝕三億多後，母公司九龍倉宣布不再額外注資，備受讚譽的有線新聞立即陷入財困；新投資者入主後，隨即宣布日後營運方針，有線新會更偏重財經新聞。

---

<sup>84</sup> Y.L.N. 是一位前線記者。

<sup>85</sup> K.L.H. 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

### 3.2.3 作為與不作為

「極度分工」與「形式指揮腦袋」，促成了兩種性質的新聞規律。「極度分工」締造的工作新規程，源自技術發展與行業競爭等外在因素，影響每一間傳媒機構；節目形式主宰的工作規律則源自內部決策，發展成機構內部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行事方式。新節目形式可視為一條新生產線，其產量、速度、運作模式、操作人手，都由設計者所控制，故「形式指揮腦袋」的結構性審查行徑，由設計者主導；不同機構，情況亦大異。

以有線新聞為例，他們集中人手資源建設「中國組」及主攻調查報道。2013年，新節目《有線中國組》啟播，中國組共12位記者，於專門時段每天報道十多分鐘中國新聞，並加插專題及分析（中國新聞採訪案例及各電視台做法之比較，詳見〈案例篇〉）。有線新聞亦設立了八人的調查報道組，製作《新聞刺針》，不定時播出。《新聞刺針》之形式設計較特別，打破往日半小時新聞紀錄片形式，雖然基本上每星期播出一集，但沒有特定播出時段，亦不規定故事長短，提供足夠彈性，拍攝更適時的調查報道。

好多古仔撐不到廿多分鐘，五分鐘可以。較彈性，可長可短……節目時間少了最少一半，但我們為甚麼要填塞 air time？我們要爭取觀眾支持，對廣告倚賴無咁勁。<sup>86</sup>  
—H.K.X.<sup>87</sup>

<sup>86</sup> 有線新聞所屬的「有線寬頻」是收費電視，主要收入來源為觀眾訂購頻道之月費。

<sup>87</sup> H.K.X. 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

TVB採訪部沒有一個恆常及專注的調查報道團隊。<sup>88</sup>資深記者L.J.Z.認為，每天趕新聞又兼顧調查報道很艱難，記者資歷淺，人手及支援不足，管理層擔憂外界觀感的心態，也是障礙。

(其他媒體)有些做調查報道的，為了結論堆砌事實；我們是另一極端，老闆幫不到你構思有力的角度，反而多質疑，常常如此，(大家)會保守一點……不過，也要考慮，TVB大台的乘數效應，偏差少少，效應好大……記者都很新，如何期望他們跟進？不是懶，天天做daily，好忙。 —L.J.Z.

節目形式，可視為一種策略性選擇；形式主導思維，亦主宰資源分配，設定日常規律，可以把活力磨平，也可以養精蓄銳。面對24小時新聞之速度化、體力化、碎片化之規律，機構掌舵人如何選擇？他有沒有制訂方法，避免隨波逐流？還是選擇不作為，甚至有意無意間加強規律的慣性，令下屬陷於漩渦中不能自拔？

文化認知系統中的結構性審查行徑，與規範系統相似，同樣有兩個面向，一為「背景暗湧」，例如傳媒制訂節目形式，意圖追逐利潤，屬無可厚非，可視之為必要之惡；24小時新聞競爭激烈，求速度、求直播、求搶先一步等價值觀滲入骨髓，同業間覺得是金科玉律，皆屬普遍存在的「背景暗湧」。雖然大勢如此，卻未必無應對之法，傳媒的「策略選擇」非常關鍵；錢賺了，有沒有相應增加偵查

---

<sup>88</sup> 除了新聞採訪部門，TVB新聞部尚有另一部門負責製作新聞專題片，如《星期日檔案》系列，主力做人物故事，《新聞透視》主要負責時事分析等，部分特輯有調查報道元素。

報道、深入報道的資源？激流中航行，掌舵人與船員縱使處境艱難，畢竟還可以選擇作為還是不作為——是好好裝備，逆流而上，監察權貴，為人民發聲；還是隨波逐流，迷失方向，只望到達下游安逸的避風港？

圖2總結文化認知系統中，結構性審查行徑的互為關係與效果。「極度分工」如生產模式細碎化、機械化，與「形式指揮腦袋」如節目設計重視商業利益、大眾化、多元化等，皆屬普遍存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背景暗湧」，主導生產規律；最終這些背景因素如何影響新聞內容，端視乎主事者如何應對：抗衡規律，還是強化規律？

本章節所述之四種結構性審查行徑，皆主事者有意或無意的不作為，令員工心力交瘁，節目內容平庸化，變相對建制一方有利。若主事者選擇抗衡規律，改善工序，增加員工自主性，避免極端碎片化，可能留有反思空間，追求速度而不致迷失。進一步，若主事者能於既存節目形式規律中求變，嘗試於夾縫中抗衡，也可能化平庸為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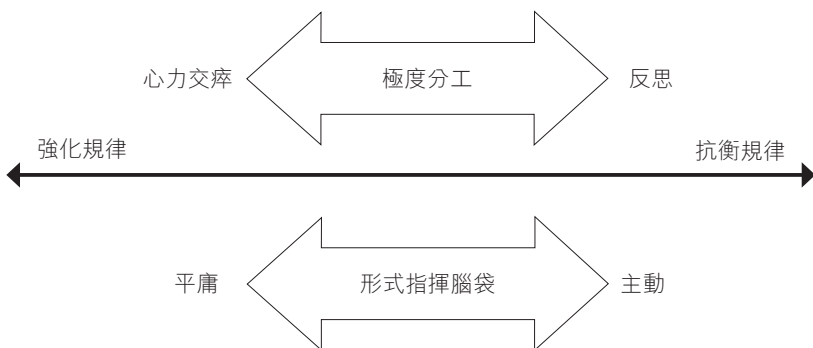
然而，激流中的抗衡，又能達致多大效果？A.C.B.曾於TVB及有線新聞工作過，認為兩台都是「車衣女工」，但有點不同：

TVB和有線新聞都是車衣女工，但有線有自己的fashion，自主性有線大一點。

—A.C.B.

大潮難以改變，但嘗試逆流而上，最少能窺探一些不同的風景。

圖 2 文化認知系統中結構性審查行徑概念之關係



### 3.3 操控·賞罰(管控系統)

老闆有太多方式整你：不加人工，投閒置散，不分配工作給你……給同輩升職，羞辱你……叫你做很多事，無時間思考。

—H.L.X.<sup>89</sup>

我們這裏甚麼都有，有空間、有自由，惟獨沒有錢。

—D.H.Q.<sup>90</sup>

在規範系統與文化認知系統中，結構性審查的強度，關鍵在積極客觀與被動客觀之間、作為與不作為之間的「策略選擇」，但誰是選擇者？透過甚麼方式落實於具體運作？答案是透過強大的管控系

<sup>89</sup> H.L.X.是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

<sup>90</sup> D.H.Q.是有線新聞一位年輕記者。

統 (regulative system)。管控系統主宰規則制訂、員工獎懲與資源操控。這些系統性的安排，預設了行為的可能界線，以管控表達渠道的方式，去管控內容。深度訪談中，有關這方面的操控，最常聽到兩個詞語：「陰乾」與「換血」。

### 3.3.1 操控資源分配

資源緊絀是每家機構、每層級員工都抱怨的問題，影響遍及每個工作環節，但基層員工往往覺得，這是「不可抗力」的大障礙。

#### 第十三道陰影：陰乾設框限 (tacit desiccation—devitalization)

結構性審查行徑之「陰乾設框限」，指預算開支緩慢萎縮及資源停滯不前，令新聞籌劃止於有保證及可預期的範疇。一位資深香港電台員工形容近年之轉變：

節目做多了，但資源沒有增加……以前100做100，現在150做200，大家都要省錢，無辦法，你無可奈何。  
—F.T.S.

香港電台是香港的公共廣播機構，屬政府部門。香港電台一直策劃搬遷新大樓，2014年，預算耗資61億港元的新總部計劃被建制派主導的立法會否決。由於缺乏空間及錄影廠，新總部計劃告吹令24小時新聞及其他擴展服務計劃難以開展。2016年，香港電台應政府要求，接管亞洲電視不獲續牌後空出的模擬電視廣播頻道，

人手只增加四個。頻道每天廣播19小時，有14小時是重播節目。<sup>91</sup>

我們資源上無自主權，政策大方向，前線同事無自主權，他要你做多少，做甚麼時段，都是策略性的東西，這大環境只在局方、管理高層及政府才能操控，抗爭不到。

—J.D.E.<sup>92</sup>

資源有限，機構內部如何分配，掌握於少數高層手中。一位香港電台資深員工說，節目怎樣才算有價值，判斷很主觀；主管分配資源的方式，他們難以置喙。

例如老闆可以少撥錢給你，cash money分給鄰組，拍劇集，都很有意思啲，拍傷殘或平等機會，都有意思……就算那個人，繼續呼喊支持新聞自由，我們有甚麼抱負，但到實質，哎咁我錢包真的很緊，我給你兩元，應該夠，鄰組我給三元、給四元，你無得異議。

—J.G.S.

有線新聞雖然贏得口碑，但其公司有線寬頻已連續九年虧蝕，2016年淨虧蝕3.13億，為過去九年之冠，多年累計虧蝕超過16

---

<sup>91</sup> 2016-17財政年度，香港電台獲政府撥款港幣9.8億，比對上一年度多16%，約1.35億元。新增款項中，港幣5,900萬用作向TVB購買模擬廣播硬件及服務。其他新增撥款，主要為早已規劃的新增數碼電視服務開支，非為模擬頻道而設。部分資料見《明報》，2016年3月24日，部分內容則於訪談中得知。

<sup>92</sup> J.D.E.是香港電台員工，亦是工會成員。

億，<sup>93</sup>母公司九龍倉宣布不再額外注資後，2017年4月底，財團「永升」入主，隨即公告要開源節流，削減營運開支二億，並準備裁員約一成。深度訪談中，有線新聞的員工甚少不滿編採方針，但早已關注待遇與業務停滯不前。<sup>94</sup>

電視台沒有很多資源去擴展內容，不進取，似乎維持現狀就很好，故此資源好有制肘，出外採訪少了，因為budget有限，人工有限，很難找願意留下而有經驗的記者。  
—Q.T.P.<sup>95</sup>

資源限制，微妙地影響題材選擇。新聞專題記者C.L.B.曾打算於六四周年紀念時，拍攝有關「天安門母親」<sup>96</sup>的題材，她們被視為異見分子，長期受北京當局監控，記者想接觸被訪者，需要額外時間資源嘗試，有可能無功而還。主管要求申請款項前，先擬定詳細採訪計劃，他最後放棄，原因是難以保證採訪一定能完成、數星期後的節目空檔能填滿。

無講清楚不能做，但時機一過，跌進製作周期，不能再做，除非你好大決心。  
—C.L.B.

<sup>93</sup> 業績見《明報新聞網》，網址：<https://goo.gl/Kog2Fo>。

<sup>94</sup> 有線新聞於2015年12月31日啟動高清廣播，較競爭對手TVB及Now TV遲。有線員工指出，他們的網站設計落後、不吸引，原因是管理層擔心網站太豐富影響佔收入八成的客戶訂購費用。Now TV的免費頻道已於2016年4月開台，有線寬頻同系的免費電視奇妙電視，於2017年5月啟播。

<sup>95</sup> Q.T.P.是有線新聞一位資深記者。

<sup>96</sup> 「天安門母親」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於北京成立的民間組織，成員主要為六四鎮壓遇難者家屬，多年來搜查死難者及傷者資料，要求政府平反。



長篇紀錄片每星期一輯，製作周期緊逼，但有意義兼具獨特角度的報道，往往需要長時間籌劃，搜集資料，取得被訪者信任，長期跟進，謹慎調查，有可能失敗而前功盡廢。另一位資深新聞專題記者指，早於1990年代，他們的節目每組有10至11名記者，時間充裕，可策劃深度報道；現時一組只有6至7人，每個特輯獲分配的拍攝時間亦減，為了保證有節目「出街」，選擇題材時必須控制風險。

會找一些一定不會失敗的題材，不會做長線的部署，做簡單故題，無能力長線跟一個個案一年，無可能，調查報道不要想。

—S.C.P.

調查報道佔用資源，而且干擾流水作業式的規律。一位資深從業員如是說：

調查報道有風險，半隻古仔，有可能輸掉兩日 crew。

—H.T.L.

另一機構的資深新聞紀錄片記者B.F.G.說，他們基本上不考慮到中國採訪，「因為無錢」，就算製作有關環境衛生的特輯，想化驗食品，公司預算所限，只容許化驗兩個樣本，「唔做好過做」。有時想到好題材，B.F.G.學會了如何處理：

意念一飄過，就立刻抹走。

—B.F.G.

一位撰寫國際新聞的編輯則談到，近來編輯部工作量倍增，但

人手增加有限。他們撰寫分析性稿件時，比以前用上更多內地資訊。

以前拆局分析，現在用現成的評論，《環球時報》都要用，未必去找其他，因為《環球時報》齊全。<sup>97</sup>

—X.M.T.

駐北京記者則發現，中國採訪愈趨被動。N.L.H.及其他記者都察覺到，主管常以「資源有限」為理由，不派攝影隊採訪政治較敏感的「群眾事件」如示威遊行等，常說「睇定啲」（不輕舉妄動）：

任何罷工、抗議，常想「睇定啲」，不覺得有競爭，不是爭新聞，（就算採訪）心態是到此一遊，做個standup……比友台慢一天，沸沸騰騰都說「睇定啲」。不想外出採訪，害怕花錢。

—N.L.H.

另一位駐京記者記得，曾經建議到西藏拍特寫故事，上級用資源有限為由否決。

有信心做到，有線眼，但老闆說，不會有錢的，在北京做就可以，有點心灰，算啦，在北京做，無意思。

—T.C.Q.

---

<sup>97</sup> 《環球時報》與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屬同一集團。《環球時報》較市場導向，重視評論，民族主義色彩較濃。

陰乾資源，無形中設定了題材的可行範圍，結果令新聞題材選擇趨向保守，避開風險高的調查報道，免浪費僅有資源，才能保證有足夠數量新聞應付一路增加的時段；另一方面，又以資源限制為由，減少敏感議題採訪，多利用免費的政府訊息，客觀效果乃進一步重量不重質，自主性遭削弱，政府聲音放大，有利建制一方。

#### 第十四道陰影：陰乾滅士氣 (tacit desiccation—demoralization)

「陰乾滅士氣」指製作支援減少，影響員工心態，貶損記者的熱情及創意，於採訪新聞時只能止步於既定框架規律。深度訪談中，很多記者投訴，技術支援與開支縮減，令他們難以安心做好份內事。

**攝影隊不足：**攝影隊拍攝日程緊密，專題片記者有時須自己拍攝，部分新人連攝影機都不懂用，不知道如何設定白平衡，只能拍攝簡單鏡頭。<sup>98</sup>

**攝影隊搭乘公共交通：**由於要省錢，不租小型貨車，記者與攝影師要攜帶沉重器材坐地鐵。一名記者記得，他們拿著攝影器材在地鐵狼狽地上上落落，被訪者問：「你們不是大台嗎？為何不坐的士？」<sup>99</sup>

**製作支援缺乏：**專題片講究影像音效，正規攝影隊除了記者、攝影師，亦包括其他工程人員，負責收音及燈光。但削減資源後，記者與攝影師要兼顧其他工作：

<sup>98</sup> 一位年輕紀錄片記者所講，幾位記者都有類似遭遇。

<sup>99</sup> 一位資深紀錄片記者的遭遇。

以前拍專題片，聲畫好重要，現在攝影師一個人，你如何控制聲效……收音根本收不到，有些 upsound 很好，但聲效很空洞，被逼不能播出，以前不會發生。  
—H.M.K.<sup>100</sup>

**採訪一腳踢：**現時電台記者亦要拍攝視像，往往一手舉話筒，又要同時錄像，又要留意被訪者問答快速跟進，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sup>101</sup>

**新人工資低：**低工資與加薪前景堪虞，令年輕熱心記者看不到未來，不能長久打算。

士氣好差，記者人工好大問題，記者只加 3%……大家工作的確開心，但私下談天，都談轉職，話題有兩種：「找到沒有」和「幾時轉工」。 —D.H.Q.<sup>102</sup>

**新人進步慢：**工作勞累繁重，同事之間見面溝通機會少，以往「舊人帶新人」的培訓方式，難以有系統地推行。

現時新人辛苦，（拍攝時）不懂得分配時間，不知夠不夠場景，資源不足，他們不會想拍太多東西。主管都無時間教導，不可能跟他們一齊工作，很快就要獨自處理古仔。  
—S.C.P.

---

<sup>100</sup> H.M.K. 是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

<sup>101</sup> 一個電台的資深記者所言。

<sup>102</sup> D.H.Q. 是一位有線新聞的年輕記者。

一位資深工作者L.G.V.解讀，公司不斷削減資源，不提供足夠支援，顯示主管根本不介意質素，他亦無心戀戰，採取「按章工作」態度。

老闆英明，他知道觀眾不察覺質素的差距……現在容易做，（做訪問）只需 talking head，做完就走；較為片面、簡單……做快一點，量不會少，有時見到一些觸動的鏡頭……不拍攝了。早些收工，算了。

—L.G.V.

亦有資深員工認為，資源不足，能維持原有內容填滿節目，已經屬超額完成。

我會想，算啦，不要做，真的，認真你就輸。公司想你如此，你做到百分之一百，或者百分之二百，你會好辛苦……我到最後看看回報，是零，甚至負。例如加人工，你升職，當年只加幾百元，不正常，如何為你這間公司做下去。

—H.M.K.

「陰乾」不能完全磨滅記者的主動性。很多從業員指出，電台與電視新聞記者「拋頭露面」，以真實姓名報道，自然不願自己負責的故事太差勁，故仍然盡力做到最好，希望能於夾縫中發揮專業本色。不過，「陰乾」之舉逼使員工退而求其次，選擇較有把握的工序、減少創意，也貶損員工士氣，直接把記者推向較被動及工作規律化的處境。

### 3.3.2 舞弄人事升遷

繁冗的血汗工序、緊張的死線限期之中，G.B.W.有一天突然發現，他竟然可以在中午時分，悠閒地坐在員工餐廳與一群同事共晉午膳，很多人無事可做。

好難想像一個採訪部，可以集體去 canteen 吃午飯，高峰期試過連續兩天，有十個人一齊坐在 canteen，坐定定食飯……兩時多，開始想下午茶，有幾個人有時間食下午茶，做這麼多年電視新聞我未試過……當中有些是被邊緣化的人，無事做的人。

—G.B.W.

當時是2014年佔領運動中轟動的「七警事件」後，TVB新聞部員工發公開信，表明不同意新聞部管理層之判斷（詳見〈案例篇〉）。G.B.W.發現自己及數位首批簽署公開聲明的同事很快被投閒置散。

人事管理的決定，主宰招聘、部署、升職、貶職，乃管控系統中行使權力的主要著力點，個體往往難以招架。各種人事編配任免中，很多資深記者都關注行業內新記者太年輕、經驗不足的問題。V.T.D.以「亞視化」作比喻：<sup>103</sup>

---

<sup>103</sup> 亞洲電視本來是香港兩家主要免費電視台之一，一直處於弱勢，人手嚴重短缺，由於股東不和、管理不善、欠債纍纍等問題遭清盤，亦不獲續牌，2016年結束營業。

亞視化即是說，記者很green，沒太多經驗，普通記者做首席記者的工作，首席記者做採訪主任的工作，跳級的。十年前，亞視一年經驗的記者，可以駐北京做人大會議，我們譏笑別人半年經驗可駐北京，現在自己都一樣，大家都很新。 —V.T.D.

一位資深的中國線記者回憶與幾位新駐京記者談天，指導他們去找異見人士訪問，須特別注意如何聯絡才能避過便衣警察監視，卻發現大部分新記者非常勉強。

有人說無時間，有些講明說害怕，有些，我好深刻，說吃力不討好，做得到，老闆都不會多謝你啦……老闆不會多謝，為何要做呢。 —T.C.Q.

TVB記者既新亦多，轉變也快，一位採訪主任說，自己連他們名字也記不清。為何如此，眾說紛紜，不得意的局內人直指「換血」，不介意聘請新人，目的在替換有主見的資深記者；但有資深記者則認為，是社會「短炒」風氣使然，年輕一輩不願投身於一份工作；亦有人認為，是因為電視台信譽大跌令經驗豐富者不願加盟。一位TVB資深記者說：

(上司)常問我，有無人介紹來做？我連我的仇家都不會介紹進來。 —C.P.P.<sup>104</sup>

---

<sup>104</sup> C.P.P.是一位資深記者，現已離職。

## 第十五道陰影：幼嫩培育 (novice conformity)

大部分深度訪談中的被訪者皆認同，廣播機構削減資源是大量聘請新人的主因，有限預算下，主管寧願多聘請幾位新人置於生產線中勞動，也不願用同樣價錢，只聘一個富經驗的記者。結構性審查行徑之「幼嫩培育」，指招募經驗淺而較順從的記者，無論原因為何，結果令整體員工趨向較被動服從的一方。

編制不加入，但要加內容，加了兼職，但全部都是實習生，兼職記者好恐怖，有些大學一二年級，很新，未懂寫稿。  
—L.C.W.

老行尊總愛說「一蟹不如一蟹」，但記者經驗太淺，加上訓練不足，確實帶來各種運作問題，很多資歷淺的記者自己亦承認；加上生產線一樣的工序令資深記者留在採訪部監督運作，前線採訪都交由新記者負責，由採訪至寫稿、硬新聞或軟性特寫、財經新聞到中國採訪，都出現各種問題。

前線記者資歷太淺，未必知道問甚麼問題，不知重點，無跟進問題，無自己的角度，無自己發掘的東西，缺乏訓練，無力感重。  
—K.T.M.

另一位資深從業員發現，新記者處理軟性的人物故事亦有弱點：溝通技巧不高，不容易打開被訪者心扉，亦無人教導基本畫面運用技巧，說故事方式平庸。



記者經驗不夠，前期準備工夫不足，人的故事很重  
長期準備工夫，記者不夠時間掌握故事的脈搏，如  
果多些時間，感受一下你，你背後如何，angle多一  
點，VO不用多，畫面可以說故事。現在全部用旁  
述去講故事，無畫面，無停頓，不斷VO接bite接  
VO接bite。

—S.F.G.

財經部門方面，資深記者都抽調時間經營各種賣錢的小品環  
節，畫面與說故事元素較少的每日財經新聞，都交新記者負責。

出去採訪的，都是新人、兼職的……在採訪部  
的人，可以抄新聞稿，上網抄，然後核實，一定淺  
薄，水過鴨背，只能用人家訂的角度……有些記  
者，基本常識，連市盈率都不懂，看行家的網站，  
又會慢人一步，永遠二房東。

—Q.S.B.

新記者經驗未足，處理新聞容易思慮不周，角度平庸；就算中  
國採訪，駐廣州記者常發覺無從入手。

駐廣州，一個電話都無，公司無任何聯絡人資料  
庫，要花好多時間cold call找訪問，公司無人指導，  
甚麼是古仔，甚麼是新聞，無人講。「炒」報紙（話  
題），變成電視版。不覺得有限制題材，只是自己  
想不到。

—A.C.B.

A.C.B.尚記得初入行時，曾經遺漏了一宗異見分子重要進展的新聞：

老細無「詐型」，但我覺得自己「水皮」。 —A.C.B.

TVB的記者注意到，近年多了一些於本地受大學教育的內地人任記者，他們表現一般受好評，但不少記者注意到他們的特點：

內地人，不覺得他們對香港政治有任何意見，好抽離，對新聞事件無個人感情。 —T.Z.K.

新增人手大體上資歷淺、較幼嫩、順從，與上司同步。A.C.B.反思往日，亦記得有慣性順從上司的時候：

那時候想法不全面，有時學懂取悅你老闆，有一次訪問，寫得很負面，覺得對不起被訪者，只不過知道老闆喜歡，堆砌一番就播出，覺得好偏頗，好不對，違背自己想法，但會服從。 —A.C.B.

有資深從業員說，部分新記者太過幼嫩，需要緊密監督他們的工作。

工作流程不熟悉，對新聞、對政府運作也不了解不熟悉；過程中，因為不熟，寫出來有錯，這個都頗大問題。舉例，會有些新記者，你不能好信任他，變了記者會（直播時）我也要聽，到他交稿時才會發現到問題。 —B.N.E.

新人幼嫩易錯，又缺乏技巧與經驗，處理新聞時，自然被經驗豐富、又得知全局的上司主導。C.P.P.說，採訪主任要加插親建制的角度或引述，輕而易舉。

好多新人，一兩年就做立法會。新人服從，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無討價還價能力，換兩次 bite 都無反對，換就換，年資長的人會反駁。 —C.P.P.

上級的新聞判斷若有偏頗，新記者入世未深，或許未能察覺，也許不敢反撲，也傾向馴服及保持緘默。有這樣的結果，管理層是否透過人事聘任，刻意為之？Z.M.G.認為，這是一個上級樂見的效果：

老闆驚你識，驚你有想法，用意清晰。 —Z.M.G.

他們想請資歷淺的人，不做「頂心杉」，容易搓圓按扁的人，價值觀會受到環境塑造，愈新愈容易。 —W.T.B.

B.N.E.則不願猜度聘請大量新人背後的動機，但他指出，機構本身聲譽如江河日下，造成惡性循環，有能力的人不願加入，或只視之為一個踏腳石，無長遠打算。新人當道的結果，主管級相應處於更權威的地位，主宰編採判斷；整體而言，人手經驗不足，難以主動出擊，亦不易抗衡既定規律，自然令平日內容更趨被動，更服從於慣例。

## 第十六道陰影：邊緣化羞辱 (humiliating marginalization)

有人覺得，我們是恐怖分子……我們被懲罰。

—X.M.E.<sup>105</sup>

人事操控的範疇中，聘任資淺記者，效果是引進較服從的員工；結構性審查行徑之「**邊緣化羞辱**」，則把較主動及不服從的員工投閒置散、羞辱及邊緣化。本章節大半受訪者均已相繼離職，此行徑之客觀效果，令大部分敢於提出異議、敢於挑戰管理層尺度的記者意興闌珊，削弱採訪部內主動出擊及抗衡刻板規律的力量。

這種羞辱及邊緣化的人事編配方式，於「七警事件」TVB新聞部記者聯署抗議後最明顯，兩位負責「七警事件」稿件的資深員工，分別被調離原來崗位。一位助理採訪主任被調職為「首席研究員」，獲安排四位兼職學生「協助記者搜集資料」，但「研究團隊」工作量甚少；另一位編輯則從工作多年的早晨新聞總編輯崗位，調至晚間工作，主管編排向海外播放的衛星新聞。兩位員工不久後辭職。

於TVB採訪部編制中，「外電編輯」除了撰寫國際新聞，亦負責港聞最後審稿把關，及編排新聞播出次序等工作。幾位曾具名「聯署」的外電編輯其後一段長時間，不獲主理較重要的審稿編新聞工作，只負責翻譯國際新聞。佔領運動期間，有記者由於被指態度偏頗，儘管人手緊張，他們從不獲派到佔領區現場採訪。

---

<sup>105</sup> X.M.E. 是一位TVB新聞從業員。

佔中時，幾清閒，幾慘，看著同事好忙……有同事不懂做，還來問我……頭一天不開心，我好快調適，可能我好快已下了決定，知道不會待太久。我為同事覺得慘，見到他們好忙碌，採主則有顧慮，不分配工作給我……查到新消息，都不出聲了。

—G.N.Y.

G.N.Y.不久後辭職。其他人則說，有不同的方式把記者邊緣化，包括一些屬於某記者跟進的線路(beat)，不讓他採訪，而安排他採訪無其他行家認為有價值的瑣碎事項。

有(我負責範疇)的故事，不編我做，找個新人做，結果要採主寫稿。

—T.Q.M.

常去聽區議會會議，明知不會用的故事……叫我去做軟性故事，甚麼關懷行動……政治議題不讓我碰。

—K.C.Q.

輪換更表的巧妙編排，亦可促成「強力監控」的效果。一些相對被視為不服從的編輯及採主，上班時間會被編排至與更高層主管級重疊，意味著他們無機會自己作重要決定。TVB製作專題片的部門，近年引進「點名」制度，要求記者準時上班，並由秘書於上班下班時間點名，辦公時間外出，亦需向上級報告行蹤，主管謂希望透過新措施令記者準時上班，但不少員工認為是嚴重的羞辱。

似小學生。要人坐在辦公室。記者坐在辦公室就有事發生？就能完成工作？出 trip 又無加班費，我現在心態是為自己做好新聞，為自己的出品，不損自己聲譽。  
—N.Z.B.

點名，不尊重，我覺得自己心裏有團火，不計較加班，想做好，額外付出不會同公司計算……現在習慣了，好像馴服了。  
—M.K.D.

以羞辱及邊緣化的方式操弄工作編排，員工難以反抗；畢竟工作調配之大權由上級掌握，似乎天經地義，員工只能選擇是留是走。

無得掙扎，我已放棄了香港，以前會想，有無機會有出路，想做些甚麼去改變，現在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每間公司都是這樣……影響所及，我們都是得過且過，由他吧，得過且過。  
—X.M.E.

生物演化論之概括原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謂「適」，不代表「優」；有些森林，擇優而噬，最後能適應的，往往不是人才。「邊緣化羞辱」減少敢言、主動、好辯、同時經驗豐富的記者，他們離去，減少了採訪部內主動出擊與逆流而上的動力，同時加快了中高層主管同聲同氣的新秩序。

## 第十七道陰影：同聲同氣新秩序 (synchronized co-orientation)

生產線極端分工，令採訪部中高層掌控大局；幼嫩的記者令採訪主任品質監控與指揮交通的角色更吃重；那麼，甚麼人會被擢升至重要崗位？不同傳媒處境各異。一些TVB的資深從業員認為，固然有唯命是從的人，「挖掘新聞做調查報道的意願是零」，只緊張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話題，但亦有熱心工作的採訪主任。

他們在一些不敏感的問題上有心，在敏感的話題上服從。  
—B.N.E.

結構性審查行徑「同聲同氣新秩序」指，透過升遷與貶職等方式，管理層篩選與自己觀點接近的員工擔當重要崗位，令執行更順暢。這批中高層成為主要的掌舵人，直接影響做新聞手法是積極抑或被動，是逆流而上還是隨波逐流。

不少資深傳媒工作者觀察到一個「劣勝優汰」的現象：順從者生存，唯馬首是瞻者會受重用。在另一個廣播媒介中，有從業員指出，選擇節目主持亦以「安全」為尚：

不要「星」，不要突出的主持，整個頻道主持都是nobody，不介意無人認識，要控制到，能預計，不要個性，要年輕；受栽培的相對要聽話，安全系數高。  
—L.P.N.<sup>106</sup>

<sup>106</sup> L.P.N.是電台時事節目主持。

以升職或去職操控人事部署，亦是香港電台很多新聞從業員關注的議題。數年前，最少四位香港電台「非公務員合約員工」(non-civil service contract staff, NCS) 被管方以已屆退休年齡為理由不獲續約；由於公務員職位凍結多年，部分合約形式聘任的NCS員工已於港台工作超過十年。本身為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F.T.S.認為，由於NCS原意為聘請機構缺乏的人才，退休概念理應不適用，不獲續約的目的，顯然是借勢清除敢言的麻煩製造者：

這些人有相當閱歷，但無公務員退休金的包袱，講錯話，公務員連退休金都無，每個月幾萬，現金幾百萬、近千萬，你叫我做甚麼就做甚麼。我們不是，我無任何好處，發窮惡，聲大，我們無顧忌，為正義為公理。差別在這裏，這班人在主管角度，是一個難處。

—F.T.S.

F.T.S.及其他香港電台員工指，由於港台傳統上享有較自主的地位，雖然屬於政府部門，但高層甚少直接干預節目內容，人事任命成為有效的操控方式之一。近年的退休潮及重開公務員職位，讓管方有機會進行人事布局。

大開空缺，人事任命成為權柄。

—J.D.E.

香港電台不少員工注意到，主動敢言者升職遇到重重阻滯，低調者被擢升至重要位置。F.T.S.認為，轉變很明顯：



這是鋪墊工程，政府不會大動作，是溫水煮蛙，他將所有關鍵位置擺好，整個團隊慢慢變型；一間學校，校長變了，主任變了，老師變了，下面的學生就按你意思去教了。

— F.T.S.

利用升職或貶職的方式操控人事任免，在政府嚴格按照程序的運作中，往往是冗長過程，但商業機構則反應迅速，「七警事件」TVB記者聯署事件後，28位最先發起聯署的記者，到了2016年中，已有一半人因各種原因離職。與管理層判斷尺度不一的人離開，資歷較淺的新人湧現，加上升職降職的微妙操作，此消彼長下，一個與管理層相當一致的運作團體成型，各種結構性審查行徑可無聲無息地進行，不泛起一絲漣漪。

### 3.3.3 妙用行政權力

專業規範有彈性詮釋空間，日常運作規律可以被改造推翻，管控系統手握制定規則的權力，能定義或重新定義規範原則，執行或廢棄行事標準，制訂或改變前提。以行政權力體現的結構性審查行徑有三項，分別為「調兵遣將·滅於萌芽」、「前提預設·先發制人」、「橫刀干預·後發先至」。

#### **第十八道陰影：調兵遣將·滅於萌芽 (precautious deployment)**

結構性審查行徑之「調兵遣將·滅於萌芽」指調配記者工作之策略，無形中控制內容，避免在政治敏感事項惹上麻煩。資深記者

M.C.B.察覺，上司分配工作時，自己甚少被調配去採訪行政長官梁振英。

中層同事覺得我對CY咬住不放，如非必要，不會叫我扑CY。

—M.C.B.

M.C.B.發現，在很多追訪官員的場合中，前線現場大多是新記者，不肯定應該問甚麼，若任何媒體派出資深記者到場，便能透過發問，設定議題與釐清重點，發揮監督官員的天職。因此新聞管理層非常謹慎調配工作，一方面減少達官貴人投訴的麻煩，同時迴避記者踩到機構未必想碰的政治敏感地雷。

一眾TVB新聞工作者均表示，該台很多記者不能碰政治議題，被認為有強烈政治取向的記者，通常不獲編配採訪政治新聞，若有時因人手問題逼不得已，他們寫的新聞會由一些獲信任的上司跟進審稿。一位「獲信任」審稿的新聞工作者認為，主管過分憂慮，熱心的記者不獲編配做合適的故事，並不健康。

你就是想對這個社會有感受有承擔有責任感的人留在採訪部，但你讓他坐在這裏，卻也不讓他做……為了投資在人身上，你要投資金錢及心力，心力包括風險。

—Z.X.H.

Z.X.H.認為，所謂投資心力，包括管理層要願意承擔風險，意見相左時願意與同事開誠布公地討論；但主管迴避風險，習慣把政治新聞都交予少數能溝通或同聲同氣的下屬負責。有記者亦察覺，

一些有新聞價值的政治議題，未做資料搜集已被排除，原因是受信任的主管休假。他們的理解是：若受信任的主管因各種原因未能密切監督，政治議題寧願不碰。

把所有可能有問題的古仔，都消滅於萌芽狀態。

—V.B.A.

佔領運動過後，TVB的編輯架構亦有新安排，以往24小時新聞，每個時段都有編輯負責編排，有時標準並不一致；新架構下，責任編輯之上增設一級，統領所有時段的編輯方針，員工引述主管之改動原因，是為了品質控制，及不同時段的新聞編排較有連貫性，但個別編輯的權力與自主性同時被削弱。

是一個較嚴密，較有人負責的制度。我自己覺得一層一層架構，品質控制好一點，的確是，但最主要原因，是控制古仔，哪一條新聞排高一點排低一點，選擇服從的人執行。

—X.M.T.

### 第十九道陰影：前提預設·先發制人 (pre-emptive premise)

管控系統中「前提預設·先發制人」的結構性審查行徑，指以預設基本遊戲規則的方式，變相設立障礙，從第一步開始控制新聞內容及流傳之範圍。例如一些新聞機構嚴格限制以「隱蔽攝影」或「臥底」方式搜集資料，令調查報道寸步難行，出現「去調查化」

(devestigation) 現象；又或於佔領運動期間，前設了佔領馬路屬非法行為，所以佔領區故事不予報道及不能美化等（詳見〈案例篇〉），皆屬預設前提，訂立影響廣泛的行事規則，客觀效果令新聞內容較有利建制一方。這種管控的權力，往往集中於少數人手上。

受訪的TVB記者提到，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新聞部主管頻密發布內部電郵，報告觀眾投訴信數目，大部分來自親建制的「藍絲」。雖然主管甚少加上個人意見，但大部分記者感到無形壓力，「不惹投訴」成為編採判斷考慮之一。處身各種前設之中，有從業員發覺，可供緩衝迴旋的空間非常狹窄。

你又要言之有物，又要同時代掛勾，但你不可以做些罵政府的東西，又不可以做些跟他政治理念不同的故事，這樣好難，空間好細。

—S.C.P.

節目編排也是簡單利落操控內容的方式，一個小小調整，節目能接觸的觀眾有天淵之別。2013年前，香港電台並無自己的電視頻道；按條例規定，本地免費電視台需提供時段播放港台製作。香港電台皇牌節目《鏗鏘集》一直安排於擁有超過八成收視的TVB播出；<sup>107</sup> 2012年，香港電台管理層提出把《鏗鏘集》轉移至收視率只有個位數字的亞洲電視（ATV）播出，港台員工反對：

《鏗鏘集》放ATV播？即是把兒子丟在廟街！

—F.T.S.

<sup>107</sup> 據TVB年報，2005年平均收視率為82%，2016年上半年為83%。

香港電台管理層亦曾建議，製作新訪談節目《星期五主場》時，取消長壽節目《議事論事》。F.T.S.認為，《議事論事》是香港唯一以立法會事務為主的時事節目，能反映市民聲音。

客觀上削弱立法會的影響力，彰顯官員的影響力。

—F.T.S.

員工反對下，兩個建議都擱置。但另一長壽節目，以政治諷刺為主、曾被建制派人士形容為「陰陽怪氣」及前特首董建華形容為「低級趣味」的《頭條新聞》，<sup>108</sup>部分集數由TVB調往ATV播放。管理層以「公平」為理據，騰出一些TVB時段播放其他港台節目，給其他港台節目享有接觸較多觀眾的機會。一位港台資深員工認為，用意明顯：

《頭條新聞》十幾年來都放TVB，現在三分一放ATV，去了ATV好明顯，十幾廿點收視的節目去了ATV，降低你的影響力。

—J.G.S.

2016年開始，TVB獲政府批准，把香港電台節目時段由以往晚上7時至8時觀眾較多的黃金時段，改到傍晚6時，《鏗鏘集》及《頭條新聞》等節目全部放在6時播放，估計觀眾人數較以往減半。<sup>109</sup>

調動節目時間、重新包裝節目、調整節目形式等等看似合情合

<sup>108</sup> 見《星島日報》，2001年10月19日報道，網址：<https://goo.gl/jKP0h7>。

<sup>109</sup> 見《香港01》報道，網址：<https://goo.gl/nt6K4Z>。

理的動作，都能達致制約節目影響力的效果。2016年初，香港電台第二台取消《思潮作動》及《[sik][si][fung]》兩個以文化及政治話題為主的電台節目，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關注電台是否有意去政治化，扼殺多元表達空間；<sup>110</sup> 香港電台則表示，節目改動是考慮聽眾需要。<sup>111</sup>

節目形式的調整，亦能削弱批判力。一位電台節目主持被調往另一時段，做同類型節目，但該時段有四位主持。C.W.Y.形容，四位主持容易令訪問混亂，內容失焦，直接影響批判力。

一個人當主持，可以講背景資料，有時間部署問題，有時間死纏爛打，有交鋒；四個人一齊做，他們不喜歡講背景資料，常常讓嘉賓多說，沒有討論大綱，難以咬住不放…… 不夠力量、不夠對焦。

—C.W.Y.

預設規則、調校節目風格與形式，雖然動作不大，但牽一髮而動全身。需要補充一點，並非所有「預設」規則都屬結構性審查，要視乎前設與改動的實則內容，但管控系統掌握了影響力的支點，主導重要安排，能把新聞內容推向傾向建制的一方，而上述受影響的節目，「恰巧」都較具批判性。

---

<sup>110</sup> 見《立場新聞》報道，網址：<https://goo.gl/v1vSww>。

<sup>111</sup> 見《南華早報》，2016年1月8日，“Occupy-linked DJs dumped as Hong Kong broadcaster RTHK rejects censorship accusation”，網址：<https://goo.gl/GUwZKW>。

## 第二十道陰影：橫刀干預·後發先至 (critical intervention)

管控系統能先發制人預設前提，亦能在關鍵時刻不依前提，改變規則。結構性審查行徑最後一項「橫刀干預·後發先至」，指於關鍵時刻打破規律，重訂規則，直接干預，重新定義正當的行事方式。

TVB的新聞工作者注意到，特別是佔領中環運動過後，政治敏感的新聞，當值採主審稿後，尚要更高級的採主審閱。

這種做法打破編輯審稿常規，在「七警事件」後一宗討論警權的新聞，一位高級採主直接指示記者加入一句稱頌警方於佔領運動中表現的原聲引述 (soundbite)。不少資深記者認為，一向程序是當值採主過目後交由編輯定稿，其他主管不直接改稿，只提供大方向意見，有問題的會於播出後再修改，現在播出前已遭截住，而普通的民生故事，沒有這個步驟。

另一事例發生於2013年初，碼頭工人發起罷工，延續40天，反對外判公司剝削工人，矛頭直指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及其附屬公司。TVB新聞專題節目《新聞透視》製作了特輯〈碼頭風雲〉，在播放前兩天突然被叫停抽起。TVB外事部表示，播出預告片後再調動節目並非首次，新聞部希望強化內容，跟進最新情況，了解更多才播出。<sup>112</sup>

但是，多位資深記者都表示，過去節目臨時調動都是因為有突發事件，如地震、騷亂或政局變故等，〈碼頭風雲〉為現在進行式，而且是社會熱話，況且沒有「罐頭」故事可即時播出，填補空出的

---

<sup>112</sup> 見《明報》，2013年4月14日，〈《新聞透視》突抽起工潮專輯 首席編輯辭職 工人質疑無綫審查〉。

節目時間，<sup>113</sup> 臨時抽起極不尋常。特輯之負責記者獲告知，主管認為稿件不完整及不客觀，要求加插更多比較角度及資方回應，稿件中雖然已引用了資方於記者會的言論，但不足夠平衡工人及學者的看法。有份參與製作的新聞工作者指出，該半小時專題連資料搜集及拍攝只有兩星期：

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但這樣短時間，你 expect 甚麼？

—L.B.M.

知悉情況的其中一位新聞工作者認為，節目內容可能不夠持平、不夠深度，但仍有兩天可作補救，有時間加插更多觀點，毋須抽起整個專輯。

做得不好？做得不好的古仔有很多，播出前半天改都試過，為何不可以補做訪問？

—D.J.U.

負責專輯的首席編輯隨即辭職。〈碼頭風雲〉最後在工潮結束後播放。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位編輯較早時製作另一專題片〈鬧爆文化〉，講述網民的語言暴力，也捲入爭議，亦被指偏頗，<sup>114</sup> 但那次較偏向傳統力量，指摘網絡文化。該專輯無受阻撓，如常播出。

〈碼頭風雲〉案例可見，組織內的管控系統，能於關鍵時刻干預，改寫慣常運作，據理力爭也是徒然，而事件客觀效果有利建制一方。

---

<sup>113</sup> 空出的時段播出另一輯關於地產商售樓手法問題的專題，由完稿、剪輯到後期製作，於兩天內完成。

<sup>114</sup> 見《蘋果日報》，2012年11月14日，〈「鬧爆文化」的被鬧爆〉。



### 3.3.4 陰影重重·明暗之間

管控系統涉機構之直接決策，其資源調撥、人事操控與制約措施，左右新聞方針傾向積極還是被動、傾向抗衡規律還是順從規律。激流中前行，船長與舵手有一定的自主空間，每家機構都面對資源緊絀，如何節省開支？省下的錢做甚麼新聞？各有各天地。例如多年前，香港電子傳媒慣常跟隨國家領導人外訪，希望爭取機會近距離接觸一向低調的領導人，但外訪活動跨越多國，花費不菲。近年，有線新聞、Now新聞、TVB等機構，已不再跟隨外訪活動，省下大筆開支。

我們計算過，有一次江澤民去南美，花了幾十萬，很肉痛……減一次領導人外訪，足夠你用半年。

—R.X.T.<sup>115</sup>

管控系統主宰資源投放，各台方式不同，例如TVB於2017年抽調大量人力製作J5財經資訊，亦不斷推出小品節目；Now新聞培養政治組，常設政治耳語節目《政情》，每年北京召開人大政協期間，政治組會派記者上京，目的在藉機會近距離接觸政治人物，建立信任；獲發免費電視牌照後，Now成立新專題組，製作《經緯線》，拍攝專題片。有線新聞投放資源於調查報道及中國採訪，其中國組共12位組員，人強馬壯，亦著重培訓（詳見〈案例篇〉）。員工招聘，當然不一定選擇個性溫和聽話的人選；據香港電台資深員

---

<sup>115</sup> R.X.T.是有線新聞一位資深工作者。

工所講，以前的文化，傾向選擇較具批判力、甚至膽敢質疑考官的面試者：

上司會告訴新人：這裏文化無大無細，如果你連老闆都不敢 challenge，你走出去會夠膽 challenge 誰？你的職責要 challenge……鼓勵他們對自己的專業有新認識，我們不是做狗，我們是做看門狗。 —F.T.S.

F.T.S. 是一位已離職的香港電台電視部節目監製，他認為這種文化於數年前一些較保守的管理者獲晉升後開始減退，但大體上香港電台員工依然同聲同氣。

這氣氛增加了朋輩之間的互相支持，有共同目標，我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發聲，當見到不義的事情，就批評，若給人批評，我們就團結。 —F.T.S.

各種強硬制約手段，亦可向積極的一方走。有線新聞的記者皆認同，有線新聞較進取，落力做調查報道，精研說故事技巧的傳統，很大程度源於一位強勢主管多年來的推動。

他好惡、狂躁、強勢，有態度，（整個文化）潛移默化，他跳過編輯層級，直接同記者溝通，聘請一些真正做新聞的人，做內容，presentation（容貌）次要。 —Z.L.F.

據記者形容，這位強勢領導整合資源，主動出擊，設定題材與角度，指導敘事技巧甚至親手改稿，但深度訪談中，受訪者無人認為這是審查。<sup>116</sup>

再引用激流的比喻：管控系統可視為波濤上小艇的機件控制架構，要突破刻板新聞規律與被動的慣性，逆流而上，需要更多燃料、穩妥精良的硬件，更要船長與舵手的決心、耐力與勇氣；故資源的配備、同行者的挑選、面對突發事件如何應對，均直接左右船隻的航向。世事往往不如人願，有時在澎湃急流中，能站穩陣腳已是萬幸。隨波逐流相對容易，在激流中不作為是一種策略選擇，但客觀效果可見，新聞方針會落入被動、消極、刻板規律的方向，有利建制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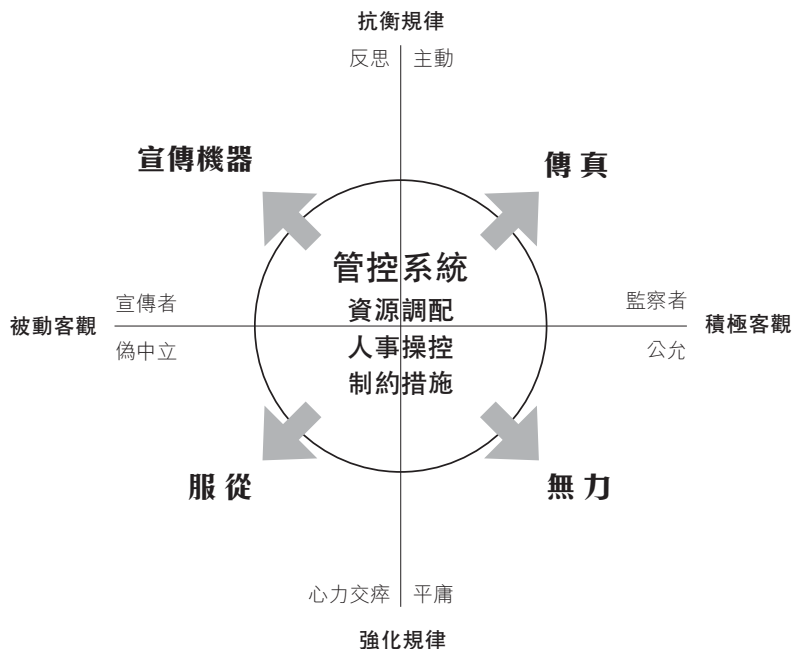
### 3.3.5 拈花微笑·不著痕跡

〈立篇〉透過內容分析與深度訪談，歸納新聞審查的二十道陰影。這二十種結構性審查行徑，鑲嵌於機構運作制度中的規範系統、文化認知系統及管控系統中。這些結構性審查行徑並非無時無刻存在於所有媒體，運用的強度與密度，既視乎機構，亦視乎情境；但這些審查方式潛伏於制度支柱之中，能於日常運作中隨時啟動、強化、影響內容。

圖3陳述各系統之關係。X軸代表規範系統中，由「被動客觀」到「積極客觀」的策略性選擇，新聞選材有「唯權是尚」與「平衡報道」等背景暗湧（見圖1，第142頁）。唯權是尚，加上被動取態，跳進權貴所設的議程，去到極端，是為「宣傳者」（publicity）角色；給予

<sup>116</sup> 但部分下屬感到壓力巨大，有時難以承受。

圖 3 結構性審查架構及行徑之主要概念



掌權者長篇報道、但維持「積極客觀」地詰問監察，傳媒擔當「監察者」(watchdog) 的使命。堅持平衡報道，卻只羅列意見，不辨真假輕重，是為「偽中立」(false neutrality)；容納不同聲音，同時積極尋真，發掘事實，才謂「公允」(fairness)。

Y軸代表文化認知系統中，由「強化規律」到「抗衡規律」的策略性選擇，採訪部運作有「極度分工」與「形式指揮腦袋」的慣性，令運作規律化而抹殺主動性的背景暗湧（見圖 2，第 163 頁）。面對極度分工，卻於日常運作中不作為，甚至加插更多工序，會令員工

走向心力交瘁 (brain drain) 的一端；在細碎累人的運作流程中，若然能拆牆鬆綁，抗衡規律，才能別樹一格，有反思 (reflexivity) 的空間。形式能指揮腦袋，若強調商業掛帥、迎合觀眾與廣告商口味，等同選擇強化規律、遠離優質新聞而令內容越加平庸 (banality)；相反，節目形式亦可在夾縫中尋找新意思，抗衡規律，打破框架，爭取主動 (proactivity)。

圖3中間之圓圈，代表管控系統牽引策略選擇的走向。管控系統掌握人事任免大權，可以升你職、貶你職，指你工作表現不如理想，不讓你更上層樓，往往隨心所欲，理由莫須有，準則隨時變。管控系統亦操控資源分配，可以陰乾你、忙死你，消耗你體力，磨滅你意志，縱使水浸金庫，永遠緊縮開支。管控系統也是指揮權柄，操弄調配工作大權，可以勞役你，可以把你投閒置散；可以培訓你，可以冷落你；發配你去邊疆，調你通宵工作，下屬難以反抗。系統中的資源調配、人事操控與制約措施，能左右新聞方針，是走向被動還是積極；也主導著面對僵化規律時，選擇強化還是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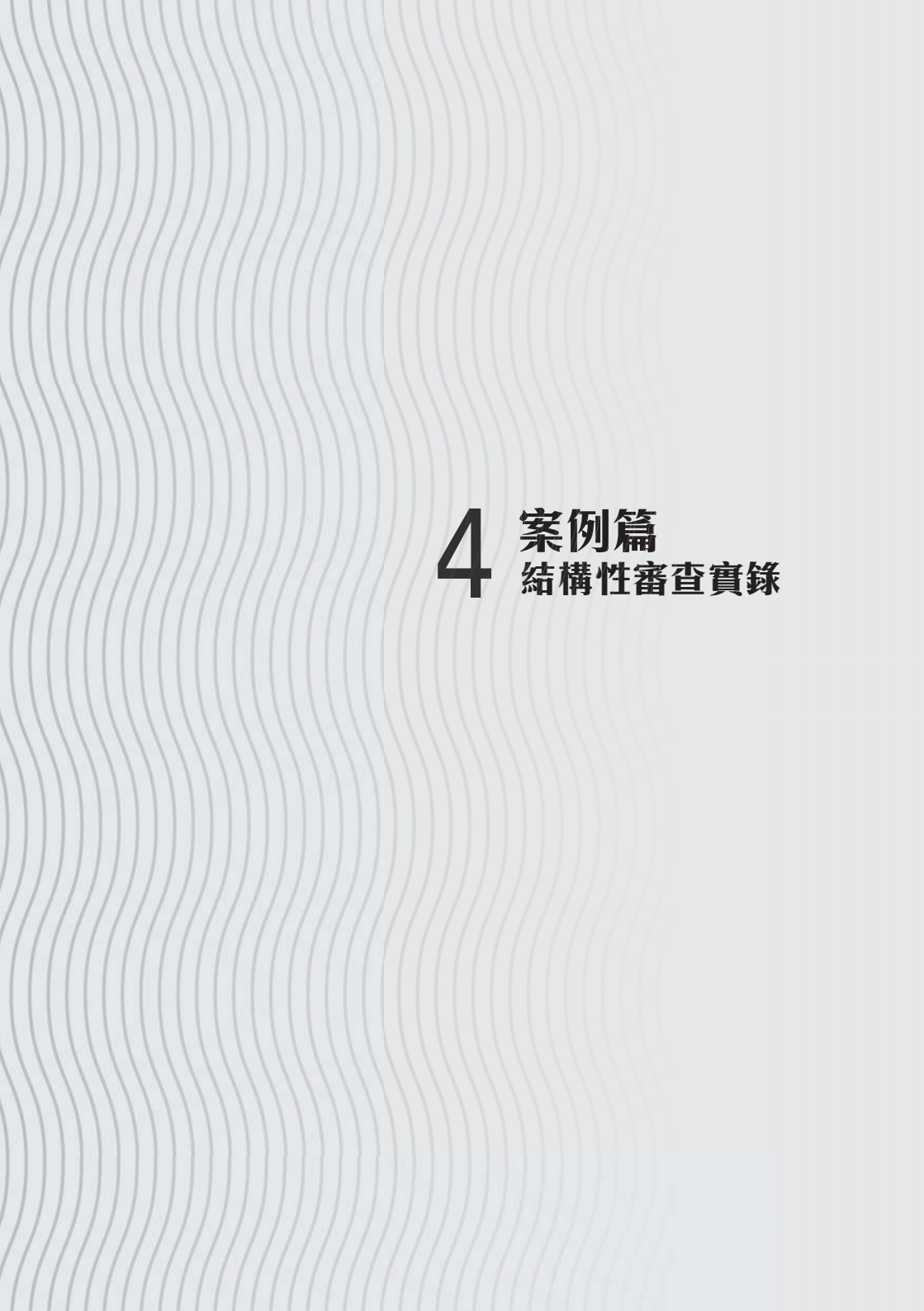
若管控系統把策略選擇推向左下角一方，一方面記者奔波勞累，節目平庸，加上新聞選材取態被動，傾向偽中立、宣傳味濃，整體新聞面貌傾向服從 (submission)，倒向對建制有利的一方。若然管控系統把策略選擇推向右上方，嘗試擺脫既有框限，增添反思空間與主動性，再加上採納積極客觀的意態，擔當監察政府角色，同時注重公允報道，則整體新聞面貌傾向「傳真」 (truthfulness)。

右下方之境域，代表既有積極意態，但受各種製作規律框限綁死，力不從心，是為「無力」 (incapability)。左上方之境域，打破成規，調動資源，卻傾向認同權威，走到極端，可視為「宣傳機器」 (propaganda)。

管控系統正是牽引力的來源，資源調配前設了節目類型與抗衡規律的可能範圍；各種人事操控，從招聘、培訓、晉升、羞辱到貶職等，可選擇同路人，塑造員工辦事心態與價值觀；各種行政措施，制訂規則標準，可廢止、可改變、可適時插手干預，直接塑造新聞面貌。

結構性審查最顯著之時，來自管控系統促成各種被動、消極、甘於平庸與規律化的行為，重重疊加，結果該機構的新聞從業員自然走向服從聽命的一方。整過個程既不涉直接赤裸的審查指令，員工甚至發現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沒有，於拈花微笑、不著痕跡之間，管控了表達的渠道與表達的形式，無形中影響內容，新聞面貌傾向了權貴的利益。

剩下來的問題是：各種系統背後，又是誰來主導？系統裏的個體，有無抗衡的可能？進一步探究前，先以個案形式，闡述結構性審查行徑如何影響具體運作。



# 4 案例篇

## 結構性審查實錄

永遠在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  
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胡舒立

本篇分兩部分，一以「佔領運動」為例，整全地闡述規範系統於歷史關鍵時刻，如何影響新聞內容；二以「中國採訪」為例，看資源分配與節目規劃等調控系統，如何塑造不同的新聞面貌。



## 4.1 佔領運動——報道與不報道的斷崖上

2014年的佔領運動，歷時79天，不滿政制改革步伐的示威者，佔領香港三處主要交通幹道兩個多月，武力衝突一觸即發，社會陷入激化對立；這場回歸以來歷時最長、牽連最廣的抗爭中，新聞工作者面對前所未見的壓力，於屈服與堅持的夾縫中掙扎。記者與主管矛盾升級。10月中，TVB新聞管理層處理「七警事件」的手法，引發新聞部記者罕有地發出公開信，表明不同意管理層的處理方式。本章所提及的事例，除特別註明外，皆發生於TVB。

### 4.1.1 消失了的人，不存在的事

做個醒目的新聞閱讀人，除了留意報道了甚麼，也要留神沒有報道的訊息。佔領運動期間，畢竟通衢大道搭滿帳篷、貼滿海報壁畫，馬路上出現教堂與自修室等景象，史上僅有，可一不可再；年輕一代的躁動不安，亦有待了解。不同崗位的TVB從業員均指出，佔領區人物故事，於平日的新聞內幾乎缺席，源自廣泛流傳的指令：由於佔領屬違法，犯法事不應報道，就算報道，亦不能「美化」。

我們不會報道這裏有自修室，不會有感動的古仔，不會有宣揚正面的古仔，好少將平靜的一面帶給觀眾。

—C.M.M.

以下是多名記者都提到的事例：

- 一位記者在報道中提及，佔領區有志願者把垃圾分類回收；上級提醒他，不要美化佔領者的非法行為。

- 有一位記者表示想報道金鐘佔領區出現「自修室」，建議遭否決。

不過，長達79天的爭議中，極少數TVB記者曾突破阻力，拍攝佔領區內較軟性的新聞故事：

- 有記者報道過一個關於父母於假期帶孩子到佔領區參觀的故事。
- 有記者拍過一個關於「連儂牆」的報道。

多位不同崗位的記者皆認為，這類故事絕無僅有，雖然最後能「出街」，亦只能於24小時新聞頻道播放，播得不頻密，而且絕少於TVB旗艦翡翠台新聞播放，24小時新聞台的收視率，大部分時間少於翡翠台的十分之一。<sup>1</sup>有記者謂無能為力，因為他們只負責在現場拍攝採訪，然後把片段傳回新聞部；新聞素材用不用、如何應用，由採訪主任決定。

一位資深記者形容，忽視「黃絲帶」聲音乃嚴重缺失，不管是支持或反對他們的行為，大批年輕一代「劏街」靜坐抗議，記者有責任讓公眾知悉他們的忿怨，此乃重要的社會現象，需要破解，也要記錄。

相對而言，有線新聞處理示威衝突的手法，有較大分別。10月9日，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因與政府談判陷入僵局，宣布發起「一人一帳篷」運動，呼籲支持者在佔領區內搭建帳篷，擴大佔領。

---

<sup>1</sup> 據TVB年報，2014年旗艦翡翠台全年黃金時間平均收視為22點，24小時「互動新聞台」黃金時間平均收視為1.4點。年報網址：<https://goo.gl/jiZl1q>。

此乃佔領運動的重要新發展，有線記者的新聞故事，描述旺角佔領區中人，派發免費枕頭，訪問了一位用700港元買床買書櫃的示威者，目的是要令佔領區「像一個家」；金鐘佔領區則出現「浴室」，有大批營幕與帳篷陸續搭建，畫面清楚交代了佔領區的景象，當中有很多具體的大特寫，包括營幕、帳篷、地蓆、枕頭、椅子、床鋪、書櫃、自修室、各式雨傘標誌、「睡眠區」與「浴室」的告示牌等，亦有訪問佔領者心情，此部分內容長近一分半鐘。<sup>2</sup>

然而，有關「擴大佔領」的最新發展，TVB六點半新聞沒有直接提及，到10月11日的主要新聞，記者簡略提到佔領區「多了營幕與帳篷」，「有佔據人士說為響應學聯呼籲紮營」及「人們在周末來紮營支持學生」。<sup>3</sup>畫面見到營幕，但沒有細節。

外國媒體稱佔領運動為「雨傘運動」，源起於示威者以雨傘抵擋胡椒噴霧與警棍；然而「雨傘」象徵在TVB新聞中，一直非常低調。十一國慶日，示威者於佔領區舉辦「撐起雨傘」活動。TVB於六點半新聞用活動作畫面襯托，講述僵局概況，並無具體報道該活動，「雨傘」象徵意義亦絕少提及。有線新聞則用了25秒報道，旁白形容為「一片傘海」、「撐傘三分鐘」，也解釋活動是為了「鼓勵香港人加油」等。<sup>4</sup>

10月23日，一群攀山愛好者於香港地標獅子山頂，掛起寫上「我要真普選」及有雨傘標誌的巨型直幡，於市區多處能看到。「獅子山精神」為近年管治階層愛用的符號，喻意六十、七十年代

<sup>2</sup> 見2014年10月10日，有線新聞台七點半一節頭條。

<sup>3</sup> 見2014年10月11日，TVB新聞六點半新聞頭條。

<sup>4</sup> 見2014年10月1日，有線新聞台七點半一節第五個故事。

「獅子山下」同舟共濟、辛勞、忍耐、堅毅的「香港精神」，也隱含著舊日「和諧」的想像與嚮往；「我要真普選」直幡顛覆了政治符號的解讀。

TVB六點半的主要新聞時段中，報道內文長37秒，其中31秒引述警方及漁農自然護理署回應，畫面則於山腳遠距離拍攝，放於第二節新聞。TVB處理方法，重點在掛直幡是非法行為，沒有掛幡者心聲，大部分篇幅用於政府回應。有線新聞七點半時段的故事，長90秒，較突出懸掛巨幡的示威方式前所未有，予攀山示威者解釋他們的目的，也有政府回應。<sup>5</sup>

另一事例，發生於10月1日國慶酒會，一位嘉賓在典禮場地內舉起黃傘，靜默抗議。有線新聞在相關報道中提及事件，並訪問了舉傘者，<sup>6</sup>但TVB當天的六點半新聞只報道了酒會，無報道有人撐傘。<sup>7</sup>

本研究訪問之有線新聞記者，絕大部分皆認為，他們在佔領運動中的採訪，礙於人手及時間急逼，並不算突出，有關佔領者的報道略嫌平淡，每天兵荒馬亂，沒有時間詳細規劃；相對而言，TVB新聞以「非法」為理由，略去不少和平示威、雨傘符號的畫面及故事；既不能「美化」，剩下能報道的，多是混亂與不安。「前提預設·先發制人」的結構性審查行徑，明顯影響內容。

---

<sup>5</sup> 當日，有線新聞以電話訪問了這群隱名的攀山愛好者，談直幡之意義，並播出了攀山者在Youtube公開的掛幡過程。新聞故事全長90秒，在晚上七點半的主要新聞時段中，有關片段出現於新聞片首的預告(teaser)，並於政治新聞中排二條；90秒時間中，有30秒警方與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官方反應，表示郊野公園內掛標語違反規例。

<sup>6</sup> 見2014年10月1日，有線新聞台七點半一節之二條。

<sup>7</sup> 見2014年10月1日，TVB六點半新聞第七宗新聞。

### 4.1.2 暴力、混亂、內訌

混亂與越軌行為，一向是新聞傳媒追逐的元素，畢竟「罕有」、「異常」、「衝突」乃公認的新聞價值，用畫面說故事的電視新聞，更是主菜。

2014年9月26日晚上至27日、佔領運動爆發前夕，當夜示威者爬進政府總部封鎖範圍內的一個廣場，與警方衝突竟日，有線與TVB傍晚的主要新聞同樣剪輯了共六、七分鐘的衝突場面，但鋪陳主次有明顯分野。

當天傍晚，緊張氣氛稍為緩和，但僵局持續，政府總部門外仍坐滿示威者，等待進一步行動（事後孔明：一天後，事態演變成全面衝突），TVB的現場直播在新聞編排中排第四，用一個高位鏡頭，見政府總部門外一批示威者於警察防線前靜坐，畫面平靜，主播用十秒時間描述情況，簡單講述學生領袖謂要等待政府回應，否則不會離開，亦引述政府聲明呼籲市民，特別是年輕學生，不要參加非法集會，<sup>8</sup>並無訪問任何示威者留駐一天不願離開的原因。

有線新聞以頭條報道衝突最新情況，記者現場直播其觀察，故事長近兩分鐘，畫面描述警民對峙，示威者帶備眼罩、保鮮紙、雨傘等防禦物品，抵擋胡椒噴霧，大有山雨欲來之感。報道中訪問了兩位「留守」的人，一位學生謂「人人都說擔心，香港不會有改變……」，及一位男士說「我們身為老人家，不出來做些事，此生有憾……」。

量化的內容分析可見，TVB六點半新聞仍有顯著篇幅報道佔領者聲音，但一部分乃參與者內訌、爭執、分裂的描述。例如「佔領

---

<sup>8</sup> 見2014年9月27日，TVB六點半排第四之新聞故事。

中環」應否早些啟動(9月27日)、爭論誰領導佔領運動(10月1日)、應否移走部分路障及誰有權設立糾察隊(10月2日)、政府總部辦公室入口應否堵塞(10月3日)等等。即是說，好一部分TVB有關示威者的聲音，闡述了他們內部分歧、對罵的場面；有線新聞也有類似的角度，但不及TVB具體。

報道的微妙用語，亦包含一些未必正確的前設。10月22日，矚目的政府與學生對話完結後一天，TVB六點半新聞的頭條導言說，「政府與學聯完成第一次對話，但佔領人士仍未撤離，在旺角彌敦道與金鐘夏愨道等幹道，仍然被佔據」。微細的字眼如「但」及「仍然」，前設了學生於對話後應撤離佔領區；事實上，學生從無承諾對話後會撤離，政府於對話中亦無提出任何具實質意義的解決方案。

相反，警察施用武力之場面則不予放大。幾位記者皆指出，一些警方使用武力的鏡頭，例如推撞無反抗能力的示威者等，在剪輯過程中被刪短，原因謂不應強化及激化情緒。

諸種編輯判斷，正是「重劃禁區」的結構性審查效果。示威者佔路違法，被劃為「越軌」行為，不屬「認可爭議」而不予報道；即使報道，也多刻劃其暴力、內訌、混亂的一面，平和、理想化的一面，理所當然地遭剔除。此消彼長，佔領者被塑造成麻煩製造者，其行為被「置於前台」(foregrounded)，成為亂局與滋擾民生之源；政府的責任隱沒，或被塑造成解決問題的動力，忽略了導致衝突激化之大背景。

假設換上另一種情景：有大賊闖進金鋪，他們不搶劫、不離開，還在金鋪開派對、吃火鍋、溫習功課、搞環保回收、開研討會、搞藝術展覽，而且歡迎記者採訪、並表示會承擔法律責任，負

責任的新聞工作者，應該會冒險犯難，仔細看看這些人在做甚麼吧。再者這種違法行為，警察袖手不管幾十日；而且「大賊」不是十人八人，是十萬八萬人。歷史大事，掀動全城，縱使有違法成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教人吸毒，求真的傳媒，理應全方位了解這些人的訴求。何況，他們不是大賊，都是普通市民；也不求財，只是求權利。

這並非說聚焦於混亂、內訌的新聞角度有錯，無疑內部分裂與抗爭路線之爭，成為公民社會及反對派陣營往後發展的突出爭議；強調內訌分裂與違法亂紀，同時低調處理警方使用武力，較少報道示威者心聲，綜合而言，報道傾向有利建制。

### 4.1.3 辭彙之語言藝術

人們問《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的老牌監製 Don Hewitt：你如何做新聞？他生前的一句名言，就是“tell me a story”，簡單而言，就是抱著「說故事」的心態，尋找新聞、報道新聞。

「故事」有趣味，有語境，有起伏，容易記得，方便流傳，能有效溝通，這個道理記者都知道。新聞人常掛在口邊：「你隻古仔呢？」新聞界甚至不會稱呼一宗新聞為「新聞」，而是「古仔」；只是在僵化運作中，本應生動活潑的「古仔」，在很多記者編輯眼中，淪為「一條稿」，淪為如流水作業式車衣工序裏的小配件、一件枯燥的工業製品。

社會各方勢力，為了爭奪話語權，亦不忘透過媒介說故事，從每次特首選舉可見一斑。例如當年曾蔭權競選特首，大賣「我會做好呢份工」，塑造親切、市井的「香港仔」故事；梁振英推出「紮腳

阿媽」的基層出身奮鬥故事；曾俊華在選舉中則訴說留學美國受歧視，燃起愛國心的故事。又如「獅子山下」故事，政府利用它叫人放低心中矛盾，回憶美好時代，同舟共濟，埋頭苦幹。然而，眾聲喧嘩、時間緊逼之間，說故事也略嫌太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把故事化成一個詞語、一個標記、一個口號、一個符號。

佔領運動也是一場符號與話語的爭奪戰，化約至最基本的事件稱謂中。示威者強調是「雨傘運動」，雨傘是平常家居用品，平淡的日常，卻代表著每個個體對強權的抗爭；政府一方，則強調示威「非法」，擾亂秩序，影響平民百姓生活。新聞辭彙的選擇，牽涉事件之定性與分類；反覆使用，潛移默化，自有其影響力。從佔領運動第一天開始，新聞從業員在每一稿件中都須決定：如何形容這場規模龐大的群眾事件？由於佔路範圍最後分布於金鐘、旺角、銅鑼灣，「中環」只佔一小部分，原初之「佔領中環」名稱明顯不適用，如何「命名」才合理？

表15綜合了佔領運動期間，TVB新聞容許記者編輯使用及不鼓勵使用的字眼。資料來自深度訪談，多位被訪者互相印證，字眼於內容分析中核實。記者表示，這些源自管理層的用字規範建議，並無白紙黑字，多於採訪部口耳相傳，亦於記者通訊群組內流傳。

西方傳媒創造並常用的「雨傘革命」，香港主流電子傳媒均無採用，事實上該場社會運動，並無「推翻政府」的「革命」意圖。各台有時會用「雨傘運動」，多數用「佔領運動」。TVB新聞絕少於記者旁白中用「雨傘運動」，「佔領運動」亦少提，多數使用「佔領行動」。有資深記者稱，曾聽過高層編採人員傳達，「運動」意味著正義行為，有「美化」之效果，故應用「行動」。

佔領運動最初由三位學者及社運人士發起，組織全名為「讓愛



表 15 TVB 於佔領運動中的辭彙選擇

不鼓勵使用之字眼	慣常使用的字眼
佔領運動	佔領行動
雨傘運動	佔中
佔中三子	佔中發起人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佔中
和平佔中	佔中行動
佔領人士	佔據人士 聚集人士
留守	留在、留嚟度
(警察)用警棍打人	(警察)揮動警棍驅散、驅趕
清場	清障

與和平佔領中環」，部分傳媒如有線新聞簡稱三人為「佔中三子」，TVB新聞不用此稱謂，叫他們「佔中發起人」。有TVB記者說，高層編採人員認為「三子」之「子」，有正面的「君子」之義，不用。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和平佔中」，組織名稱亦是問題所在。TVB新聞用「佔中」或「佔中行動」，略去「和平」字眼；有線新聞則照用「和平佔中」。

如何形容通宵達旦靜坐「劏街」的示威者，亦有巧妙之選擇。大部分電子傳媒以「佔領人士」形容，TVB新聞用「佔據人士」。「佔領」有主動進佔的含意，而「佔據」較側重「佔有一些不屬於你的東西」之意味。TVB也不用示威者「留守」的字眼，只容許用「留在」現場的說法，原因是「留守」意味一種「守衛」的責任。

描述警察行為之用字亦有爭議。在TVB，不說「警察用警棍打示威者」，要用「揮動警棍」或「驅趕」等字眼。運動期間，警方多次

試圖驅散示威者開通路面，字眼用「清場」還是「清障」（即清理障礙物），雖然表面意義差別不大，但反映了新聞機構如何跟隨官方用語。10月17日「旺角黑夜」衝突中，警方清理旺角佔領區一段主要路面，重新開放通車，官方用了較低調的「清障」。有線新聞中當天有示威者質疑此警方用字；而TVB新聞在旁述中採用官方「清障」字眼，不用「清場」。

其他電子傳媒有時會採用示威者一方的用字，例如Now新聞於其大事回顧節目中，用「遍地開花」字眼，形容佔領行動擴散至市區不同範圍；有線新聞則常用「和平佔中」及「留守」等辭彙，亦曾在旁述中採用泛民主派形容人大831政改方案的「落三閘」等用字。

Now新聞及有線新聞的受訪者均表示，採訪部無嚴格及統一守則限制辭彙用法，由記者編輯決定，合理即可。由字詞用法可見，採用何字，據何準則，或不設準則，都是策略選擇；「絕對中立」只是迷思，辭彙選擇不能迴避，一有選擇，就已反映新聞機構的基本判斷及取態——採納官方還是抗爭者的話語？或是兩者皆用？標準是否一致？——都清晰易見。

訪談中，一眾TVB前線記者難忘佔領運動採訪的委屈。佔領區內，特別是旺角，常被激進示威者以粗言穢語辱罵，指TVB新聞偏頗；回到採訪部，又承受上級莫大壓力，說他們報道偏向佔領群眾。

佔領運動十多天後，潛藏的衝突終於爆發。

#### 4.1.4 七警事件：傳說中的百分百中立

2014年10月15日，龍和道大衝突後，TVB早上6時30分時段的新聞，播出了「七警打人」片段。

大約早上6時35分，TVB新聞部一個電話響起。

這個時分，那個電話，只有一個人會打來。

採訪室當值記者編輯呆了一呆，最後有人拿起電話……

「七警事件」發生於佔領運動對抗激化的關鍵時刻。10月15日凌晨，示威者首次佔領交通要道龍和道，警方凌晨增援反擊。嚴重衝突後，TVB新聞攝影師拍攝到七名警員將一名雙手已被塑膠帶捆綁的示威者曾健超帶到公園一處「暗角」，拳打腳踢四分鐘。<sup>9</sup>該名示威者後來被發現較早時曾於高位向一隊警員潑液體。

TVB清晨時分播出片段後，新聞部主管不滿描述，要求修改，後來新聞片段中有關打人的描述，包括「暗角」及「拳打腳踢」等字眼被刪去，影像則維持不變。28名TVB記者及採訪主任率先聯署公開聲明，不滿管理層編輯決定，<sup>10</sup>後來新聞部記者、編輯、主播、編導、監製共百多人加入聯署。當日負責寫稿及審稿的當值採訪主任和編輯遭調職，不久後辭職。表16總結爭議經過。

「七警事件」爭議中，TVB管理層、記者、新聞從業員組織皆動用「專業」、「客觀」等字眼，說明己方理據。專業規範詮釋空間大，是行事標準，也是爭逐之話語；事件中，管理層的處理方式及理據，多處可運用結構性審查框架作分析：<sup>11</sup>

<sup>9</sup> 《蘋果日報》及Now新聞亦拍攝到事件經過，但以TVB新聞的片段最為完整清晰，及最早引起廣泛關注。爭議片段及旁述見：<https://goo.gl/oVqMIP>。

<sup>10</sup> TVB記者聯署公開信見：<https://www.facebook.com/tvbnewsopenletter/>。

<sup>11</sup> 細節於深度訪談中得知，部分可於洩漏之錄音中核實，本研究曾發電郵及短訊等，要求TVB管理層接受訪問，均未獲回覆。洩漏之會議錄音見網址：<https://goo.gl/E6N00V>。

表 16 TVB「七警事件」爭議時序

日期及時間	事件
2014年10月15日	
6:00 am 及 6:30 am	「七警事件」播出，旁白：「一名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由六名警員帶走。警員將他抬起，帶到添馬公園一個暗角位，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整個過程歷時近四分鐘。」打人片段長 60 秒。
大約 6:35 am	新聞部總監致電採訪部，要求修改旁白用字。一位當值採主致電另一名主管，商討如何改動稿件。
7:00 am 至大約中午	「七警事件」新聞片段在不同新聞時段繼續播出，但「暗角」字眼及形容「拳打腳踢」等旁白被刪去。畫面及片長並無刪短，與早前播放的一樣。
大約中午	警方發新聞稿指懷疑有警員涉及使用過分武力後，「七警事件」新聞片段原先刪去旁白的地方，加上了一句：「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
6:14 pm	首批 28 位 TVB 新聞工作者，包括記者及採訪主任，在 Facebook 發表公開信，表明不同意管理層處理手法，其後共百多名記者、編輯、編導、主播、監製等加入聯署。公開信中，聯署人對事件之「處理手法與公司管理層意見分歧，特此聲明，表示遺憾」，又「期望前線和管理層均恪守專業，堅守原則，以事實為本，為公眾帶來準確客觀及全面資訊」。
6:30 pm 新聞	「七警」新聞片段經多次更新，六點半主要新聞中，版本再加上經改動的打人描述：「警方其後帶走一名示威者，他雙手被綁上索帶，之後被抬起，到添馬公園一個地方，期間懷疑警員毆打他，包括揮拳及腳踢動作，整個過程歷時近四分鐘。」
大約 9:30 pm	TVB 發表聲明回應，表示「尊重及支持新聞部主管的專業和編輯自主」，解釋由於「可能有法律訴訟，新聞部主管決定用一些較客觀字眼，以免影響日後法庭審訊，妨礙司法公正」，並重申「電視新聞報道最重要是真確、客觀中立和公正持平」。 <sup>12</sup>

<sup>12</sup> 見 2014 年 10 月 15 日《明報》，網址：<http://goo.gl/OmX3nm>。

10:09 pm	香港記者協會及另外六個新聞組織發表聲明，促請TVB新聞管理層尊重記者的專業報道，恪守專業原則，切勿自我審查；同時呼籲，不要對有關記者秋後算帳。 <sup>13</sup>
10月16日早上	新聞部管理層召開大會，與記者、編輯、採訪主任討論事件。
10月17日	會議錄音被匿名放上Youtube。TVB總經理向員工發出電郵，指洩漏行為「卑鄙和懦弱」，不排除有個別員工「被外間人士利用，意圖破壞公司運作和聲譽」。 <sup>14</sup>
10月29日	撰寫第一個版本「七警」稿件的當值採訪主任，被調職至新設的「首席資料搜集員」職務。當天早上負責最後審稿的當值編輯，後亦被調往處理編排歐洲衛星新聞時段。
2015年4月及6月	TVB新聞部憑「七警事件」之六點半新聞版本，先後於蒙特卡羅電視節及Edward R. Murrow Awards奪得新聞獎項。
2016年4月	一年半後，最初發起聯署的28名記者，已有14人因不同理由辭職。

**強力平衡：**事後的新聞部內部會議中，新聞主管問憑甚麼「說（警察）刻意拖他去暗角拳打腳踢？」，<sup>15</sup>又問「你是那幾個警察心裏那條蟲？」，又質疑記者要問過當事人才能這樣說。「持平」之專業守則，要求記者讓被指控者有機會回應，新聞主管認為行文用字指控警察「特登」（刻意）打人，需要「回應」。問題是，當事人不可能回應，或不回應時，如何下筆？更重要的爭議：「事實」應否平衡？又如何平衡？

<sup>13</sup> 聲明見網址：<http://goo.gl/TLtsZF>。

<sup>14</sup> 見2014年10月18日《南華日報》，“TVB Backs News Chief’s Handling of Police ‘Beating’”。

<sup>15</sup> 稿件旁白並無「刻意」的字眼，會議中所提到的「特登」（刻意）屬主管對稿件之詮釋。

新聞管理層及部分聯署公開信的記者認為，「涉嫌使用武力」字眼較客觀；但大部分記者反對加入「涉嫌」或「懷疑」字眼，因為警察的拳打腳踢動作，在放大及「推光」畫面後，其實看得很清楚，打人事實無誤。事實毋須平衡，假如用上「涉嫌」字眼，便是模糊了事實。有TVB記者指，若畫面清楚可見仍狐疑不信，那麼眾多警察施放胡椒噴霧的片段，都要加上「懷疑」字眼。

如何「不偏不倚」地選用中性字眼，也是爭議的焦點。管理層認為「拳打腳踢」及「暗角」用字不客觀。四字詞「拳打腳踢」在一些字典中有「毒打」的意義。有參與事件的從業員認為，「拳打腳踢」只有名詞及動詞，乃客觀及經核實後的事實描述。管理層認為「拳打腳踢」有負面意義、不中立，又牽涉到「中立」的理解。負面的事件，為何要用「中立」的詞語去描述？我們不會用正面的詞語去描繪負面事件，同理，我們也不應用「中立」的言辭去描述負面事件。以負面字眼描述負面事件，才是恰如其分，才叫公道持平。「拳打腳踢」最後版本改為「懷疑警員毆打他，包括揮拳及腳踢動作」。有TVB記者認為，兩套用字無分別，本來就不需大費周張改動。

另一爭議字眼「暗角」，管理層亦認為是主觀判斷，且有負面含義。負責記者認為，該形容詞乃協助觀眾理解現場環境，該角落確實是四周最黑的一角。「暗角」一詞最後改為「一個地方」。

**龍門飄移：**多位TVB記者指，「七警事件」中，管理層要求的事實證據，達到「法庭標準」，屬於「龍門任搬」的不一致標準。他們指出，很多時閉路電視拍攝到的犯罪片段，不會使用「涉嫌」字眼；2016年大年初二凌晨的「旺角騷亂」，TVB新聞部就使用了「暴徒」、「暴亂」等負面字眼。至於管理層稱用字要小心，是為免影響日後法庭審訊、妨礙司法公正，記者們則認為，當事實確鑿、有片

為證，根本不須考慮法庭審訊或警察形象，況且當時事情剛發生，未有人被捕，亦無人遭落案起訴，不可能影響審判公正。「七警事件」中，選擇字眼標準忽然嚴格，客觀的效果，正好減輕了對警察形象的衝擊。

**積極不對焦：**儘管TVB新聞已把「七警事件」及後續之各界反應，作頭條處理，但一眾記者指出不尋常之處：片段為全行業最清晰及齊全，但新聞旁述並無特別指出「本台拍攝到……」等字眼，非常謙遜。

亦有記者指，既然打人全過程都有片為證，應該用後期製作放大片段，「推光」畫面，逐秒分析，指出每個動作，才能讓公眾看清楚事實，免於停留在「看到動了手但看不清是否真的打中」的爭論。<sup>16</sup> TVB當天播出的畫面，沒有「推光」；但片段後來於法庭作呈堂證供時，曾經「推光」，增強了光度，讓人看得較清楚。<sup>17</sup>

有記者指出，以往激進反對派在立法會內投擲物件，TVB新聞曾把投擲的物件以後期製作，加上紅圈突出重點，協助觀眾於電光火石的一剎看得清楚。「七警打人」新聞片段於早上數小時旁白被刪去，由於畫面較暗，觀眾不易理解，客觀效果正是淡化了事件。

**人事操控：**「七警事件」顯露管控系統的威力。TVB管理層於強大的公眾壓力下不為所動，並於短時間後，把當天早上負責寫稿及審稿的高層員工調職。一位採訪主任變成「首席資料搜集員」，據記者所言，新職工作量極少；另一位多年來一直主理晨早新聞的編

<sup>16</sup> 一位TVB新聞主管曾於翌日與記者會議時表示，該片段「影像上有踢，但  
是否踢中，我們看不清楚」，並以此為理由刪去爭議的描述。會議泄漏的  
錄音記錄見：<https://goo.gl/E6N00V>。

<sup>17</sup> 見七警案判詞第149-151段，網址：<https://goo.gl/cTT0Kn>。

輯，被調往晚間時段，負責編排新聞，向歐洲觀眾發放。這兩位高級人員不久後辭職。事件發生一年半後，28位發起聯署公開信的記者，當中一半因各種理由，已呈辭離職。<sup>18</sup>

一眾TVB受訪者皆認為，「七警事件」是新聞部的分水嶺，大批積極主動的記者意興闌珊；離職潮後，採訪部聘請大量新人。「厚重制度化」(thick institutionalization)現象亦出現，透過人事編排，部分記者及採訪主任，工作受到更嚴密的管束，任何新聞時段均不能全盤決定新聞編採，背後有受管理層信任的上司監控工作細節；採訪部權力重組，只有少數人有權編排新聞主次。這些強化了的規程成為運作的新定律，儘管最激烈的衝突過去，新增的管控措施，一年多後仍大致維持。

TVB支持新聞部主管的聲明，亦可圈可點。聲明所講，乃尊重及支持新聞部主管的專業和編輯自主，並非支持新聞部員工或記者的專業，闡明了所謂「專業」，根據TVB聲明是「新聞部主管的專業」；所謂「編輯自主」，根據TVB的理解是「新聞部主管的編輯自主」。一位TVB年輕記者說，他學會了不要對抗。

明知老闆立場如此鮮明的話，下面的人又怎會……  
除非你想跟他硬碰硬，否則你不會堅持去做一些他認為不對的事，如果你這樣強烈，一早就不在這裏。

—C.M.M.

---

<sup>18</sup> 從深度訪談中得悉，辭職理由各有不同，部分因不滿採訪部大環境，非直接因為七警事件；最少一名資深從業員表示，辭職完全是個人發展理由。



佔領運動TVB新聞準則之案例，可見規範系統的詮釋與執行，主動權在高層管理一方，主管級人員可以重新定義認可爭議的範圍，預設前提，先發制人，排除被視為「越軌」及「非法」的活動，名正言順減少報道；亦可透過規範辭彙選擇和用法，設定框架，定性事件。新聞編採人員固然可以提出異議，但從「七警事件」可見，他們付出了沉重代價；主管級人員運用管控系統，調配人事，加強監督，於必要時直接干預，前線記者難以於制度體系中抗衡。

兩年多後，七警被控「襲擊造成他人身體傷害」罪名成立，各被判入獄兩年。TVB新聞片段成為主要呈堂證供，判詞中，法官信納TVB片段真實、準確及完整。<sup>19</sup>

---

<sup>19</sup> 見七警案判詞第164段，網址：<https://goo.gl/cTT0Kn>。

## 4.2 中國採訪——大海航行靠舵手

作為一個新聞人，中國新聞有趣過做港聞，老實講，一個泳池游水同大海游水的分別。你報道的東西，涉及十幾億人，國家的走向，可能影響全世界，不能貶低香港，但香港只有幾百萬人口。

—R.X.T.<sup>20</sup>

香港屬中國一部分，但香港記者卻被官方歸類為「境外記者」。香港地理上位於中國邊陲，兩者卻有涇渭分明的界線；文化上同種同文，卻各自走過相異的歷史軌跡。一國兩制，造就香港記者採訪中國新聞的獨特地位；儘管近年中國內地收緊新聞控制，敢言者遭噤聲、陷獄，香港記者大致上仍能於內地自由行動，尋找新聞線索，報道大時代轉變與敏感的人權問題。追訪異見人士的訪問片段中，往往見到的，都是香港電子媒介的「咪牌」。

你定位是甚麼，就是大陸無辦法做的新聞我們去做嘛，我們拿著香港身份證，我們不會坐監。—T.C.Y.<sup>21</sup>

既認識內地文化，語言無大障礙，加上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而且內地經濟發展飛速而制度建設落後，重重矛盾待挖掘剖

---

<sup>20</sup> R.X.T.是一位中國採訪的資深記者。

<sup>21</sup> T.C.Y.是一位有線中國組的年輕記者。

析，香港媒介理應發揮優勢，投放資源做好中國新聞，但這「空間」，香港傳媒不見得積極開發。大部分電子傳媒並無固定專責的「中國組」，駐內地記者部分更非常年輕，缺乏經驗。

本書第二個案例「中國採訪」，審視新聞機構在資源操控與人手調撥的手段，如何塑造新聞面貌。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令人矚目，制度建設之落後亦令社會問題日日新鮮；對記者而言，中國既是新聞「富礦」，也是一個地雷陣，隨時觸碰禁忌底線。中國記者常陷於兩難邊緣：採訪不採訪、是進是退、如何規避風險又不辱使命？透過「中國採訪」之案例可清楚看到，新聞機構的管控系統如何透過資源分配、人手安排、培訓、新聞選材等不同手段，看似平淡日常，實則主宰新聞的整體面貌。

香港廣播新聞機構中，只有有線新聞常設具固定人選的專責中國組，共有一位主管及11名記者。其他媒介跑中國的記者，通常叫「中國線」記者，他們只於駐北京或廣州時，才專責報道中國新聞，每一次輪調約為兩至三個月；回港後，多數重拾香港採訪。

有線中國組資源人手為全行之冠，當中有三人擁有超過20年採訪經驗，其對手TVB之記者亦認同，兩台的中國線記者「相差幾班」（非同一級數）；競爭中，有線新聞「贏硬」。2013年，有線新聞增加中國組人手，重組節目，星期一至五黃金時段，新增《有線中國組》每天十多分鐘中國新聞，並直接以「有線中國組」作為品牌，命名新節目。

表 17 各電子媒體中國採訪之編制

媒體	中國組編制 <sup>22</sup>	專責中國組	定期節目/ 環節	駐內地記者
有線新聞	12	有	《有線中國組》 星期一至五 每天約 18 分鐘	2 駐北京採訪隊 1 駐廣州採訪隊
TVB 新聞	3 加輪換之駐外記者	有	《中國新聞》 星期一至五 每天約 8 分鐘	1 駐北京採訪隊 1 駐廣州採訪隊
Now TV	駐外記者輪換，其中二人較常駐北京	無	《首都專線》 每星期一次 約 3 分鐘特寫故事	1 駐北京採訪隊 1 駐上海採訪隊
香港電台	4-5 駐北京記者輪換	無	《透視大中華》 每月兩次特寫故事	1 駐北京記者
商業電台	5-6 駐北京記者輪換	無	無定期環節	1 駐北京記者

#### 4.2.1 資源調配：承傳經驗 vs 自斷經脈

從上表可見，有線中國組人手較充裕，更長期派駐兩隊攝影隊駐京，即兩位記者及兩位攝影師；記者一方面採訪每天北京的時政新聞，同時留有彈性，若其他省份城市有突發事故，可立即調動，無後顧之憂。駐外記者輪調完畢回到香港，仍然繼續負責中國採訪，故能專注工作，建立長期人脈關係。

留在香港的中國組記者，不論資深資淺，一律參與每天例會，討論新聞及商討當天議題。《有線中國組》節目設計，不用專職主

<sup>22</sup> 有線新聞 12 人皆專責中國新聞，記者輪替駐北京及廣州，回到香港亦繼續主理中國新聞。TVB 新聞亦有「中國組」，但只有一名編輯及兩名留在香港負責重新包裝內地新聞的編輯；駐外記者非固定，他們只於駐外時，才算為「中國組」一部分。香港電台有四五位記者較常輪換駐京；Now 新聞有兩人較常駐京，其他時段駐京記者通常較年輕。

播，訓練記者登場做主持，文稿自訂。中國組資深記者R.X.T.說，這些流程會增加工作量，但能達到訓練及建立記者自信之目的。

他不是讀稿機器按稿讀，人家寫甚麼就讀甚麼，他自己寫，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語言講出來，他的自信感強很多。對記者的進修很有幫助，從中學習，這是我們最主要目的。  
—R.X.T.

有線中國組在2000年代中期只有五人，逐步擴充成一個主管加11名記者；人手相對充裕，不須每天「追火車」、「填cast」，騰出空閒時間構思角度。

相反，TVB新聞的中國組卻於2009年開始，逐步收縮及拆散。TVB早年有一群較專注採訪內地新聞的記者，但幾位組員分別遭調職、升職或辭職後，有關中國新聞的策劃與駐京記者的輪換，權力集中於管理層手中，幾位曾做過TVB中國線記者都不明白為何如此。

大家都好奇怪，為何老闆不找一些有相當份量的人來主理對外事務，培養中國事務的記者……是否不重視？不重視培訓記者？  
—A.K.Q.

2014年初，TVB在24小時新聞頻道加添了定期的「中國新聞」環節，星期一至五晚上8時黃金時間播出，每晚約8分鐘。TVB中國新聞團隊由一位具有十年中國採訪經驗的首席記者領導，下屬只有兩位年輕的編輯，另加每兩月輪換的駐廣州及駐北京記者。這團

隊負責跟進每天的中國新聞，與其他新聞機構一樣，新聞靈感多源自內地一些較開放的新聞網站，如「財新」或「澎湃新聞」等。其他廣播媒體沒有常設「中國組」；香港電台多名資深記者有豐富中國採訪經驗；Now新聞由於記者流失，中國線記者資歷甚淺。

記者的判斷力源自經驗與承傳，其資歷直接左右採訪成敗；「李旺陽事件」背後的採訪故事，說明周詳策劃與記者經驗，於中國採訪非常重要。

李旺陽於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後，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輾轉被囚21年，既聾又盲，患有心臟病及糖尿病，是異見分子中陷獄最長一人。2012年5月，他於服刑期滿後一年，接受有線新聞訪問，誓言不會後悔，「就是殺頭我也不回頭」。李旺陽第一次接受訪問，也是最後一次。訪問播出後四天，李旺陽死於湖南邵陽市他所住的醫院病房。他倚在窗邊，頸項纏繩；邵陽當局最初宣稱李旺陽自殺，但幾天後改為「意外死亡」。李旺陽之死在香港引起極大迴響，過萬名市民遊行，認為李旺陽「被自殺」。

籌劃採訪李旺陽的記者K.S.L.有16年中國採訪經驗，長駐廣州9年。他回憶，每年六四事件周年紀念，他們都會做專題報道；2012年初，他開始構思：

2012年初，有想法，有無一些人受到很大迫害，是我們不知道呢，一班朋友談起，剛好有一個朋友認識他，他是李旺陽的朋友。  
—K.S.L.

K.S.L.透過三層聯繫人，接觸到李旺陽的妹妹。李旺陽朋友的朋友則到訪廣州，直接見面安排細節，並確認4月可以做訪問。他

們用了兩至三星期安排接應及避開國安監聽的溝通方式。K.S.L.於5月21日離開廣州到達邵陽，一到埗立刻拍攝相關文件；由於知悉國安人員的上班時間，他們在清晨與李旺陽做了一個簡短訪問，並於早上8點前完成，立刻回程。

不能拖，因為會好快給人知道（行蹤）。 —K.S.L.

K.S.L. 24小時內完成任務，訪問於六四周年紀念前的6月2日播出。能完成這項艱鉅的採訪，有幾個先決條件：(1) 有新聞觸覺，了解事件背景，洞悉甚麼是舊新聞，才能構思新角度；(2) 需要有足夠線眼，協助邀約被訪者；(3) 消息提供者要信任記者；(4) 消息提供者亦須信任電視台，信任源自電視台的信譽與往績；(5) 有充裕時間籌劃，不能急就章，更須一早計算，在六四敏感時分國安戒備前完成，否則到時保安嚴密，無機會接觸；(6) 需要鉅細無遺的策劃，避開國安監視，要懂得成熟地運用通訊新科技。

K.S.L.長駐廣州9年，自能建立關係網，連繫知情人士，建立信任，李旺陽的訪問才有可能成事。這些特質，正好是新記者所缺。

從前，有機會「駐北京」被視為「榮耀」，代表新聞主管認同記者獨立工作的能力；但近年，駐外的崗位往往被主管視為讓記者嘗試獨立工作的訓練場，只有一兩年經驗的新記者，也有機會被派駐北京廣州，任他們自生自滅。一位具十多年中國採訪經驗的記者W.M.B.留意到，有些新記者連最基本查找當天官方活動的辦法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內地辦公時間，中午致電官員，奇怪無人接聽，不知是午膳時間。W.M.B.亦發現，一些記者採訪維權律師，視他們為一個評論員，而非一個建立長久關係的朋友或消息來源；

W.M.B.引述一位內地名記者私下講述對香港記者的觀感：

她曾說：你們香港記者真的奇怪，來到駐北京，只會天天同香港記者自己人吃飯聊天，她說，你們如此難得上來，全世界記者都在，你不同別人打交道，認識一下外國記者，或其他人。 —W.M.B.

一位曾於TVB工作的駐外記者有這樣的心態：

我不了解中國國情，自己是港燻，普通話又不好……我自己要求駐京，想學習、有新挑戰，我的確不熟悉國情，全行都是這樣，煮到嚟就食（見步行步）。

—A.C.B.

有線中國組相對較重視培訓和傳承，他們一樣聘請新人，但新記者派駐外地時，不會孤身作戰，會安排他們與老手一同工作，接受指導。

廣州站是很好的培訓基地，新記者會派上廣州跟K.S.L.，最近新同事，派上去給他勞役，新記者較受落，較入心。 —D.M.S.<sup>23</sup>

---

<sup>23</sup> D.M.S.是有線中國組的資深記者。



年輕組員 T.C.Y. 記得很清楚，其中重要一課，包括拍攝敏感話題時，與警察及官員周旋之心理戰術。

我們會傳授你，甚麼時候做甚麼事，何時與他周旋，何時要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何時表現出一副偽裝的軟弱，我們會教這些。 —T.C.Y.

在中國，很多官方程序皆屬機密，例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能否採訪，新記者茫無頭緒時，T.C.Y. 滿有信心，因採訪心法已有前輩傳授。

哪裏開會，哪裏等，甚麼時候等，你會做到甚麼，做不到甚麼，我會知道，但有電視台的記者，他跟我差不多年資，他一無所知，他竟然問，可不可以「扑咪」。我已接受了指導，你知道無可能「扑咪」，你連他何時開會都不知道……我收到的指示，是你不能落車，只能在會場外，用裝上茶色玻璃的車不停繞圈，但他們不知道，變得好無助。 —T.C.Y.

其他媒體一般沒有整全的培訓計劃。有剛到埗的駐廣州記者發現，辦公室的電話通訊錄久未更新。

電話好舊，有時打去，無這個人，有要事時，很狼狽。 —Y.L.N.

曾經駐北京的T.C.Q.記得，幾年前曾有一段日子，管理層新增每星期一次的北京故事，要求深度報道，講宏觀問題，但記者所得支援有限，上級甚少提議任何新聞靈感。

無人教，逼自己做，大壓力到一個地步，對住牆，  
開始欲哭無淚，覺得自己是否有情緒病有精神病，  
好大壓力。 —T.C.Q.

中國線記者都認同，自2012年習近平上場後，內地禁令日多，新聞管控愈加嚴密，記者常接觸的敢言學者、維權律師、異見人士，處境愈來愈困難；採訪環境惡劣，更需要累積經驗，由資深記者帶領，才有可能突破重重險阻。管控系統中的人事操控安排，可令經驗傳承，也可自斷經脈，對新聞內容有深遠影響。

#### 4.2.2 制約措施：破浪乘風 vs 一葉孤舟

蝴蝶拍翼，有機會引起一場風暴；簡單規律輕描淡寫地制訂，漣漪有機會變成洪流——駐外短期輪換，正是當中一例，影響直接而深遠。

絕大部分香港廣播機構派駐北京與廣州的記者，皆屬短期性質，一般每年一次，每次兩至三個月，與外國駐華記者大不同，他們一般駐外經年，成為中國問題專家。香港的駐外記者工作完畢，回到香港後，又忙於採訪香港新聞，遂難以積累經驗，不容易建立人脈關係，很多人只是過客。

短期輪換的規律，有眾多成因。管理層一方說，輪換頻密，能讓更多記者接觸中國新聞，既屬培訓機會，也不希望少數記者長年駐外，一旦辭職會造成青黃不接；主管級一方亦常指出，記者因家庭問題及各種原因，根本無人願意長駐。

部分記者坦言，「駐京」是一種「榮耀」，有這種經驗，履歷上好看一點，有就好，不在乎多寡；也有記者指出，香港地方小，近年趨向保守與內向，年輕一代不習慣離鄉背井、四海為家，很少人想長駐外地。結果，年輕、經驗淺，亦無長遠打算，促成了極端的「跟風新聞」(pack journalism) 做事方式。一位資深駐京記者觀察到其他香港駐外記者：

現在是中午飯一齊食，晚上一齊食，星期六日一齊食，是這種情況，你說這是互相監視互相照顧，甚麼都好。

—W.M.B.

「跟風新聞」之義，即不想錯過競爭者有的新聞，一種「人有我有」的心態，這種心理壓力，令很多記者認為，駐外是苦差。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最好大家一齊不要做……無的話，事件就不存在，無問題……他們無配套，亦無足夠知識。無辦法之下……不犯錯成為不少人在北京的目標與工作態度，不「預鑊」。……如果你每一天都擔驚受怕，提心吊膽，好害怕「預鑊」，你當然想快點回香港。

—T.C.Y.

T.C.Y. 認同，缺乏支援是很多駐外記者面對的痛苦問題，經驗未足而孤身在外，有些記者焦慮得連約人吃飯談天、融入當地社群的心情都沒有。

另一種制約措施是資源緊縮。一些資深記者注意到，2009年「金融海嘯」後，新聞部緊縮開支，減少出外採訪，就算駐北京廣州記者到其他城市採訪突發事件，如意外、騷亂等，都會因為人手及機票費用問題，多番猶豫。

(有突發事件) 問做不做，採主猶疑，出發時間遲，又無準則，有時考慮路程遠近，或無經濟位就不去，要省錢。

—C.P.P.

採訪突發事件，同時是鍛練記者應變的好時機；亦有記者不滿，就算獲准到其他城市採訪，但不配備電子工程人員，結果傳送新聞片的工作，落在攝影師與記者身上，他們忙於尋找強勁的無線傳輸網絡，難以分身去認真採訪，淪為「到此一遊」的報道，並不深刻。

一位TVB的駐外記者指出，公司常以「資源緊」為理由，縮減採訪人手及技術支援，但TVB實際上是眾多機構中，財政最穩健及豐裕的一家電視台。

深度訪談中，所有受訪的駐外記者都說，主管從無直接指示，有甚麼敏感話題不能做；關鍵在於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及採訪完成後有沒有機會播出。

既無新聞線眼，亦缺資源人手，很多年輕記者集中精力，採訪自己勝任的題材，例如較軟性的文化、民生、環保、科技等議題。

他們的靈感多數來自內地報章及網站，再拍攝訪問跟進；不少年輕記者認為，非政治類型的新聞也有意義，現時以微信或微博邀約訪問，直接方便。

我覺得就算經驗淺，都可以做有意思的民生古仔，例如（內地）年輕一代、蟻族、startup、科技。科技令約訪問容易了，可以清晰了解被訪者的背景，約訪問直接約。

—Y.L.N.

人手配置與資源多寡，直接影響新聞內容之種類與形式。例如災難新聞，由於環境複雜多變，很多未知因素，傳送畫面未必順暢。2013年四川地震造成二百人死亡，有線新聞及Now新聞調派兩隊採訪隊，配以技術人員專責傳送片段；兩家電視台均拍攝到救災初期，缺乏帳篷及派發藥物時之混亂場面。TVB只派出兩人採訪隊，既要兼顧傳送片段、直播，又要到災區採訪，自然分身乏術；結果只能留駐一地，未能做更深入的採訪。

2011年，矚目的「烏坎事件」上演，廣東烏坎村爭地事件，演變成大規模警民衝突，村民驅逐鎮內官員，對峙十多天，後來廣東省政府採用柔性手法解決事件，並於村內舉行公開民主選舉，抗爭者獲選為村委會主任；<sup>24</sup>資深記者M.T.L.注意到，好些香港主要媒體，到衝突後期才派記者到現場跟進，他感到奇怪：

<sup>24</sup> 五年後，烏坎爆發另一輪衝突，村委會主任及抗爭一方，多人被捕陷獄。

既然是跑新聞，無理由不一路追蹤。你過了多天才來採訪，有幾個觀察：你（不報道衝突），只報道解決方式；第二，讓人（行家）先行一步，避免受到不知從何而來的壓力，這樣只叫做「人有我有」。

—M.T.L.

其他記者亦報告，一些災難新聞，有時做一兩天，採訪隊就撤退，記者無機會多找角度深入跟進。有處理中國新聞經驗的TVB記者大體上同意，管理層重視中國發展的光明一面，例如高鐵建設、深海探險、載人航天、一帶一路等新聞，必定重視。

高層要求多講中國經驗，多於中國災難，好喜歡高鐵，高鐵一定要寫。

—K.B.T.

上層的價值觀，大中國主義，深刻信任大一統政權，影響了基本取向。

—K.L.S.

一位記者記得，汶川大地震周年紀念的專題採訪中，她收到指示，要講「救災經濟」，各種災後建設令市面繁榮。有些記者表示，敷衍一番就算；亦有記者覺得，角度「並非無價值」，可以加一兩個訪問。受訪TVB中國線記者都說，他們有完全自由度跟進敏感題材，前提是，在有限資源人力下，你有無辦法做到。結果，一些敏感題材間或於TVB出現，Y.C.P.記得，她做了一個敏感人物專訪，順利播出：

還聽到(上級)說「任你寫」，長版本真的播出，有些較「激」的bite，照樣播出，翡翠台都出到，那次比較深刻，無改過稿。

—Y.C.P.

採訪部本身缺乏支援，具體做甚麼中國新聞，主導權在記者身上，亦關乎記者本身的文化資本是否豐厚，是否具堅毅態度，不斷於艱難環境中突破重圍。但記者亦發現，容許你做不代表故事能在理想時段播出。很多記者說，一些敏感題材，無人阻撓採訪，但新聞成品往往安排於較少人收看的24小時新聞台播出，次數亦不頻密。編輯監控，不在新聞採訪階段，而在最後的選材及製作階段。

維權新聞，都做，傾向不干預你做。問題是，你做完回來，播出不播出，播出多長，如何出，角度是甚麼，播出多少次。

—C.P.P.

然而，新聞管理層總能提供「好理由」，減少投放資源於中國採訪。近年，中國官方媒體積極進取，如中新社等通訊社，向廣播媒體提供「原片」素材，即無字幕、無公司徽號的影片(clean feed)，加上內地網絡媒體的影片亦供使用，影片來源充裕。特別是大型活動，如國慶閱兵等場合，中央電視台提供多角度精采畫面，有駐京記者形容，片段「足夠有餘」，有高空鏡、有吊臂鏡頭，「拍攝一架坦克也有五六種角度」；若有群眾運動、警民衝突，也能於社交媒體未遭審查時找到。縱使各種官方通訊社片段都經過審查，但已能滿足電視新聞的基本畫面需求，很多事件毋須記者親臨現場，都有足夠片段及資料整合故事。一位於TVB工作的資深記者

說，他很佩服有線中國組的努力，但普羅大眾未必看得出兩台新聞的分別。

有線新聞的確好，深圳那新聞（深圳山崩災難），有細節，但大部分香港人不懂得看，有多少人看Cable（有線），做得多好，都是行家口碑，你去到食肆，都是播映83台（TVB互動新聞台）。 —H.M.K.

亦有TVB資深記者旁觀《有線中國組》自2013年起之節目改革，由於每天都要播出十多分鐘節目，要為填塞時段找新聞而煩惱，往日《神州穿梭》式的深入批判性報道有減少跡象：

現在的改革，天天都是《有線中國組》，日日都要你嘔出來，你如何做《神州穿梭》（深入報道）？你天天都要嘔內容出來，你只能嘔新華社、中新社那些東西。 —H.L.X.

表18整理了多家廣播機構的中國新聞，近年所獲的主要本地獎項。有線新聞及香港電台佔多數，TVB只有兩輯專題報道獲獎。獲獎記錄可窺見各台新聞部選題的取向，及同儕與社會人士的評價。



表 18 各新聞機構中國採訪近年所獲本地獎項（2012–2017 年獲獎）<sup>25</sup>

有線新聞

年份	團隊	獎項	題目/題材
2012	神州穿梭	人權新聞獎大獎	《核試遺害》
2012	神州穿梭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上訪》
2012	神州穿梭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烏坎村徵地事件》
2013	神州穿梭	中大新聞獎大獎	《李旺陽》
2013	神州穿梭	人權新聞獎大獎	《李旺陽》
2014	神州穿梭	人權新聞獎大獎	《南周事件》
2014	神州穿梭	人權新聞獎大獎	《公安也維權》
2015	新聞刺針	中大新聞獎大獎	《水貨集團運作》系列
2015	有線新聞	中大新聞獎優異獎	《前途解密三十後》第五集

香港電台

年份	團隊	獎項	題目/題材
2012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茉莉花革命，內地教會信眾被捕
2013	電台新聞部	中大新聞獎優異獎	《四川地震五周年》系列
2013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上訪之路》
2013	鏗鏘集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走在改革的路上》，有關內地志願組織
2014	鏗鏘集	人權新聞獎大獎	《我媽媽無罪》，有關維權人士子女
2014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川震家長改口風感謝國家感謝黨
2014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抗日老兵心繫祖國，冀承認身份還鄉
2015	電台新聞部	中大新聞獎優異獎	《六四廿五年》系列：天安門母親
2015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大獎	《六四廿五年》系列：天安門母親
2015	鏗鏘集	人權新聞獎大獎	《六四廿五——囚語》
2015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內地逾百人聲援佔領運動被捕
2016	公共事務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不倒的教會》，有關溫州教會鎮壓

<sup>25</sup> 只包括人權新聞獎及中大新聞獎兩個主要本地廣播新聞獎項之中文製作。

## 香港電台(續)

年份	團隊	獎項	題目/題材
2016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維權律師的苦困》
2017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大獎	《追蹤烏坎事件五周年》
2017	電台新聞部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丈夫無罪：709維權律師家屬》

## Now 新聞

年份	團隊	獎項	題目/題材
2012	Now新聞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血·礦》
2014	Now新聞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中國人民系列之舉國體制及擺脫體制
2015	Now新聞	人權新聞獎評判大獎	六四廿五周年系列報道
2017	經緯線	人權新聞獎大獎	《刀鋒上的公義》

## TVB 新聞

年份	團隊	獎項	題目/題材
2012	新聞透視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冤案》
2014	星期日檔案	人權新聞獎優異獎	《半世紀勞教》

新聞內容之面貌，層層上溯，關鍵之處，多源自管控系統的決定：人手調撥、培訓手法、駐外之輪換密度、資源投放之取捨，均有深遠啟示。有線中國組，資源配置重視培訓與傳承經驗；其他媒體則多以資源短缺、投資龐大為由，難以側重中國新聞。Now TV 一位資深從業員說，他們的更表上只有18名記者，寧願選擇鑽研其他範疇。

我們無花資源去建立中國新聞組，因為本地新聞(人手)都只是剛剛好，不是政治原因，是因為無資源做。

—A.B.N.

有線新聞有八至九成收入來自訂戶，他們付錢買新聞看，要求較高，故策略上需要製作與眾不同和高品質的新聞。

如果我們的新聞都是 more of the same，我無價值，TVB 都有做，但我做完全一樣的東西，你死得啦，我一定有些東西要能分辨，新聞（選材）與別人不同，或要做得比別人好。  
—B.Z.E.<sup>26</sup>

至於TVB，一位記者說，由於資源缺乏，大家不敢奢望。

他的初衷，要善用資源，而非建立品牌，要多些東西給觀眾看……可能被虐待得成為習慣，我不敢盼望。一路不給你足夠資源，兩個人做四個人的事，不會再想。  
—L.C.N.


管理層的策略選擇，能透過管控系統，對焦重點，安排配置人手，資源落實及設限。中國採訪之案例，清晰可見管控手法如何塑造新聞的內容。資源的多寡，決定了團隊的規模與經驗，繼而影響培訓、教導、協調與記者成長的速度；人手選擇之操控，則主導了文化資本的累積，愈是年輕缺經驗的記者，所選之題材愈是軟性；人手調配時輪換駐外時間之長短，又能影響記者的心態及工作方式。缺乏時間與經驗追蹤自家角度，只能引用官方提供的二手新聞素材，磨滅記者的採訪觸覺，報道傾向官方的框限。

---

<sup>26</sup> B.N.E.是有線新聞一位資深從業員。

內地著名財經調查記者胡舒立曾說過，其調查報道以「啄木鳥」自居：「永遠在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記者的天職，就是探索和報道隱藏的真相，真相縱使難覓，也希望盡力接近真相。

不幸地，盡力接近真相，也要力所能及、人手資源允許；騰出資源去做這些吃力未必討好之事，要有決心、有勇氣。結構性審查潛藏於看似合理的簡單指令與資源調配中，毋須直接指令，沒有直接衝突，已能令記者減少拷問權貴、無力揭露不公，削弱新聞批判性，結果當然有利建制一方。有線電視由新財團營運後，人事與資源調配分針的轉變如何影響節目內容，值得大家留意。



# 5 逆流篇

## 激流中的點滴浪花

這是一個平庸的職業，迴避矛盾，不問是非，  
明哲保身，甘當權勢的喉舌；這是一個神聖的  
職業，胸懷天下，思慮千載，批評時政，監督  
政府，溝通社會……

——楊繼繩

前數章列舉了嵌於機構的三個制度支柱中，結構性審查之架構與行徑。接下來很自然的問題：誰來制訂目標、主導採訪焦點？即是說，誰來主宰這些架構與行徑之設定？繼續層層上溯，那些有影響力的主導者，又如何受到宏觀環境影響遊戲規則之設計？個體處身洪流中，力量只如點滴浪花，又有無可能抗衡？

## 5.1 遊戲規則之遊戲規則

一場足球賽中，球員落場比賽，有眾多賽例規則；若球員希望改變遊戲規則，牽涉的是另一場遊戲，爭逐之場域在國際足協，你要發動遊說工作，與規則之制訂者周旋。遊戲規則之上，如何設計與定奪遊戲規則，誰來掌控規則制訂過程，稱之為「二階制度」(second-order institution)。<sup>1</sup>

本研究闡述，有三種因素主導結構性審查之規則設定：涉管理文化之「層級剛性」(hierarchy rigidity)，涉各級編採人員自主與經驗對比之「文化資本鴻溝」(cultural capital gap) 及涉個別機構宏觀因素之「背景依賴」(historical contingency)。<sup>2</sup>

### 5.1.1 管理文化·誰主浮沉

TVB (記者) 無機會開會，有線所有記者一齊開會，要跟進甚麼，不做甚麼，甚麼agenda，學懂了很多，成長快，感覺自由，可以討論。 —E.C.K.<sup>3</sup>

管理文化如何影響規範與管控措施之制訂與執行？比較有線新聞與TVB新聞的日常溝通管理模式，可理解權力層級之配置，如何啟動各種結構性審查行徑。

有線新聞採訪部每天規律，由早上九時半的新聞部會議開始，新聞主管與當天所有不須外出工作的各級記者、採訪主任一齊開

<sup>1</sup> 足球賽比喻及「二階制度」概念出自Holm, 1995。

<sup>2</sup> 詳細之理論架構與分析，請參閱原著論文，此處從略。

<sup>3</sup> E.C.K. 曾於兩家機構工作。

會，商討當日新聞重點，協調優先次序，討論角度。年輕記者亦須出席會議：

每朝開會，真的討論，談大半小時，有時討論到：喂，要做啦……自己在旁聽，聽到如何討論題材……學了好多，整單新聞、角度、如何包裝古仔。  
—P.Z.Y.<sup>4</sup>

不同崗位的有線新聞記者都認同，採訪部氣氛開放，上下級打成一片，新聞題材做與不做、故事主線如何、包裝技巧等，都歡迎討論。有線新聞採訪部有一個 WhatsApp 群組，名為「快樂新聞部」。

真的做得到，為「快樂新聞部」自豪，坦誠真心，不會防對方。  
—Z.L.P.<sup>5</sup>

深度訪談中，有線記者最多怨言在工作繁重、人工偏低，主管要求高，部分人心理壓力沉重，甚至害怕開會；但大部分人都同意，有線新聞是一個做新聞的地方。

新聞運作，隨時要處理突發進展，應變須快速果斷；一般大方向決策過程，都傾向集中於少數中高層主管定奪。有線新聞的「參與式」文化，對採訪部的權力層級與日常溝通，有三方面重要影響。

首先，各級人員有充裕機會互相激勵支持與交換意見，非孤身

---

<sup>4</sup> P.Z.Y. 是一位資歷較淺的記者。

<sup>5</sup> Z.L.P. 是一位資深新聞從業員。



作戰，較容易建立共識、增強決心，令新聞取態較易傾向主動進取一面。

(新聞靈感)不介意從一個問題開始，一個比較傻的問題，從報章一宗新聞講起，在同事「吹水」談天之間，好多古仔是吹水吹出來。 —Z.L.P.

然而，有線新聞於2017年陷入財困前，早已面對嚴重資源問題，資深記者不容易留住。「參與式」管理文化，若遇上能力欠奉的員工，「參與」亦徒勞；或工作繁重得連細心討論的時間都沒有，更無所謂「參與」。有線新聞於佔領運動爆發後，新聞故事相對未見突出，部分員工歸咎於分身乏術，無暇細思討論。

但於平日正常運作時，參與式的管理文化有第二個優點：年輕記者能參與新聞策劃構思過程，一定程度上擺脫刻板的「車衣女工」生涯，成長較快。

還有一個好處：公開的討論，能增加新聞決策的認受性，增強機構內各階層之互信。於其他媒體，中高層主管判斷敏感政治題材的取捨時，常遭同儕質疑自我審查；有線新聞一位資深從業員記得，採訪主任有一次決定不跟進報道一宗有關建制派人士的醜聞，這決定頗具爭議，但採訪主任在會議中鋪陳理據、公開解釋，得到同事相信這屬專業判斷，並非自我審查。

對旁觀者而言，自我審查行為與一個糟糕的新聞判斷，往往只是一線之差。參與式管理文化，令採訪部有較開放的氛圍，減少猜忌與懷疑。

相反，TVB新聞部的管理較為「指導式」，從例行會議的形式

可見巨大分野。TVB新聞部每天三次編輯大會，參與者包括最高級的採訪主任、總編輯、新聞攝影、剪接、工程部、導演組的頭目，低級的採訪主任及所有記者均不須亦不能參與，主管的意見非常主導。

高層常發表意見，用講古仔的方式，把他的看法講出來，很階級的由上而下，一級一級落。—S.X.M.

透過升職與貶職，及每天三次編輯會議的「學習」過程，高層主管培養了一批與其價值觀及尺度相近，或願意遵從這些尺度的執行者。編輯會議甚少異議聲音或真正討論，很多價值觀皆透過日常執行與慣性，變成規律，大家習以為常。上面引述這位資深編採人員記得，有次被一位新記者提醒：那記者問他，是否領導人外訪一定要寫？他才猛然醒覺，很多規則都被無意識無反思地執行，而自己渾然不覺。

大部分TVB新聞工作者形容，採訪部層級分明；高層會議開完，下級就按指令執行。採訪主任與前線記者討論很罕見，前線記者無參與過討論，亦不知道決策背後的因由。這種運作方式之為可能，有賴一群願意執行指令的中高層編採人員：

(當值採訪主任)常常說「等開完會先，開完會就也都唔同晒」，等上面的旨意；有時採訪主任講「因為剛才開會老闆好關注這些議題，所以我們就找誰誰誰來回應」，講得坦率。 —P.Y.S.

一位資深記者指出，管理層很多時候根本不想跟記者認真討論，原因很簡單：

我們有很多決定乃經不起考驗。

—Y.B.M.

有TVB記者亦觀察到，某些組別，主管甚至迴避與眾記者開會，因為不希望其編輯判斷於大庭廣眾間，受敢言的記者挑戰。主管採取的策略是「逐個擊破」，與記者單獨面談討論編採行文，避免於公開爭辯中暴露理虧的地方。

這種內部溝通方式，揭示了管理文化的另一極端：「指導式」管理，強調控制與服從，不求員工參與決策，要求中層員工忠誠執行，達至上行下效；好處是受控、有效率、省時間，但有三種可能出現的反效果。

第一，下屬無機會參與討論，難以集思廣益，只重執行力，磨滅進取心；高層微管理，事事關心，令較資深的員工亦感沮喪。再者，前線年輕記者感到抽離、孤立，連新聞角度亦不必自己構思，培訓欠系統，成長緩慢。最後，指導式的管理文化，由於決策及判斷不透明，各方無機會交鋒論辯，「只要做，不要問」的氛圍下，猜疑情緒容易滋長，編採判斷受質疑時，疑忌反饋循環，難以消解；內部不能溝通，矛盾向外爆發，「七警事件」後TVB大批記者公開聯署質疑管理層判斷，就是典型例子。

指導式管理令權力集中於少數人士身上，高層主管獨攬大權，建立行事目標，指揮重點追蹤。當判斷準繩兼目標正確，一夫當關，自能增添效率，若主事者為魅力型領袖，也能鼓勵士氣，做出

一番成績。但指導式管理亦伴隨風險：容易令員工愈趨被動、疏離、等指示、不信任、不思進取。

行事管理的風格，一方較指導式，一方較參與式，代表「層級剛性」強度之大小；「層級剛性」愈強，設定遊戲規則的主導權更集中，換言之，只有少數主管話事，運用各種結構性審查行徑時，往往如魚得水，甚少遇到抵抗。

理論上，每個個體都有「策略選擇」的餘地，有提出反抗的可能。但在身處「層級剛性」強的環境中，前線人員無處著力。

另一原因，則是「文化資本鴻溝」大，有心無力。

### 5.1.2 文化資本·鴻溝隔閡

有些記者猶如一包很好的茶包，你把他浸在冷水中，根本不能發揮。  
—S.L.W.<sup>6</sup>

誰來主導策略選擇？「文化資本鴻溝」是重要因素。新聞行業的「文化資本」包括記者的經驗、資歷、學識、職權、技巧、談吐、同儕認同等，機構內每個個體，資本有高有低；「文化資本」之多寡，主導著個體於機構中的地位與抗衡的可能。

「文化資本鴻溝」指管理層與前線工作者的文化資本差距，差距愈大，決策主導權愈是集中於少數主管手上，由他們決定遊戲規則之遊戲規則，主宰各種行事規矩、標準以及預設前提。

舉一例以說明。深度訪談中，廣播媒體有關1989年六四事件

---

<sup>6</sup> S.L.W.是一位有廿多年經驗的資深記者，經常擔當培訓角色。

之周年紀念報道，往往是媒體高層關注焦點，也是新聞審查最常出現的時候。2009年，一位有20年經驗的紀錄片導演A.P.Q.準備製作「六四20周年」系列特輯。A.P.Q.早於籌劃特輯前，已預計此紀錄片非常敏感，他於播出前早十個月，已展開前期準備，找尋被訪者，並於無通知管理層之情況下，提早以採訪另一題材的名義，先到北京拍攝做訪問，他形容這是「先下手為強」的方式。最終到提交拍攝建議書時，由於準備充足，管理層難以拒絕，但曾要求縮減篇幅，被A.P.Q.拒絕。最後剪片製作階段，該媒體主管罕有地要求與A.P.Q.直接面談。

超越七級，要直接聽我匯報，20年未聽過……若非自己年資、經驗夠，容易被壓下去。 —A.P.Q.

最後特輯順利播出，此一系列後來贏得多個新聞獎項。另一媒體，只有不足兩年經驗的熱心記者E.C.K.發覺採訪部無任何記者跟進六四周年的報道，他自告奮勇提出，當時是周年紀念兩星期前。

兩星期前問(採訪主任)，採主問我想做甚麼，我當時無認真準備過，他無直接說不做……最後不了了之。 —E.C.K.

此例可見文化資本之重要。A.P.Q.經驗老到，能找到難以接觸的被訪者並獲得信任，並老早預計會觸動管理層神經，早作準備；由於其經驗與「江湖地位」，與管理層討價還價時，亦得同儕的支持。資淺記者E.C.K.，無論於知識、人脈、與高層周旋的策略與溝

通技巧皆欠奉，他的建議自然不受重視，高層主管亦能理所當然地令題材無疾而終。

文化資本鴻溝之擴大，普遍存在於所有媒體之中。一方面，「極度分工」的24小時新聞規律，強化中高層的協調管理角色；另一方面，媒體普遍以緊縮開支為理由，聘請大量新記者，加上一些管理層有意無意地忽略培訓，令鴻溝跌入不斷擴闊的惡性循環。

**年輕幼嫩新記者：**富經驗的記者團隊，能交流經驗、互相啟發；一位資深記者形容，新記者太多，互相之間的討論氣氛亦淡。

大家都不會討論，因為記者太 junior，連討論事件的热情或能力都未必有。

—S.M.L.

**服從的中層員工：**人事操弄中，一些資深而有主見的記者因「你把尺與老闆不一致」而被投閒置散，最終離職。<sup>7</sup>「服從者生存」的現實下，中高層主管既擁有職位帶來的訊息與人脈資本，卻又欠缺主動，滿足於執行指令，不能把經驗傳授。

（中高層採訪主任）驚老闆罵，「安全」做過了火，無必要地戴好多頭盔，無必要地猜度老闆（的心意）。

—C.J.G.

**學習成長緩慢：**前線與基層員工既不能參與決策討論，亦少機會與資深上司交流，缺乏學習對象，令成長停滯。本來經驗與知識

---

<sup>7</sup> 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憶述自己被上級告知他被投閒置散的原因，乃尺度「與老闆不一致」。

也能於工作中累積，但分配工作的策略常有錯配，前線記者難以在專門範疇中積累人脈知識。一位年輕記者說，他常感到無助。

我本人的熱誠，又未去到，嘩！我要揭示這社會的黑暗，又未去到，未必有推動力，這是我的問題。……採訪主任不會提出特別的古仔叫大家跟進，他們提出的，連新記者都分得出是舊角度。又做？又是這個角度？……我是執行能力高，但自己未必有新想法，需要有人幫我。 — P.Y.S.

一家機構的文化資本鴻溝，本來可透過聘任、培訓、交流、決策參與而減少。但現實運作、個別機構的人事配置與管理模式，繼續擴大鴻溝。總括而言，「二階制度」中，層級剛性愈強、文化資本鴻溝愈大，則二階制度之主導權愈集中於少數主管手上，也代表著他們操控結構性審查制度與行徑之能力愈強。

### 5.1.3 背景依賴·各有前因

當然，這些「操盤人」也不可以任意為之，組織中的個體，儘管掌握機構運作大權，也受到更宏觀之「制度邏輯」所影響；新聞傳媒機構的運作，主要受四個板塊牽引，分別為「專業」、「市場」、「企業」及「國家」。這些影響力，於「制度邏輯模型」(institutional logics model)，稱為「宏觀制度法則」(macro institutional order)。<sup>8</sup>

---

<sup>8</sup> 有關制度邏輯模型的理論框架，由於本書篇幅關係從略，詳細解說請讀原著論文。

結構性審查行徑的個別運用，每家傳媒各有不同，乃因宏觀背景有異，即「背景依賴」(historical contingency)。這些宏觀的「制度法則」，得「法則」(order)之名，一如自然規律，影響力強大深遠，乃機構運作之前提，主導著基本行事規則。

例如「專業法則」(professional order)，一般新聞守則皆於業內有共識，無論主管與前線人員都受其牽制，例如不能作假、立場不能明顯偏頗、有錯要改正等。在眾廣播傳媒中，香港電台之專業守則與別不同，《節目製作人員守則》比通訊事務管理局為持牌廣播機構設定之通用業務守則更為清晰進取，說明所謂「適切的不偏不倚」(due impartiality)，「並不是要求在處理每一個公眾關注的題材時，採取硬性的絕對中立，也不是要求偏離公平開放社會視為根本的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大原則。倘若為了試圖不開罪任何人，不驚動任何機構，而不盡力去全面和公開地探討有關的論題和事件，則我們是有瀆職守。」《節目製作人員守則》給予香港電台員工更大的保障，於應付外界批評及高層主管質疑時，能用以捍衛編輯自主。

《節目製作人員守則》是我們的聖經……(高層主管)  
 爭論時有他的一套，程序權力他贏，但專業上說不過我們。  
 —F.T.S.

另一重要影響力是「市場法則」(market order)，一如Neveu所言，「市場邏輯」有如「巨大星體或黑洞」，扭曲空間，改造媒介內容，塑造新標準，令「追求收視與銷售數字成為優質節目的明證」，深入分析與調查報道的藝術被擱一旁。<sup>9</sup> 市場力量於每家傳媒而言，

<sup>9</sup> Neveu, 2007:339.



影響大有不同，免費電視追求最多觀眾，但收費電視為了吸引特定品味的觀眾，要建立品牌，吸引訂戶。一位收費電視的主管說：

現在有人每個月給你200元，明天就可以取消訂閱，你要令他覺得你有價值，就算繼續付費訂閱都覺得ok。  
—E.B.D.

如有線電視，八至九成收入來自訂戶月費，觀眾學歷及收入較高；為了照顧他們對資訊的要求，說服觀眾這個品牌值得付費收看，需要探索市場空間，製作其他新聞媒體欠奉的節目類型，故《新聞刺針》、《有線中國組》等深度報道節目，亦有市場價值。雖然有線新聞較積極進取，但公司有線寬頻連年虧蝕，「市場法則」發揮威力；2017年初，母公司看不見「錢景」，宣布不再投資，新股東入主後隨即宣布削減經常性開支二億元，可見市場之「黑洞」引力強大。

至於香港電台，承擔公共廣播的角色；與其他商業機構大不同，香港電台開支由政府撥款，不須考慮賺錢，收視壓力較少，「市場法則」影響力弱，編輯相對較自主。

「企業法則」下之商業機構運作模式，擁有者及其代理人操生殺大權，主宰企業的根本政策方針及人事任免，但每個新聞機構處境不同，香港電台再次是一個「奇葩」。

港台員工常抱怨政府文書程序及行政架構臃腫繁複，浪費時間；但詭異地，官僚體系同時又是編輯自主的保護傘。一般商業機構，主管有絕對權力操控人事選拔與升遷，順我者昌，可破格提拔；逆我者則投閒置散，甚至以裁員重組之大條道理，除去眼中釘，程序上幾可為所欲為。不過，香港電台屬政府部門，公務員任免，有規則有程序，而且公開透明。

公務員體制，難以解僱人，有制度保障，要調職要解僱你，要三年時間，其實做不到。我天天準時上班，只好調配你做不喜歡的位置，磨滅意志，但也要人家有空缺肯收留你。  
—R.M.F.

任何紀律處分都有小組審核，不滿的員工，能向上級部門提出覆核上訴。對比其他商業機構，公務員與高層周旋時，有程序保障，博弈時力量較均等，故討論時能相對直率，不怕遭秋後算帳。縱使不少人認為，不馴服者升職較多阻滯，只要你不望飛黃騰達，主管亦難動你分毫。

只要無違反製作守則，你奈我何？……人工好，拚死無大害，不升我職，可做到60歲退休。—R.M.F.

商業機構中，企業擁有者的背景與性格，當然也是「企業法則」的推手。擁有者視傳媒為賺錢工具，也可視之為政治籌碼，或兩者皆是。然而，香港兩家收費電視，即Now TV及有線電視，擁有者為電訊及地產大亨，新聞機構只屬他們企業王國極小部分，兩家機構的員工皆認為，擁有者很少直接施加影響力。例如有線電視，連續多年虧蝕，每年一兩億計，但由於母公司是地產王國，多年來，蝕得起。

這公司，蝕一兩億，都是一兩個（豪宅）單位的價錢，這一壇傳媒，對老闆不會有大麻煩就可以。  
—V.J.E.

有線新聞不同階層的員工都認同，他們享有較程度自由，得自大老闆尊重編輯自主，絕少過問日常運作。機構內的傳聞更謂，大老闆當有線新聞為「社會企業」一樣，做好事而不求賺錢。個別擁有者的性情這種「背景依賴」，無疑各機構都有不同，直接影響運作的可行範圍。

然而，編輯自主在「企業法則」之下，只是擁有者一念之仁，終有一天，富豪一句「在商言商」、「要向股東交代」，或是掌舵人換了，不會對蝕本貨有感情包袱；又或是忍受不了屬下傳媒為他帶來麻煩，美好歲月隨時告終。2017年的有線新聞，正是一個不幸而無奈的例子。

「國家法則」包括政府制訂之廣播法規，例如規定持牌機構必須播放指定時數的新聞節目、有自家製作的新聞專題、規定廣播語言、時段、編採規範等，均直接影響廣播機構的策略選擇範圍。在歐美政治體系，談國家或政府對傳媒之影響，多集中於法規與政府宣傳等方面；但香港處境特殊，一國兩制下，香港原則上享有新聞言論自由，沒有明目張膽的新聞審查，但威權主義經濟強國之影響力龐大，政治干預毋須明刀明槍，透過政治籠絡傳媒擁有者，操控商業機構廣告投放，也能發揮影響力。於非常時刻，「西環」更會直接來電，<sup>10</sup> 或面談訓斥。

深度訪談中，一位前有線新聞記者L.P.K.透露，六四20周年後，國務院新聞辦曾經找他「喝茶」，批評有線新聞直播六四燭光晚

---

<sup>10</sup> 「西環」即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為中央駐港的協調機構，其辦公室位於西環。

會，每半小時播一次，「太刺眼」，問「能否不播或少播」一點。<sup>11</sup>駐京記者亦透露，國安人員監控記者，成為常態，系統化而且甚為公開。

每逢六四之前，都有公安、國安、記協，都請我們喝咖啡，叫我們不要搞事，不要採訪，騷擾你。

—N.K.B.

眾多廣播機構中，TVB是唯一一個有明顯紅色資本的電視台。TVB大股東是上海傳媒大亨黎瑞剛，他是中共黨員，曾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由於TVB長期佔免費電視收視率八成以上，影響力巨大，特別受國家的統戰力量關顧。部分TVB員工，體諒TVB的「機構效應」，「大台」特別受關注，壓力大，而傾向謹小慎微，包括面對公眾壓力亦相似：

我隨意舉例，找一個律師訪問，去批評某人看法，你找一個建制派律師，會如何呢？民主派就會講，你明顯有心選這個，好了，調轉，你找一個民主派律師講，另一方會質疑。好，我兩方陣營都訪問好不好，古仔又好長。一個有bite一個沒有bite，只用旁述講，你又即是有選擇。這方面有少少值得同情，我們目標好大，容易小事放大。 —D.Y.B.

---

<sup>11</sup> L.P.K. 離職後曾寫過兩篇文章憶述事件，見〈一個必定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理由〉及〈頂心頂肺的六四燭光〉，網址見：<https://goo.gl/3aEqHz>及<https://goo.gl/ZOKPWw>。

「專業」、「市場」、「企業」及「國家」等「宏觀制度法則」，框限了機構決策者策略選擇的可行範圍，由於每家機構之歷史與發展軌跡不同，「背景依賴」情況有別，令結構性審查行徑亦出現不同的狀態。

結構性審查「遊戲規則」由誰來設計？誰掌握關鍵權力作策略選擇？一方面視乎機構之「層級剛性」與「文化資本鴻溝」，兩者愈大，則運籌帷幄之力量愈集中於少數主管手上，但同時他們的行事決策可行範圍，亦受制於「背景依賴」之因素，各種市場、企業、國家、專業等宏觀法則，每家機構處境不同，塑造了各種新聞內容之可能性。<sup>12</sup>

接下來，要解答一個懸在牆上的問題：

面對強大的阻力，市場、企業、國家的力量，新聞機構中的個體，有無抗衡宏觀體制的可能？

---

<sup>12</sup> 四家傳媒機構（TVB、有線新聞、Now新聞及香港電台）的個別分析，請參閱原著論文。

## 5.2 逆流的勇氣·抗衡的可能

以前，以為能遊走於其中，已不做敏感東西，但可以反映社會重視的議題，但空間越來越窄，似被人捻住條頸。  
—M.J.S.

無形的界限，一眾受訪新聞從業員都感受到；有人認為，權勢一方要操控傳媒，古今中外皆然，不足為奇；亦有資深記者見到，情況變本加厲，枷鎖框限愈來愈緊。

制度論之理論體系中，恆久不息之討論，乃制度與各種宏觀法則既存，而且深入每個組織架構環節，制度中人如何抵抗這股洪流？制度畢竟是人所造，個體如何身處制度體系中，改變制度，促成革新，締造新的工作模式，抗拒各種結構性審查行徑？

化約至最根本的問題：世道如此，個體如何去改變？

有一天，參加了一個專業地質考察團，去了印洲塘我從未踏足過的往灣洲。帶隊的權威地質專家說：「板塊與板塊之間的碰撞邊緣，是我們地質研究最精采的地方。」

板塊與板塊相遇，總是多事之秋，因為板塊邊緣、斷崖撕裂處，岩層受扭曲、擠壓、摺疊，是地殼活動留痕之地，有不平凡的過去，曾幾何時翻天覆地，乃故事所在。

同理，體制中如專業、市場、企業、國家等宏觀制度法則，也可視為「板塊」；這些板塊並非互相補足和諧共處，有可能互相矛盾，有碰撞有擠壓。制度中的個體，遇上各種價值觀與行事規律之間的衝突，需要取捨；世道如此，個體如何在體制內改變？正是這

些板塊碰撞的衝突點，個體有機會在原則之間作抉擇，能衡量輕重、轉移焦點，啟動行事目標與方式。<sup>13</sup>

各種「法則」與制度邏輯之間的衝突點，就是體制中人能著力之處，也是個體作策略選擇，於結構性審查的架構中採取主動還是被動、是抵抗僵化規律還是強化規律的抉擇時刻。

就在這些衝突點之上，制度中的個體可以鞏固或放鬆結構性審查架構，可以啟動或對抗結構性審查行徑。

### 5.2.1 衝突點：專業價值之張力

如前所述，新聞專業之「客觀性」，充滿歧義、模糊，甚至有矛盾；例如過分平衡可能遠離真實，強調中立可能更為偏頗，詮釋之標準可以飄移，多操控於文化資本厚的中高層主管手上。

不過，專業守則之應用，涉及日常操作，若前線記者不同意編採判斷，有機會以專業準則，據理力爭。一些記者常以「平衡」或「事實」為由，質疑上司決定，實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些以「平衡」作暗戰之爭逐，多發生於TVB：

有時約泛民訪問，要爭取好長時間，用「平衡」作理由去爭取……有些佔中示威者 *soundbite* 能出街，都是記者以平衡為理由力爭。  
—N.L.H.

<sup>13</sup> 有關宏觀制度法則之間的衝突如何成為改變的著力點之理論闡述，請參閱原著論文，此處從略。

P.Y.S.說，觀眾看到一個表面上正常的新聞故事，可能背後是經過激烈爭取的結果。

人們說我們為五斗米折腰，聽到真的好灰心，你留下可能更難，有勇氣走，但留下面對難題更難。有時候A、B、C、D、E的元素在一隻古仔裏，好正常，但有時我們為了要給D、E元素出現在古仔中，我們要爭取，花時間，爭論一輪……爭論一大輪才可以改一件事，然後大家就沾沾自喜，唉，終於能出街了；但外面的人會說，好正常啊，本來就應該有的，外界的人不會明白，裏面的人爭取幾多，才有正常的成果。

—P.Y.S.

然而，趕稿緊張關頭，具爭議性的編採判斷根本無暇討論，當值編輯採主通常一鎚定音。

根本無時間去爭論，出出入入（工作），無時間拗，電光火石之間（編輯）就改了稿，有時連重看一遍都無時間。

—Y.B.M.

但始終他們經驗比你多，你是他下屬，都要接受，沒甚麼反抗餘地，儘管掙扎一下，失敗的機會多。他們已經有一套，好難爭論，除非他是錯，一定要指正他；但有些寫法，寫長或寫短，幾多秒才好，好難講對錯，無一個標準。

—C.P.P.



只要有時間、有對話討論的機會，專業守則之模糊，能讓不同階層的主管下屬，有一定的爭逐空間。中低層記者的抵抗是否有效，關乎其識見、是否有時間資源找尋理據、同儕的支持等因素，也視乎爭持雙方文化資本鴻溝之大小，與層級剛性之大是否令溝通也無機會。然而，這類有關專業守則詮釋之反抗，只發生於新聞選材與製作「下游」的最後階段，若有改變，多屬斬件式與一次過。

### 5.2.2 板塊碰撞處：專業 vs 市場

市場的重力如「黑洞」，扭曲空間，最有價值的新聞往往不能營利，放眼市場，要利潤最大化，似乎和專業追求格格不入。TVB一位資深記者Y.B.M.認為節目與頻道發展速度過快，資源投入卻不成比例，令記者難以做好新聞。

過度商業化的問題，你究竟新聞想如何發展，大方向的問題；你想把時間都填滿，不斷生財，還是想要做好新聞？  
—Y.B.M.

TVB的盈利並無以部門分類，但多位員工表示，採訪部一直流傳，近年好景的日子，新聞及資訊部每年利潤過億。<sup>14</sup>一位資深員工形容，這是新聞管理層一項卓越成就，成功扭轉新聞製作這個數

<sup>14</sup> 多位受訪TVB記者說，數字出自管理層會議。由於具體數字未能證實，故只提供一個概念供參考。TVB記者均注意到，近年24小時新聞廣告頗多，一些小品環節亦有廣告商冠名贊助，J5新頻道的新財經節目時段，亦由新聞部主導。

十年來只會花錢的「成本中心」，成為「賺錢項目」。Y.B.M.指出，管理層若願意把利潤的一半，重新投資製作新聞，多聘資深記者，採訪部的工作氣氛與動力，一定能顯著改善。

「市場」與「專業」看似不能兩全，但如何用錢、是否保留部分利潤再投資，可以取捨，也是矛盾中一個策略選擇。例如有線新聞與Now新聞，兩台均設財經頻道，其中一個頻道的資深記者說，財經與投資節目的廣告收益，是新聞部門的主要收入來源。

財經的世界，人們不會覺得你賺錢有問題，都ok，搞投資講座，同銀行合作……所有東西都可以賣，財經台用來賺錢，養我們的（新聞台）。 —A.B.N.

抵擋或迎合市場力量，策略選擇涉資源之調撥，會否設計新節目新規律等決策，都由主管掌控。前線記者卻在市場與專業的夾縫中，找到一個「特異空間」，能讓主管願意花錢花資源，精心炮製調查報道，甚至觸碰敏感話題——投資於新聞獎項。不同傳媒的記者都發現，主管們通常願意投放更多人力及時間，深入報道，製作有潛力奪取新聞獎項的題材，例如中國人權等議題。

老闆有點「惡頂」，但為了得獎，甚麼題材都可以做。為了得獎，準則放鬆，故事題材自由一點，資源多一點，好現實。 —H.B.V.

H.B.V.觀察到，「得獎」令新聞主管高興，也可以讓他們向更高層領導展示其成就。H.B.V.感到自己似花瓶。

整件事很矛盾……得人權獎是最大掙扎，因為他本身不重視人權。  
—H.B.V.

新聞獎項榮耀之「誘餌」，令記者充權，有理據向上級爭取資源，打破新聞規律，製作一些市場不一定歡迎、大眾不一定欣賞、但無愧專業理想的新聞題材。這些深入報道，往往不利權貴，但能建立市場與公司形象，儘管用錢較多，也可以大開綠燈。

### 5.2.3 板塊碰撞處：專業 vs 企業

TVB、有線新聞及Now新聞，均由富豪或旗下財團擁有。企業與專業的最直接衝突，在新聞機構大老闆及其財團變成新聞焦點時，傳媒如何報道。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說：「不會唱衰老父。」

好正常的事，可能奴化，行內好普遍的做法，其他台都是這樣。  
—G.Y.C.<sup>15</sup>

其他台的高級人員則表示，若對母公司或大老闆不利的消息，新聞照樣報道，但會特別謹慎，絕大部分情況下，不會主動及深入跟進。

一般商業機構的層級管控措施，滲透於辦公室的日常，規則訂好，「信得過」的人佈置於關鍵位置，只須按機構所訂之程序行事，審查自能隱於細節中。

---

<sup>15</sup> G.Y.C.是一位採訪主任。

一些記者憶述中高層主管處理新聞的手法，不須以「客觀平衡」等專業話語去討論，只須跟足程序已能把敏感的新聞故事殺滅。某年的六四周年紀念，N.L.H. 建議採訪一位在當年鎮壓中受傷的人，主管開了綠燈，可以做；但播出當天，交稿後七小時，編輯仍未審稿，最後只在一個很少人看的新聞時段播出了一次。

這種手法，中高層主管根本不與記者商討採訪主題角度，不談內容，不涉新聞專業原則；走過了採訪部的審稿程序，就能把敏感新聞埋葬。這些行徑，很難判斷為「自我審查」，主管傾向低調處理，意圖難以確定，而記者的確獲准採訪而又播出了。

很多記者早已洞悉魔鬼在程序細節中，以各種手法，如「模糊化」、「先斬後奏」與「後編輯」等方式，抗衡隱藏於程序細節中的監控。例如一位資深記者申請出外採訪用錢時，不寫清楚目的：

例如做劉曉波，不寫「劉曉波」三字，只講「公民社會」，避免上級不簽。  
—A.P.Q.

日常文件也會「模糊化」處理，例如準備採訪中國住宅嚴重空置的「鬼城」問題，只寫「中國房地產問題」；重要而敏感的資訊，不放採訪部電腦系統；採訪回來的訪問抄本，若被訪者說了敏感字眼，文檔收藏於私人硬碟中，不驚動高層。一位採訪主任曾試過把建制組織傳來的採訪通知直接扔掉，不讓其他採主知道，避免他們如獲至寶，派員採訪該無意義的活動；亦有採主利用自己調配採訪隊的權力，刻意派人採訪一些高層會議不決定跟進、但對政府不利的議題。「先斬後奏」策略包括出外採訪時，順道拍攝其他敏感題材，不事先與上級商討，自能避開高層以「無錢」為理由殺滅題材。

一個最極端例子，記者明知管理層不肯出錢派攝影隊赴海外採訪一位政治敏感的重要人物，遂自費採訪。<sup>16</sup>到寫稿剪輯階段，有資深記者面對編輯審稿，亦採用「先斬後奏」策略，甚至「後編輯」方式，不理會編輯之判斷，「反改」編輯已審之稿件。

先斬後奏，無論剪片及寫稿，有時寫稿，明知他不喜歡某句，不寫清楚bite，到(剪接)時加一兩句，寫的稿，有時心知他不喜歡，會剪輯完才更新字幕，他不知改了甚麼……有時會好大膽地，他刪了的bite，在剪片時重新加上，看他有無發覺，播出時他們無留意，不會一字一句都監控。 —T.C.Q.

這些策略性抗衡，跳過了專業原則的爭議，直接挑戰企業所訂層級之間的行事規則，往往是文化資本較厚的資深工作者才有膽色及有信心去做，而且多發生於高低層員工嚴重缺乏互信、正常商討無可能出現的機構。

廣播機構中，抗衡力量最有組織的是香港電台。港台有節目製作人員工會，成員謂，雖然工會不能改變電台之資源調配或發展策略，但可以積極發聲，警示同儕官方妨礙編輯自主的跡象。<sup>17</sup>有員工形容，公務員系統有明文規定的人事任免制度，乃他們的「護身符」。

<sup>16</sup> 為保護資料提供者身份，這些例子之細節不詳細披露。

<sup>17</sup>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公會曾於2011年，政府委任之上任廣播處長履新時，鋪黑地氈抗議。於2013年，亦公開質疑管方一些做法損害編輯自主，見2013年3月25日，《明報》〈廣播處長，不見了〉。

你不讓我升職，你贏了，但我繼續坐在這裏……我  
只要繼續發揮到作用，就死都不會走。 — J.G.S.

香港電台由於其傳統上「背景依賴」之特殊因素，員工抗衡力量較大。但其他商業廣播機構，擁有者及其代理人有無上權力，他們所設定之行事規則與權力架構，一般員工難以逾越，策略性的抗衡多屬「斬件式」，發生於新聞流程中較下游的環節。而且媒介擁有者及其代理人還牢牢掌控人事調配與資源分配的重要決策權，資源策略是「陰乾」還是利潤再投資？人事任免是選賢與能，或是劣勝優汰？始終掌握於少數人手上。

#### 5.2.4 板塊碰撞處：專業 vs 國家

「國家法則」(state order) 的影響力，除了有白紙黑字的業務守則，亦有不明言的禁忌。香港記者都清楚知道，一些觸及「紅線」的敏感話題要特別小心處理，包括疆獨藏獨台獨等國家統一與民族問題、領導人及其親屬的醜聞、軍隊國家化、法輪功、六四周年紀念、維權運動、異見分子、獨立教會等；近年，內地甚至連「憲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公民社會、志願組織等，都視為敏感爭議。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眾多禁忌並無明刀明槍的審查，但有結構性的滲透，例如於規範系統的策略選擇中，特別傾向被動接受官方話語；於文化認知系統中，加強僵化規律，磨滅記者主動性，減少對建制不利的新聞內容；於管控系統中，透過人事調配及「陰乾」資源，減少調查報道與積極跟進。

本章節主要談論，香港獨特的政治環境中，傳媒高層直面「國家」影響力時，其應對方式。

在香港，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有一傳媒團隊。部分主管級被訪者證實，他們確實接聽過「西環」的電話，建議新聞如何做，有人表示敷衍一番，從不理會；亦有電視台甚為重視。一位中國線記者A.K.Q.憶述，年前一次有關地震的採訪，他的故事播出了一段內地公安與記者衝突的影片，其上司直言受到高層責罵，要求以後嚴密監察下屬寫的新聞：

(新聞故事中，記者)同公安理論，畫面全播出，後來 editor 說，給老闆罵，接中聯辦電話，說傷害感情，editor 說，有這些元素的古仔要找我改，放假都要找我。

—A.K.Q.

另一家廣播機構之資深員工確認，間中會接到「電話」：

你做新聞機構，如果無人理睬你，無人打電話給你，你都好失敗啦，我相信一件事，一個有影響力的新聞機構，各方才想遊說你又好，說希望影響你也好，這個好正常。

—B.Z.E.

B.Z.E.說，他通常不理會這些「電話」，亦不感到受壓，此機構的員工亦稱，從未感受到「西環」壓力。本研究的深度訪談發現，最赤裸的高層干預，幾乎都與六四周年紀念的採訪有關。其中一間電視台的六四特輯，播出後遭「上級電話」要求縮短或停播；該新

聞部中高層人員說，早已計劃好，一路做專題，一路不驚動大老闆，直至播出後，有人想阻止，亦已無意義。

先斬後奏，做了再算，都播出了，不能收回。(應對電話的)做法就是照樣做，播出，有人出聲(不滿)? 都已經播出，你不喜歡，sorry囉。 —A.B.N.

所謂「國家」或政府的權力，並非不可抗力。香港處境下，傳媒大亨於中國有眾多業務發展，須保持良好關係，但有記者注意到，梁振英一屆的特區政府，與部分香港富豪關係欠佳，包括了他們所工作傳媒的大老闆，這種「國家」與「企業」的衝突，結果令他們專業自主空間增大。

如果西環同老闆相對要好的話，我們較難做，現在的政治環境，他們同我們大老闆不是太密切，我們相對易做。 —N.K.E.

新聞管理層如何應對「國家級」直接壓力，乃編輯自主的考驗時刻。一些主管會把內容自己消化，不讓下屬知情，亦不給予壓力；也有人開誠布公，與下屬商量，找出兩全其美的處理手法。若主管聽命於壓力，直接把指令下達，會失信於下屬，其在同儕心目中的尊嚴與誠信，亦留下不能磨滅的瘡疤。

有線中國組的記者提到，北京官員也會留意他們的新聞；R. X.T.認為，只要堅持報道是公平、客觀和有價值，記者堅持原則，更會贏得尊重。



有時，你「硬淨」一點，人家反而更尊重你；反而你常卑躬屈膝，人家打電話來，叫你改就改，人家更看不起你，只要你報道的，對他們有參考價值，即是讓他們了解真實情況，這是你的價值所在。

—R.X.T.

然而，抗衡的可能，很視乎個別機構的背景與主管級人員的處事模式。在文化資本鴻溝大、較指導式的管理作風下，個體企圖抗衡，成功的話多只是一次過，而且有後遺症。

十次聽話，一次反抗你就死。

—Z.M.G.

管理層操控獎懲與工作編排，記者的抗衡有何後果，主管是從善如流、是欣賞、是忍受，還是記於心中等待時機報復，說到底，權都在主管手上。

覺得老闆超級不信任我，我曾覺得自己應該有把握不用逢迎而走到鋼線，新聞能播出。我問自己歷史任務是否已完成，發揮不到，幫不到記者甚麼，寧願在另外的平台發揮。

—P.E.J.

內地敢言政論雜誌《炎黃春秋》前副社長、《墓碑》作者楊繼繩，2016年獲哈佛大學頒發 Louis Lyons Award，表揚其「良知與節氣」。楊繼繩的得獎感言說，記者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聖之間，黑白之道，可由自己掌握——

這是一個卑鄙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製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這是一個平庸的職業，迴避矛盾，不問是非，明哲保身，甘當權勢的喉舌；這是一個神聖的職業，胸懷天下，思慮千載，批評時政，監督政府，溝通社會，使媒體成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力。


……這是一個舒適而安全的職業，出入於官闕樓台，行走於權力中樞，燈紅酒綠的招待會、歌舞昇平的慶典，訪大官，見要人，春風得意，風光無限。如果用文章與權勢投桃報李，今日的書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的窮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這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職業，且不談穿梭於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記者，就是在和平環境中，調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難萬險。一旦觸及到權勢集團的痛處，不測之禍從天而降。

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聖、是淺薄還是高深，在於從業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價值取向。真正的職業記者會選擇崇高、神聖、深刻、兇險，鄙視和遠離卑鄙、平庸、淺薄、舒適。然而，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聖之間，沒有鴻溝、沒有高牆，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

本章闡述了各種「宏觀制度法則」中，存在互相衝突，制度中的個體，有可能把握這些衝突間的夾縫作為著力點，去抗衡專業以外的影響力，或作策略性選擇，緩解結構性審查。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也許會覺得人微言輕，無力扭轉乾坤；但分析可見，傳媒中高層掌握一定的決策權力，他們處身急流中帶領船隻航行，有權力、亦理應有能力，堅定小船的方向。然而，2017年發生於有線電視的變故，赤裸裸地展現香港的新聞自由是何等脆弱；只要大老闆一聲令下，小船的燃料耗盡，不再添補；所有逆流的努力，隨時付諸流水。雖然最後關頭有「白武士」注資，有線新聞可繼續營運，但航行的大方向，難免將由新股東主導。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6 結語篇 審査新境界

「中立客觀」只是手段，  
尋真才是最終目標。

—— 一位資深記者

筆者盼望，本研究能帶領大家經歷新聞審查的新境界。

結構性審查的方式，無赤裸直接的操控，卻能達到傾向建制之實；無可無不可之間，刻意地不經意，軟硬兼施，龍門飄移，順水推舟，無形無跡。

## 6.1 再思自我審查——你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沒有

常用的「自我審查」概念，難以統攝潛藏於組織架構中各種規範、慣性與管控系統的審查力量。

簡單而言，部分新聞工作者現在面對的問題，不僅是「自我審查」，而是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消失了。

意思就是，好些主要是中低層級的前線記者，被困於刻板的生產線規律、受制於上級的工作編排、框限於管理層所訂的行事準則與規矩中，「安全系數」高，令記者自主性減弱，沒甚麼機會接觸政治敏感議題，有機會接觸亦無權作重要決定，從根本上減低令權貴尷尬的可能，故亦無所謂「自我審查」。

### 6.1.1 自我審查難認定

前文〈破篇〉已論及，「自我審查」概念關乎從業員意圖趨利避禍，作出不專業判斷；自我審查行為難證實，因為好些從業員現在連「作出判斷」的機會都大大減少。「沒有」自我審查，不代表形勢大好；很多較資深的記者，當然仍有接觸敏感議題的機會，但深度訪談中很多例子可見，旁人難以一針見血地指出「自我審查」的行為，因為除非當事人坦白承認，否則「意圖趨利避禍」難以確證，新聞判斷是否「不專業」也難辨對錯。

一位記者描述一種「自我調節」的應對方式。他們都知道新聞裏某些原聲引述 (soundbites) 上級不喜歡，在時間緊逼下改稿，採主編輯往往改得一塌胡塗。記者後來學會了「自己來」，不想自己做的新聞故事面目全非。

初時「懵懵地」，發現次次都被刪剪，支離破碎，不想作品不好看，自己來，這是一個妥協的過程。

—Y.Y.M.

一些記者選題時，會盤算主管的心意，極力避免墮進其「議題陷阱」；例如佔領運動過後回顧事件，有記者擔心會遭上級主導，變成「鞭屍」故事，從策劃故事開始已是一場影子角力心理戰。有記者在訪談中自白，做政治新聞很「高危」，常和上司衝突，她為了避免違背自己的原則，索性自我設限，刻意迴避敏感的政治話題：

我不再願意做政治題材，不做才可以繼續騙自己，若做政治新聞，你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底線、自己的想法，我不想自己不開心。

—W.T.B.

她目的明確，想規避衝突，不想陷入背棄原則的掙扎，然而她不肯定自己是否「自我審查」。她雖然不去觸碰政治題材，但把工作時間分配做勞工、交通等新聞，這些新聞同樣有價值，她不覺得自己「不專業」。這是橙與蘋果之比，你不能肯定地說，政治新聞價值較高，你逃避就是判斷錯誤就是自我審查。

很多記者因文化資本不足，或因不同性格、處境，不直接抗衡，而選擇了自我調節、自我設限的方式，避開麻煩。記者承認他們改動故事主線及引述，甚至避開爭議性故事，目的在避免與上級爭拗，但「專業」的界線很闊，他們認為改動後的成品，仍然在他們的專業底線之上，不能說是自我審查。



新聞專業的「客觀」與「不偏不倚」，意義多變；新聞價值之判斷，容易被搓圓揸扁。一位中國線記者說，有一年，一位重要而政治極敏感的中國前領導人死忌，有家屬舉辦追思儀式，但主管認為「沒有新意」而拒絕播出；該記者說，題材當然不新，但有新角度。

另一宗個案，一位記者跟隨領導人外訪到非洲國家，順道採訪了當地一宗抗議中國傾銷貨品的示威及跟進相關議題；主管認為故事「無價值」，「非洲人倚賴中國貨」，不播。新聞取捨中，何謂重要、何謂有價值，界線具彈性；但該記者說，以往從未試過花費大量資源出外採訪的特寫故事會被刪掉，從「環境證供」而言，判斷不尋常。

較容易確認的自我審查案例，乃編輯與記者之間能坦率討論，其中一方承認自己為避開麻煩而違心又不專業地寫稿。一位資深記者憶述一個他認為明顯的自我審查事例：一位主管為免惹來民主派支持者的批評，刪去一個建制派人士的原聲引述。這位記者認為，「自我審查」其實難以認清：

我或者永遠不知道自己在自我審查，因為我或者已經妥協到一個地步，所有東西都已經內化。

—Z.X.H.

值得注意一點：本研究之深度訪談中，一些記者憶述新入行時，根本從無想像過採訪運作的各種規律與慣性，如何牽制住記者的動力。一位在TVB有三年經驗的記者說，不久前還「好鍾意返工」；一些則迷醉於在「大台」工作的好感覺，也因為經驗淺，連既定工序都未做得好，遑論抗衡。

一位訪問時剛離職的記者，形容自己曾處於如「自我麻醉」的狀態，她尊重的上司常有各種奇怪的編採判斷，她要說服自己，那不是審查。

在採訪部內，不知是否自我麻醉，會相信他們的解釋，自己騙自己，才能做下去，信他們未必是壞人，真的真心相信。離開以後再想，每次都覺得，哪有如此「躉居」的理由。  
—W.T.B.

疑似審查的時刻，是記者生涯關鍵一剎，當恐懼、憤怒、屈辱交織，是妥協屈服還是堅持原則？是忍辱負重還是瀟灑離去？各種自我麻醉、自我調節、自我設限的應對方式，加上價值觀的內化同化，令「自我審查」行為難以確認。傳播學著李立峯曾言，回歸後的香港，所有被公開的疑似自我審查事件，被指控的一方都否認其事。本研究亦有類似發現：所有自我審查之指控，媒體管理層都會以資源限制、正常調動、專業判斷等理由作辯解。

香港新聞界普遍認同「自我審查」是業界嚴重問題，<sup>1</sup> 本研究並非要貶抑「自我審查」之概念，而是希望著力探究其結構性根源，各種潛在審查行徑如何散佈於新聞運作各層面。自我審查可視為傳媒工作者於結構性審查框架下，放棄抗衡、選擇妥協後的結果。

---

<sup>1</sup> 見香港記者協會之調查，報告內容見：<https://goo.gl/oHJd47>。

## 6.1.2 就在陽光空氣中

本書提出「結構性審查」之具體架構與行徑，「結構性審查」有別於既往之「自我審查」概念，主要有四方面不同，總括而言：

一，「結構性審查」不僅針對懷疑審查之案例，更強調其結構性現象。

結構性審查行徑，潛伏於三條「制度支柱」中，即專業守則、運作慣性與管控系統。

新聞「專業」有別於其他專業，沒有一套核心而專門的知識，也沒有專業認證，誰想做記者，隨時都可以；新聞行業一般也沒有具法定權力的專業組織實行自律，或處理違反守則的爭議；所謂專業守則如「客觀」與「尋真」，也不如醫護專業救急扶危生死存亡之清晰。新聞行業的專業準則詮釋空間大，是爭逐之戰場，也是行事標準，卻沒有權威組織能定義判準。

捨難取易、信奉權威，也許是人的本性。新聞專業理想，「尋真」不容易，遂追求「平衡」；有權勢者，說話有份量亦有影響力，「監督」極耗心力，也有風險，相信官方權威既方便又快捷，而且通常有點新聞價值。本研究闡述，隱藏於「規範系統」內之八種審查陰影（結構性審查行徑），包括以平衡報道為名的「不對稱平衡」與「強力平衡」；迷信官方權威之「唯權是尚」與「官話必真」；在積極客觀與被動客觀之策略選擇間，傾向被動而出現「後天下之憂而憂」及「積極不對焦」；啟動行事標準時，「龍門飄移」及「重劃禁區」。

運作慣性，包藏了四道結構性審查陰影。新聞媒體資訊求快求新，看來理所當然；以「效率」之名，建立流水作業式一樣的生產

線，又似是天經地義；爭收視、吸廣告，更是企業生存的命根。慣性如洪流，若一葉輕舟選擇不作為，任由水浪沖擊牽引，追求效率數量，會導致「生產線常規化」、「血汗工場削自主」；從節目形式設計開始，追逐收視廣告，會導致「取悅大眾·擁抱平庸」及「追逐利潤·迷失本業」等結構性審查行徑肆虐。

三條「制度支柱」中，管控系統影響最深，操控資源分配，「陰乾設框限」及「陰乾滅士氣」，能令員工身心疲累、降低主動性，連帶編採規範也易傾向被動消極。

人事操控的手段，掌生殺大權，愛聘用新人「幼嫩培育」、物競天擇下出現「邊緣化羞辱」、「同聲同氣新秩序」的行徑；人事布置，直接決定誰能於何種情況下掌控表達之渠道，所謂適者生存，「適」不一定代表「優」，誰能認同或假裝認同機構的取向與價值，誰就活得較好。

管控系統的制約權力，能「調兵遣將·滅於萌芽」、「前提預設·先發制人」、「橫刀干預·後發先至」。這三種結構性審查行徑，基本上限定了行事範圍，不得越雷池半步。

二，「結構性審查」不追問懷疑審查行為之意圖，而重視行為對內容之影響。

一直以來之理解，「自我審查」行為有趨利避禍之目的，但眾多有利於建制的新聞處理方式，不一定為了趨吉避凶，也可以因為「真心認同」。例如，曾有記者提出要做「保育廣東話」的故事，但主管拒絕，認為「廣東話無特權」。傳媒高層主管若以「大中國」的民族主義思維作判斷，未必有趨利避禍之目的；況且，若報道真的換來獎賞或報復，不一定即時見效，亦難以判斷因果關係，要證實

這是自我審查，除非主管親口承認，否則非常困難。在一些編輯與記者嚴重缺乏互信的採訪部，高層指令往往只叫你做或不做，連解釋都沒有，遑論知悉背後目的。

在深度訪談中，主管級人員對「自我審查」四字都非常警覺，有一位說「九成時間都沒有自我審查」，其餘皆表示，他們的編採判斷從未逾越自己的專業底線。大部分TVB受訪者認同採訪部內有自我審查，但自己沒有。<sup>2</sup>

「結構性審查」概念，不亟亟於追問有否趨利避禍的意圖；洪流之中，掌舵人不作為也是選擇，也是作為之一種；用人為親，或是用人為才，船長有權決定團隊之素質專長，直接影響航向與目的地。放眼於新聞製成品對權貴之取態，自能印證結構性審查的強弱，而毋須猜度意圖。

三，「結構性審查」透過操控表達渠道與表達形式去影響內容，不一定要直接操控內容。

機構擁有者及其代理人背後之真正意圖，局外人難以知悉。香港數碼廣播電台（DBC）2011年因股權糾紛，董事會會議錄音「絕密流出」，<sup>3</sup>罕有地讓公眾窺探傳媒股東意圖趨利避禍而操控時事節目方向的手法。股東會談到聘請名嘴李慧玲加盟，有股東指出這人選「中聯辦好反感」，有股東說「我們不想參與政治，或者捲入漩渦」，可見股東們擔心「政治化」題材會惹上麻煩；又有股東說「我哋淨係

---

<sup>2</sup> 大部分於深度訪談中提到的疑似自我審查案例，由於大多涉及一對一之談話，若向主管人員核查真實性，會泄露提供資訊者身份。此研究提供的事例，皆為被訪者親身經歷，研究者盡可能查問細節；若涉多人，會向其他人核實。

<sup>3</sup> 錄音見網址：<https://goo.gl/4nT9rL>。

睇返香港」(我們只集中看香港)，也可窺視香港傳媒的奇怪現象，儘管政府宣傳常叫人認識祖國，但主流媒體之中國新聞，不合比例地少，資訊來源倚賴內地官方訊息，正是擔心惹上麻煩；錄音中，其他股東提出遇上敏感新聞，採用人有我有、不爭先、只跟進報道的手法，免招話柄。股東討論主旨，就是透過員工聘任與設計節目形式，避開令權貴不高興的可能。這種行徑，不須在個別事件上自我審查，而是如 Bourdieu 所言：以管控「表達的渠道與表達的形式」(access to expression and form of expression) 去管控表達的內容。<sup>4</sup>

通過挑選人事、安排工作，就能管控表達的渠道；透過節目設計、生產線之規律，能操控表達形式，大致上控制表達內容，減少令權貴尷尬，增加「安全系數」。

四，「結構性審查」是否存在，並非單純「有」或「無」，而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結構性審查行徑，是否啟動、何時啟動，每個機構各有不同。當中「迷信高官權威」、「偽中立假平衡」、「極度分工」與「操控資源分配」類別下的審查行徑，普遍存在於各廣播媒體，屬於「背景暗湧」，影響較恆常性；其他陰影雖然存在，但是否啟動，也視乎個別機構主事者的策略選擇及個別機構的宏觀制度法則。

結構性審查較強的時刻，常見於重大事件，關鍵一剎，背景暗湧疊加各種龍門飄移、干預行為、制約措施，令新聞內容維護建制一方。本研究發現，各台新聞處理手法，最大分野出現在「佔領運動」、「六四周年紀念」、「洗頭艇事件」等對政權尷尬的極端敏感時刻，是主動跟進還是人有我有、是積極調查或是積極不對焦、行事

---

<sup>4</sup> Bourdieu, 1991:139.

標準有沒有「搬龍門」等，較為明顯。

高層管理者有絕對優勢主宰節目方向，是能省就省限制採訪資源，還是傾力支持主催深入報道？事事擔心觀眾不滿，還是不懼外力堅持尋根究柢？當機構內文化資本鴻溝大，高層控制遇到較少阻力，但下屬也難有貢獻，基層員工較易被同化，傾向跟從指令做事，角色容易倒向「打份工」、「不惹麻煩」、「新聞表演」，重包裝表達技巧；第四權之監督角色，閒置一旁。

慣犯作案，當然不會大庭廣眾、明刀明槍、白紙黑字留下人證物證。警察查案，留意環境證供、不在場證明，思索嫌疑犯動機、誰是最大得益者。當蛛絲馬跡同一指向、不斷重複出現，怎可以還掉以輕心，當作無事發生。

最後，附上本研究歸納的二十種結構性審查行徑及其簡義，或曰新聞審查的二十道陰影，可視為新聞審查利器一覽表、背棄專業理想路線圖，或專業人士提高警惕的警告訊號系統。

結構性審查行徑的框架及二十道「陰影」，不單適用於新聞界，舉凡權貴意圖操控專業，但礙於價值共識不便赤裸裸出手，轉而透過機構內部運作發揮影響力者，都能在框架及「陰影」中，找到似曾相識的手段。

例如老師教學常以「中立」自居，談公共事務，強調要舉出正反意見，「強力平衡」而可能忽略真實。社工界朋友說，現時很多社福機構，著眼爭取撥款及資源擴展現有服務，以量取勝，卻無視更多人的福祉，需要較政治敏感的政策倡議，才有望從根本解決問題，也可視為「追逐利潤·迷失本業」的範疇。港大於2015年委任新副校長的風波，校委會使用「橫刀干預·後發先至」的方式，推

翻過往程序，重新審視副校長人選，除去眼中釘；又如行政長官委任大批自己信任的人進入港大校委會，正是「同聲同氣新秩序」，利用其行政權力，化操控於體制中。

香港特區享有「一國兩制」下保證之各種自由，亦為香港人所公認抬舉，操控既不能硬來，自然透過看似天經地義的方式滲透；因此結構性審查行徑，不屬新聞界獨有，其他自主受威脅的專業界別，如法律界、教育界、學界、社工界、文化藝術界、電影界、出版界等，同樣有含糊的專業準則或面對資源緊絀的逼迫。大家或能於這些概念中找到共鳴，窺探專業理想淪落的結構性緣由。

表 19 總結二十種結構性審查行徑及其簡義

規範系統 (Normative System)	
<b>平衡報道</b>	
<b>不對稱平衡</b> ：平衡只屬裝飾，容納雙方意見，但長度及顯著性不對稱，其中一方意見特別顯得薄弱、抽象、失焦甚至答非所問。	
<b>強力平衡</b> ：不需要平衡時強作平衡，過分強調平衡而引致扭曲。	
<b>迷信權威</b>	
<b>唯權是尚</b> ：官員屢獲例外處理，前設了他們地位重要，不詰問其權力，不嚴守平衡報道。	
<b>官話必真</b> ：以官方訊息作事實，官員之作為與言論，習以為常地視為真，不加質疑。	
<b>被動客觀</b>	
<b>後天下之憂而憂</b> ：重要事件發生時，採取按兵不動策略，不主動、不爭先。	
<b>積極不對焦</b> ：以極端的中立持平之名，去焦點、去情感，不鼓勵調查報道，迴避設定議題。	
<b>飄移境界</b>	
<b>龍門飄移</b> ：執行規則時，雙重標準、前後不一。	
<b>重劃禁區</b> ：重新定義反對派行為，視之為「越軌」，名正言順地譴責，及不予理會。	



## 文化認知系統 (Cultural-Cognitive System)

### 極度分工

**生產線常規化**：工作流程固化，有如工廠生產線，重視產量、效率與樣式一致，加上繁重工作，削弱生產者活力與主動性。

**血汗工場削自主**：極端分工改變權力架構，一方面令下層工作零碎、成長緩慢；生產線一樣的工作模式，有利中高層管理者掌握大局操控流程，削弱前線自主。

### 形式指揮腦袋

**取悅大眾·擁抱平庸**：迎合大眾口味，製作平庸的成品，主理嚴肅問題之人力物力被分散。

**追逐利潤·迷失本業**：節目形式轉向「資訊」，內容無時間性、缺批判性、以實用價值為先，較少關注社會議題，遠離尋真與監督政府之天職。

## 管控系統 (Regulative System)

### 資源分配

**陰乾設框限**：預算開支緩慢萎縮及資源停滯不前，令策劃止於有保證及可預期的範疇。

**陰乾減士氣**：製作支援減少，影響員工心態，貶損下屬的熱情及創意，於工作時只能止步於既定框架規律。

### 人事操控

**幼嫩培育**：招募經驗淺而較順從的從業員，人手經驗不足，難以主動出擊，亦不易抗衡既定規律，整體員工趨向服從。

**邊緣化羞辱**：把較主動及不服從的員工投閒置散、羞辱及邊緣化，讓其流失。

**同聲同氣新秩序**：透過升遷與貶職等方式，管理層篩選與自己想法一致的員工擔當重要崗位，令執行更順暢。

### 制約措施

**調兵遣將·減於萌芽**：緊抓調配工作大權，操控誰來做、做甚麼，無形中控制成品，避免在政治敏感事項惹上麻煩。

**前提預設·先發制人**：預設基本遊戲規則，變相設立障礙，從第一步開始，影響結果。

**橫刀干預·後發先至**：在關鍵時刻打破規律，重訂規則，直接干預，重新定義正當行事方式。

## 6.2 再思客觀——不追求中立，追求真實

有一次到中學週會演講，同學首先起立唱校歌，歌詞只有短短四句，出現了兩個“truth”字，一個“true”字。曾幾何時，我們被教育要追求真善美，「真」排第一位；學習要求真，思考要確當，都是為了判別是非真偽；鑽研科學，為探求宇宙真相；新聞也要「求真」，是新聞工作者的終極追求。

奧斯卡2016年最佳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改篇自多年前轟動美國的神父性侵案，記者追蹤報道的過程，令人念念不忘的，是追尋過程中接近真相時，手心冒汗、心跳加速的感動與錯愕。

女記者上門找涉嫌性侵的神父，門打開，神父站在眼前；匆匆問答，神父竟直認性侵不諱，還道是平常事；記者瞳孔張大，難以置信，呆住、呼吸急促……

男記者在家，追尋可疑神父之地址，驚覺有一間教會，就在他家路口轉角，子女流連之地。記者奪門而出，那急步狂奔長鏡頭，搖晃喘氣間，真相就在身邊，一直渾然不覺。

追尋變童神父線索，目標人物由一個，到十幾個，然後九十個；簡單一個數字，驚心動魄，真相難以置信，卻擺在眼前。

男記者在法院死纏爛打，終於排除萬難，教會隱瞞的關鍵文件到手，在繁忙馬路狂飆追的士。

想起那年那天，每次與公安糾纏，藏著錄影帶，末路狂奔，擺脫追蹤。真相或未能全知，但是掌握了不為人知的證言，步近真相，觸碰真相。世上，有這樣一種共通的感動。

《焦點追擊》故事裏，沒有英雄。很多人問，為何性侵事件，事隔廿多年才東窗事發，為何當初有人通風報訊，報館內卻無人理

會？當原因揭盅時，那是多麼的平凡：繁瑣雜務中，那位看似英明神武的主管，掉以輕心，連他自己也忘掉了。那些規律的日常，記者們接過無數看似偏執瘋狂的傳聞，閃念之間，即拋諸腦後。

香港一地，不少傳媒表面上堅守客觀中立，以「旁觀者」姿態，主動迴避敏感或容易招惹批評的話題，怕得罪權貴、怕被人告，畏首畏尾。調查報道是有的，但槍口不對準權貴，卻針對弱者，甚至暗倚高牆，站在權貴一方；又或為逃避麻煩，把寶貴資源消耗於無關痛癢的軟性題材。

本研究闡述，「新聞客觀性」成為結構性審查行徑的工具，源自其彈性的詮釋空間，美國記者及作家E. J. Dionne形容新聞客觀性之矛盾：「既要中立又要調查，既要抽離又要有影響力；既要公平又要鋒銳。」<sup>5</sup>各階層之記者都認同，客觀、中立、不偏不倚、持平、平衡等，都是大家掛在口邊、至高無上的專業標準。實際運作中，準則含糊，各自演繹，成為編輯與記者爭論編採手法的焦點；也成為很多新聞從業員用作「驅魔辟邪」的口號，「中立」、「客觀」光環一出，自能塞悠悠眾口。

一位資深記者說，常用的「中立客觀」只是手段，我們常忘卻「尋真」才是終極目標：

做新聞，我覺得，最高價值不在於持平中立，sorry，這只是手段，essence是你展現的是否真，是否真相。  
—H.L.X.

---

<sup>5</sup> 引述於Cunningham, 2003:25。

試想像，若某人「堅守中立」，舉著標語聲嘶力竭地號叫「我要追求中立」、「我要堅持平衡」，其實很滑稽。

一宗新聞，你採訪或是不採訪，你找人來平衡意見還是不須平衡，寫一百字還是一千字，都要判斷，沒有所謂中立的判斷。在香港，每年7月1日都會發生兩件事，早上有官方回歸慶典，主調是喜慶紅色；下午有七一大遊行，抗議政府施政，主調是沉重黑色。翌日報章，用哪幅相片作頭條配圖，報章頭版是紅色還是黑色，或是又紅又黑，都是判斷，都有立場。

本研究並非要推倒「中立客觀」的神壇，只希望闡明：新聞客觀性只是尋真的手段，只是工具，不是目標。強調「中立」、「平衡」只因為「真相」一時不可得，唯有退而求其次，暫時不追到底；或因為不涉真假，只涉價值觀，故羅列意見以平衡報道。而且，有些價值觀是社會公認要維護的，例如有人說謊，有人說話自相矛盾、雙重標準、欺凌弱小、權貴濫權等，記者應要指出，不須故作中立平衡。

然而，不少新聞工作者礙於真相難求，或時間逼人，慢慢習慣把權宜之計當作標準工序；又或自欺欺人，把中立客觀當作最高目標；猶有甚者，把中立客觀解釋成不作為的藉口、新聞審查的暗器。

美國專業記者協會早於1996年，已於專業守則中去除「客觀」字眼，強調尋真、準確性、核實、監督權貴及為弱者發聲等價值。<sup>6</sup>縱使真相未必可得，但我們可以嘗試「在一堆有爭議的事實中接近

---

<sup>6</sup> 美國專業記者協會之守則，見：<http://goo.gl/eJONr>。

真相」。<sup>7</sup> Ryan 則把新聞客觀性等同科學客觀性，核心原則相似：<sup>8</sup>

- 一、準確、完整、精細、清晰；
- 二、留意新證據與另類意見；
- 三、質疑權威，亦要提防自以為是；
- 四、公道、抽離、不偏不倚，不能為社會政治議題服務；
- 五、策略性決定須邏輯上一貫。

無疑，這些專業理想，每天都在忙碌的工序中消磨，但尋真的原則，仍然應該是記者的追求；抽離與不涉個人喜好很重要，但不應以此為由，放棄求取事實與真相；當眾說紛紜、真偽難分時，當然要聽取各方意見，但黑白分明時不應中立，真相毋須謊話來平衡；「中立」也是一種立場，是需要解釋的立場，並非自然而然的道德高地。

本研究發現，一些傳媒傾向以極端被動的方式理解「客觀」，詰問當權者被認為偏頗，官方權威被視為理所當然，官員說話不須核實而自證為真；滿足於平衡報道而不追求完整清晰，鼓勵抽離、緊跟程序，謂之做得好。

管控系統與文化認知系統，俱能強化規範系統中的「被動客觀」。極端分工令記者忙於瑣碎工作，無餘力主動思考；管理層不提供支援，無人協助核實查證，資淺記者只能接受「被動客觀」之做事標準，堆砌各方意見而不求甚解，及時完成工作，未必做得好，最少不會被指偏頗。

---

<sup>7</sup> Carr, 1961:26.

<sup>8</sup> Ryan, 2001:3-4.

今時今日，記者比任何時候更需要「積極客觀」，官方輿論機器資源充沛，無時無刻提供官方訊息，惟恐記者不用；通訊科技新發展，開啟更多戰線，訊息如海嘯，零碎、混亂而不完整，記者需要更主動去蕪存菁，反覆核查，提供有意義的圖像。記者不單是被動的守門人，而是「釐清者」(sense-maker)，盡力澄清謠言，主動求證，揭破謊言；也是「新聞策展人」(news curator)，在資訊大海中過濾訊息，再組成有意義的篇章；也是「知識經紀」(knowledge broker)，綜合資訊，化繁為簡，透析時局；更是尋真者(fact-finder)，於有爭議事件中潛航，期望靠近真相，以盡量準確的方式呈現真實。

要做到這一切，需要時間、精力，需要機構充足的支援，還有免於刻板規律的自由自主。但很不幸，這正是眾多傳媒工作者所缺乏。

### 6.3 最後，還有七個自問自答

是一種感覺，是一種模式，一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內化了一套(價值觀)……但這個無形的框有其目的……有很多方法令你覺得不是審查……我會形容是高明的手段。  
—W.T.K.

他們懂得去抗衡，他們知道要妥協；他們戴著腳鐐跳舞，他們冠冕堂皇地跪倒。他們有自由，卻沒有自主；他們會飛，但已不懂拍翼。

「有bite有扒有聲有畫煞有介事講廢話」，<sup>9</sup>我覺得我們 exactly 就是這樣。  
—M.Z.T.

這個生態系統，不一定汰弱留強，往往汰強留弱；適者生存，但強者不適，有堅持者不適。無形的牆，不言說的規則，就在陽光空氣中；每天是永恆的掙扎，掙扎在不為人知的平淡日常。自由，就在嚴密的體制中流逝；專業價值，被洪流沖刷侵蝕，漂到迷離境界，面目全非。

我不覺得我是一個記者，我寫的，不是我所學的新聞。  
—N.L.H.

---

<sup>9</sup> 「有bite有扒有聲有畫煞有介事講廢話」一語，乃香港電視行業名言，出自一位新聞主管對下屬的訓斥；bite指soundbite；「扒」屬行內術語，即standupper，電視記者拿著話筒於鏡頭前做報道的表達手法。

心力，耗盡於忙亂規律中；資源，投放於無法著力處。

收起我們的刀，給我們木棍，然後叫我們去打仗。

—D.J.U.

本書展示了結構性審查的微細操作，沒有人戴著「審查」的臂章操控新聞，沒有人暴跳如雷說三道四，一切隱沒於組織架構運作細節中，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闡述至此，尚有多個問題需要解答。本書最後一章，以七個問題作結。

回到書首提及，1994年的「六君子」事件。當年亞洲電視高層干預新聞部，抽起西班牙電視台拍攝的六四鎮壓紀錄片，引發六位新聞部中高層人員集體辭職。今天回望，很自然聯想到一個問題：

一，為何「六君子事件」後，類似機構高層或新聞部管理層與下屬直接衝突，導致新聞從業員集體辭職的事件無再發生，是否代表有更微妙的遊戲規則？

也許本書就是答案。「六君子事件」既有前例，機構及新聞部主管們前車可鑑，從別人的錯誤中學習，毋須來到粗暴干預的一步。前瞻「危機」所在，自能透過制約措施，把麻煩新聞消滅於萌芽階段；就算要干預，都是層層滲入，以資源不足、時間不夠等理由，把敏感話題擱於一旁；長年的人事更迭與社教化過程，培養了一群識時務的把關人，在管控系統中先發制人，把審查掩埋於日常運作中。

當然，「六君子事件」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筆者亦查問過事件其中一位主角，當年六人共同進退，一方面是「亞視兄弟班」，情



同手足；二來，那是「美好的九十年代」，新成立的媒體湧現，記者工作機會多，集體辭職後不愁無工開，因此很快決定有一致行動，引發社會關注。

2014年「七警事件」激發大批TVB記者公開聯署質疑主管的編輯判斷，性質類似，但結果迥異。一來，當天「七警打人」片段並非粗暴地不准播出，只是旁白較低調處理；其次，無TVB記者辭職抗議，部分與行業生態有關，主流傳媒若非緊縮開支，就是趨向靠牆建制，一職難求，不容易瀟灑求去；再者，高調辭職的政治標籤，今時今日，會是負累而非光環，高調辭職者未必容易在行內立足。

二，為何一些傳媒，不投資於人力，又不重視製作優質節目，都能生存下去？

研究發現，部分傳媒寧願聘請經驗淺的記者，欠培訓、不重視傳承，亦不鼓勵深度調查報道。大家可能疑惑，如此管理文化，彷彿時光倒流一百年。豈不是犧牲人才，打擊士氣，窒礙創新？如何能進步？為何仍然可以生存，甚至在市場上佔領先地位？

各有前因，以TVB為例，它一直佔香港免費電視市場超過八成收視。2016–2017年，當它唯一直接競爭對手亞洲電視不獲續牌前後，新的免費電視（包括港台電視、ViuTV及奇妙電視）陸續登場，但暫時未能威脅「大台」。TVB用大氣電波廣播，仍是各電視台之中訊號滲透率最高，有先天之優勢。

對普羅大眾而言，輕鬆的軟性節目合口味，嚴肅節目不一定受歡迎，《世界零距離》之成功可見一斑。何謂「優質」節目，人言人殊，對一群下班後希望輕鬆娛樂的都市人，沉重的時政節目可能倒胃口。有甚麼觀眾群就有甚麼節目，TVB長年的大台地位，亦反過

來塑造觀眾的口味，互為影響，反饋循環。優質、深度的新聞節目，對收費電視吸引客戶訂購有幫助；對「獨大」的免費電視台而言，只對其「合格」與聲譽有影響，反而輕鬆而「非政治化」的資訊節目，能吸引廣告商購買宣傳時段。故從市場結構而言，幾近壟斷的免費電視台，並無大誘因投資製作深度節目，卻仍能活得好。

三，香港很自由，常常聽到批評政府的聲音。所謂審查，根本不如你所說的嚴重吧？

本書旨在呈現潛藏機構運作中的結構性審查架構與行徑，萬事俱備，不代表整套機器無時無刻全速開動運作。例如一位扮作中立持平公正的球證，全場球賽89分鐘正正常常，無懈可擊；但吹黑哨只需一分鐘半分鐘，一個半個重要決定，就有可能改寫戰局。養兵千日，用於關鍵時刻，其餘時間，可以長期偽裝，外衣只需在關鍵時刻撕掉，甚至不須撕破面具，借勢行事就可以了。

結構性審查最頻密之時，在政治敏感關鍵時刻。深度訪談中發現，「六四」周年紀念報道，長年是傳媒高層關注點，有關中國採訪亦格外小心；香港事務中，各類型反政府的社會運動，也是結構性審查啟動得最頻密之時。政治烽火總有稍息之時，無重大爭議期間，於無關痛癢處小罵大幫忙，也能建立傳媒監督政府形象，佔據道德高地。

結構性審查之分析可見，香港媒體有莫大隱憂，幾乎所有電子媒體皆陷於資源緊絀狀態，用人唯「新」，以減開支，同時要應對更多頻道更密集的節目，一直把新聞運作推向更被動更規律化的一端。再者，審查架構已在，只要話事人一剎那間轉念，變故說來就來。現時的自由，非常脆弱。

#### 四，哪個傳媒最有韌力？最能抵擋得住洪流？

紅色資本滲入香港各行各業，所謂「中字頭」的中資股，市值已超過恆指成分股一半。阿里巴巴收購了《南華早報》，中國傳媒大亨黎瑞剛入主TVB成為大股東，透過收購媒體直接操控，格局已成，主流電子媒體還有希望嗎？

有線新聞及Now新聞雖然編採方針相對主動進取，管理層亦意識到不能自陷運作規律，但兩台的新聞從業員都明白，他們今天擁有的自由，全賴大老闆一念之仁。深度訪談中，兩台的被訪者皆談到，小小電視台跟大老闆的地產與電訊王國比較，只屬九牛一毛；當有一天傳媒擁有者心意轉變，或不想無止境虧蝕，或有人出高價收購，作為小小員工，根本無能力阻止。

有線新聞的處境，正是現實寫照。有線寬頻於2016年業績，錄得九年來最大虧蝕，超過三億元；公司於2017年中易主後，新老闆能否忍受現時有線新聞較進取的中國報道及調查報道？削減哪方面開支？新東主明言新聞取向將多做財經新聞，探討「一帶一路」、「大灣區」發展等，這些項目都是「發展是硬道理」的國家主旋律。而這亦正是新聞機構同時為商業機構、難以保障自由的原因：以商業原則止蝕、減人手、改節目風格，貌似天經地義；以老闆身份任免人事，直接改變管治手法，主導節目板塊，又是理所當然，因為老闆有權。

有線新聞長年的聲譽與風格，凝聚了一群願意付費的觀眾，若新老闆接手後，一下子編採政策急轉彎，未必是聰明一著。但這片相對自由的土壤，不幸地，可能是即將結束的一次悠長假期。

出乎意料地，屬政府部門的香港電台，看來是相對能站得更穩的媒體。

財政「陰乾」與人事操弄俱在，但政府公務員與撥款制度有規有矩，不能讓主管任意妄為。港台員工薪酬待遇跟從政府編制，工資最高，留得住資深從業員，文化資本鴻溝較小；有工會，抗衡力量最強大，又有專業守則與公務員制度作護身符，抗衡時能更理直氣壯。

這是最有希望、最自由的綠洲，但地下水開始無。

—F.T.S.

五，傳媒是商業機構，受老闆控制，處處如是，香港有何獨特？

香港有關新聞自由的爭論，常有這種論調：傳媒老闆炒人？他有權。老闆換總編輯？他有權。中資機構抽廣告？它有權。

其他民主政體國家地區，遇上類似情況，也許不必太在意，因為社會多元，政黨會輪替，權力歸人民，傳媒或醉心賣文牟利，或持守一貫信念，傳媒老闆不須仰權貴之鼻息，記者求職擇業選擇也多。香港的體制，傳媒數量多，但政經權力核心無輪替，傳媒老闆多，但老闆們的老闆，只有一個。

在西方國家，所謂「有權勢者」包括大財團、廣告商、政府組織，甚至民間組織、環保團體，亦有能力影響媒介，以至執筆的記者，有時亦會被視為「有權勢者」，因為民主開放社會下，權力較分散、新聞真自由，「當權者」有很多，不會永遠是同一群人；政黨每隔幾年會輪替，沒有人人不敢得罪的「佛地魔」。

香港的傳媒，沒有嚴重的跨媒體壟斷問題，但每位財團大亨，難免與內地有生意往來，國家透過收買、籠絡、統戰傳媒老闆，影響新聞內容。國家領導人愛叫香港向澳門學習，我們就看看澳門傳

媒：澳門有辦報自由有言論自由，但澳門報章，黨報一報獨大，公共廣播凋零；政壇醜聞、各種私相授受，口耳相傳於民間，卻絕少得到主流傳媒重視；社會監察力量微弱，他們的言論自由如空谷呼喊，主流傳媒充耳不聞。當主流傳媒一一被收編被收購，受頌揚的澳門模式，看來是香港未來的寫照。

#### 六，既然如此，還要入行嗎？做記者還有意義嗎？

這個問題，是某次大學入學講座中，一位中學女生的問題，她很明白現時傳媒生態，自由無保障，前景不樂觀；那麼，應否選讀新聞，準備做記者？

無疑，這個行業非常冷酷。

多次傳媒的「裁員節流」或以「羞辱」方式逼人辭職的事件，<sup>10</sup>有如行軍打仗間，突然有人傳聖旨，謂軍糧不足，或曰重新調配兵馬；結論，卻是先拿下那位受人景仰、負責衝鋒陷陣的大將軍的人頭。那是真的資源不足，還是不想見到有人衝鋒陷陣？那真的是調兵遣將策略，還是要自毀長城，除掉有威信的領軍人物？

部分傳媒的主事者就是不喜歡你的經驗，記者最好像一張白紙；它就不想你有新聞熱誠，記者最好做一個錄音機；它就不想你成為後輩的寶貴資源，因為怕記者「學壞」。

記者晉升的階梯上，經常面對難以兩全的局面，你想在夾縫中忍辱負重、堅持底線、力挽狂瀾，卻發現往往在消磨意志中助紂為虐。

---

<sup>10</sup> 例如《明報》於2016年突然辭退執行總編輯姜國元，及TVB把「七警事件」中負責的編輯採主調職等。

也許香港其他機構、其他專業，都面對類似情況。

看看香港各種組織架構，就是不介意犧牲人才，最怕你有原則有堅持，最歡迎你甘願當組織機器裏的螺絲釘；好些主管，就是不想見到有士氣的團隊，最好是一盤散沙，方便逐個擊破；口說鼓勵創新，卻更重視政治正確，所謂創新，是請你乖乖因循，在零風險下創新。

香港眾多新聞媒體，薪金不留人，加上車衣女工分工細，記者成長慢；有經驗有見識的，留不住，老闆也不想留住，除之而後快。

我告訴那位疑惑的中學生：想在香港找一個正常的新聞部，很奢侈，但仍然有；前景不樂觀，但不至於萬馬齊瘡；這個行業，仍有廣闊空間：網絡媒體「第五權」。

往日媒體被封為「第四權」，負起監察政府的角色，全因傳媒獨立於權貴之外，堅持編採獨立，拒絕奉迎屈膝。然而，觀香港大勢，第四權被收編，逐漸融合成建制的一部分，歌功頌德，小罵大幫忙；減少偵查報道，卻投入資源風花說月，追隨領導人之一顰一笑與重要講話。由監察政府至呵護權貴，「第四權」之地位亦隨之消失。

公民社會興起，網絡力量的加持，各種「自媒體」如公民組織、網絡媒體、網上電台、博客群體，皆能主動發布消息、監察政府，甚至搶佔先機、設定議題，出現「第五權」之說。往日，公民勢孤力弱，無力親自監察政府，要假傳媒之手代勞，才促成主流傳媒「第四權」的光環；如今，庶民善用互聯網通訊工具，門檻低，每個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平台，吶喊發聲，打破話語權的壟斷，既監察政府，亦監察傳媒，「第四權」影響力驟降。

當然，網上新聞媒體的限制與弱點，可以一口氣數十個八個：財源不穩、尚未有人尋到穩健的經營模式、資源貧乏、未能策劃有

組織的調查報道、一般缺乏專業之新聞把關制度、公信力未足、接觸的讀者層面較窄等等。新媒體縱有諸般不是，卻始終是黑暗中的希望所在，廢墟中的一盞明燈。

世界在變，一雞死一雞鳴，不要太快絕望。

### 七，個人力量，有可能抵擋洪流嗎？有可能改變現狀嗎？

時局大勢，如滔滔流水，個人力量改變不了大潮流向，但有機會可以改變大船軌跡；只是，機會未必屬於你，機會只留給極少數處於權力支點的掌舵人。

做一個壞的掌舵人，可以把新聞機構一代的清譽毀於一旦；當一個好的掌舵人，可以在湍流中穩定航行，帶領人探索從未見過的風景。

無名小卒，急風大浪中，無著力處，又能做甚麼？

在傳媒環境，每一位旁觀者都能提供助力；公眾作為觀眾，對那些排除萬難、嘗試逆流而上、帶大家闖到未知境地的大船小艇，請多加鼓勵，買報、訂閱、捐錢，為他們添一點燃料，抵住激流；對那些平平無奇、得過且過的新聞，請不屑一顧，就讓他們消失在下游安全地帶水波不興的河岸轉角處。

處身體制之中，多少人在經濟的壓力下忍讓，在政治的壓力下屈膝，在榮譽的引誘下獻媚，在自身的不足下得過且過。也許，我們只是未認清結構性的操弄下，個體被擺布的方式。

當我們明白，每種專業倫理道德，都有游移的界線；高尚目標，同時是操控手段，專業的底線自然不會隨任意的詮釋起舞。當我們明白，日常的規律不一定百分百天經地義，前設皆有緣由，背後或有黑手，操控暗藏其中，我們能更加警覺，好些金科玉律只是金

玉其外，沒有必然馴服的理由。當我們明白，管控的手段滲入每個運作層面，自能預早防範，知己知彼，探求出路，增添抗衡的資本。

微小的力量，未必能改變很多；但微小的力量，能保留一些好重要的支柱……保存到的東西可以走得幾遠，就看我們的氣數。<sup>11</sup>

處身激流中，站穩腳步，堅守所珍重的價值，已是莫大的功德。

---

<sup>11</sup> 筆者於2013年一個訪問節目中，前廣播處長張敏儀的說法。



# 跋

童話一樣的布拉格，橫跨莫爾道河的查理大橋，雕像在說故事，巨鷗漫天飛翔；當地人總會告訴你，查理大橋經得起時間考驗，是因為當年建造時，運用了特別的工藝：工匠用蛋漿混合石頭，砌成橋身橋臺，堅固無比，五百年不倒。

同行的朋友說，雞蛋與高牆，原來可以完美配合。

宮崎駿作品《風起了》，故事主角是二戰時日本零式戰機設計師堀越二郎，他夢想設計飛機，那個時代，這夢想是詛咒，因為只能設計戰鬥機。二郎成功了，他的完美工藝，殺人無數；機師，也沒多少活著回來。

多少人為了追逐夢想，在高牆的夾縫中堅持，夢圓一刻，卻原來是助紂為虐，是稱職的蛋漿。

電影《V煞》有句對白。女主角在牢房裏，絕望中，讀到一封前人留下的信：

我們的尊嚴不值多少錢，但它卻是我們真正擁有的。它是我們最後的一寸領地，在那一寸領地裏，我們是自由的。

這寸心，是那麼小、那麼脆弱，卻是這世上最值得擁有的東西。我們決不能失去或放棄它。我們決不能讓別人奪走它。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參考文獻

- 方志恆編 (2015)。《香港革新論》。香港：漫遊者文化。
- 朱學勤 (2008)。〈三十年來中國：兩場改革〉。陳婉瑩、錢鋼編，《中國傳媒風雲錄》(頁29-42)。香港：天地圖書。
- 孫逸仙 (1927)。《孫文學說》。中國：新時代教育社。
- 陳韜文、李立峯 (2007)。〈再國族化、國際化、本土化的角力：香港的傳媒與政治〉。《二十一世紀》，6月號，頁43-55。
- 盧瑋鑾 (1983)。《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 (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
- 錢鋼 (2008)。《中國傳媒與政治改革》。香港：天地圖書。
- 羅伯特·哈克特、趙月枝 (2005)。《維繫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沈蒼、周雨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蘇鑰機 (2009年12月)。〈從四川地震報道看新聞專業主義〉。「跨文化傳播國際研討會」論文，武漢。
- (2011)。〈甚麼是新聞？〉。《傳播研究與實踐》，第1卷，第1期，頁1-24。
- (2015年8月13日)。〈傳統新聞媒體仍然主場〉。《明報》，頁A32。
- 蘇鑰機、陳韜文 (2011)。〈傳媒公信力評分因年齡層而變化〉。《傳媒透視》，1月號，網址：<http://goo.gl/7BYs0m>。
- Altschull, J. H. (1984). *Agents of Power: 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Longman.
- Andre, J. (1992). "‘Censorship’: Some Distinctions." In E. D. Cohen,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pp. 77-8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sp, K. (2014). News Media Logic in a New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ism Studies*, 15(3), 256-270.
- Bennett, T. (1982). "Media, ‘Reality,’ Signification." In M.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pp. 285-306). New York: Methuen & Co.
- Benson, R., and Neveu, E. (Eds.) (2005).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 Fie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erkowitz, D. (1997). *Social Meaning of News: A Text-Rea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Bird, S. E. (2009). "Tabloidization: What is It, and Does It Really Matter?" In B. Zelizer,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 (pp. 40–50). New York: Routledge.
- Boczkowski, P. J. (2010). *News at Work: Imitation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Abund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1977[1972]).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1[1982]). "Censorship and the Imposition of Form." In J. B. Thompson (Ed.), G. Raymond and M. Adamson (Trans.),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pp. 137–15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8). *On Television*. New York: New Press.
- (2005). "The Political Field, the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n R. Benson and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 Field* (pp. 29–47).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yd-Barrett, O. (1995). "The Analysis of Media Occupations and Professionals." In O. Boyd-Barrett and C. Newbold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A Reader* (pp. 270–276). London: Edward Arnold.
-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 326–335.
- Carr, E. H. (1961).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astells, M. (2010). "Communication Power." In J. Curran (Ed.),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Champagne, P. (2005). "The 'Double Dependency': The Journalistic Field between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R. Benson and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 Field* (pp. 48–63).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an, J. M., and Lee, C.-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han, J. M., Lee, C.-C., and Lee, P. S.-N. (1996).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an, J. M., Lee, P. S.-N., and Lee, C.-C. (1996). "Professionalism: Roles, Values and Ethics." In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A. S. Y. (2003). *Self-censorship and the Struggle for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Cohen, A. A. (Ed.) (2013). *Foreign News on Television: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Global Village?* New York: Peter Lang.

- Cohen, B. (1963).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 Cohen, E. D. (1992).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 B. (2008). Foreword. In F. Caso, *Global Issues: Censorship*.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 Communication Authority of HKSAR (2014). *General Code of Practice in TV Programme Standard*. Retrieved online at: <http://goo.gl/oumCHT>.
- Cunningham, B. (2003). "Re-thinking Objectivity."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42.2(July/August 2003), 24–32.
- Darras, E. (2005). "Media Consecr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In R. Benson and E. Neveu (Eds.),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 Field* (pp. 156–173).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ayan, D., and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nnis, E. E., and Merrill, J. C. (1984).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In E. E. Dennis and J. C. Merrill, *Basic Issu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A Debate* (pp. 103–118). New York: Macmillan.
- de Botton, A. (2014). *The News: A User's Manual*.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Diamond, J. M. (1998).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DiMaggio, P. J., and Powell, W. W. (1991). Introduction;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In W. W. Powell and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1–40, 63–8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nsbach, W., and Patterson, T. (2004). "Political News Journalists: Partisanship,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Roles in Five Countries." In F. Esser and B. Pfetsch (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Cases, and Challenges* (pp. 251–2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rham, M. G. (1998). "On the Relevance of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to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The Case for 'Strong Objectiv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May 1998), 117–140.
- Elliott, P. (1972).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Entman, R. M. (2003). "Cascading Activation: Contesting the White House's Frame After 9/11."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4), 415–432.
- Esser, F. (2013). "Mediatization as a Challenge: Media Logic Versus Political Logic." In K. Hanspeter et al. (Eds.),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Mediatization* (pp. 155–176).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Evetts, J. (2003).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8(2), 395–415.

- Fairclough, 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 Fenby, J. (2000). *Dealing with the Dragon: A Year in the New Hong Kong*. London: Little, Brown & Co.
- Fish, S. (1999). *The Trouble with Principl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1997). “News and Nonevents: 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In D. Berkowitz (Ed.), *Social Meaning of News: A Text-Reader* (pp. 210–2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Fournier, V. (1999). “The Appeal to ‘Professionalism’ as a Disciplinary Mechanism.” *Social Review*, 47(2), 280–307.
- Freidson, E. (2001).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iedland, R., and Alford, R. R. (1991).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W. W. Powell and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232–2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ung, A. (2007). “Political Economy of Hong Kong Media: Producing a Hegemonic Voic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59–171.
- Galbraith, J. K. (1984). *The Anatomy of Power*. London: Hamish Kamilton.
- Gans, H. J. (2009). “Can Popularization Help the News Media?” In B. Zelizer,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 (pp. 17–28). New York: Routledge.
-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tlin, T. (2003).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asser, T. L. (1992). “Objectivity and News Bias.” In E. D. Cohen (E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pp. 176–18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ing, P., and Elliott, P. (1979). *Making the News*. London: Longman.
- Green, J., and Karolides, N. J. (2005). *Encyclopedia of Censorship*.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 Halberstam, J. (1992). “A Prolegomenon for a Theory of News.” In E. D. Cohen (Ed.),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pp. 11–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aniel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Sound-bite News: Television Coverage of Elections, 1968–1988.”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1), 5–24.
- Hampton, M. (2008). “The ‘Objectivity’ Ideal and its Limitations in 20th-Century British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9(4), 477–493.
- Handel, M. J. (Ed.) (2003).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Classic, Contemporary, and Critical Reading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Hanitzsch, T. et al. (2011). Mapping Journalism Cultures Across N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12(3), 273–293.
- Hardy, C., and Maguire, S. (2008).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R. Greenwood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pp. 198–216).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Herman, E. S., and Chomsky, N. (1999). “Manufacturing Consent.” In H. Tumber (Ed.), *News: A Reader* (pp. 166–1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m, P. (1995).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in Norwegian Fisher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3), 398–422.
-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1997). *The Die is Ca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the Handover of China*. Annual Report.
- (2002). *The Line Hardens*. Annual Report.
- (2005). *A Change of Wind*. Annual Report.
- (2007). *Shrinking Marg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Annual Report.
- (2009). *Macau Takes the Lead*. Annual Report.
- (2010). *The Vice Tightens*. Annual Report.
- (2011). *Two Systems Compromised*. Annual Report.
- (2012). *New Leader Raises Fears*. Annual Report.
- (2013). *Dark Clouds on the Horizon*. Annual Report.
- (2014). *Press Freedom Under Siege*. Annual Report.
- (2015). *Journalists Caught Between Two Fires: Hong Kong Media Faces Serious Harassment and Self-Censorship*. Annual Report.
- Hughes, R. (1976).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 Hong Kong and its Many Faces* (2nd Ed.). London: Andre Deutsch.
- Iggers, J. (1998). *Good News, Bad News: Journalism Eth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Ingle, S. (2015). “Orwell: Liberty, Literature and the Issue of Censorship.” In G. Kemp (Ed.), *Censorship Moments: Reading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Censorship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pp. 149–156). London: Bloomsbury.
- Ingram, P. G. (2000). *Censorship and Free Speech*. Hants: Dartmouth.

- Jansen, S. C. (1988). *Censorship: The Knot that Binds Power and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5). “‘Every Idea is an Incitement’: Holmes and Lenin.” In G. Kemp (Ed.), *Censorship Moments: Reading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Censorship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pp. 141–148). London: Bloomsbury.
- Jeperson, R. L.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Effects,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W. W. Powell and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143–16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ohnson, T. J. (1972).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 Johnstone, B., (2008).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 Malden, Oxford: Blackwell.
- Jones, D. (Ed.) (2001). *Censorship: A World Encyclopedia*. Chicago: Fitzory Pearborn.
- Kemp, G. (Ed.) (2015). *Censorship Moments: Reading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Censorship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London: Bloomsbury.
- Kessler, L., and McDonald, D. (1989). *Mastering the Message: Media Writing with Substance and Style*. Belmont, CA: Wadsworth.
- Kieran, M. (1997). *Media Ethics: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Westport, CT: Praeger.
- Kovach, B., and Rosenstiel, T. (2010). *Blur: How to Know What’s Tru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New York: Bloomsbury.
- (2014).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3rd Ed.)*.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 Larson, M. S.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C.-C. (1997). “Media Structure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M. K. Chan (Ed.), *The Challenge of Hong Kong’s Reintegration with China* (pp. 113–14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2), 55–73.
- (2000).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Economy: Media Structure, Press Freedom, and Regime Change in Hong Kong.” In C.-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288–336).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L. F. (2007a). “Hong Kong Citizens’ Belief in Media Neutrality and Perceptions of Press Freedom: Objectivity as Self-censorship?” *Asian Survey*, 47(3), 434–454.
- (2007b). “Strategic Interaction, Cultural Co-orientation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34–147.
- (2012). “Remediating Prior Talk and Constructing Public Dialogue, Newspaper Coverage of Political Talk Radio Discussions in Hong Kong.” *Journalism Studies*, 13(4), 583–599.



- (2014). *Talk Radio, the Mainstream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L. F., and Chan, J. M. (2009).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Hong Kong Med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 112–133.
- Lee, F. L. F., and Lin, A. M. Y. (2006). “Newspaper Editorial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censorship in Hong Kong.” *Discourse & Society*, 17(3), 331–358.
- Lee, P. S. N., and Chu, L. L. (1988). “Inherent Dependence on Power: The Hong Kong Pres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edia, Culture, Society*, 20, 59–77.
- Lichtenberg, J. (2000). “In Defence of Objectivity Revisited.”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238–254). London: Arnold.
- Liebling, A. J. (1981). *The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 Ma, N. (2007). “State-Press Relationship in Post-1997 Hong Kong: Constant Negotiation amidst Self-Restraint.” *The China Quarterly*, 192, 949–970.
- MacGregor, N. (2011).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 London: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 Maras, S. (2013).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 McLuhan, M. (2002).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In K. Askew and R. Wilk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Media: A Reader* (pp. 18–26). Oxford: Blackwell.
- McManus, J. H. (1994a).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1994b). “What Kind of Commodity is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 787–805.
- McQuail, D. (1992).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erritt, D. (1999). “Public Journalism and Public Life: Why Telling the News Is Not Enough.” In H. Tumber, *News: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s, C. W. (1956).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lotch, H., and Lester M. (1997).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u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In D. Berkowitz (Ed.), *Social Meaning of News: A Text-Reader* (pp. 193–209).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osco, V. (200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Müller, B. (Ed.) (2004). *Censorship and Cultural Regulation in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Rodopi.
- Muñoz-Torres, J. R. (2012). “Truth and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natomy of an

- Endless Misunderstanding.” *Journalism Studies*, 13(4), 566–582.
- Munson, E. S., and Warren, C. A. (Eds.) (1997).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Neveu, E. (2007). “Pierre Bourdieu.” *Journalism Studies*, 8(2), 335–347.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verholser, G. (2006). *On Behalf of Journalism: A Manifesto for Change*. The 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etrieved on November 22, 2015, at <http://goo.gl/3pfMl3>.
- Pen America (2015). *Threatened Harbor, Encroachment of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Retrieved on November 22, 2015, at <http://pen.org/hong-kong-press>.
- Philo, G. (2007). “Can Discourse Analysis Successfully Explain the Content of Media and Journalistic Practice?” *Journalism Studies*, 8(2), 175–196.
- Picard, R. G. (2010). “The Future of the News Industry.” In J. Curran (Ed.),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2014).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5(5), 500–510.
- Poerksen, B. (2008). “Theory Review: The Ideal and the Myth of Objectivity.” *Journalism Studies*, 9(2), 295–304.
- Porwancher, A. (2011). “Objectivity’s Prophet: Adolph S. Och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1896–1935.” *Journalism History*, 36(4), 186–195.
- Pöttker, H. (2004). “Objectivity as (Self-)Censorship: Against the Dogmatiza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Journalism.” *The Public*, 2, 83–94.
- Powell, W. W. (1991). “Expanding the Scop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W. W. Powell and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183–20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well, W. W., and DiMaggio, P. J. (Eds.)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n, J. (1993). “Beyond Objectivity.” *Nieman Reports*, 47(4), 48–53. Retrieved on November 22, 2015, at <http://goo.gl/IbupkA>.
- Rosenberg, H., and Feldman, C. (2008). *No Time to Think: The Menace of Media Speed and the 24-Hour News Cycle*. New York: Continuum.
- Rosenfeld, S. (2001).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ensorship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D. Gordon (Ed.),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pp. 117–145). New York: Routledge.
- Ryan, M. (2001). “Journalistic Ethics, Objectivity, Existential Journalism,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and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6(1), 3–22.

- Schmidt, J. (2000). *Disciplined Minds: A Critical Look at Salaried Professionals and the Soul-battering System that Shapes Their Liv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2000).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and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 (pp. 175–199). London: Arnold.
- (2001). “The Objectivity Norm in American Journalism.” *Journalism*, 2(2), 149–170.
-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Norton.
- (2010). “Four Approaches to the Sociology of News Revisited.” In J. Curran (Ed.), *Media and Society* (pp. 164–185).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Scott, R.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 (1991). “Unpacking Institutional Arguments.” In W. W. Powell and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164–18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oemaker, P. J. (1996). “Hardwired for News: Using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to Explain the Surveillance Func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3), 32–47.
- Shoemaker, P. J., and Reese, S. D. (2014). *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New York: Longman.
- Smythe, D. (1981).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In M. Durham and D. Kellner (Eds.) (2012),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2nd Ed.)*. Wiley-Blackwell.
- So, C. Y. K. (1999). “Dialectic of Journalistic Orientation: A Study of the Treatment of Government News by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 Y. K. So and J. M. Chan (Eds.),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 to 1997* (pp. 95–136).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007). “Professionalism, Press Freedom and Market Force: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Hong Kong Journalism Industry after the Handov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3, 53–71.
- So, C. Y. K., and Chan, J. M. (1999). *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 to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007). “Professionalism,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 Survey Studie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48–158.
- Soloski, J. (1989).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 Reporting of the News." *Media, Culture, Society*, 11, 207–228.
- Sundar, S. S. (2008). "The MAIN Model: A Heurist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Effects on Credibility." In M. Metzger et al. (Eds.), *Digital Media, Youth, and Credibility* (pp. 73–100).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M. (2005). *Broadcasting and the Idea of the Public*. Presented at Worth Abbey Gaudium Et Spes Conference, July 5, 2005. Retrieved on November 22, 2015, at <http://goo.gl/Q3ZSVF>.
- (2006). *Whose Side Are We On?*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World Congress, Edinburgh, May 28, 2006. Retrieved on October 19, 2015, at <http://goo.gl/F9dZvr>.
- Thornton, P. H. (2004). *Markets from Cultur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rnton, P. H., Ocasio, W., and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4), 660–667.
- (1973).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 (1976). "Telling Sto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 (Fall), 93–97.
-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1995). "The News Net." In O. Boyd-Barrett and C. Newbold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A Reader* (pp. 294–299). London: Edward Arnold.
- (2009). *Wannabe U: Inside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mber, H. (1999). *News: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 (1998).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 In A. Bell and P.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 21–63). Oxford: Blackwell.
- (2005). "Discourse and Manipulation." *Discourse & Society*, 17, 359–383.
- Vos, T. P. (2011). "A Mirror of the Times." *Journalism Studies*, 12(5), 575–589.
- Waisbord, S. (2013). *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ng, B. Y., Lee, F. L. F., and Wang, H. (2013).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News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Journalistic Witnessing.” *Journalism Studies*, 14(4), 491–506.
- Ward, S. J. (1998). “An Answer to Martin Bell: Objectivity and Attachment in Journalism.”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3), 121–125.
- Watzlawick, P. (1976). *How Real is Real? Confusion, Di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Weaver, D. H., and Wilhoit, G. C. (1996). “Professionalism: Roles, Values, Ethics.” In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pp. 125–17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Wong, S. L. (1984). “The Migration of Shanghainese Entrepreneurs to Hong Kong.” In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 and Monographs, No. 60*.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Zelizer, B. (Ed.) (2009).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 Tabloidization, 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 New York: Routledge.
- Zucker, L. G. (1991).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Cultural Persistence.” In W. W. Powell and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pp. 83–10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邊城思想者系列

### 邊城對話

香港·中國·邊緣·邊界

彭麗君 編·2013

### 再見亞洲

全球化時代的解構與重建

羅貴祥 編·2014

### 粵語的政治

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

文潔華 編·2014

### The Invisible Citizens of Hong Kong

Art and Stories of Vietnamese

Boatpeople

Sophia Suk-Mun Law · 2014

### 政治的道德

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增訂版）

周保松 著·2015

### 多重奏

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

周耀輝、高偉雲 著·2015

### 解構中國夢

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  
(1999-2014)

沈旭暉 著·2015

### 廢品生活

垃圾場的經濟、社群與空間

胡嘉明、張劭穎 著·2016

### 當代政治學十講

閻小駿 著·2016

###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

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區家麟 著·2017

## 自由如何失落？審查如何滲透於媒體的運作細節？ 這樣的新聞，你是否看得清楚看得真？



「中立」、「客觀」等專業光環，往往暗藏「殺機」，加上機械化生產線一樣的新聞運作及機構行政權力之巧妙運用，能化審查於無形，把新聞內容淡化、扭曲和轉移焦點，不利於呈現事實真相。本書提出新概念「結構性審查」，檢視香港新聞審查的暗湧，揭露新聞日常運作隱密的一面。

資深傳媒人區家麟，訪談數十位同業，結合經驗與理論，循微觀與宏觀層面，謹慎而冷靜地探尋香港廣播新聞媒體自我約束行為的來龍去脈，闡述操控的二十道陰影。讀者可視本書為審查利器一覽表、專業淪落之警報系統，不只適用於新聞界，其他自主受威脅的專業，也能在這些概念中找到共鳴。



「很多市民和記者都認為主流媒體有自我審查，但要充分了解這些『審查』如何發生，殊不容易。不過，本書把這個千絲萬縷的題目闡釋得有条不紊，而且充滿洞見。區家麟帶著二十年工作經驗回歸校園，這本書展現了理論和經驗結合的威力，是一本所有關心香港社會轉變的人都應該閱讀的書。」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面對幾近無跡可尋的新聞自我審查現象，我們需要曾經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又脫離了這環境的新聞人，借助學術研究的調查和批判能力，深入剖析隱蔽式自我審查運作背後的程式密碼，區家麟的《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為我們提供了解開密碼的鑰匙。」

——劉進圖（《明報》前總編輯、明報教育出版營運總裁）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2-996-770-3



9 789629 967703